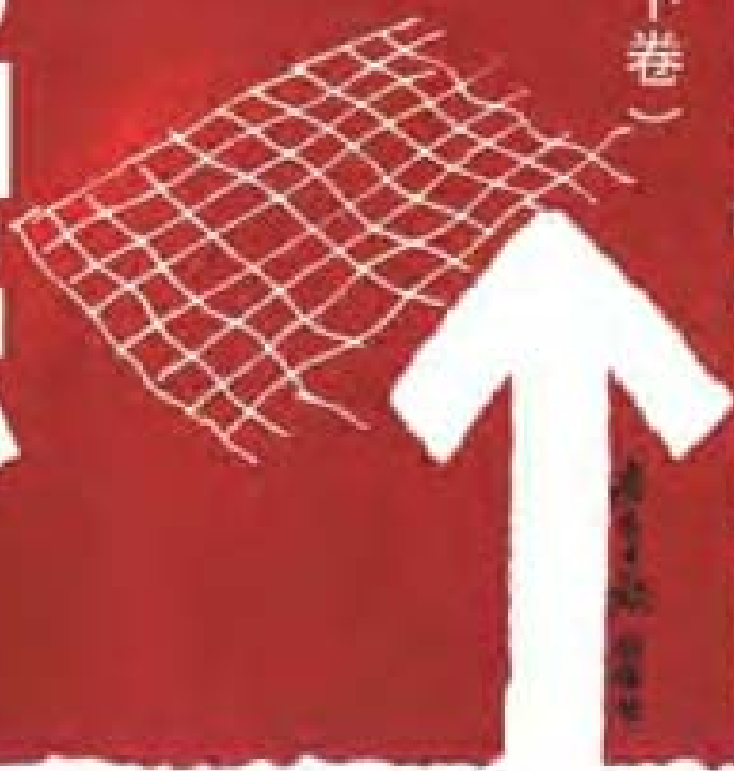


卢跃刚自选集·观察中国（下卷）

卢跃刚 / 著

在高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跃刚自选集/卢跃刚著,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2

ISBN 7-80652-029-5

I. 卢… II. 卢…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869 号

卢跃刚自选集(下卷):《在高层》

卢跃刚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话:(020)87373998-8503

经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中山晶山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15.5

字数:375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版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全套: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在高层

南中国海喻言 (1)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暧昧的国际关系摊了牌,终于使我三年前写作的《南中国海喻言》前两章在《中国作家》和《报告文学》发表,我们虽然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但在现实中,什么时候“爱国”,什么地方“爱国”,什么领域“爱国”,什么形式“爱国”,什么分寸“爱国”,什么渠道“爱国”,什么人“有资格”“爱国”,是被上面严格规定的。所以,媒体包括文学刊物,但凡涉及“外交”,但凡涉及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惶惶如惊弓之鸟。真是一种大荒唐。

《南中国海喻言》的命运便能说明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南中国海喻言》是国内五十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报道南海情况。

我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海:南沙群岛二百多个岛礁八十年代已被周边国家瓜分完毕,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已被开采或正在勘探开采,我国渔民被周边国家大肆抓扣、审判、打死、打伤,大肆抢掠、没收设备,外交不得力,海军束手无策;北部湾有过之无不及。所谓南海主权,仅仅是九条画在地图上的虚线而已。

王恒杰传奇——《南中国海喻言》续篇 (65)

一位老人一辈子从事边疆考古,学术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可是读完这篇报告文学,我相信,谁也不会轻松。这位老人一辈子爱国,却一辈子孤独。

这位老人是一位失去左小臂的考古学教授,一位残疾学者,一位残疾书生。

那些肢体健全,最有“权力”爱国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呢?终让这位独臂老人泛舟南沙,出生入死,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参加了独臂老人在北京八宝山的葬礼。那天,苍天都在为他哭泣。

辛未水患 (119)

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一九九一年《辛未水患》中的判断和预言,一九九八年长江、松花江大洪水全部兑现。我的判断和预言是:一、中国治水有一对基本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即水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利益构成永远冲突;二、中国治水思想,宏观上“堵”始终占上风(注:亦有例外,如二千二百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和灵渠),并影响到了政治理念,微观则是以邻为壑;三、出于利益的短视,宁愿花钱买棺材哭哭啼啼送葬,不愿花钱买药长治久安;四、出于政治的短视,非人性地面对灾难,丧事当喜事办,把灾难当作对当权者歌功颂德的机会,凡此,水灾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加剧。一九九一和一九九八年水灾,本质是一样的:人祸大于天灾。

对中国治水思想和水灾历史、现状的考察,促使我产生了如下想法:一、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由于其“西方中心”背景,由于其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陌生,解释力过于狭窄;二、评价文明社会,特别是评价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制度文明是第一指标,简单用“专制制度”一言以蔽之,很难解释中华文明一统天下、文化传递两千余年而不灭的历史;三、发现了家庭、宗族、社区、乡、县、市、省半径不断扩大的治水的“利益同

心圆结构”，治水首先要调整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才是调整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四、对统治者来说，治水的政治考虑远大于兴利除害。

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 (225)

三峡水坝是中国人的一个宿命，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民族为了一个工程萦回纠缠七十三年才有其始终。一个工程的论证几乎贯穿一个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三峡论证实际上是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治水”思想，即长江治理，应该是“先支（流）后干（流）”，还是“先干（流）后支（流）”；一个是“治国”思想，即是否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实质，就国家重大决策而言，就是允许有反对派，尊重反对派意见，并创造一个保证反对派发言的制度性环境。三峡论证如果没有反对派意见，工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上马，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即使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也承认这个判断。

根据我对三峡工程长期跟踪，我认为，有些问题必须记录在案：一、三峡建设资金，反对派的计算基本准确，即建成后所需动态投资约四千亿至五千亿，还不包括三峡库区地方配套改造投资和其他间接投资，主上派在投资问题上打了埋伏，或者是计算太有出入；二、移民投资管理有明显的腐败黑洞，库区一百一十四万移民将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三、三峡上游每年流进库区的五至六亿吨泥沙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而只有二百亿立方米库容的三峡水库，其寿命将一直面临挑战；四、库区环境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 (325)

什么是“性艺术”？有点儿莫名其妙。“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有点儿大而无当。但是，用“性艺术”来概括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人体油画艺术大展”倒有简洁之妙。“人体油

画”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可不得了。平时门可罗雀的中国美术馆门票两角钱,现在门票两块钱还人山人海,波澜壮阔。“人体油画艺术大展”由一个专题性艺术展览,演变成了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重要社会现象,“人体油画艺术大展”与稍后的“现代艺术大展”,被认为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大悲剧预言性的事件。

这期间,还发生了模特儿起诉画家侵权官司。这场官司一打十年,今年我在报纸上看见模特儿胜诉的消息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 (383)

茅台酒欺负人,贵州醇不服气,所以有了斥资数千万打官司的恶战。这场恶战,持续六七年,直杀得血雨腥风,到今天才以茅台酒停止“贵州醇”生产,贵州醇胜诉而告终。

这是中国酒业恶性竞争的典型案例。

我当时的判断没有错。文章发表后,遭到贵州省的反击,极尽权势造谣中伤之能事,编辑部在中国报告文学会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赴贵州解释,我则坚持己见,坚信报道的事实没问题。时间作出了最公正的裁判。

报告文学新局面的诞生 冯立三 (452)

卢跃刚速写 吴 滨 (473)

我有话要说 卢跃刚 (479)

在底层

自 序 (1)

在底层 (7)

《在底层》一九九六年初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因为文中内容触痛了地方权势者,招致大规模的反击,中国作协在不调查、不与作家对话的情况下,武断地下了“严重失实”等影响恶劣的结论,我亦致书中国作协抗议,《中国作家》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刊登检讨“声明”。《中国作家》一时“洛阳纸贵”,这便是一九九六年中国文学界的“《在底层》事件”。

《在底层》中,我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底层”视角,用“单元逻辑”、“单元阅读”的结构方法,把沈阳下岗职工、贵州山区农民、重庆“海外集团事件”所涉及的冤屈者,把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新闻运作、经济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的奥秘,把工人、农民、记者、报社总编辑、市长、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部长、省长等等似乎不相干的人物、事件和领域,像冰糖葫芦一样串了起来。这篇报告文学不能用传统的报告文学阅读方法来阅读,因为其中既不是“人物”的,也不是“事件”的;既是“人物”的,也是“事件”的。但是,它的主旨很清楚:揭示中国人、特别是底层人严酷的生存处境(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打破幻想,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即生存“自救”,否则没有出路。

以人民的名义——湖南娄底政治生活档案 …………… (73)

我在进入一种愤怒和恐惧的写作状态。

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顾跃明在一九九二年市人大会上,依法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市长案,市长没被罢掉,自己却被“监视居住”二百一十四天,还是那种整人的老套路,在市长积极参与下,公安、检察联合组成专案组,吸收社会一千人等,人大会议一结束,就非法拘禁了顾跃明。先是整经济问题,整了半天整不出来,然后整男女作风问题,牵涉无辜男女数十人,刑讯逼供,惨不忍述。此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大踏步改革开放,娄底却是人人自危,白色恐怖。

“顾跃明事件”涉及我国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身临其境,顿感惊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顾跃明身上发

生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我们(包括我)的身上,颜跃明的命运完全可能是我们(包括我)的命运。

讨个“说法”——《以人民的名义》续篇…………… (145)

调查湖南娄底“颜跃明事件”属报社派遣,但是七千字的调查报告“二百一十四天的较量”写出来后却被“枪毙”,后在《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两会”讨论两院报告期间全文发表。可能是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受,与会代表反响强烈,纷纷质询湖南代表团。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以人民的名义》在《当代》当年第三期发表,发表后,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在《当代》主持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我说,我将以“连续报告”的形式写出《以人民的名义》续篇,因为事件远远没有结束。与会者颇惊讶,因为报告文学写作往往都是一锤子买卖,特别是揭露性的题材。

续篇在当年《当代》第五期发表时,事件仍没有了结。于是在文章的结尾处告诉善良的读者:“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 (205)

不到四万字的文章,关于“傻子”年广九、“傻子瓜子”的经典故事,经典细节多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采访到这些经典故事、经典细节,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傻。我只不过是把上百的记者、作家看到了一笑了之并文过饰非的事儿当了真,只不过按照常识作了判断。通过这些故事细节,我们基本能把握那一时期的“改革家”的情状。

据我调查,“傻子瓜子”在八十年代末衰微,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因为他没有文化,素质不高,不懂现代管理。西方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家,大多是海盗和亡命之徒,大多没文化,可是并不妨碍他们有经营头脑,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傻子瓜子”衰

微的原因不外有二：一、在独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挤压下，年广九经营心态变形；二、违背起码的商业道德，坑害消费者，自毁品牌，“禁止有奖销售”仅仅是导火索罢了。

“关广梅现象”回顾 (255)

关广梅在一九八七年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所领导的辽宁本溪“租赁改革”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她的出名，很大程度因为《经济日报》“姓资姓社”大讨论。一九八八年初，我到本溪调查关广梅租赁改革。我的结论是：一、本溪关广梅租赁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上是一出闹剧；二、一九八七年《经济日报》大讨论也基本上是一出由报社导演的闹剧。

我到本溪发现了两个让我惊诧不已的事实：

一、关广梅任总经理的本溪东明商业集团，没有获得法律资格，关广梅既不是集团的法人代表，也不是下属八个有独立法人资格商店的法人代表。关广梅正是在这种长期不合法的状态下，参加包括党的十三大在内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

二、关广梅那封导致“姓资姓社”大讨论的给《经济日报》的信，是《经济日报》记者、本溪政策研究室“提升”、“拔高”关广梅本意而炮制的。而且，《经济日报》记者对待关广梅的态度前后不一。

我发现，建立法治（当时我用的是“法制”），建立市场经济秩序这样一些改革的目标，却被所谓的“改革”和“改革者”蔑视。我对那种用“运动”的方法搞改革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今天也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春天里的神话 (307)

郑州商战，“亚细亚风波”，是一九八九年后两三年的沉闷气氛中人们能拿出来说的故事。故事本身很精彩。但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的东西却不是人们想象的样子。我的落脚点是评价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明。

我的目光延伸到了北宋汴梁。《东京梦华录》吓了我一跳：当时的汴梁竟是如此繁华。“清明上河图”仅仅是汴梁之一角。交易规模之大，交易方式之先进；人口至少250万，比现在的郑州市区人口多得多……活脱脱呈现出的是商业文明的景象。往上缕，可以缕到发源于河南的商朝；往下缕，可以缕到晚清，浓郁的商业气息绵延不绝。而这一块儿，在评价中华传统文明时被忽视被丢失了。人云亦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事实面前又受到了挑战。

乡村八记 (381)

我必须安顿我负疚的灵魂，于是写了《乡村八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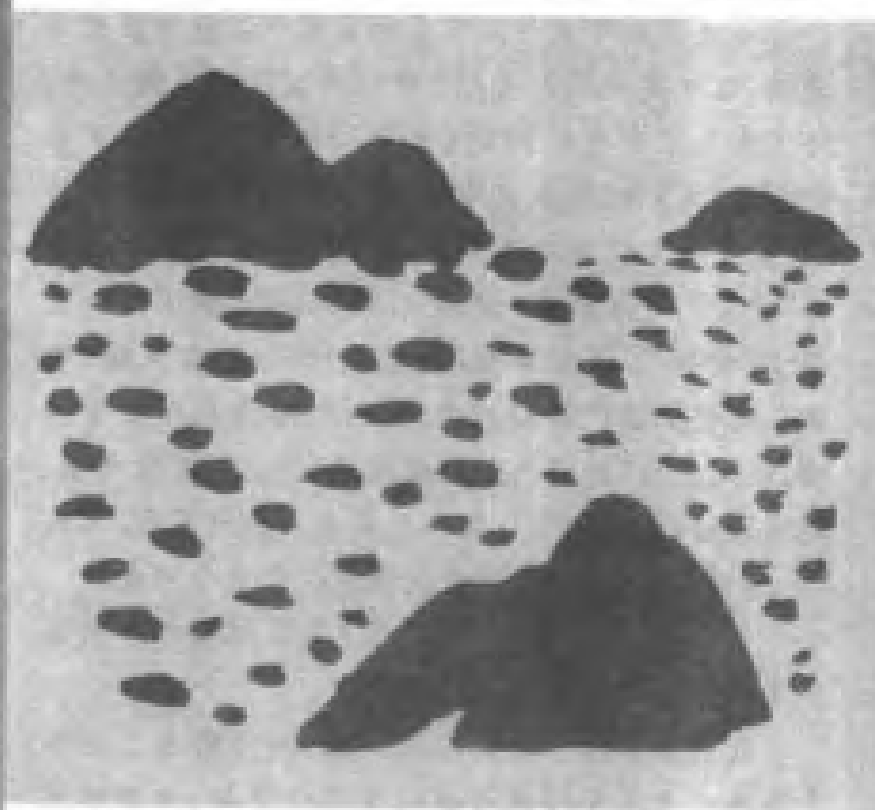
我一九七五年插队回到四川雅安老家，一九七六年主持修建“科学饲养场”，在公社的支持下，以“科学”与“革命”的名义。挖了数十座古坟，取石砌墙。几年后的一天晚上，灯光错暗，我嫂子告诉我，每逢天阴下雨、气候寒冷的时候，便有鬼魂哭泣。当年，由于施工质量不好，拱券垮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成了冤鬼。当地人说，她替了我的命。冤鬼冤魂知冷知热，没有了栖身之所，怎么不哭泣？但愿他们在天之灵能原谅我。

农村经历，颠覆性地改造了我的世界观，培育了我的“底层视角”。

二十年后，我来到了鄱阳湖畔的湖下村，我在一位农民青年家里住了八天，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被剥夺，然后被遗忘。我想说明的是，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庞大群体是怎样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以来半个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怎样被“革命”颠覆，并留下怎样的恶果。

南中国海喻言



据我所知，《南中国海喻言》
是国内五十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
报道南海情况。

世纪末感言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暧昧的国际关系摊了牌，终于使我三年前写作的《南中国海喻言》前两章在《中国作家》和《报告文学》发表，我们虽然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但在现实中，什么时候“爱国”，什么地方“爱国”，什么领域“爱国”，什么形式“爱国”，什么分寸“爱国”，什么渠道“爱国”，什么人“有资格”“爱国”，是被上面严格规定的。所以，媒体包括文学刊物，但凡涉及“外交”，但凡涉及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惶惶如惊弓之鸟。真是一种大荒唐。

《南中国海喻言》的命运便能说明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南中国海喻言》是国内五十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报道南海情况。

我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海：南沙群岛二百多个岛礁八十年代已被周边国家瓜分完毕，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已被开采或正在勘探开采，我国渔民被周边国家大肆抓扣、审判、打死、打伤，大肆抢掠、没收设备，外交不得力，海军束手无策；北部湾有过之无不及。所谓南海主权，仅仅是九条画在地图上的虚线而已。

——作者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司马迁

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话语只能是国家利益。

——汉斯·摩根索

引 言

燃烧的海洋

南中国海给我的印象是出乎意料的。它的广阔，它的深邃，它的神秘，它的浪漫，不知道为什么，却是那么不实在。如果在那里说，“海是蓝色的”，生活在那里的士兵便会告诉你，“那只是最肤浅的印象”。你所期待的那种和睦、和谐，在那里是不存在的。你想象之中的蔚蓝色多少有点虚假。

一只海鸥在南沙群岛的天空回旋，突然也斜着直插而下，锐利地划过海面，“欧—欧—”地鸣叫着。一位海军上校指着凌空远去的海鸥说：“你看海鸥的翅膀！偌大的海洋，都在它的翅膀底下。波涛汹涌，风云变幻，海水真实的颜色，海洋真实的性格，

都在它的翅膀上写着呢。蔚蓝色瞬息即逝,礁盘的绿色却永远在那里盘旋,接下来的便是黑色了。”上校是“老南沙”。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动不动地挺着腰板,灵动的眸子在追踪着海鸥,紫铜色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神色,一种让初来乍到的人很难描述的神色。这种神色让我多少有点陌生和震栗。可以想象,上校经常站在孤独的礁石上观察海鸥,凝视海洋,肩章上的金五星闪耀着晚霞的余晖。此刻,上校正在复制和证明着一种存在,一种必须正视的存在。

我们纵穿南中国海。我们出航了。波澜壮阔的二百一十万平方米的海面把我们像婴儿一样地托起来,然后抛掷到既让我们心驰神往、又让我们忐忑不安的最南端。一九四六年,林遵舰队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从战败国日本的手中接管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方域司随即编制并向世界宣布了中国的南海边疆线——即著名的“九段连续线”。从此确立了中国的最南端是“曾姆暗沙”。“曾姆暗沙”在今天所有的教科书中仍被斩钉截铁地确认着,然而,至今中国的实力并没有伸向那里。七十年代,一位中国元帅曾指着地图感叹:南沙群岛虽然属于中国,但是鞭长莫及呵!中国人曾经在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从秦王朝到明王朝,为了抵御外族入侵,这条万里长城修筑了一千多年。后来,我们发现,外族的铁蹄越过长城,如同越过一条低矮的栅栏。万里长城这一人类奇迹后来成了没有任何威慑作用的雄伟摆设。长城尚且如此,况乎几条画在地图上的断断续续的细线?

这是十二年前的一次秘密航行。

一支由一艘二千吨运输船、一艘油船组成的海军实习编队从湛江港出发了。

时任海军副参谋长的张序三将军担任编队指挥长兼政委。编队向南,缓缓驶出港口。南中国海的波涛拍击着军舰两舷的

甲板,拍击着张序三和一百多名海军官兵激动的心房。

向南,向南,编队直指南沙!

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海军首航南沙海域。

张序三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军。他是胶东荣城人,海里生,海里长。一九四九年,他加入了刚刚组建的海军。一百年前,日本海军在他家乡的海面上打败了北洋水师,让中华民族蒙受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的巨大耻辱。在他近半个世纪的海军生涯中,这种耻辱感深入骨髓。一九五二年,这个渔民的孩子怀着“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抱负来到前苏联列宁格勒海军高级学校。一九五四年,他学成回国后,由驱逐舰长一直干到海军副司令、军科院政委。

然而,作为编队最高指挥官的张序三,对此次航行不敢掉以轻心。南沙海域,对于他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在地图上。任何一幅中国出版的疆域地图右下脚,都有一个小方框,有九条断续线——“传统海疆线”标志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范围。但是,对于一名指挥编队航行、显示和保卫国家主权的海军将军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对远航没有任何帮助的地理概念。

这个“概念”,在今天也变得破碎不堪了。二战后,国民党海军在日军手中收复南海东沙、西沙、南沙诸群岛,并一直占领着南沙群岛的太平岛。而从七十年代开始到一九八三年,南海周边国家无视中国主权,陆续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菲律宾占领了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司令礁;马来西亚占领了弹丸岛、光星仔礁、南海礁、南通礁;越南占领了南威岛、鸿麻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景宏岛、安波沙洲、染青沙洲、中礁、毕生礁。之后,马来西亚又占领了南通礁,越南又占领了柏礁、西礁、无乜礁、日积礁、大现礁、东礁、六门礁、南华礁、舶兰礁、奈罗礁、鬼喊礁、琼礁、蓬勃堡礁、广雅滩、万

安滩、西卫滩、人骏滩、李准滩。南沙群岛早被周边国家瓜分完毕。中国海军编队面临着南海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

更尴尬的是，一九七四年中国海军收复西沙后，一直没有南下，对南海大部分水域十分陌生。编队临出航，却没有中文的南海航海图！只好选用了一张英文版的国际航线图。

这种陌生感揪痛了张序三这个“老海军”的心！

这与五百八十多年前中国人纵贯南中国海的航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南海航行，不能不想到郑和，不能不想到郑和七下西洋。

一九九五年，刚好是明朝郑和首航西洋五百九十周年。

明初所谓“西洋”，概指亚洲南部和非洲东部诸国家和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广大海域。

今天，让我们来恢复世界航海史上辉煌壮观的一幕吧！

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海面上刮起了东北季风。江苏太仓刘家港。一支由六十条海船、二万七千八百名官兵组成的庞大混合舰队，带着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使命出发了，开始了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时代”。

钦差正使（舰队司令）三保太监郑和伫立在帅船上。同代人、名相家袁忠彻描述说，郑和，“云南人。身長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

之前，明成祖曾问袁忠彻：“以三保领兵何如？”

袁中彻答道：“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

在古人看来，相貌不堂堂，才智不超群，怎能担当撼世重任？怎能代表大国出使？

舰队扬帆乘风，旌旗蔽日；浩浩荡荡，气势巍然。

舰队包括宝船（相当于旗舰）、战船（相当于护卫舰）、座船

(相当于运兵船)、马船(相当于综合补给船)、粮船(相当于后勤食品补给船)、水船(相当于淡水储运船)。

史学家对舰队船只的尺寸、形态、功能作了详细考证,本文亦不厌其烦,详列其后。

宝船,为舰队旗舰。长四十四丈四尺(约一百二十五点六五米),宽十八丈(约五十点九四米),最大排水量约一万四千八百吨,载重量大于七千吨,供舰队最高领导层和外国使节乘坐,并装载赐给各国的礼品和各国进贡的珍宝。船体底尖上阔,首尾两头出梢,有纵通龙骨和纵向舳龙骨。船体壳板为多层板,内有多道水密格舱。船有四层甲板,底舱载石以提高船体稳定性能;第二层载士卒、马匹;第三层放置淡水柜,并设有客厅舱室。各层登梯上下。上层为宫座型,分前舱、中舱、后舱。后舱有三层天盘,最上一层为露台。楼内有“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有书房、公廨等”。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

宝船九桅十二帆。首桅立于偏左舷,因中部有起锚绞车与绞盘,第二、三桅和第七、八桅分置前后,均于左、右舷对称;第四、五、六桅除挂带帆竹的硬篷帆外,上部还有小软帆。各桅下都有升帆用绞盘。帆总面积四千五百平方米。尾舵舵杆长约二十米,舵面积约四十平方米。第五桅(主桅),上挂“郑”字帅旗。上层列中炮十六位,中层列大炮八位。导航设备有磁罗盘、星板、测深砣索、计更燃香、航海图等。

宝船船头两侧,绘有铮铮“龙眼”,下托圆月和波澜,与船尾龙凤呈祥彩绘相呼应,如同奔腾嬉戏的出水蛟龙,蔚为壮观!

马船,是快速的综合补给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八桅,其尺度仅次于大号宝船,故也有称之为中号宝船。海上连续航行数月的一切物资从被装、军需、生活用品到修船器材、武器装备,还包括牲畜、动物,除粮、水以外,全都由“马船”装载补给。

此外也可作为使团中层行政管员和技术人员等非军事人员的座船,还要携载各国进贡的珍禽异兽。

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五桅。

座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六桅,运载士兵约二、三百人。

粮船,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七桅,每船可载粮两万石以上。

水船,其尺度、载重可能与粮船相似,每船约可储运淡水一千吨。

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达到了二百艘战船!顺太平洋西海岸南下,纵穿南中国海,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概览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泱泱洒洒,极尽中华风度!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郑和舰队也是无与伦比的。

海军少将郑明说:“郑和率领的混合舰队,船舶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多,组织编配之严,舰队航程之远,续航时间之久,航海技术之先进,造船工艺之优异,历史影响之深远,实为中外航海史、造船史、海军史上之壮举!”

明永乐年间,中国海军拥有大小舰船三千八百艘。李约瑟认为,这个规模“超过(同时代)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郑和比葡萄牙探险家迪亚斯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发现印度洋新航线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一四零五年便到达了印度,四十年后,伟大的哥伦布才出生。

而且,欧洲探险家的船队,也就是三五条船、一二百人,船的吨位不超过三百吨。与郑和的混合舰队相比,简直可以说是蚂蚁和大象!

那时,中国对大海并不陌生。

美国学者路易斯·E·丽瓦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来到了南

京。南京是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都城。郑和舰队的大部分战船都是在南京龙江造船厂制造的。皇皇古都,虎踞龙盘;大江上下,惊涛拍岸。这里矗立着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明成祖在一四一六年对她说:“仰维皇考太祖高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版章。中外怀柔,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或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兢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惨,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动魄,莫不错愕。”

以后的情景便不同了。明成祖自豪地告诉这位西方人,中国舰队在神明的保佑下,出入太平洋、印度洋,“驾长风,驭飞帆,蓦数万里,若履平地。略无波涛忧险之虞,歌吟恬嬉,咸获安济”。

整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都在中国舰队的控制之下。

她惊呆了!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舴艋小舟的时候,中国的庞大舰队已经在大洋上歌着唱着,如履平地了!她在努力想象当时宏伟的场面。

她在南京住下了。一住就是两年。一九九四年,她在美国出版了《当中国控制海洋的时候——一四零五至一四三三:龙朝的宝船编队》。为了形象的描述当时东西方的差距,她专门请了一位画家,绘制了一幅非常有趣的插图。她把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三桅帆船与郑和的九桅宝船重叠起来,并在插图下注释,“郑和的宝船(四百英尺)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八十五英尺)”。直观一比,哥伦布可真是小儿科了。

她还打算造三条郑和宝船,美国、欧洲、亚洲各放一条,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时造好,二零零零年时,集中在悉尼奥运会上展出。

.....

全世界公认的事实是,十五世纪初,中国人创造了数千年无古人、数百年无来者的海洋文明。这里应该指出,郑和数百条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不是上帝恩赐的天外来客。明初登峰造极的海洋文明,是汉、唐、宋、元海洋意识、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的结果。没有上千年的积淀,没有前辈的实践和努力,光凭明成祖的意愿,不可能造出数千吨的大宝船,不可能在太平洋、印度洋上航行“若履平地”。事实上,元朝就有数十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抵达南中国海南部的国家和地区。元代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曾记述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通道完全控制在中国人手里。宋朝平均每年造船三千余艘,元代每年建造大小船只五千余艘,技术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所造之船,“大者可载五、六百人”。

那时,中国人对海洋充满了自信。明人郑怀魁在其《海赋》中写道:“迨明皇祖。羽檄三苗,下一尺之诏,飞十丈之 ,破遐方而效顺,称荒服以入朝。于是使臣命中舟师,纪四极,定罗经,认畛域,占风云,辨土色,审道里之远近,分天地乎南北。梓三宝之朱书,垂百代以为则。继焉富商巨贾,损亿万,驾滕艚,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蓬,约千寻之修纜,筑天后之崇宫。建旗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乃涓吉旦,祀阳侯,鸣金鼓,发棹歌,经通浦,历长洲,触翻天之巨浪,犯朝日之禽栖。献饘飧于七洲之水,焚毛羽于双峤之丘。望夕晖之落云,知明教之多,聆水声之渐响,虑礁浅之可忧,夜睹指南之针,日唱量更之筹。”

我们看到,商人也加入了航程。扬威,教化,外交,贸易,整个过程,从容不迫。

中国社会似乎脉络清晰地向前演进着。新纪元的门槛就在前面。我们的眼光注视着它。我们激动地看着它抬起了一支脚……然而,这支脚没有落下。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遗憾。历史让我们扼腕长叹！

一四三三年，第七次下西洋的舰队带回了郑和的遗体。一代巨星殒落了！

之后，迎接中华民族的不是新纪元的曙光，而是四百年海禁！而是子孙后代对海洋的陌生！对中国文化和科技史着了迷的李约瑟说：郑和“几次远征的原因，至今仍不明了，可能是为了要用海路来补偿陆路对外贸易的萎缩，也可能是为了扩大朝廷的威势，可能是甚至如正史所载，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侄子——被赶下台的前任皇帝。而郑和这种远征的停止也像它的开始那样突然，原因也是不明。”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遗憾。美国学者、巨著《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的作者丹尼尔·J·布尔斯廷亦大惑不解：“西方人很难理解这支庞大的船队为何远航。郑和的兴趣和目的和十六世纪欧洲皇室的兴趣和大相径庭。”

在西方人看来，如此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总应该给诞生它的社会带来点什么。它怎么会像夏天惊心动魄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它怎么会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给人眩目的一激，便蹿进了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怎么会像巴比伦人的空中花园那样，只给人留下一个遥远的梦幻般的印象？

在对不可思议的中国人进行历史玄思的时候，西方探险家的小帆船出发了。一五一四年，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荷兰人在一六二二年、英国人在一六三七年相继来到中国。一八四零年，英国舰队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

接下来的便是屈辱，漫长的刻骨铭心的屈辱。

因为是秘密航行，张序三将军率领的实习编队多少有点沉闷。今非昔比。威风八面的元朝舰队、郑和舰队，如同梦幻一般。

出湛江，经西沙，下南沙。上级命令，中断通讯。无声无息

地在自己的海域里航行,给整个航程蒙上了浓浓的探险气氛。非常特殊的、中世纪式的探险气氛。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不能用,大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听不见大陆的声音。编队几乎与世隔绝。茫茫数千公里航程,惊涛骇浪,暗礁险滩,命运全在自己手里捏着。上级命令,尽量不与周边国家接触,免生事端;如遇敌舰攻击,可以自卫还击。可是,对周边国家在南沙的活动情况,我们知道多少呢?茫然感,陌生感,孤独感,紧张感,兴奋感,使命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沉甸甸地压在张序三将军的心里,沉甸甸地压在编队一百多官兵的心里。

张序三将军在他家里接待了我。他告诉我,提拔他任军科院政委,他并不满意。因为,这让他离开了海军,离开了海。他说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军旅生涯的最后时刻离开海军。

他老伴在一旁插话说:“我们家老头特别喜欢海。我对他说,只要我死在他后头,我就把他撂到海里去!”

他这一辈子都献给了海军。他一辈子的痛苦、欢乐和荣誉都融进了海洋。生于海,长于海,葬于海,何等快哉!

五、六十年代,他当了十六年的驱逐舰舰长和大队长。那时,美国人不承认我国宣布的领海范围。他率领的驱逐舰经常在中国领海与美国军舰相遇。美国军舰的信号灯今天还在他眼前闪耀着。

“早上好。”

不邀自来的美舰,用国际通行的海军信号灯语言打招呼。

然后又轻松愉快地说:“我们走了。”

“这是中国的领海!”张序三气得眼睛冒火!用大炮到别国的领海来问“早安”,真是欺人太甚!但又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星条旗扬长而去。

实习编队终于来到了曾母暗沙。

在我们的印象中,曾母暗沙是一个神秘而平静的海区,是中国毋庸置疑的主权标志。可眼前的情景把张序三将军惊呆了!这里已是井架林立,灯火辉煌!

学校地理课堂里书声琅琅,南沙海域石油天然气喷薄而出。

这是国人始料不及的。我们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太少了。我们一直在问,南海周边国家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敢冒战争和外交风险,占领和瓜分南沙群岛一些生存都十分困难的珊瑚岛礁,意义何在呢?

南沙海域二百多个岛礁,八十二万平方公里,被一张巨大的帷幕屏蔽了。

南海是黑色的。

地质勘探资料表明,南沙海域发育着一系列沉积较厚构造类型各异的新生代盆地,藏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其中尤以万安盆地、文莱—沙巴盆地、巴拉望盆地和礼乐盆地等五个大中型含油气盆地远景最好。这五个盆地总面积三十七点九万平方公里(其中在我传统海疆线内的盆地面积为二十九点九万平方公里),估算其石油资源为二百三十五亿吨,天然气资源为八万二千六百九十九亿立方米,超过了我国西部油气资源总量。因此,南沙海域被称为“第二个中东”。

战略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潘石英先生对南海问题有着专门研究。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描述说:长期以来,大多数地质学家对南海蕴藏石油天然气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然而,随着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人类社会对石油需求量的激增,促使人们对濒临中国的未经勘探开发的大片海域投来了覬覦的目光。

一九六六年,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赞助下,建立了亚洲近海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两年后这个

委员会在初步实施的地球物理调查的基础上,公布了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指出了黄海和东海的石油前景外,还指出,南海有一条狭长的带状大陆架。这个认识与一些外国石油公司在这一海域的秘密勘探结果相吻合。于是,一个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观点形成了:南海可能是一个有巨大石油蕴藏的地区!

人类终于透过南海深深的海水,嗅到了石油的腥味。

这个发现,对于资源有限、亟待经济起飞的东南亚国家,不啻是上帝的福音。

由此,相对平静的南沙群岛开始骚动了。接下来的便是周边国家的“下海三部曲”。

第一部曲:巨大的石油诱惑,使政治家们首先想到是,必须拥有大片海域。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关国家没有经过疆界的单边或多边谈判并达成协议,便纷纷单方面的、武断的宣布了南海的划界主张,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国与国之间的南海疆界重叠,严重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准则。

第二部曲:武装占领。众所周知,中国政府自一九四六年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了南沙群岛之后,只有中国军队驻守在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上,根据二战后的国际公约,合法地行使着主权管辖。然而,从七十年代开始,有关各国纷纷派出军队抢占了自己需要的战略要点,长期驻扎。现在,南沙群岛中的岛屿、露出水面的礁盘和不能露出水面但水深较浅的礁盘已被全部瓜分完毕,从而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武装割据和军事对峙的严重局面。

第三部曲:有关各国相继宣布《矿区法》或《石油法》,划出了大大小小的“矿区”,吸引外国石油公司投资开发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石油使南海变成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最复杂的海域。石油染黑了海水,划一根火柴扔进去,整个海洋都会燃烧起来!西方

人把二十世纪称作是“石油的世纪”。对石油的认识和开发,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基础。然而,石油的开发和掠夺,也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痛苦和哀伤,哪里就有血腥和眼泪。“欧佩克”的创始人、委内瑞拉石油部长培雷斯·阿方索曾把石油称作“魔鬼的排泄物”。

一九九二年,日本 NHK 专门制作了南海的专题片,把这一地区称为“亚洲的火药桶”。

五十年代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周边国家在我传统海疆线内外,通过国际招标,先后有六十多个外国石油公司参与南沙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已投入资金三百五十亿美元,完成地震测线四十万公里,钻井六百五十口,找到油田七十八个、气田六十六个。其中有十一个油田、十五个气田、一百五十个油气井在我国传统海疆线内。有关资料显示,外国在南沙海域日产原油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一吨、天然气七千万立方米。近年来,这些国家又各自划分了彼此重叠的对外招标区,继续扩大勘探范围,不断向我国传统海疆线内推进。不久前,越南公布的油气勘探国际招标图,几乎囊括了整个南中国海!不久前,五十年代便承认我传统海疆线的印尼,也在纳土纳群岛发现了巨型气田,有效储量达一点五万亿立方米,将投入四百亿美元进行勘探开发,并对我南沙部分区域提出了主权要求。

地质学家说,曾母盆地是一个前陆型的新生代大型沉积盆地,发育有巨厚的海相碎屑沉积和碳酸盐沉积,有多套油气生储盖组合,是南沙诸盆地中油气储量远景最好的盆地。外国石油公司已在盆地内发现并开采了四十多个油气田和含油气构造。相关国家已经在曾母暗沙发财。一九九四年,文莱年产石油一千七百万吨,马来西亚年产石油二千万吨。

实习编队找到了外国人建的曾母暗沙标志。这是一个大浮

筒,上面有一架航标灯。

“抛锚!”张序三将军命令道。

时近黄昏。全体官兵在前甲板列队。夕阳斜照,海风吹拂着全体官兵古铜色的脸。大家庄严肃穆地注视着前面这位小个子将军。只有海浪拍击船舷的砰响,只有闻讯而来的海鸥掠过时的嘶鸣。

军舰停泊在曾母暗沙的海面上。中国海军被脚底下巨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拥抱着。中国海军被南中国海拥抱着。

“同志们,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非常激动!”张序三将军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大声说:“解放后,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来到了南沙,来到了曾母暗沙,来到了祖国的最南端!此次航行,意义重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相信,你们也一辈子忘不了!”

张序三将军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被当时的庄严气氛笼罩着。

“起锚!”

时间过的太快了!天已经擦黑。海的尽头,只剩下霞光一线微弱的猩红。

大家围了过去,想看看铁锚能带上来什么东西。

大家都明白,这是违反常识的。几十米深的海水,光秃秃的铁锚提起来时,有点泥沙,也被冲刷干净了。可大家偏要等着看。给他们的,当然是失望。

可参谋赵承春没走。赵承春心细。他看见铁锚的焊接缝里还残留着一丁点儿珊瑚沙,便一粒一粒地扫下来,装进瓶子里。“这是‘国土’啊!”他说。

他要把这些珊瑚沙带回大陆。他要告诉人们,这是中国海军从曾母暗沙带回来的“国土”!

张序三将军要离任了。

离任前,军委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还要去一次

南沙。”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九八二年五月，中间隔了整整十年，张序三将军第二次来到了南沙。这十年，南沙群岛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八八年，中国海军继一九四六年进驻太平岛之后，进驻永暑、渚碧、南薰、东门、赤瓜、华阳等六个礁盘。

他来到了永暑礁。南沙守备部队请他留言。他说：“让我好好想想。”

他把留言簿带回了宿舍。窗外，明月高悬，海浪排空。他非常清楚，这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到南沙了。到南沙来结束他的军旅生涯，平添几分苍凉和惆怅。

他提笔写道：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我与糜振玉少将率军事科学院考察组乘 952(综合补给舰)抵达永暑，在此之前，先后登临渚碧、南薰、东门、赤瓜、华阳渚礁，感触良多。作为一名老海军，我曾率舰只编队，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巡航南沙，让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祖国大海的最南端。然而，却无法用自己的双脚踏上南沙所有的祖国领土——这是我海军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之一。我希望再一次重返南沙时，不再只从望远镜中遥望那些可爱的岛礁沙洲。

亲爱的年轻战友们，拜托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中将 张序三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夜 永暑礁

美济风云

东经 115°32'、北纬 9°54' 的“捣蛋鬼”

南中国海在海南岛渔民眼里充满了魅力。几个世纪以来，舒展、宽阔、深厚、纯洁的海洋，如同母亲的蓝色乳汁，滋养哺育着他们。远远望去，烟波浩淼中，几叶轻舟追寻着祖先的航线，向南行驶，由西沙而南沙。他们怀着希望和梦想，可是，命运将会怎样呢？他们互相告诫着。一个渔民扯开了喉咙，其他渔民随声附合，海风送来苍凉的歌声：

无雷海响而有恶风，
太白清现亦有恶风，
海棠多湾而有恶风，
鸟离领飞高有恶风，
无风浪涌而有恶风，
日落天江急有恶风，
内山现红近有恶风，
云飞如箭而有恶风，

.....

海南琼海潭门镇渔民祖祖辈辈唱着这首“恶风歌”下南海。南海盛产石油天然气，盛产鱼类贝螺，还盛产惊心动魄的飓风。渔家妇女最关心天气预报，在电视上一看到台风警报，心都揪紧了。她们每天都会去渔港眺望，眺望她们的儿子和丈夫能装满鱼舱，侥幸归来。嫁作渔人妇，亦唱“恶风歌”。她们年年担惊受

怕,她们哭下了眼泪,多少肝肠欲断、悱恻缠绵的故事。

今年的飓风来得早。五月中旬,热带风暴就在南海形成了。然而,今年渔妇们担心的不是热带风暴的侵袭,而是人类的侵袭。

和往年一样,渔船在旧历年正月陆续出海了。渔民们掐着时间,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南沙群岛作业三、四个月,然后赶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返航。

此番出海亦喜亦忧。喜的是,去年年底中国在南沙群岛的美济礁修建了避风港,捕鱼的安全区域扩大了。忧的是,美济礁避风港的修建引起了国际争端。菲律宾发表了抗议声明,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南沙群岛风云骤起,局势紧张。

天灾人祸,对于靠海吃饭的渔民来说,只能听天由命了。

农历正月十九,琼海潭门镇琼海 00373 船、琼海 00488 船、琼海 00406 船、琼海 00308 船结伴而行。他们沿着传统的航线,驶向风云莫测的南海。

经过三天四夜的航行,他们来到了南沙群岛最北的双子群礁。双子群礁完全在菲律宾的控制之下。他们继续往南,穿行于中、菲、越占领的岛礁之间,捕鲨鱼,捞海螺,钓石斑鱼,一个多月,颇有收获。他们喜出望外。

往南,再往南。三月二十二日,他们来到了美济礁西南约三十海里的仙娥礁。他们不知道,他们早就被盯上了,一张巨大的网口正在收拢。

菲律宾对美济礁问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

早些时候,菲律宾军人炸毁了美济礁周围礁盘的中国主权标志,拆毁了一些中国建立的简易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抗议声明,认为这种做法,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与此同时,中、菲举行了双边会谈。三月十九日,菲律宾副外长赛韦里诺来到北京。为期三天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但菲方公布说,菲目前不会去触动美济礁上的建筑。

菲律宾驻华大使穆阿多·翁在三月二十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会谈气氛“坦率而诚挚”,并认为中、菲关系“是良好和稳定的”。

香港《南华早报》三月二十四日发表文章《中国的务实态度》。文中说:“如果中国真想阻止菲律宾的行动,马尼拉就不大可能进入有关岛礁并拆除上面的建筑物而中国一点也不知晓,中、菲会谈就不大可能进展得那么顺利。”

这给人一种印象,通过三天的双边会谈,美济礁的紧张局势已得到缓解。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直到事态扩大后的四月五日,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公布了赛韦里诺的会谈报告。报告的评价是:“虽然对彼此的立场有了较多的了解,但也要认识到,这些立场仍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菲律宾人并不满意北京之行。南沙群岛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波澜。

菲律宾人在寻找猎物

三月二十五日夜,仙娥礁。北纬 $9^{\circ}24'$, 东经 $115^{\circ}28'$ 。

潭门镇的四条渔船经过两天的紧张捕捞作业,各船之间拉开十米的距离,互相依傍着在礁盘的海面上睡着了。黑色的大海,像是一个巨大的襁褓,环抱着疲倦的弄潮儿。月亮高悬在天空,几分忧虑地注视着四星点儿摇曳的灯光。在清澈的月亮看来,夜幕下的海,更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巫婆,不怀好意地摇着你,哄着你,可以给予你,也可以吞噬你。

仙娥礁,好美妙的梦。几多窈窕仙娥飘然而至,踏着波浪,舒卷长袖,轻歌曼舞。歌罢,舞罢,懒解素装,肌肤娇嫩如月;拆

散发髻，一汪清醇泼地。她们是月亮的女儿，天工神造，洁白无瑕，睹之怕无，抚之怕化。她们来到人间，肆无忌惮，极尽妩媚，乱人心绪，动人魂魄。当晨曦泛起的时候，她们匆匆离去，化作天际的云雾。

.....

凌晨六点半。大家还在酣睡。负责值更的琼海 00373 船的渔民黎德民突然大叫：

“有情况！”

还在美梦中的四条船顿时骚动起来。

大家纷纷拥出舱外，远远地看见两艘军舰，在夜色的掩护下，从东南面悄悄地摸了上来。

“会不会是咱们海军？”看不清军舰的模样，更看不清国旗，有人侥幸地猜道。

“不像！”有人肯定地说。

凭以往的经验判断，是不像。这样的距离，我们的海军一定会认出中国渔船来。再者，中国的军舰没有这种编队。

眼睁睁地看着两艘军舰夹击逼近，渔船已是插翅难逃。

“赶快和家里联系！”有人喊道。

“喂！喂！”

喊半天都没有回答。

“没到联系时间！”有人提醒说。

一急便没了时间概念。按镇上渔业指挥部和出海渔船的约定，每天八点、十二点、十八点固定时间联络。现在还不到点儿！真他妈扯淡，过了点儿，死活没人管了！

“快向海军报警！”

“怎么报？哪里有海军？”

茫茫大海，别说海军，苍蝇、臭虫都难见到！大家都急昏了头。

这时候,渔民看清了军舰上的菲律宾国旗。渔民说,两艘军舰的编号分别是“28”和“507”。据外电证实,这两艘军舰分别是四千吨的登陆舰“本盖特”号、巡逻艇“米格儿-马尔瓦尔”号。这两艘军舰一个半月后,运载了西方和菲律宾等九个国家、三十九名记者直逼美济礁“采访”。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四条渔船、全部六十二名渔民被菲律宾军舰席卷而去。

声东击西,防不胜防。本来焦点在北纬 $9^{\circ}54'$ 、东经 $115^{\circ}32'$ 的美济礁——这个被世界称为“捣蛋鬼”的地方,结果,菲律宾人非常策略地绕过了焦点,在南沙群岛的软肋——仙娥礁,给中国狠狠地来了一刀,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动。

美济礁:三百三十八分钟的对峙

抓渔民作人质,仅仅是菲律宾挑开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第一步。

紧接着菲律宾宣布,将让外国记者采访中方占领的美济礁。

南海局势空前紧张。观察家认为,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进行一场赌博。

这是一场充分窥测和把握到了中方心态的赌博。

美济礁是一个环礁,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泻湖,南北长六公里,东西宽八公里,因其南部和西南部有两个进出港口,又称之为“双门礁”。菲律宾人称之为“密斯奇夫”礁。

美济礁距离菲律宾一百三十海里,距离中方占领的赤瓜礁七十四海里,是南沙群岛西北部的天然避风良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二日十七时许,夜幕降临。外国记者包租的客轮在菲律宾“本盖特”号登陆舰和“米格儿-马尔瓦尔”号

巡逻艇的护卫下,从菲本土起航。

菲律宾海军编队和客轮在菲西部司令部司令卡洛斯·塔内加少将的统帅下,选择夜间航行,可见精心策划,用心良苦。

十三日清晨,美济礁海面好低的云,好大的雾!大雨“乒砰”敲打着高脚屋铁皮顶。

海面能见度不到一海里。

“报告,发现菲律宾军舰!”

六时许,我方发现菲海军进入美济礁海域。由于大雾大雨的阻隔,他们停泊在较远的海面上,不敢贸然进逼。

根据气象预报,雾雨还要持续很长时间。菲方派出了侦察飞机。

七点二十一分。“发现敌机!方位四十五度!高度三千米!……二千米!”

七点二十五分消失。

八点十分。“发现敌机!方位二百二十度!高度一千五百米!”

八点十四分消失。

八点三十一分。“发现敌机!方位八十度!高度二千米!”

八点三十四分消失。

菲律宾飞机频繁的低空侦察,使整个美济礁气氛高度紧张。

大雨大雾足下了四个小时!十点,天气放晴。雨后的海面空气清新,太阳毒辣。

十点零五分,菲编队在距离美济礁十三海里出现。我方观察到,客轮把记者转移到登陆舰后,迅速离去。

菲军舰向中方打着国际信号。大意是:我们是菲律宾海军,我们护送记者采访。

中方则警告他们:这里是中国领土,外国船只不得入内!

菲军舰在菲空军两驾意大利S-211喷气式飞机的支援下,

不顾中方警告,向美济礁驶来。当菲舰驶至七点五海里时,中方两艘渔政船追上夹击。

菲舰一三零炮对准了渔政船。渔政船毫不畏惧,一个劲地往上冲,往上冲!

“渔政船别冲得太近! 与菲律宾军舰保持距离!”指挥部命令道。

“我们要上军舰和他们论理!”渔政船说。

“服从命令! 保持距离!”

渔政船贴在“本盖特”登陆舰左右两舷不到五十米处,强行别转它的行进方向,阻止它开往美济礁。

这时,“米格尔-马尔瓦尔”巡逻艇穿档插了进来,保护登陆舰的侧翼。

菲军舰与中国渔政船怒目对峙。观察者注意到,中国渔政船的炮衣未解,完全靠肉身拦截。当然,我渔政船有着坚强的后盾。三十海里处,我 510、536 导弹护卫舰编队严阵以待。渔政船和登陆舰呈现出胶着纠缠状态时,导弹护卫舰冒着浓浓的黑烟逼近对峙现场,给菲舰以威慑。

一个月以前,作者随同中国记者赴南沙采访团在赤瓜礁海面上,访问了 510 导弹护卫舰。少校舰长给人印象深刻。别小看这个长得像渔民的小个子少校,他是海军舰艇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海军指挥学院三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他站在导弹发射架前,非常自信地对我们说:“请转告祖国人民,有我们海军在,就有祖国领海在! 谁胆敢来挑衅,我就打沉它!”

这是菲律宾和中国首次在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对抗。当然也是一次实力悬殊的对抗。一个在场的菲律宾高级军官说:“这是一次大象和蚂蚁的交锋。”“根本不是北京的对手。”

美国造的“本盖特”舰,已服役五十二年,老掉牙了。上过该舰的外国记者描述说:舰上设备破旧不堪,老鼠横行。中国护卫

舰以每小时二十六—三十海里的速度行驶，“而‘本盖特’号则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摇摇晃晃地前进”。对抗后的第二天，“本盖特”号的发动机便出了毛病，瘫痪在海面上，不得不拖回港口。

用这样的军舰来向外国记者显示菲律宾的国威和军威，确实令人难堪。这样的军舰打仗不行，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倒是富富有余。

有关资料显示，菲律宾一共只有百吨级的护卫舰五艘，登陆舰二十八艘（其中千吨级的二十四艘），小型舰二十三艘。舰对舰、舰对空导弹等于零。

为什么“蚂蚁”敢跟“大象”一拼一赌呢？

外国记者是保护伞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海上游戏，军舰被堵住去路，无法靠近美济礁并进入泻湖，就换直升飞机。

观察员发现，两架直升飞机编组，直扑美济礁！

飞机上载着记者和菲军人。

十一点二十三分，飞机从正北方向三百六十度分别进入我三号、四号、二号、一号设施。

十三点，第二批从正北偏东十度进入。

十三点三十九分，第三批从同一方向进入。

十四点半，第四批进入。

记者分四批进入美济礁。直升飞机都是超低空飞行。飞行高度二十米！距我高脚屋只有十米！几乎是与高脚屋的窗子平行！

观察员报告：“飞机低空飞行。飞机型号 PRE-55、UH-‘休伊’式。他们在拍照。我们怎么办？”

指挥部命令：“观察！隐蔽！忍耐！”

菲律宾直升飞机在美济礁横冲直闯。“哈罗!”“哈罗!”穿着短裤和裙子的男女大声喊着。我方人员在高脚屋里气得眼睛冒火!“观察!隐蔽!忍耐!”军令如山倒。谁也不能出去。飞机飞得很慢,“扔个酒瓶子出去,一砸一个准”。大家拳头捏出了汗,牙齿咬得嘎嘣响。五月的南沙,气温高达三、四十度,高脚屋像个大蒸笼。天气炎热加上心情烦躁,干脆脱成了光膀子。憋在高脚屋里的人,都急了眼!只要笼子一打开,这群人蹿了出去,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俗话说: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可直升飞机来了一拨又一拨,来了一拨又一拨,偏有再三再四!而且,飞得那么低,飞得那么近,像是偏往人嘴里钻的苍蝇。你闭上嘴,它撬开你的嘴往里钻!没有比这更糟心更窝囊的事情了!没有比这更伤自尊心的事情了!

忍耐!忍耐!在高脚屋里关三个多小时,需要何等的毅力!

忍耐!忍耐!一个月前,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抓了六十二个渔民,我们已经忍声吞气。如今又打到了家门口,还得忍声吞气!

忍声吞气,忍辱负重,不愿意扩大事态,不愿意搞僵关系。菲律宾人算是把中国人的心态摸透了。

塔内加少将告诉外国记者,“斯普拉特利群岛(注:即南沙群岛)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目前等于零,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有必要持谨慎态度”。

菲律宾人进入南沙

中国一直避免南沙群岛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力图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领土领海争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十二字

方针。对南沙问题,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遗憾的是,这种态度,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反而被认为是中国人软弱的表现。处处忍让,处处克制,换来得却是尴尬和窘迫。有趣的是,中国越是忍让,越是克制,南沙问题就越是复杂化和国际化。南沙问题的复杂化和国际化,现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说起来,菲律宾有一部比中国更伤心的历史。

一五二一年,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航行。为了寻找一条东印度的新航线,从事赚大钱的香料贸易,这一年,他“发现”了菲律宾,并把它命名为“圣拉萨罗群岛”。一五四二年,西班牙人鲁伊·洛佩斯·德·维拉洛博斯率领的远征队,为了向西班牙王位继承人菲利浦表示敬意,将群岛命名为“菲律宾群岛”。

人类文明史上被尊崇为“先驱者”的麦哲伦,在菲律宾人眼里,是一个嗜血的恶棍!菲律宾民族英雄拉普-拉普杀死了麦哲伦。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疯狂的西班牙人蜂拥而至,这并没有改变菲律宾之后被西班牙奴役和统治了三百七十多年的悲惨命运。那时,菲律宾人被称为“砍柴挑水的人”、“印地安人”。

十九世纪末,美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发生了短暂的战争。美国人胜利。一八九九年,美国取得了它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成了菲律宾的新主人。

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迅速占领菲律宾。一九四六年,菲律宾独立。

一五二一~一九四六,四百二十五年!多么漫长的殖民地统治!菲律宾人饱经蹂躏,同时也养成了菲律宾的殖民地文化特征。

历史上,菲律宾人和中国人打交道,和西方人打交道,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中、非关系史上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就是苏禄国王访问中国。

有人认为，中菲关系始于七、八世纪；有人认为始于十世纪；有人则认为更早，始于三世纪。持三世纪证据的人说，《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公元二三零年，东吴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到夷洲和洲。“夷洲”即台湾，“洲”即今菲律宾。

如此推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中菲关系较早，并在明朝推到了高潮。

明朝是中菲关系的黄金时代。

当时，菲律宾群岛的吕宋、蜂牙施兰、苏禄等国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和政治关系。一四零六、一四零八、一四一零年，蜂牙施兰国王连续三次访华。吕宋和猫里务（吕宋岛南的马林都克）也在洪武、永乐年间屡次遣使修好。当然，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苏禄国王访问中国。

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苏禄东王、西王、峒王各率家眷随员共三百四十余人，浩浩荡荡，访问中国。这是中国古代来华访问的最大的外交使团。

苏禄庞大的外交使团从泉州登陆，经过苏州、杭州，沿大运河至北京。外交使团受到了明政府的隆重接待。他们给中国皇帝带来了“梅花脑、米脑、竹布、棉布、玳瑁、降香、苏木、胡椒、荜茇、黄蜡、番西”，还有珍珠、宝石。中国皇帝回赠了丰厚的礼品。

外交使团在北京住了二十七天，受到中国皇帝的封赐后返国。返国途中，东王染风寒，在山东德州逝世。明成祖闻讯，深为哀悼，敕谕在德州以王礼安葬。明成祖还亲自为东王墓撰写了碑文。碑文曰：

帝王之治天下，一视同仁，声教所被，无思不服。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盖有不待威而从，不假力而致也。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诞膺天命，统驭万方，深仁厚德，薰蒸洞彻，近者既

悦，远者毕来，莫不欢欣鼓舞于日月照临之下，猗欤盛哉！肆朕继承大统，君主华夷，继志述事，惟恐弗逮；劳来绥怀，每殚厥心。而戍狄之君，蛮夷之长，越大小庶邦，亦罔不来庭，朕悉以礼接之。乃者，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邈居海峤，心慕朝廷，躬率眷属及其国人，航涨海，汎鲸波，不憚数万里之遥，执玉帛，奉金表，来朝京师。其恭顺之诚，爱戴之意，蔼然见于辞表，可谓聪明特达，超出等伦者矣。故特加宴赏，锡以印章，封以王爵，命中人送之还国，道经德州，竟以疾薨，实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也。仆闻，朕不胜悼痛，遣官谕祭，赐谥“恭定”。仍命有司为营葬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于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含袭爵，率其属而还。礼官以襄事告，请树碑垂示于后。朕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代天出治，君臣之序位，五常之教备，内外之分明，人生之大庆，实在于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王慕义而来，诚贯金石。不谓婴疾，遽殒厥身，其中义不可泯，故用纪其实，以诏后世。于戏！人孰无死？若王，光荣被其家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可谓得其所归矣！使其区区民海峤之间，一旦殒歿，身与名俱灭，岂不惜哉！王虽薨逝，盖有不随死而亡者，此诚大丈夫矣。乃锡之铭曰：

覆载之内，庶类实蕃；
天生圣神，主宰其间。
礼乐教化，达于四夷；
包含遍覆，恩布德施。
敬恭玉帛，朝于明堂；
无有远近，山梯海航。
粤自古昔，与今斯同；
苏禄之君，慕义向风。
携其室家，暨其耄倪；

汎其鯨波，万里而至。
拜舞婀娜，列肆摠诚。
感恩效顺，特达聪明。
眷惟贤哲，锡賚是加，
金章赤绶，开国承家。
秋风载途，倏然长驱，
神游逍遥，风马云车。
平原之 ，佳城苍苍，
永国厥封，千载之藏。
显显令闻，垂于无极，
后之来者，视此贞石。

永乐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第二年，又在墓前建了祭庙。祭庙建成后，明成祖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致祭。

东王妃、两个王子及其仆从留华守墓，明朝廷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每年拨给银、钞、布供生活所需，又赐给祭田二顷三十八亩，“永不起科”。为了尊重苏禄的伊斯兰教习惯，专门从历城县拨了夏、马、陈三户回民耕种东王祭田，并帮助办理每年的祭祀典礼。

从此，留华守墓的王妃王子及其后代，受到了明朝、清朝数百年的优待。中菲两国友好往来也是数百年延续不绝，一直到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才中断。然而，东王的后裔在中国繁衍生息，直至今日。

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大诗人顾炎武来到了德州东王墓。他留下了诗篇《过苏禄王墓》：

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晖。
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

九河水壮龙狐出,十二城荒白鹤栖。

下马一为郑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中菲关系断绝。德州城外,荒冢瑟瑟,孤魂哀绝。

数百年的隔绝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把中、菲关系重新接续了起来。这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南沙问题恰恰是围绕着石油展开的。独立以后的菲律宾,一方面要摆脱殖民地经济的阴影,走自己国家独立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却是石油能源的缺乏。一九七三年,全球性的石油能源危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给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以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菲律宾不得不采取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而此时,已经解冻的中美关系,也为中菲对话交往铺平了道路。与亚洲很多国家一样,菲律宾的对外关系基本在美国的政策框架之中。这是二战留给亚洲的政治遗产,也是亚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痛苦、愤怒、又无可奈何的深刻根源,也应该是观察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问题的“牛鼻子”。菲律宾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比较,它跟美国的渊源更深。

中国对菲律宾展开了“石油外交”。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殊的案例。

一九七四年九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这次接见的直接好处是,菲律宾得到了中国援助的一百万吨“友谊价格”石油。当时,中国原油的出口价是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而卖给菲律宾的却是每桶七点五美元。每吨石油合七桶。光是这一笔交易,菲律宾就省下了三千七百四十五万美元!这是一笔国家间的政治交易。菲律宾得到的是经济好处,中国得到的是政治好处。大陆在台湾的国际关系棋盘中,拿掉了“菲律宾”这个棋子。

我们不能忘记晚年毛泽东拥抱伊梅尔达·马科斯的情景。

伊梅尔达·马科斯非常清楚，她在拥抱了毛泽东主席的同时，也拥抱了中国的石油。之后，伊梅尔达·马科斯一次陪同马科斯、三次单独访华。

“夫人外交”对“石油外交”，“美人”对“石油”，都打了个大胜仗。

菲律宾人大喜过望。中国第一批石油一点七万吨运到马尼拉时，马科斯总统亲自出席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国家元首出席一船石油的交接仪式，这种情景在国家礼仪中极为罕见。

中、菲建交后的一九七八年，中、菲签订了一项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的长期石油协定。协定规定，中国每年以“优惠价格”向菲律宾出售六百万吨石油。一九八四年，中国还赊销给菲律宾价值约一点四亿美元的石油。

然而，这在菲律宾人眼里，都是笔笔清的交易，不能有其他什么指望。

中国人不管手头阔还是不阔，向来都是“薄来厚往”，所以，事到临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是最早对南沙提出主权要求的。

一九四六年，菲律宾外交部长季里诺宣称，南沙群岛应该划入菲“国防范围”。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七日，已成为菲律宾总统的季里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如果国民党军队真的占领着南沙群岛（注：即南沙群岛），则菲律宾就无须占领该地。如果在敌人手里，即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根据国际公法，该群岛应该辖属于最近的国家，而距离南沙群岛最近的国家就是菲律宾。”

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认为：“菲律宾政府对于中国领土的这种荒谬宣传，显然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指示。菲律宾挑衅者及其美国支持者必须放弃他们的这种冒险计划，否则必然

引起严重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容许南沙群岛及南海中其他任何属于中国的岛屿被外国所侵犯。”

一九五六年,菲律宾人克洛马组织“私人探险队”和所谓“远征队”到南沙活动。之后,菲律宾外交部长加西亚向世界宣布,菲律宾“发现”了南沙群岛,称南沙群岛为“无主地”,菲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将南沙群岛更名为“卡拉延群岛”,单方面划割了二十四万平方公里归菲所有。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关于南沙群岛的主权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根据最近某些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菲律宾外交部长加西亚再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说,南中国海上包括太平岛和南威岛在内的一群岛屿“理应”属于菲律宾,理由是它们离菲律宾最近。外国通讯社并且透露菲律宾政府正在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接触,企图“解决”南沙群岛的所谓主权问题。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发表如下声明:

南中国海的上述太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小岛,统称南沙群岛。这些岛屿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主权。早在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关于英美对日合约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就已经严正地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一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菲律宾政府为了企图侵占中国的领土而提出的借口,是根本站不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合法主权,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军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派“太平”号护卫舰和“中业”号坦克登陆舰接管了南沙群岛,并成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由于内战,中共军队占领海南岛,一九五零年六月八日,国民党军队从太平岛撤回台湾。一九五六年,蒋介石在与菲律宾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七月十一日,派遣“太康”号、“太昭”号护卫舰和“中业”号坦克登陆舰载一百余名陆战队员,再次占领太平岛,组建了“南沙守备区”至今。

一九七零年八月,菲律宾占领了南沙群岛的马欢岛、费信岛。一九七一~一九八零年,又先后占领了中业岛、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司令礁。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南沙群岛是“有争议”的岛屿,“占领是决定性的因素,占领就是控制”。态度强硬,行动坚决。

一九七六年,在中、菲建交一周年、菲律宾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拿到廉价石油的时候,菲律宾与一家瑞典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沙群岛的礼乐滩勘探石油。

中国政府都先后发表了抗议声明。然而,都仅仅是“声明”而已,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直至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的军事对峙。

“弗洛尔事件”与南沙冲突

纵观菲律宾历届总统,对待南沙问题,拉莫斯的态度最为强硬。

炸毁中国竖立的标志和设施,抓扣并审判中国渔民,让外国记者采访美济礁,向南沙群岛增派军队,公开邀请美国干预,与美国在南沙群岛搞军事演习,充分利用东盟论坛和媒体,倡议东盟国家“用一个声音讲话”,共同对付中国。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开化的。无论是菲专家、学者,还是议员、部长、总统,无论是政策、情绪,还是行动、措施,有话都是在台面上说,绝不含糊。与

此同时,让冲突总体把握在“有限冲突”、“留有余地”的分寸感上。“制造舆论”,“有限冲突”,“充分表现”,是一九九五年中、菲南沙冲突非方策略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先干后说,先干后谈,都是在既成事实的层面上进行外交磋商,既给你余地,又不给你余地。“我就这么干了,你看着办。”第三个特点是,充分利用国际背景,充分利用对方心态,旨在打好国内政治这张牌。

先来看看拉莫斯的简历。拉莫斯出身于菲律宾望族,早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一九八五年一月,菲三军总参谋长兼国家情报安全局局长法维安·贝尔因涉及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被暗杀事件,受到隔离审查,当时任三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家警察总监的拉莫斯接任贝尔的职务。一九八六年,“菲律宾革命”时,拉莫斯将军审时度势,代表军方支持革命。马科斯政府倒台后,拉莫斯出任阿基诺夫人政府副总统,后竞选为总统。乍一看,拉莫斯有点莽撞。西方记者描述说,美济礁对峙是“蚂蚁对大象”的对峙;菲军方人士说,“同中国交战等于自杀”;熟悉东南亚事物的专家说,拉莫斯的一系列举动是在“冒险”。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冒险,为什么敢于冒险。拉莫斯是军人出身,他当然知道“实力对比”、“鸡蛋碰石头”的后果。但是,拉莫斯也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权衡利害的参照系与军人不同。军人擅于冒险,政治家擅于赌博,两个角色拼在一块,情景便很不相同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在外界看来,有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被拼凑在了一起。这两件事都是世界级的新闻:一件是发生在新加坡的菲女佣“弗洛尔事件”,一件是菲律宾扣押中国渔民事件。两件事前后脚,“弗洛尔事件”稍早。中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便在美济礁修筑避风港了。施工期间,舰船来往频繁,相邻如此之近的南沙菲驻军不可能没有发现。为什么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偏要在三月二十五日动手抓扣中国渔民?

这要回顾一下“弗洛尔事件”及其对菲律宾政局的影响。

弗洛尔，四十二岁。一九八八年到新加坡当女佣。一九九一年，新加坡警方发现她杀死菲律宾另一名女佣马加，并将该女佣看护的新加坡男孩溺死。新加坡警方将她拘留。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她被起诉。在审理过程中，弗洛尔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新加坡高级法院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判处她绞刑。这之后节外生枝。弗洛尔的菲律宾辩护律师向法院提供了新证词。与弗洛尔共过事的两名菲女佣分别说，弗洛尔是在监狱看守给她服药后承认杀人的，真正的杀人凶手是马加做事的那家男主人，杀人后嫁祸于弗洛尔。

死刑消息传到菲律宾后，拉莫斯总统亲自出面请求新加坡总统王鼎昌，免弗洛尔一死。均遭拒绝。新加坡政府说，经调查和与弗洛尔再次对证，菲方提供的新证词都站不住脚。同时，弗洛尔也对新证词持否定态度承认自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并阐述了自己的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不仅如此，她还将警方带到藏匿从马加处枪来的贵重物品和珠宝首饰的地方确认。菲律宾驻新加坡使馆人员曾九次探监，弗洛尔没有一次同意撤回证词。王鼎昌总统为了使菲律宾信服，还将弗洛尔对警方所作证词的副本交给了拉莫斯总统，认为，“免去死刑是没有依据的”。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弗洛尔被处以绞刑。

这个结果，在菲律宾国内引起强烈反应。

三月十八日，弗洛尔的遗体运回菲律宾。数千人在马尼拉街道上挥舞着拳头和白手绢，迎接弗洛尔的灵柩。数百人到新加坡驻菲大使馆门前示威。

三月二十六日，马尼拉万人空巷。弗洛尔的灵柩覆盖着菲律宾国旗，缓缓从她家驶往马尼拉东南约九十公里的圣巴勃罗市天主教堂。数万名送葬者拥挤在七公里长的街道上，高呼着：“弗洛尔，我们爱你！”

反对党欣喜若狂。这场丧事,外电报道说:“所有反对拉莫斯政权的势力都利用这个出殡仪式,煽动人群在五月的选举中抵制拉莫斯的候选人。”

菲律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人民联盟主席埃内斯托·马塞达说:“弗洛尔案清楚地显示,人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政府却无所事事。”他认为,群众的不满情绪将延续到五月,反对党将从执政党手中夺得更多的参议员席位。

一位政治分析家明确指出:“弗洛尔被绞死,毁掉了执政党在选举中得胜的机会,民心会转而支持反对党,执政党候选人将成为这一事件的牺牲者。”

拉莫斯的新闻部长沮丧地说,目前的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事态之严重,相当于“七次兵变”和几次台风。

外交部长罗慕洛在宣布辞职后,泪流满面地说,他希望他的辞职能平息全国的抗议行动,并有助于缓和菲、新两国的紧张关系。

劳工部长也提出了辞职。

拉莫斯对新加坡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态度。菲宣布,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原定于四月十日至十二日对菲律宾的访问推迟,限期召回菲驻新大使,并将两国关系降格为代办级。拉莫斯说,弗洛尔被处决,将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个疮疤”,并派夫人到机场迎接弗洛尔的灵柩。然而,这些超常举动,仍然不能平息国民愤怒的情绪,仍然不能缓和反对党的攻势。

拉莫斯必须摆脱国内政治的困境,必须把人们的视线从弗洛尔事件上引开,必须扭转中期选举的颓势。他的视线转向了南沙。

转移民众视线,减缓国内压力,重塑政府形象,挽回选举颓势,是拉莫斯适时选择三月二十五日——弗洛尔出殡前一天在南沙问题上向中国摊派的真正动机。

这在国际舆论面前是一个公开的事实。

美国介入

菲律宾敢打“南沙”牌以缓解国内矛盾,当然有美国的背景。

五月十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谢利向新闻界宣读了“美国对普拉特利群岛(注:即南沙群岛)和中国南海的声明”:

美国对下述情况感到关切:中国南海的某些单方面的行动和反应加剧了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强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敦促所有提出领土要求的各方面加以克制,避免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

在维护中国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方面,美国有持久的兴趣。美国呼吁有领土要求各方面加强外交努力,解决与领土争端有关的问题。要考虑到所有各方的利益。美国愿意以有领土要求的各方认为有帮助的任何形式给予帮助。美国重申欢迎东盟一九九二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南海的宣言。

保持航行自由涉及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使所有船只和飞机不受阻碍地在中国南海航行和飞行对于保持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中国南海各岛屿、礁脉、环礁和沙礁主权的领土争端的法律依据,美国不表明态度。然而,对于中国南海不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通过的海洋法公约的任何海上领土要求或限制海上活动的行动,美国将深表关切。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谢利说:这次声明与以往美国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所不同的是,“这篇声明更强硬”。

第三天后,拉莫斯即发表声明,“欢迎美国明确表示它永久关心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声明”。

熟悉南沙问题历史演变的战略家十分重视美国的声明。他

们认为,美国五月十日关于南中国海的声明,是美国南中国海政策的的转折点。一般人读不出其中的奥妙来。谁都不会认为和平解决南沙问题、对领土争端“不表明态度”有什么毛病。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游戏,一个典型的美国干涉世界事务、保持某种制衡张力、警察加牧师的姿态。美国是当今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虽然这一地位正在不断地受到挑战。美国的亚洲政策,半个世纪以来,充满了伤感和恶梦。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打得很不光彩。挑战者,严格地讲,都是中国。当时,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还站在战争废墟上的中国会出兵朝鲜。无论怎样评价朝鲜战争,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这场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的后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近、现代一百年从未有过的。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看到了这个事实,冷战的格局是一个多极的格局,中国是不容忽视的一极。亚洲事务乃至世界事务,不与中国接触和对话,没有中国的参与,都很难有圆满的结局。然而,被二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美国人,没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他们忙于追究“失去中国”的责任,沉浸在板门店谈判的耻辱和仇恨中,久久不能自拔。最最实用主义的美国人,这时候变得最最不实用主义。当我们看到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周恩来伸出来的手,转身离去的身影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赌气的美国孩子。把国家利益交到了一个感情用事的“孩子”手里。这真是莫大的灾难!杜勒斯做梦都没有想到,周恩来的兜里揣着与美国打交道的一揽子计划。年轻的中国,这时恰恰是实用主义的。周恩来更像一个绅士,而杜勒斯更像一个没文化的草莽。这是大国外交史上最具有悲剧意义的一幕。历史便成了被开了叉的小孩子裤裆。中国人不会再主动把手伸出去了。被蹂躏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对“自尊”有着特殊的敏感。从此,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占了上风,对抗成了主流。在这个意义上,尼克松是一个

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伟大在于,他主动把手伸出来了。他来到了北京。他代表着一个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来承认另一个被长期封闭、但一直对世界事务发挥着重大影响的大国。一个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人口最多、历史上曾经最强大的国家。这让我们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场面。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国际政治永远是大国的政治,全球的利益格局最终是由大国决定的。大国的兴衰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小国只能在大国的政治中扮演筹码的角色,一旦风吹草动,便如惊弓之鸟,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弃。一些区域性的组织和运动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命运。如欧共体,如东盟,如不结盟运动。有人带着调侃的口吻分析说,尼克松到北京见毛泽东,是美国人揣摩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是为了满足中国的虚荣心。把尼克松描述成了朝贡中国皇帝的酋长。中国人有过万事不求人、天朝帝国的心态。西方人记忆深刻的是一七九三年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晋见乾隆皇帝,要求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双边贸易。这次晋见成为西方人的笑柄。乾隆皇帝认为,中华无所不有,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乾隆孤陋寡闻,不知道那时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经建立了世界霸权,势力所及,远超过了中华帝国。然而,自给自足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既没有霸权欲望,又没有资源需求。英国人的失望便是自然的了。这次东西方交往的失败,本质上是文化冲突的结果。无论是谁,在天子面前只行一个单腿下跪礼,简直是大逆不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礼仪”,是规矩,是秩序,是维系皇权维系国家最重要的伦理规范。马嘎尔尼也说:“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使人犯错误的了。”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对尼克松访华有一段评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在北京而不是在华盛顿或者其他中立地点会晤周恩来,这标志着两国都相信在亚洲和全世界,权力分配已经发生变化。”这才是本质所在。如果没有这种变

化,和两个大国对这种变化的确认,并在这种变化中去寻求各自的利益,尼克松在戴维营呆着不是更惬意吗?尼克松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的。”毛泽东非常喜欢尼克松这句话。尼克松恰恰是个大赢家。尼克松北京之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打出了冷战时期最妙的一张牌——“中国牌”,利用中苏矛盾和对抗,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状态,从而达到遏制前苏联的战略目的。中国也打“美国牌”。这张“美国牌”,让中国人等了十八年!中美互相打牌,各取所需。说起来奇怪,中美关系,表面上看,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立国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极看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可是在行动上,中国更讲究实际,美国却更为了意识形态而摇摆不定,以致铸成诸多大错。

同样是一张牌,打法却因人而异。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崩溃,“遏制战略”已失去意义,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种言论是,乔治·凯南描述的“冷战”局面已经结束,“铁幕”已经拉开,威胁不复存在,“中国牌”已没有意义。一种言论是,中国威胁。这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一场辩论。美国国际关系最有影响的杂志《外交季刊》主编威廉·G·海兰指出:“这场辩论,名义上是对华关系,但根本上是一场美国冷战后政策新目标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布什政府延续到克林顿政府,逐步使美国外交政策由“奉行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让位于重视人权的理想主义”。换一句话说,美国人想扮演“梁山好汉”,把国家利益用“替天行道”来重新包装,让美国对世界的干预“道义”化,“道德”化。美国对华关系的意识形态转变,“人权”成为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构成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冷战”。“山姆警察”这时候穿着牧师的黑外套,自己就是一个悖论。原来的敌人消失了,如果没有新的假想敌,那么多的海外驻军,那么多的武器,存在就没

有理由了。由此,美国人开创了一个靠“定义”寻找敌人的时代。我认为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最荒诞的是,一九九四年春末,美国罗德岛军事学院秘密举行了以二零一零年的中国为假想敌的电脑模拟战争演习。这次军事演习是由国防部长佩里亲自计划的,美军高级将领和政策分析家参加了演习的全过程。演习的战争结果是,“军事上富有革新精神、技术先进的中国武装部队击败了美国海军”。演习结果公布后,在美国朝野引起很大反响。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举行了一次电脑模拟战争演习,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与美国在二零零五年发生战争,中国将打败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美国“遏制战略”的产物。如今,原来的敌人苏联消失了,新的敌人又没有,总得找点儿新的理由来维持它二点二万人的生计,于是就寻找未来世界的敌人,赋予遏制战略以新的内容。美国一些新闻媒体据此大做文章,宣传中国“威胁论”。美国是荒诞艺术的故乡。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模拟战争让我们想起了荒诞剧大师奥尼尔的话剧《等待戈多》。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想告诫美国人,只要耐心等待,就一定能在二十一世纪等来中国这个敌人。谁最喜欢这齣荒诞剧?当然是军火商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客,一个世代代发军火财的利益集团。

可以预料,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一九九五年六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坎佩尔(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强大。如果中国迄今的经济发展速度再维持十年,那么,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会回过头来评论说,二十世纪末在战略上的最大事件不是苏联的瓦解,不是中东和平,也不是海湾战争,而是中国的兴盛。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是国家衰亡和国家强盛的过渡期。苏联衰败了,同时中国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戏

剧性地增强了实力。”一九九五年四月,日本著名战略家、和平研究所所长佐伯喜一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经济学家说:如果你们中国仍然保持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和美国搞好关系。甚至进一步说,中国只有“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降到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在国际上才“有利于协调与美日等国的关系”。一年以后,佐伯喜领导的日本和平研究所提交了一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报告,明确提出“遏制中国”。

这真是混账逻辑!一种殖民主义的混账逻辑!这说明,西方强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死不了活不好的中国,希望看到的是永远在他们控制下的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不会忘记《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耻辱。不会忘记因为贫困和软弱而受到欺负和蹂躏的历史。不会忘记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不会忘记妇女被奸淫、儿童被抛弃、军民被屠杀惊天动地的哀嚎。不会忘记城池陷落、国破家亡的悲凉。近代以来,一百五十年的漫长岁月,为了富国强兵,中国人卧薪尝胆,艰苦努力,鲜血和眼泪可以汇流成河!

今天,要让我们以放慢发展步伐为代价,来改善美日关系,真是痴人说梦。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便不可避免了。曾经缔造了崭新的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哀叹道:“一项存活了二十五年的、超党派的、由六位总统奉行的政策正在瓦解。”

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中美关系一九八九年以来发生的事件。

美国众、参两院作出决议,抵制中国申办二零零零年奥运会;以“人权”为条件来衡量最惠国待遇;强行搜查“银河”号事件;阻碍中国复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谴责“劳改”产品和导弹技术输出;中国对美三百亿美元贸易顺差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同意李登辉访美,同意台湾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访美,与台湾进行军事合作;吴弘达事件……

美国政府态度强硬,不顾承诺,步步紧逼,藐视中方意见。

在美国国会,充满了遏制中国的“冷战”气氛。针对中国的香港、西藏、台湾等诸多超敏感问题,发表言论,提交法案,形成决议。众议长金里奇说,美国应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一些议员鼓动向西藏派驻大使。

上述事实,在一九八九年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美国的亚洲政策也在进行迅速的调整。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闪电般地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在战略的意义上与日本就贸易摩擦达成妥协;停止冷战结束后的撤军计划,保留十万人的驻军规模;与东盟协调南沙问题的立场,帮助东盟国家进行军备竞赛……

等等,等等。

凡此,拉莫斯有足够的理由打“美国牌”。

不过,今天把美国人请回来,是件挺尴尬的事情。一九九二年,菲律宾人刚把美国人从苏比克湾撵走,结束了美国人近一个世纪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对此耿耿于怀的美国人,一直把一九五一年签署的《美菲安全条约》严格界定在菲本土,并不把南沙群岛包括在内,对菲律宾扩大保护范围的要求不予理睬(后又有松动)。美国的态度让菲律宾非常恼火。当然,全世界也注意到,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国政府关于南沙的声明,表明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种种迹象表明,美菲对南沙争端并采取行动,已有某种默契。

中国渔民该倒霉了

“他们拿我们当狗一样!”

潭门镇是一个美丽的小镇。距琼海市三十公里,距海口市一百二十公里。远远望去,椰林,棕榈,芒果树,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掩蔽着一个个小渔村。海南岛永远没有秋天和冬天。十月的海南岛,除了绿色摇曳、湿热的海风,便是毒毒的日头。港湾里一片沉寂,成百条的渔船像沙丁鱼一样地拥挤在一起。它们刚刚受到了一场惊吓,神色张皇。它们本该在南海的热带风暴过后出航,可今年不行。它们不敢去冒同伴一样的风险。十月一日“国庆”节,海南省政府包租的专机接回了被菲律宾抓扣的渔民。海南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是,人们发现被扣押的六十二名渔民只回来了五十八名,还有四名船长没回来。他们分别是 00373 船船长黎德权,00488 船船长孙文安,00406 船船长麦运秀,00308 船船长王琼法。拉莫斯说,还要以“非法入境罪”和“非法捕捞罪”起诉四名船长。按常识理解,四名船长应该和其他五十八名渔民一起回国。看来,八月份的中菲副外长在北京的第二次外磋商及其联合声明,中方采取了较低的姿态,并作出了妥协。菲方没有归还扣押的船只和船上的设备,还要继续审判四名船长。事实只能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和解释:四名船长被当作了给拉莫斯“留面子”、“下台阶”的人质!

九月,当菲律宾宣布释放中国渔民时,渔民不理解,为什么不同时释放他们的船长。渔民们不肯离开菲律宾。他们的想法是,“我们六十二个人一起出来,应该一起回去”!

“菲律宾继续扣押中国渔民”,令国际舆论大哗。这不符合情理。

九月十三日,拉莫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失口否认上述事实。他理直气壮地说:“只要愿意,这五十八名中国渔民可以随时离开菲律宾。但不包括四位船长。”四位船长还要“受到起诉”。

在解释五十八名渔民不愿意离开菲律宾时,拉莫斯说:“(这

五十八名渔民)也许因为忠于他们的船长而不愿意离开拘留地。”

拉莫斯说,他已下令有关方面同中国大使馆合作,“以便我们的管理人员不至于要向他们提供一日三餐而加重负担”。

菲律宾向中国大使馆施加了压力。

拉莫斯如愿以偿。

渔民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们在菲律宾巴拉望省监狱与他们的船长挥泪告别。

渔民王开福、王琼法、王兴祖孙三代同在一条船上。爷爷王开福搂着孙子王兴,在铁窗外紧紧拉着王琼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祖孙三代哭作一团。场面十分凄凉。

六十四岁的王开福老人责问菲方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分开我们一家祖孙三代?!”

菲方人员沉默不言。

王开福老人转而安慰儿子:“你在这里要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你放心。政府不会不管你们的。政府一定会来救你们出去。”

王家住潭门镇灶坡村。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王家的院门口。王家是一个两进大院。见有生人来,看家狗轻轻地吠了两声便蹿了。王开福老人不会说汉语,旁边需要人翻译。老人神色茫然。他指着全家福照片中一个健壮的汉子说:“这就是我还关在菲律宾的大儿子。”

王家这回损失惨重。00308 船是五十多吨的机动船,是七个渔民一九九四年合伙买的新船。

不算船上的设备,光是买船就花了近四十万元。其中一半是自己凑的钱,一半是信用社贷款。儿子和船都被扣在了菲律宾,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王开福老人心情沉重地说:“将来拿什么来还贷款欧?”

为了丈夫、儿子、孙子,家里的老伴、儿媳望穿了大海,哭肿了眼睛。

听说有人来采访“美济礁事件”,镇政府大会议室一会儿就聚拢了十几个刚从菲律宾回来的渔民。天气大热,衣服都湿透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诉说半年前被菲律宾军舰掳掠的经历。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六点半。这时,菲律宾“本盖特”号登陆舰和“米格尔-马尔瓦尔”号巡逻艇朝渔船扑来。

逼到一百多米远的时候,军舰停住了。渔民看见军舰上放下了四只橡皮艇,每只橡皮艇上有七八个荷枪实弹的菲律宾军人。

菲律宾军人分别登上了渔船。他们上船后的行动迅速而准确,直扑驾驶舱,首先拆除通讯设备,像是精心排练过一样。大海上航行,只要没了通讯设备,所有联系中断,渔船便又聋又哑了。

紧接着就是拆除卫星导航设备。渔船光聋哑还不行,还必须弄瞎喽。

语言不通,军人和渔民只能互相打手势。在拆 00373 船的导航设备时,船长黎德权忍不住上去制止。他急得直喊:“不能拆!不能拆!”不管菲律宾人是否听得懂话。00373 船是一条八十多吨的大船,通讯、导航设备加起来值好几十万元,船和设备都是几个渔民合资买的。那是全船的命根子啊!黎德权扑在仪器上不让拆。立即有几个军人冲过来,枪口对着他,蛮横地把他推出舱外。他还要往里冲,被他兄弟黎德民拉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黎德民劝道:“他们手里有枪!”

菲律宾军人拆完通讯、导航设备,把渔民们全部赶到船头,然后进舱搜查。菲律宾军人进舱后,见什么拿什么。黎德民说:

“他们像海盗一样,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拿走了我们的现金。”

四条船被菲律宾军人洗劫一空。

渔民被全部集中到了登陆舰上。每条船只准留一个人,由两名士兵押着看船。

五十八名渔民像囚犯一样,被一条尼龙绳拦在了登陆舰的前甲板,两边各站着一名士兵看守。随菲舰而来的二十多名外国记者纷纷拥上前来拍照。渔民怒目而视。

两艘军舰各拴两只渔船,向菲律宾本土驶去。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周边国家抓扣中国渔民,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天大雨,淋了我一个透身湿。大雨滂沱中,我找到了海南省渔政局。管海事的渔港监督科科长郭义权是个瘦削精干的中年人。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对南海发生的事情如数家珍。

这是一本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海南省渔船被周边相关国家袭击抓扣的明细帐,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鲜为人知,国内各种媒体查不到线索,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涉及维护国家主权和如何有效地保障中国公民生产生命安全等重大问题,在这里我将详列如下,以备查考:

●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三日,琼海 00224 船在南沙中业岛附近海面捕鱼时,船员黄昌标、郁业友、郁业轩被菲律宾驻岛军队抓扣。十五日下午一时,菲军用飞机将三名渔民送往菲律宾巴拉望岛军营拘留所看管。三名渔民被抓扣期间,遭到菲士兵拳打脚踢等非礼待遇。后经中国驻菲大使馆和当地华侨的交涉,三名渔民于六月二日返琼。

● 一九九零年五月十一日,琼海 00585 船十四名渔民在南沙安渡礁海面捕鱼时,被马来西亚军队抓扣。八月二十七日,马来西亚纳闽地方法院以我渔船侵犯其领海为罪名公开判决:一、没收渔船及一切财产(价值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二、船长罚款二

十万马币,船员每人罚款十万马币;三、如不交款,坐牢一个月。九月二十八日,我渔民坐牢期满,取道香港返琼。

●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琼海 00559 船南沙六门礁附近海面捕鱼时,遭到占礁越军枪击,一名渔民腿部中弹。该船为了抢救伤员,不顾大风恶浪强行,航行中遭风浪击沉。全船十四名船员,除两名获救外,其余全部罹难。

●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日,琼海 00460 船在南沙中业岛附近海面捕鱼时,七名渔民被菲律宾军队抓扣。后经外交途径解救,四月三日返琼。

●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琼海 00344 船在南沙中业岛附近海域捕鱼时,十一名渔民被驻中业岛菲律宾军队抓扣,船长何君法被押往菲律宾。后经外交途径放行。

●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儋州 06002 船在北部湾五三三海区捕鱼时,遭越军抓扣。越军没收我渔船起网机等生产工具,抢走鱼货及私人现金。经济损失七万元。

● 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临高 12169、12150、12001、12162、12002、12163 等六艘渔船在北部湾三三八海区捕鱼时,遭越军三艘军舰抓扣。六十二名渔民均遭越军殴打,船员杨文庆被打伤。越军没收我渔船流刺网一千六百张,起网机六台,蓄电池六块,抢走渔民全部生活用品,并对每艘渔船罚款五点七六万元。我渔民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余万元。

●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七日,临高 03108 船在北部湾北纬 18°23′、东经 108°捕鱼时,被越军抓扣。越军抢走渔民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并罚款三万元。该船直接经济损失十点五万元。

●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临高 11010 船、海渔 12109 船在北部湾五三四——八渔区捕鱼时,遭越军抓扣。越军没收我渔船生产用具,每船罚款六万元。我渔民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七点五万。

●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日,临高 11329、临高 11030 船在北部湾四八七——五渔区捕鱼时,遭越军抓扣。越军没收全部生产工具,并对 11329 船罚款五万元,11030 船罚款四万元。两船直接经济损失十八点六万元。

●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临高 03026、03106、12145、11092、11135 船,琼渔 12208 船,海渔 12234 船,在北部湾四四——四渔区捕鱼时,遭越军抓扣。越方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五处一办中介,每艘渔船付款六点七万元人民币后才赎回渔船。琼渔 12208 船无钱交付,被越方没收。直接经济损失共计一百零一万元。

●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潭门镇六十二名渔民及船只被菲律宾抓扣。

● 一九九五年五月六日,琼海 00339 船在南沙南薇滩海面(北纬 7°50'、东经 111°44')捕鱼时,被越军十九号供给船抢走海参等一批鱼货,价值八万元。

●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十三点,临高 03013 船在北部湾四四二——一渔区航行时,遭一艘越军炮艇开枪射击,渔民黄五腿部中弹。越方七名无标志持枪人员登我渔船,抢走保险箱一个,对讲机两部,电泵一个,风布两块,手表一只,共计六千多元。

●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儋州 00513 船在北部湾四四二渔区捕鱼时,被越军开枪追赶,并被越军抓扣,拖往越南吉婆岛。越军抢走生产工具和鱼货,经济损失二点八万元。六月六日我渔船返琼。

●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临高 11363、05023 船和海渔 12107 船三艘渔船在北部湾北纬 19°18'、东经 107°10'海面生产时被越军抓扣,我三艘渔船生产工具、鱼货等物资被越军没收,并对我每艘渔船罚款四千四百美元。经济损失共计五十五万元。我三艘渔船于六月十一日交付罚款后,于十八日被越方放行返

琼。

● 1995年5月12日,儋州11036船在北部湾北纬20°20'、东经107°35'海面上生产时,被越边防军抓扣,越军没收我渔船生产工具,鱼货等生产、生活用品,经济损失三点三万元,其后越方将我渔船及其人员放行返琼。

● 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我省琼渔12114、海渔12123船在北部湾北纬20°35'、东经107°49'海面生产时被越军抓扣,我两艘渔船及其二十三位渔民至今未归。(作者按:这个消息作者知道的更早一些。九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作者在农业部渔业局渔政处采访时,一个办事员给正在接受采访的高黎明处长一份电传。“海南来的。”办事员说。高处长看完后,把电传递给我。“你也看看吧!看看越南人在干什么事儿!”高处长愤愤地说。)

● 一九九五年九月五日,儋州17007船在北部湾北纬19°47'、东经107°58'航行时,遭一艘越军武装船追赶射击,当场打死我渔民吴大儒、李小三,打伤渔民李镇杰(重伤)、符战义(轻伤)。

● 一九九六年四月,菲律宾军舰在南沙海域把中国商船“误认为海盗船”,进行拦击,打死中国人两名。

还有上百起中国渔船被周边国家军人渔船和不明国籍的海盗船打人、杀人、抢劫的事件。据有关资料统计,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四年,海南省渔船在南沙遭到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军舰及不明国籍的海盗船抓扣抢劫枪击事件十三起、渔船十四艘、渔民一百六十二人,死亡渔民十六人,受伤十六人,直接经济损失七十一万元。北部湾的情况更糟。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五月,海南省渔船在北部湾捕鱼,遭到越南及不明国籍的海盗船袭击一百一十起,渔船一百四十一艘次,死亡渔民一人,受伤二人,直接经济损失八百一十九万元。其中被越军抓扣事件十二起,渔船三十艘,渔民二百八十六人,经济损失四百零一

万元；被越军和海盗船枪击事件二起，渔民死一人，伤二人，经济损失三万元；被不明国籍没有船号的海盗船抢劫事件九十六起，渔船一百零九艘，直接经济损失四百一十七点二万元。如果再加上广东、广西两省的统计数字，会更加触目惊心。

“你来得正好。”郭义权拿出记事本，说：“今天（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七日），越军又在北部湾白龙尾岛东北部抓扣了一艘中国渔船，船号是 13113，船上有八名渔民。”

中国人既可悲可怜，又窝囊。被别人打碎了牙齿，强往肚子里咽。

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之前，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先后抓扣过中国渔船。马来西亚还公开审判了中国渔民。我国公民在自己的海域捕鱼，被抢，被抓，被扣，被审判，国外沸沸扬扬，国内渺无音讯。如此重大的事情，国内公众完全蒙在鼓里。

我们注意到，三月二十五日之后，越南活动频繁。他们毫无顾忌地在南海和北部湾抓扣中国渔船，抢劫鱼货，打死打伤中国渔民。没有越南最高当局的允许，越南军人绝不敢这么干。这些严重的事件发生在中国领导人刚刚访问了越南之后，越南人也太不给中国领导人面子了。这些严重事件发生在越南最高领导人十一月份即将访问北京之前，这似乎是想在热情拥抱中国领导人时，先给你点颜色看看。越南人似乎有恃无恐。一九九五年七月，越南加入了东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问越南时说：越南加入东盟，无疑会给越南在南沙等问题上的发言增加分量。不久，越南又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连串的事件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注意到，国内有一些利欲熏心的卑鄙小人，钻了中国外交软弱的空子，和越南人互相勾结，榨取同胞的血汗钱。郭义权科长介绍说，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越军舰抓扣中国七条

渔船,押往越境吉婆岛。越方以我渔船进入其领海偷捕海产资源为由,对我每条渔船罚款八点五万元。正当中方通过外交途径与越方交涉时,广西区党委五办一处私下分别与越方和临高县调楼乡有关单位联系,签订了“私了”协议书。我方船长被迫在罚款通知书上画押签字,被迫交清罚款走人。这种结果让中国外交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五办一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单位?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这帮人的行为极其恶劣,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郭义权给作者提供了“五办一处”和临高县调楼乡的私了“协议书”文本:

甲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五办一处

乙方:海南省临高县调楼乡渔业开发公司

双方就乙方琼渔:12124、12208号,海渔:12234号,临高:03025、03106、12145、10011号,七艘渔船被越南边防部队扣押,乙方愿意出钱赎回渔船,甲方协办等事宜协达如下协议:

一、乙方同意让甲方负责办理赎回七艘渔船的具体工作。

二、甲方负责与越方联系办理赎船的一切手续。

三、乙方按越方提出的渔船赎金,每艘九千五百美元,共六万六千五百美元付给甲方,由甲方付越方。

四、甲方负责与越方协商尽量保全渔船上的一切生产工具和仪器,并负责要求越方把罚款通知书交由渔民带回。

五、自乙方付完赎金给甲方之日起,甲方应尽快联系办理保证渔船和人员安全返回海南,如在十天内乙方的渔船没有安全返回海南,甲方应把七艘渔船的全部赎金六万六千五百美元如数退还给乙方。

六、协议执行中如发生意外之事,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三份。

甲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五办一处

乙方：海南省临高县调楼乡渔业办公室

一九九四年元月十九日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越南在我方领海（起码是有争议的海域）抓扣渔船都是以中国渔民交纳赎金来了结？“五办一处”的真正背景是谁？谁赋予了“五办一处”这种权力，使它敢于置国家形象、国家利益而不顾？如果没有某种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和默契，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敢于超越外交途径来处理国际争端？要不然，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这里还要提出问题：为什么渔民不愿意依靠国家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反倒愿意忍痛罚款，私下了结？郭义权说：“你不了解情况。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渔民，你当外事部门的人。我的船被抓扣了，我去找你，把情况告诉你。你说：‘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我说：‘我同意。但是，你能不能保证通过外交途径一定能够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你赔不赔偿损失？’你就不好说话喽。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耽误功夫跟你纠缠了。我就赶紧借钱去越南赎人赎船了。搞得好，还能赶上几个‘流水’挽回损失呢！实际上，你也决定不了。层层汇报，层层耽误，陪你不起。说到底，渔民对你的能力和效率不信任。这就是渔民为什么在自己的领海捕鱼被抓、被抢、被敲诈、被凌辱却不愿意求助政府的原因。”

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公民或纳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做得怎样呢？在我所开列的清单中，中国渔民在南沙和北部湾捕鱼，与周边国家发生海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南沙水域，渔民被抓扣，都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的。即使如此，渔民仍然不能避免被审判、被侮辱，渔船及其昂贵的设备被没收，血本无归的命运。一种情况是，“北部湾私了”，按

照对方的要求缴纳赎金,换回人和船的自由。总之,渔民没有任何安全感,出了事,腰杆子也不硬。这与美国、菲律宾对待本国公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菲律宾为了一个公民在异国他乡的命运,总统都要出面搭救,最大限度向对方施加压力。我们呢?要渔民自己去“私了”,借钱去越南赎船赎身!真是丢脸!真是天大的笑话!

菲律宾军人用枪把中国渔民赶到登陆舰的前甲板,拖着四条渔船,得胜回朝。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整整十个小时的惊吓和折腾,渔民们已经是疲惫不堪。前甲板几十平方米的地方,挤了五十八个人,互相都挪不开身。铁甲板被三十八度的太阳暴晒了一天,人在上面如同烤鱼干!顶着晒,没法躲。南海的太阳忒毒,一般人去,不到一个小时,便能狠狠地揭掉一层皮!可恶的是,菲律宾人不给水喝,即使给一点水,根本不够分。有心计的渔民带几瓶矿泉水,你一口我一口,一会儿便喝没了。甲板烫,站没法站,坐没法坐,更别说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了,加上口渴难耐,真是活活地受罪。小便就地解决,大便报告,由当兵的押着去厕所。

从仙娥礁到菲律宾巴拉望省的乌尔干港,走了一天两夜,两夜都是下雨。小雨淅沥,海风凄凉,无处遮蔽。菲律宾人把中国渔民当作了任凭风吹雨打、没有知觉的礁石!风雨中,大家身子贴着身子,互相倚靠,互相取暖。船长王琼法,既要照顾老,又要照顾小。老父亲六十四岁,儿子十五岁,都经不起这般折磨,日晒雨淋,饥寒交迫,病在路上麻烦就大了。爷爷更是爱惜孙子,他把孙子搂在自己薄薄的胸膛上捂着。上了菲律宾军舰后,渔民一天两顿稀饭,而且不管饱。五六个人一小钵稀饭,小钵六七寸直径,也就是一公分深,不够一个人吃!每条渔船都有一千多斤大米,菲律宾人也是用这些米煮稀饭,但是偏偏不煮够。渔民黎德民讲述这段经历时,余怒未消。他说:“他们拿我们当狗一

样!”狗都不如!狗还给饱饭吃呢。这是故意虐待。船上有二十多个外国记者,对此似乎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与菲律宾人一样认为,中国渔民应该受到惩罚。他们此刻正在船舱里,喝着香槟幸灾乐祸呢!

越南渔民和菲律宾渔民也到中方驻守的岛礁附近捕鱼,在南沙的渚碧礁,我看见礁盘上有菲律宾渔民的小舢板活动。我问守礁士兵:“外国渔民在礁盘上捕鱼怎么办?”士兵回答说:“只要他们不逼近到一定的距离,我们不会采取行动。”我问南沙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张万华上校:“我守礁部队有没有扣押外国渔民虐待外国渔民的情况?”张万华上校正色说:“我以我中国军人的人格担保,在南沙的中国军人,严格执行纪律,从没有抓扣过一艘外国渔船,从没有虐待过一名外国渔民。外国渔民在海上如果遇到情况,求助于我守礁部队,我守礁部队都以礼相待。”

南沙守礁部队赵铁林少校给我讲了个故事。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两点多,东门礁。哨兵报告,一只小舢板朝礁堡划过来了!“舢板上有三个人。他们打着小白旗。”

这种小舢板只有菲律宾渔民才有。“主任,是菲律宾渔民求救。”哨兵向在东门礁“蹲点”的赵铁林报告。“放他们上来吗?”

“注意警戒!”赵铁林命令道:“让他们把舢板划过来,看看有什么事。”

一会儿,抬上来一个渔民。士兵打手势问发生了什么事。菲律宾渔民打手势回答。打了好半天哑语才搞清楚,原来菲律宾渔民用炸药炸鱼,距离太近,火药激起的水波,击伤了渔民。那个渔民抬上来时,全身僵着不能动弹,一脸的痛苦。

菲律宾渔民向中国军人求医。

“拿个凳子过来。”赵铁林说。“再拿点酒来。”

战士徐建新拿来了父亲寄来的跌打损伤药和白酒。他看见

三个菲律宾渔民口渴，还拿来了矿泉水。在远离大陆的南沙群岛，没有比药、酒、矿泉水这三样东西更珍贵的了。

受伤渔民被扶到凳子上。“把脚伸过来。”赵铁林示意道。他给受伤渔民的腿和胳膊敷上酒，然后上下左右使劲按摩。

四十多分钟后，受伤渔民僵硬的四肢开始缓和。

“活动一下胳膊。”赵铁林甩着自己的胳膊示意。

渔民跟着赵铁林甩胳膊，活动膝关节。

“好了吗？”赵铁林问。

“OK！OK！”受伤渔民伸出大拇指说。“扑通”，他跪下了，磕头感谢赵铁林。

.....

在西沙，在北部湾，中国军人和渔民救护越南遇险渔民的故事也很多。

郭义权跟我说，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八号台风袭击北部湾海面。晚上九时许，海南岛陵水县边防部队收听到了越南船只的呼救信号，会同县水产局紧急出动，冒着生命危险，将二六六五号越南渔船、九名渔民救到陵水县新村港。等台风过后，给二六六五号越南渔船装满淡水，备够柴油、大米、蔬菜，然后放行。

再看看古人是怎样对待菲律宾人的。

清朝时，对那些遇风浪飘入中国的苏禄船只，清廷“给银修船而去”。对受难的苏禄船民，“著广东督抚给予口粮，加意扶恤，听其候风回国，嗣后凡有外国船飘入内地者，皆著该地方询明家由，悉心照料，动公项给予口粮，修补舟楫，俾得安全归国”。

可谓是仁至义尽。

然而，中国的仁至义尽换来的是什么呢？

潭门镇渔民在继续诉说着他们在菲律宾的遭遇。

三月二十七日，六十二名中国渔民被拉到了菲律宾巴拉望省的乌尔干湾。他们又在军舰上日晒雨淋了两天后，被带上岸，

关进了巴拉望省监狱。

六十二名渔民“囚犯”生活的第一天是出乎意料的。进监狱时,监狱已经开过了晚饭。监狱方也不准备给渔民吃晚饭,匆匆把渔民塞进十六号牢房,便不管不问了。这一天渔民只吃了一顿饭。渔民又饿,又累,又惊,又吓,在异国他乡的监狱里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菲律宾监狱的生活,让六十二名渔民永生难忘。

监狱在巴拉望省府大楼以东不足一公里处。省长可以在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看到犯人活动的情况。

巴拉望省监狱是一个“U”字形监狱。“U”的底部是十六号牢房。十六号牢房,不到一百平方米,水泥地面,高低不平。牢房后墙约有一点八米,以上是通风的铁栅栏;牢房的前面面对监狱的院子,铁栅栏一通到底。牢房的建筑风格,可能是为了适应菲律宾热带海洋性气候。潮湿,闷热,太阳、台风、暴雨时刻都会光顾这个地方。太阳来了,风雨来了,无处躲,无处藏。晚上,渔民们一个挨着一个,席地而睡。不久,渔民们开始生病了。发烧,腹泻,胃痛,关节痛。

更糟糕的是,监狱当局对中国渔民采取了歧视的态度。渔民李春宇说:“中国大使馆的人没来之前,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早饭是中午十二点到二点,晚饭是晚上八点到九点。每顿饭每个人吃不到二两饭。早饭一人一个小面包,晚上吃稀饭。菜是苦瓜叶、辣椒叶、菠萝蜜芽煮的汤。有时候也吃煮香蕉,切成一块块的,两三个人分吃一只香蕉。监狱关了三百多犯人,分给中国渔民的都是黑锅巴;有时分到中国渔民时,没饭了,没饭只得饿肚子。没有水喝,没有水冲洗厕所,七八天洗一次澡,天气又热,大小便都在里面,又脏又臭。每天吃不饱,很多人就利用洗澡时间,采一些野空心菜拿回牢房,用当地华侨给的报纸煮来充饥。没有盐,没有油,难吃极了!”

在监狱当局的纵容下,菲律宾犯人也来欺负中国渔民。渔民黎德权说:“犯人趁晚上没灯的时候,朝我们泼脏水,用石头砸我们。我的胸口就被砸了一下,痛了十几天。孙振兴、莫泽豪也被犯人打过。”

中国渔民为了生存,他们在监狱办起了交易市场。他们卖衣服、卖鞋、卖裤带、卖手表、卖香烟,只要是能卖的都卖了,然后买香蕉买面包充饥。当然,菲律宾犯人充分利用了监狱里交易的天时地利人和,他们买中国渔民的东西时,就是“买方市场”;他们卖给中国渔民东西时,就是“卖方市场”,面包香蕉值钱着呢!一块五“比索”(注:“比索”,菲律宾币。一块人民币约合三比索。)一个小面包,一块到一块五一个香蕉。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六日,中国政府派出了渔业协会代表团赴菲慰问六十二名渔民。代表团虽然有各级政府官员参加,但是以“民间”的形式出面。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说,渔民向他们诉说了在菲律宾监狱受到的非人待遇后,“代表团以民间的身份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了抗议”。代表团回国后写了专门报告。我要求看报告,被拒绝。理由是,“加了密级”。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让公众知道六十二个中国渔民在菲律宾的悲惨遭遇。

六十二个中国渔民中,还有十个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每人交纳了二十万比索的保释金后,由当地华侨托管。这些孩子在关押期间,也像大人那样受到了歧视和虐待。

有关方面接到的指示是,“注意掌握政策,不要渲染,要维持最近中菲关系转向稳定的良好势头”。

中国方面十分克制。渔民被关进监狱七天后,中国使馆才派了二秘去探监。渔民们把二秘的探监看作祖国送来得温暖,虽然按常理这种温暖送得稍晚了一点儿。见到祖国亲人,多少心酸,多少痛苦,多少委屈,一起涌上心头。大家围着二秘,哭作

一团。

二秘此行,只是一般性地了解了一些情况,一般性地安慰了一下渔民,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问题。这之后的两个多月,渔民并没有改善生活处境,让人感到沮丧和遗憾。二秘安慰渔民说,政府正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尽快让渔民们回家。渔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政府早日解救他们回家。

然而,他们盼来的是菲律宾人的“起诉”。

五月三十一日~九月九日,中国渔民共出庭十一次。渔民说,每次出庭几乎都问的是同样问题。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出庭时,居然没有翻译,一位香港记者自告奋勇当翻译。每次出庭都是当地华侨的大卡车接送。

渔民说,每次出庭,法官和法庭工作人员都相当随便,好像是装模作样地履行着一个设计好的没有任何新意的程序。渔民说,地方法院的法庭很小,渔民一进去就坐满了,即使如此,每次都有许多记者赶来听审。给人的感觉是,这里正在上演着一台戏,一台专门演给各国记者看的戏,一台专门给国内舆论看的戏。

地方检察官伊拉甘“起诉”中国渔民,罗列了一大堆罪名:

“非法人境罪”;

“非法捕杀海龟罪”;

“非法破坏珊瑚罪”;

“拥有爆炸物企图非法捕鱼罪”;

“使用有毒物质非法捕鱼”。

五月三十一日,菲律宾巴拉望省公主港市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公审中国渔民。

地方法官喝道:“马云辉,你们六十二人是否为擅自进入菲律宾领海以及非法拥有炸药和有毒物品认罪?”

渔民代表马云辉拿着一份声明,愤怒地辩驳说:“我们当时

是在中国的领海捕鱼。我们所拥有的炸药是为了防止海盗袭击。我们强烈要求菲律宾政府释放我们！”

马云辉强调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仙娥礁一带海面捕鱼，祖祖辈辈都在南沙群岛捕鱼，何罪之有？

这种结果当然在预料之中。中国渔民不可能承认有罪。但是，不管承认与否，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审，不厌其烦地开庭，不厌其烦地讯问。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渔民被大卡车拉着，从监狱到法庭，从法庭到监狱，来来回回，招摇过市。案件性质如此清楚，案情如此简单，却要这样反复折腾，把中国渔民当猴似的耍，给菲律宾所谓的“审判”增加了一种滑稽的色彩。

最终，检察官向法庭表示，放弃“非法拥有爆炸物企图非法捕鱼”和“使用有毒物质非法捕鱼”的证据和证词，坚持“非法入境”、“非法捕杀海龟”、“非法破坏珊瑚”等三项指控。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

“五十二名成年渔民监禁最少七个月加一天，最多两年另四个月；十名未成年渔民监禁最少一天，最多四个月。没收四艘渔船（作者注：其中一艘不知何故在菲律宾港湾沉没）及其附属设备。”

法官要中国渔民认罪，中国渔民拒绝认罪。

法官要中国渔民在判决书上签字，说，“你们签了字，就可以让你们回家”。中国渔民拒绝签字。

与此同时，菲律宾司法部和外交部磋商，建议拉莫斯总统特赦中国渔民。

不久，拉莫斯宣布，特赦中国渔民，但是要留下四名船长，继续接受审判和惩罚。

中国大使馆在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中国大使馆的人始终没有出席地方法庭的开庭，基本态度是，“不承认，不参与”。

对此,大使馆一秘张铁根对香港记者解释说:“我们不承认菲律宾法庭的裁判。这件事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即使渔民犯法,也应由中国法庭自行审理,菲律宾无权审理。因此我们没有派人到法庭去。”

不知道为什么,六十二名中国渔民深陷囹圄半年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却一直没有露面。“不承认,不参与”,并不妨碍驻外代表国家利益的最高行政长官看望和慰问自己的同胞呀!别说是六十二个同胞,就是一个同胞在外面受到了侮辱和委屈,所在国大使都有义务予以高度的重视,并表示足够强有力的姿态。只派一名二秘来沟通大使馆与渔民之间的联络,衔接各方面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二秘第一次去监狱看望渔民并了解情况时,已经知道了监狱当局歧视和虐待中国渔民的情况,然而,事隔好几个月,中国渔民恶劣的环境和待遇仍然没有得到改善。二秘安慰渔民,“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你们很快就会回家”。“很快”了半天却是彻彻底底的“很慢”。渔民在监狱被折磨了半年多才回家。为渔民辩护的律师,是华侨,据说还是中国大使的好友。然而,正是这位律师的代表在法庭上承认中国渔民犯有“蓄意捣乱罪”,实际上是所谓的“有罪”辩护。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七月底、八月初中国渔业协会赴菲慰问渔民,虽然该团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组成,却是“民间性质”的低调。海南专机将渔民接回时被告知,“从今后中菲关系的大局考虑,不宜大造声势”。也是低调处理。这时候,大家可能忘记了渔民到南沙捕鱼,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显示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意义。这两层意思,是渔民出海之前政府动员和教育的主要内容。

渔民被抓扣,低调处理。

渔民被审判,低调处理。

渔民被虐待,低调处理。

渔民返回家园,低调处理。

当地华侨对中国渔民的处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

毕竟是骨肉同胞,毕竟是血浓于水。

华侨经常来看望渔民,经常给渔民送菜送米,给渔民零用钱花,帮助生病的渔民买药看医生。菲律宾华商会还专门组织了四十多人的医疗队,从马尼拉飞到公主港,给包括中国渔民在内的监狱人员检查身体,治疗病症。这些举动在菲律宾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深深地鼓舞和感动着被扣押的中国渔民。

无论是有关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渔民;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守卫南沙的士兵,说到南沙发生的事情,都是一言难尽。一年过去了,南沙的情景怎样了呢?外交事务自有人去办理,好坏不便臧否。风云消散,物换星移,什么事都有一个了解的时候。但是,何时能了,何时能结?有学者说,人类终将走向大同,不比那么锱铢必较,争斗不断。但愿能够如此。我们愿意为这个目标祈祷。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南中国海的局势一天比一天更复杂,一天比一天更难预料。

一九九五年李登辉访美,一九九六年台湾“总统”大选,中国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导弹试验,海峡两岸关系空前紧张,“美济风云”渐渐淡化,淡化到了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似的。除了例行的外交辞令外,国内舆论什么话也没说,这对于六十二名受尽屈辱的中国渔民和他们的家属不太公平,这对于在北部湾和南沙群岛捕鱼曾被打死打伤被抓扣被抢劫的中国渔民和他们的家属不太公平。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九六年初于北京木樨地



王恒杰传奇

《南中国海喻言》续篇



一位老人一辈子从事边疆考古，
学术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和
国家主权。这位老人一辈子爱国，却
一辈子孤独。

世纪末感言

一位老人一辈子从事边疆考古，学术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可是读完这篇报告文学，我相信，谁也不会轻松。这位老人一辈子爱国，却一辈子孤独。

这位老人是一位失去左小臂的考古学教授，一位残疾学者，一位残疾书生。

那些肢体健全，最有“权力”爱国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呢？终让这位独臂老人泛舟南沙，出生入死，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参加了独臂老人在北京八宝山的葬礼。那天，苍天都在为他哭泣。

——作者

告 别

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一天,能见度极好。一条渔船在南中国海航行。这条渔船只有七十九吨,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像一片薄薄的树叶——一片孤独无援的树叶,起伏摇摆着,远远地向南飘去。

船头,一位独臂老人迎风矗立。

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地道的渔民。他戴着一顶被汗水渍黄的草帽,白衬衣已是邋邋不堪,一条无所谓脏还是干净的蓝裤子。一阵大风吹来,刮掉了草帽,露出他蓬松凌乱的花白头发来。没有了遮掩,那张被南海炙热的太阳烤焦的脸显得异常的执着和倔犟。如果说他与渔民还有些区别的话,就是他那一米七九的个子和他那副看上去不太协调的深度眼镜。海南岛原住渔民少见他那么大的个子,更不可能近视。再就是他那随和又不失矜持的教授风度。这是一个古怪的老头。他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独自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进行了系统的考古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他在回想不久前一个美国记者对他进行的具有挑衅意味的采访。

美国记者问:“王教授,政府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进行南海研究?”

他笑了。他知道美国记者话中有话。“你拿了政府的钱,当然要替中国说话。”显然是对他南海考古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提出质疑。

他说:“我在海南省注册了南海区域文化经济研究所。这是

一家民办研究所,没有政府一分钱的资助。我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募集和我的积蓄。您坐着的这个破沙发,就是我经常睡觉的床。”

美国记者又问道:“南沙群岛离你们那么远,怎么能说是你们的呢?”

这是国内外人士经常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容易给人一个错觉:谁离的近,主权就应该归谁。这种逻辑,不尊重历史,不尊重现实,更不符合国际法。

严格地讲,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甚至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没有对中国的南海诸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后来占领了南沙群岛大量岛礁的越南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时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材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禄则进一步介绍了越南所掌握的材料。黎禄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属于中国了。”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亦正式致函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对南海诸群岛的主权。越战结束后,越南恩将仇报,出尔反尔,推翻以往的所有公开承诺,重新提出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其理由,“基于当时战争的考虑”。也就是说,越南当时要利用中国,以赢得中国对越战的支持。越南人的脸,说变就变,昨天还是“同志加兄弟”,今天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从北部湾到南中国海,非常强硬地向中国提出了主权要求。他们说,北部湾的大部和南中国海的全部历史上就属于越南。

“历史性水域”是国际法承认的主权标志之一。历史归属便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的焦点。

中国是古代航海技术十分发达的国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最早开发南海诸岛的国家。有典籍记载,秦汉时期,中国

人就到了南海诸岛。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九乳螺洲”、“石塘”、“长沙”、“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宋元明清四代,以“石塘”、“长沙”为名记述南海诸岛的书籍多达上百种。

一九七七年,有关专家在海南岛文昌和琼海调查时,发现了四本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更路簿》。这些《更路簿》都是渔民祖祖辈辈的传抄本。它记载了由海南东部文昌县的清澜港和琼海市的潭门港航行至东南亚各地,尤其是航行至西、南沙群岛,以及西南沙群岛各岛礁之间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那时,渔民出海要点香,以香枝算更,一般以顺风计,一更十海里)。其中记录了渔民对西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三十三处,记录了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七十二处。有专家参照《更路簿》指示的航海针位和更数,绘制了一张南中国海航海图,与现代手段测绘的航海图惊人地相似!南中国海三百余万平方公里,仅凭经验和简陋的罗盘,没有数百上千年的积累,是很难产生《更路簿》这样精确的航海图的。据专家考证,《更路簿》形成于明朝。这说明,中国渔民世代在南海西、南沙群岛航行和从事渔业生产,与西、南沙群岛连成了血脉关系,并构筑了南海的历史。

一部海洋的历史就是这样纠缠得不明不白,以致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除。但是又必须说清楚。

跟一个没有任何历史概念的美国记者谈历史,是颇费口舌的。跟这个先天抱有成见的美国记者谈历史,不仅有文化上的障碍,还有政治上的障碍。通常情况下,宗主国拥有主权的岛屿,离宗主国本土相对较近。然而,世界公认的国际法从来没有依据远近来划分领海领土的归属。与其说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国际海洋法问题,还不如说这是目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的世界利益格局的现实。王恒杰教授告诉美国记者:“希腊在爱琴海拥有大量岛屿。这些岛屿距离希腊本土约二百至四百公里,而距离土

耳其仅有十几至几十公里。英国的海峡群岛,距离英国本土约二百公里,距离法国海岸线不足五十公里;马尔维纳斯群岛则与英国隔了一个大西洋。还有密克隆岛和圣皮埃尔岛,对于加拿大来说,近在咫尺,却隔着大西洋遥属法国。(作者注:与南沙群岛相对称,马六甲海峡西口有两个群岛,一个是尼科巴群岛,一个是安达曼群岛。这两个群岛紧贴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而扼守着马六甲海峡的西口。然而,这两个群岛既不属于印度尼西亚,也不属于马来西亚,而是属于隔着孟加拉湾一千多公里远的印度。)仅仅凭远近来确认归属,既违背历史,也不尊重国际法所规范的现实。”

“王教授,您到底想说明什么呢?”美国记者问。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王恒杰大声说:“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形势逼人。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资源的争夺,宗教的冲突,大国关系的调整,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

我们看看南中国海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亚太经济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出现了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四小虎”。越南的改革开放也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构成了所谓的“亚洲奇迹”。从资源的角度看,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动力是能源,即石油天然气。阿拉伯的石油和南美的石油已经被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瓜分完毕,新兴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吃一点残羹剩饭的同时,如果不寻找新的能源基地,势必形成经济发展的能源“瓶颈”。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南中国海这片“处女地”。七十年代以后,南海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分别在礼乐滩、曾母暗沙盆地、万安

盆地、北部湾、莺歌海盆地发现了石油天然气。世界为此惊称南海为“第二个波斯湾”。比如印度尼西亚在纳吐纳群岛探明了一巨大的天然气田,天然气的有效储量达一点六万亿,将投资四百亿美元进行开发,气田的相当部分伸进了中国的传统海疆线,并邀请中国参与国际投标。在自己传统海疆线内参加别国主持的国际投标,岂不荒唐?然而不参加又能如何呢?纳土纳群岛才是南中国海的最南端。早被周边国家开发的曾母暗沙都奈何不得,况乎纳土纳?此举让中国人感到左右为难。再看看越南。越南的海洋石油一九九五年达到了七百万吨,本世纪末将达到一千万吨,几年前石油出口量就超过了传统的大米出口量,成为第一出口商品。马来西亚、文莱也早就发了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财。周边国家所有已开发和准备开发的大油气田无一不伸进了中国的传统海疆线。越南甚至把整个南中国海数百万平方公里划成区块向全世界招标,北部边界直逼中国大陆,包围了海南岛,囊括了中国二百余万海洋国土!在南海西南部的万安盆地,一九九二年中国政府与美国一家小石油公司——克里斯通公司签订了勘探协议。由于越南的骚扰,克里斯通公司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勘探作业,四年合同期满后,一事无成,不得不续签合约。与此同时,一九九六年四月,越南把万安盆地的勘探权授予了美国另一家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同一片海域,两个国家重复授权,针尖对麦芒。在中国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其他海域,美国的莫比尔石油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也获得了勘探权。无论怎样淡化处理,都无法回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加之美国的介入、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和恶化,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日本 NHK 在其南海问题的专题片中称南海是“亚洲的火药桶”。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以下的事实便不奇怪了。

九十年代初,马来西亚抓扣并审判在南沙群岛捕鱼的中国

渔民。

九十年代以来,越南上百次地抓扣和打死打伤中国渔民,抢劫中国渔船。

一九九五年三月,菲律宾抓扣并审判中国渔民,组织外国记者访问美济礁,中国除了例行的抗议和低姿态磋商,舆论没有针对性地作出反应。中国公众只能从“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了解世界舆论的动态。一九九五年四月中旬,中国记协和军方共同组织的北京八家新闻单位赴南沙采访团,虽然是一九八八年大陆中国进入南沙群岛以来规模最大的记者团,却非常谨慎地回避了美济礁。记者来到南沙群岛的赤瓜礁时,美济礁只有数十海里之遥了,可望而不可即。去不去美济礁看来是一个界限。中国记者万般无奈,望洋兴叹。然而,中方能够管住中国记者,却不能管住外国记者。中方的抗议并没有阻止住下一个月中菲美济礁对抗的升级,并没有避免外国记者乘坐菲律宾军舰逼近美济礁,进行嘲弄式的访问。

中国舆论对中国渔民在自己的领海被外国抓扣侮辱视若无睹,高挂“免战牌”,其是非得失,暂且不去评论。因为评论毫无意义。国家大事,上面自有安排,轮不上草民百姓来瞎操这份心。中国新闻媒体作为喉舌,从来就缺乏独立的品格,自不必说。没有媒体的充分报道,公众无法了解遥远的南沙群岛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作出判断,虽然他们有了解的权利,虽然他们的判断非常有必要。在国际关系中,充分利用舆论进行博弈,这是简单的常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舆论看作异己力量,看作可能坏事的根源,不仅不利用,反而压抑和贬斥,简直可以说是愚蠢。愚蠢的行为来源于愚蠢的逻辑。这个愚蠢的逻辑有一个假设:别人都是愚蠢的,唯有我聪明,因为我拥有聪明的特权。这便导致了南沙问题研究的“沙龙化”、“贵族化”。

所谓“沙龙化”,是指由于南沙问题的研讨不能得到官方的

支持和允许,文章不能发表,学术成果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一些专家和有识之士不得不以民间的形式组织的小规模非正式聚会。这样的聚会不可能也不准备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大多是一些同仁互通信息、交流看法、发泄情绪。

所谓“贵族化”,是指关于南沙的各方面材料都是由专门的部门来掌握和处理的,一般人很难染指和楔入。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些信息老化、观点陈旧的学术文章,还被“加密”,讳莫如深。更觉荒唐的是,这些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的“加密”文章,却被作为“策论”递交给决策部门和决策者。

久而久之,“南中国海问题”成了人人关心又人人搞不清楚、最公开又最不公开的“玄学”。加上浩瀚大海的阻隔,人们不可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里的紧张气氛,不可能树立起完整的地缘概念,不可能亲吻那里的土地和海水,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便生疏和淡漠了。时间正在拉长。时间正在吞噬美丽的南中国海。

这种状况刺痛了王恒杰的心。他等不及了。这位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毕生从事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他说,近代、现代、当代中国边疆的历史,是一个让人听着看着生气的历史。所有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边疆史研究涉及国际国内政治,涉及国家间关系,涉及掌权者,遍布“雷区”和“陷阱”,动辄得咎。这不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学问,进入者要冒很大的风险。王恒杰教授毫不犹豫地进入了。他的学术动力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学术视野由图们江、乌苏里江而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而南中国海。他紧紧地盯住了这里。这里问题之复杂,形势之紧迫,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注定要在南中国考古研究。他的考古发现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他没有助手,也雇不起助手。他不代表任何一级组织。没有人来资助他。他说:“我靠的是一个中国

人起码的爱国心,靠的是一个历史学者起码的良知来南海考察研究的。”他一个人。他在南中国海大风大浪中独往独来。他是哈尔滨人,满族。半个世纪前的东北日伪时期,他的左小臂被日军一枚哑弹的引信炸断。他左臂那只悬空的袖管,在大海上充满灵性地摆动着;渔船航行,风浪扑面,让我们联想到在那惊涛骇浪中抚剑长啸的独臂侠客。

谁也不能阻挡王恒杰教授的南沙之行。

他每次去南海,都要“善后”。南海诸岛考古研究,是一项极其特别的学术研究。到了海上,谁都不敢保证能平安归来。天有不测风云。南海有三个方面的威胁是绝难预料的:一、心狠手辣、神出鬼没的海盗;二、瞬息万变的热带风暴;三、多国驻军的骚扰。

他在向妻子张雪慧“善后”。他说,如果我回不来,借了谁谁谁的钱要还;如果谁谁谁来信,一定要回复。他把海南研究所的账本交给她。还有那些南沙群岛的资料和古董……都要一一交代清楚,生怕遗漏了什么。

来来去去,担惊受怕,已是习以为常。这种“善后”安排,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今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

她说:“你今年都六十三岁了。不服老不行啊!”

“我现在不去,将来就更不可能去了!”王恒杰红着脸说:“那么多中国渔民被抓,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话都说到了这种份上,还能再说什么呢?

张雪慧女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她多病体弱,可长期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她出身于满清贵族家庭,饱经磨难。她曾经被下放到西北劳动,病退回北京后失业。她当过炊事员,推过煤车,打过零工,后来考上著名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的研究生,才彻底改变了悲惨的命运。不幸的是,过度的操

劳把身体搞垮了。她说话有气无力,说快了,便捂着胸口喘不过气来。这个小个子女人在屋里来回走着,感觉是一张纸一样薄的生命在飘动。让我惊异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却在那里顽强地搏斗着。里里外外她都要张罗。王恒杰是个残疾人,多有不便;两个孩子的上学就业,必须操心。与其他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他还要承担丈夫生死存亡的压力。与其他知识分子家庭相同的是“贫困”。贫困和恐惧,笼罩着眼前这位单薄而多病的女性,你会感到命运的不公平。“你看,我这个穷家破家。”她说。当一个穷家破家的家庭妇女何其难。更糟糕的是,南海研究颇有成就的王恒杰给家里招来了包括记者在内的诸多来访者。“每次有人来,我都要演戏。”她说。堂堂著名教授的家,“面子”上总要说得过去。人来之前她都要紧张地进行大扫除摆一些“道具”,把窘迫的地方都遮掩喽。“穷一点,破一点,没关系,但是要干净。”她说。因为“干净”,不仅是为了“面子”,更是为了“尊严”。

这个家庭,三室一厅,房子不算小,然而,一看便知,这是一个疲于应付捉襟见肘的家庭。客厅兼饭厅里,一墙书架,一个方饭桌。方饭桌的红漆已经剥落裸露着木头。张雪慧在这里接受我的访问时,桌上铺了一张旧报纸。“垫着点儿,别把衣服弄脏。”她一面把报纸捋平一面说。从她略有些难为情的神色中可以看出,垫报纸与其说是怕把客人的衣服弄脏,还不如说是刻意想把陈旧斑驳的桌面遮盖住。坐的木椅也有点摇晃。“来来,换一把。”她说。新递过来的椅子上,白油漆写着单位的名称和编号。一、二十年前的家庭有这样的椅子不奇怪,现在便有些奇怪了。“这几把椅子是单位处理的。”她解释说。

王恒杰教授的小书房更是草率。一个小书架,一张小三屉桌,一条黑色破人造革兼作床的三人沙发。小书房,小书架,小书桌,塞着一个大沙发,再塞进王恒杰这个一米七九的大个儿,

真是拥挤不堪！王恒杰不在乎。一有人来，他就领进书房，把他那些从南沙搜集到的古董拿出来。一些碎瓦片碎瓷片，一些小碗小罐，一些铁器铜钱。他拿着一块在外行人看来毫无意义的碎瓷片说：“你看，这种青花瓷，只有明朝才有。”他又拿下来一个小耳朵瓷罐，说：“这是清朝的。”“别小看这些东西。”他强调说：“他们说明了中国人最早开发南沙群岛的历史。”

张雪慧却轻轻地嘟囔说：“家里的钱都换了这些破烂玩意儿。”

说归说。每次王恒杰去南海，张雪慧都痛痛快快地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积蓄拿出来，尽可能多地让王恒杰带上。她也是学历史的。她也是南海区域文化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她比谁都知道王恒杰南海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南海考古研究，用尽了家里本来就很微薄的积蓄。这还罢了。最不堪忍受的，是每次的生离死别。

这个场面慷慨而悲壮：海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周松从王恒杰教授手里接过一封仔细装好的信函。

“这是我的遗书。”王恒杰说。

“遗书？”

周松着实吃了一惊。他盯着独臂教授，半晌说不出话来。独臂教授用一种深思熟虑的眼光看着他。他当了那么多年的统战部长，每天人来人往，接待的人多了，办公事，办私事，但是从来没有拿着“遗书”来找他的。他早就认识这位从事边疆考古研究的独臂教授。王教授的南沙考古计划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以为王教授来办公室，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辞行。没想到，老教授却报着慷慨赴死的准备和决心。

“遗书”写到：我赴南沙考察，多有不测，若有什么意外，我有一点钱，放在我的学生那里，是返京路费，请转交给我的家属，并请政府关照我的家属。

此番出海,若有个三长两短,他希望女儿能到海南来工作。他希望他的亲人能离南海更近些,能经常去海边眺望他,陪伴他。

这是一九九二年五月的一天。

此时,冒险家们正云集海南,酝酿着新一轮发财狂潮。

可能相当数量的国人不知道这一事实:海南省在全国,既是最年轻的省,又是最大的省。

一九八八年海南建省,全国人大通过的建省“决议”中规定,包括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统属海南省管辖(注:之前属于广东省管辖。)。在南中国海“传统海疆线”内的中国海洋国土面积,理论上达二百一十万平方公里!比陆地面积最大的新疆还要大五十万平方公里!遗憾的是,中国的地理教科书没有明确地表述这个内容。这是几十年来张扬“爱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连自己国家到底有多大都没有搞清楚,何谈爱国?

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王恒杰教授不惜生命,独闯南沙,与当时海南岛的发财主旋律是那么的不和谐。

我问:“为什么要把遗书留在海南?”

他说:“我已经把海南当作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交给了南中国海。”

南海有约

王恒杰来到了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镇人从镇长书记到渔民,都认识这位倔强的独臂教授。大家知道,只要是独臂教授来,一定是下南海的事儿。今年可不敢轻易答应这老头儿。

三月份，“仙娥礁事件”菲律宾抓扣潭门镇六十二名渔民后，潭门镇人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都缩在家里不敢出海了。谁见了王恒杰都摇头。一块去的香港电视台愿意出大价钱，渔民还是不去。

潭门镇的渔民都不敢去，还有哪儿的渔民敢去呢？

王恒杰只好找三年前第一次带他去南沙的那条船。船老大已经换了。原来的大副成了船老大。大道理不必讲。“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政府当初动员渔民去南沙讲得多了。对于赤手空拳任人宰割的渔民来说，又能怎样呢？

你面对大道理容易，面对这位六十多岁的独臂老人却很难。一晃就是三年，独臂老人的手握着还是那么有劲。他站在你面前，你可以叫他父亲。一个能叫父亲的老人，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你，你会怎样呢？

出海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个四肢健全的棒小伙子，上了打鱼船，就跟泥人一样身不由己。在渔民看来，跟谁都可以较劲，别跟海较劲。常年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出一次远海如同到底狱走一遭。遇到风浪，走不出多远，你的骨头架子顷刻间就会被拆散喽，肠肠肚肚都化作了黄汤吐出来。渔船被海水簸起来，又跌下去，航程永无止境，永无希望。这时候你会觉得生存下来是那么的丑陋，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没有理由，那么的没有意义。灵魂已经被绝望攫走，剩下的只是一具缺乏生气的躯壳。这时候你会感到死神的美丽。你可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扑进海里去，与风浪融为一体，从那晕船的痛苦折磨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情景唬不住眼前这位独臂老人。他早就尝过那种滋味了。三年前，他六十周岁时，就跟这条船去了南沙，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在南沙的首次考古活动。他没有被折腾垮。

这位独臂老人在潭门镇有着很高的威望。这位老人在南中

国海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在渔民眼里,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一位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而是前生前世的南海精灵!他对南海的了解绝不亚于船上的渔民就是明证。他能乘着渔船出海,又能挺着身板上岸就是明证。一个学者,一个老人,一个残疾之躯,真是一个奇迹!他便是这样看着你。他花白而凌乱的头发,他充满着沧桑感的皱纹,他那只悬空的袖管,都在传达着他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殷切的希望。你不能拒绝他。你不能拒绝一位你可以称之为父亲的老人的恳求的目光!

三年前,这位独臂老人就是这样面对着他们。三年前,就是这种不可抗拒的目光!

渔民们被独臂老人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船老大说:“王教授,你什么也别说了。你爱国,我们也爱国!我们去南沙!”

王恒杰教授拼着老命去南沙,是为了赴“南海之约”。

他不能爽约。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二度南沙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一九九四年,王恒杰偕夫人出席了台湾召开的“南海学术会”。他在大会发言时呼吁:“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希望海峡两岸有识之士有进一步的行动,共同捍卫南沙主权,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两岸学者能在南海研究上携手合作,是王恒杰多年的梦想。

他的呼吁得到了台湾学者的响应。

台北圆山大酒店。王恒杰教授的手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陈仲玉教授的手握在了一起。他们可以说是神交已久。他们约定,翌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他们同时开展南海研究。王恒杰负责考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美济礁,陈仲玉教授负责考察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太平岛。然后,在海南岛会合,互相交换和切磋考察成果,对南海进行深入地研究。

此番合作,意义重大。

南中国海地缘政治关系中,海峡两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大陆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南沙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海峡两岸是否能够就许多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并进行各种层次的呼应合作。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从目前的形势分析,两岸在南沙问题上进行政治合作的可能是不存在的,而且,前途极其渺茫。

台湾“保七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南沙群岛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菲律宾抓扣中国渔民,一件是台湾国民党军巡护舰队炮击逼近的越南舰只。

越南驻台湾代理代表即向台湾“外交部”提出抗议。台湾“外交部”拒绝越南抗议,并重申南沙主权不容置疑。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五十分,台湾高雄港。台湾“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的三艘巡护舰在鞭炮声中出发,前往南沙群岛执行“护渔”任务,并“宣示南海主权”。

然而,保七南沙护渔舰队出港不到三个小时,突然接到命令:不去南沙,转航东沙。

保七舰队被迫中途返航,令台湾舆论大哗,进而酿成了被台湾媒体称为“一场无预警的‘南海风暴’”。

反对党立法委员抓住此事抨击政府决策如同儿戏,有损国家尊严,并要求黄昆辉(台湾“内政部长”)、卢毓钧(台湾“警政署长”)负责。《中国时报》发表“社论”：“保七护渔折返事件必须要惩处有关官员。”

有关人员不得不而对公众舆论。

黄昆辉、卢毓钧、保七总队长杨子敬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保七事件”作出解释。

卢毓钧说,保七舰队在敏感时期巡护南沙,是他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后,认为引发高度冲突的美济礁离太平岛有些距离,不会

有太大影响,所以决定按计划出航。

杨子敬担任此次南巡舰队的指挥官。他说三艘巡护舰每年年初都要进厂维修,四月底又要执行北太平洋护渔任务,所以,利用空当前往南沙巡航。因为是和平巡航,相信不会引起冲突。没想到酿成了如此大的风波。

台湾保七舰队出航南沙突然折回,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台湾屈服于菲律宾和越南的压力,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态度暧昧。菲律宾和越南曾就保七舰队南沙护渔事先向台湾当局提出过抗议。就在保七出航的当天,菲律宾参谋总长恩里莱公开威胁说,菲律宾海军将进入南沙对抗台湾舰队。

李登辉发表谈话说:“护渔没有必要跑那么远吗!”

这种说法遭到了舆论的批驳。台湾大学政治系一位教授著文说,李登辉的说法“是未经思考的说法。台湾渔船最容易受到挑衅与遭人拘留的地方就是南海一带,保七到南海护渔是名正言顺的。一旦发生冲突,捍卫领土的责任才是国防部的,对外交涉的责任则是外交部的”。并认为台湾对南沙群岛的态度“消极”。这位教授建议说:“海峡两岸对双方在南沙群岛的活动不但不要质疑,还需要相互呼应。因为‘东协’(注:即‘东盟’。)国家已结成同一战线,利用海峡两岸相互牵制的政治局势,对抗两岸的中国人。如果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还相互抵消力量,实属不智。台湾和大陆不愿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两岸当局对于南沙群岛问题可寻求合作方式,一致对外,双方正可利用此一问题建立互信。”

“寻求合作”,“建立互信”,谈何容易!

学术合作,也都是严格建立在“民间”层面。“民间”倒能超脱。总体讲,两岸学者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有着一致的看法,并积极地排除障碍、探索合作的途径。即使如此,这个层面的合作仍然受制于两岸的政治气候。据参加国际南中国海研讨会的学者

讲,每次参加会议,两岸都先要争“名份”,打内战。“自己人和自己人先打得不亦乐乎。”一位学者说,“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让人痛心。大家都明白两岸合作的重要性,但又不能不承担历史和现实分裂的后果。那种兄弟间的不和与猜忌,以致让外人利用和看笑话。”

气候稍好时,两岸学者的合作还会比较顺利;气候不好时,合作便会遇到障碍。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我被电话吵醒。一听那苍老的东北腔,便知是王恒杰教授。

老人非常激动。他告诉我,他赴台湾参加南海学术会的申请搁浅。

此时,老人已是肺癌晚期。第二次南沙行,摧毁了老人的身体。然而,此行台湾,是他与陈仲玉教授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他非去不可。

不批准的理由是,老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作长途旅行。这不是关心和爱护老人吗?“既然是关心和爱护,为什么让我这个老头子在大冬天来回跑那么多趟?”他说,“说我身体不好,但是医生有证明,去开会没问题。”

王教授原计划的学术交流就这么流产了。他无可奈何。他分析,不批准他应邀赴台湾,可能是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空前紧张的缘故。

一九九零年,大陆海军希望跟太平岛国民党守军联络。大陆海军购买了“茅台”酒和“中华”烟,往太平岛送,但是遭到太平岛国民党守军的拒绝。这批“茅台”酒和“中华”烟放在永暑礁,一放好几年,礁上的海军官兵再馋酒再缺烟,谁都不去动,谁都知道那是给国军弟兄预备的。

“天长日久,烟生霉,酒蒸发,一拨一拨的守礁官兵看着都心痛。不是心痛这名贵烟酒就这么糟蹋喽,而是心痛兄弟同胞间

的隔阂太深了！”一位海军上校说。

一位权威人士分析说：“海峡两岸是否能在南沙问题上进行充分地合作，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总体政策框架的变化和调整。在目前的情况下，政治军事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保七事件”便是一次实验。

然而，“保七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南沙政策执行过程中另一番情景，即政客与军方态度的微妙差别。

意味深长的是，这么一次涉及敏感地区的重大行动，“行政院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不知道准确的出航时间。出航当天，黄昆辉接到了“警政署长”的报告：保七总队十九点出航。想必黄昆辉认为，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通报情况并征求各方的意见。下午，他与出席“立法院”质询的“外交部长”钱复、“国防部长”蒋仲苓交换了意见。三方认为，即应阻止保七舰队出航南沙。

当黄昆辉不慌不忙地给“警政署”打电话时，“警正署长”告诉他，保七舰队已经提前出航了！

竟比预定出航时间提前了三个多小时！也就是说，几乎是在对上层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改变了舰队计划出航的时间。

这简直是开玩笑！这么重大的变动，居然不报告顶头上司！

杨子敬言之凿凿。他说，保七舰队在出发前曾与“国防部”有过联系。出发当天，“国防部”、海军、“警政署”三家召开了联席会，认为一切准备就绪，可以提前出发。

而且，保七舰队护渔南沙，行前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同行的还有记者和研究人员。黄昆辉曾两次要求“警政署”暂缓执行保七南沙护渔计划。“警政署长”却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箭”不仅要发，而且还要提前发。

当然，这“箭”还是被政客折回。

台湾警方与军方协调立场，保七舰队在“美济礁事件”的背

景下护渔南沙,演出了三部曲:大肆宣传,违抗命令,提前出航。我猜测,没有某种强有力的默契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

台湾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成立了“南海小组”,并且制定了“南海政策纲领草案”。草案确立了五大目标和九项实施纲要,其中包括配合国家统一纲领研究两岸南海问题的有关事项,筹备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或两岸及港澳多边南海会议,强化战备,对南海诸岛加强巡逻等。实际上,这个“草案”只具有文本的意义,台湾当局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台湾的南海政策仍然受制于台湾对大陆的整个政策环境。我们能看到的现实是:一、九十年代以后,台湾为了扩展国际空间,推行“南下”外交战略,李登辉先后访问了印尼、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用“度假外交”的形式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联系,这是东盟国家与大陆建交以来,台湾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方面不可能得罪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与大陆默契、合作。二、江泽民提出大陆对台关系的八点建议,随后李登辉回应了六点建议,“江八点”和“李六点”仍有短期内不可能弥合的重大分歧。三、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空前紧张。大陆连续在东海进行洲际导弹实验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者表明武力解决“台独”的决心,二者打击李登辉的实力,意图影响台湾“总统”直选。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的“南海政策纲要草案”便是一纸空文了。

然而,台湾毕竟还有一个“南海小组”来协调有关部门的步调,毕竟还有一个“南海政策纲要草案”来规划和指导南海的一切行动。与之相比,大陆倒略有不足。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了中国解决南沙群岛问题的十二字方针,即“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迄今为止,大陆并没有一个综合部门、比如“南海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协调各部门的行动,组织制定大陆南沙政策的方案,以致在南沙群岛已被瓜分完毕、周边国家大规模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形势

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虽然颇具大国气度,因为缺乏或没有实际内容,缺乏或没有谈判的实力基础,却成了一个响应甚微的一厢情愿。

台湾也提出了“共同开发”的设想,但仅仅是说法。

由此可见,大陆台湾两兄弟,在涉及国家主权等重大问题上,同室操戈,各行其是,不啻是中华民族一个不堪卒睹的悲剧。

王恒杰教授说:“我就是要为了结束这个悲剧而努力。”

勇闯太平岛

“太平岛,你哪来太平!”

船过太平岛,人们都难免发出这样的感慨。

几十年的隔绝,几十年的猜忌,大陆人从没有上过太平岛。

从海南岛出发,过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然后进入南沙群岛。继续南下,便可以看见如雁阵依次排列的南沙诸群礁:双子群礁,中业群礁,道明群礁,郑和群礁,九章群礁……太平岛便在郑和群礁西北。

太平岛是南沙群岛最大的岛,零点四二平方公里。说是最大的岛,却小得可怜。零点四二平方公里,在这沧海茫茫中,不过是一块立锥之地。可在南沙,却是一块宝地。南沙群岛,与其说是“群岛”,还不如说是“群礁”、“群滩”、“群沙”。因为,“岛”远远不如“礁”、“滩”、“沙”多。南沙群岛二百多个岛、礁、沙、滩,只有十一个岛。南沙群岛全部的岛面积加起来,还不如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面积大。

这些概念,对于大陆人来说,真是太陌生了。

所谓“岛”,是露出海面,由沙洲堆积而成的陆地,植物茂盛,

特大风浪不能淹没。

所谓“礁”，是生长在海面附近的珊瑚礁体，涨潮淹没，退潮露头。

所谓“沙”，分两种。一种是“沙洲”，是指那些新露出海面的陆地，有一些松散的珊瑚、贝壳等堆积而成，容易被大风浪所淹没，如越南占领的染青沙洲。一种是“暗沙”，覆盖有碎屑沙粒的珊瑚礁体，在海平面以下，如曾母暗沙、北康暗沙等。

所谓“滩”，是海底突起的珊瑚礁滩地，呈广阔平坦的台地状，深度超过三十米。

这样的地质地貌，人类难以生存，却是鱼类等海洋生物的天堂，却是远古有机物积聚、变质、演化的最佳场所。这也是周边国家在七十年代才来认识和占领的原因之一。

如此看来，太平岛便益发显得珍贵了。

大陆的船只缓缓驶过时，只能怀着一种怅惘的心情远远地眺望她。那飘浮在海面上的一小片葱茏，那终于能给人希望的生命绿洲，如同顽强拼搏、想摆脱厄运的诺亚方舟，如同一个梦魂牵绕的永恒情人。

王恒杰教授痴痴地望着她，满心的温暖和踏实。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令人绝望的枪声。

这是他进入南沙以来，第二次听见枪声。

国际社会把南沙群岛称作是“亚洲的火药桶”。可这火药味儿也来得太快点了。

航程紧张而陌生。一个陌生的海域，一个陌生的群岛，一个独臂老人的南沙行。

渔民叫老人“王教授”，老人叫渔民“孩子们”，出了海，便像一个大家庭；出了海，大家的命运便拴在了一块儿。王恒杰是尊长，渔民遇事一定要征询和尊重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倚老卖老，端着教授的架子。船上的活儿，渔民不让他干，他也不愿闲着。

“王教授,你年纪那么大了,身体又不方便,休息吧。”渔民说。他说:“呆着也是呆着。”他帮着拉网,帮着厨房洗菜淘米做饭,帮着冲洗舱板打扫卫生。“只要出了海,就尽可能地不要成为大家的累赘,力所能及,干一点是一点,干着比呆着强。”他说。考古本来就不是端着架子的学问。荒郊野岭,高山大川,沧海横流,在那浑浑噩噩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寻找人类社会、国家民族的生存依据。考古从来都依恋着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情绪,并构成了难以遏制的学术动力和学术激情。边疆考古更是如此。中国人原无边疆概念。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朝以前,中国人奉行天下主义。“天下主义”的特征,按照梁涑溟先生所说,“不是国家至上,不是民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基于中国文化中一种包容感和“大而化之”的精神。这种文化的支持条件是,庞大的疆域,丰富的物产,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成熟的种植、灌溉、养殖技术,由非常稳定的价值观所支持的自给自足的富裕社会。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只有两种情形,那就是被侵略、被骚扰。然而,蒙古人和满清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最后都以被汉文化的同化而告终。中华文化中,只有道德教化,而无军事扩张。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急速向现代化迈进的俄国人给了中国人“边疆”的概念。《尼布楚条约》、《中俄勘分界线条约》较早地确认了北部中俄边疆。这之后,中国由陆地到海洋的边疆问题便是一笔不堪回首的烂账,一笔能追溯一百五十多年的烂账,一笔让中国人深感耻辱、永远耿耿于怀的烂账。中国人在得到“边疆”概念的同时,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得到了西方人弱肉强食的“森林规则”,被动地向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现代国家迈进。王恒杰也很清楚,光靠考古不回大好河山。他不过是在尽一份历史学家的责任罢了。他意识到这份责任,于是他来了。他是准备来受苦的。他早就成

了渔民的一部分,甚至比渔民还渔民。因为他比渔民更了解南海的历史。

月明星稀,波浪翻涌,“突突突”的渔船疲惫地向前行驶。独臂老人在给渔民们讲着南沙群岛的故事。

一九一七年,一个叫平田末治的日本人和一个叫小仓卯之助的日本海军退伍中佐,曾组织探险队到南沙群岛探险。他们在考察报告中说,南沙群岛各岛有五百多户华人居住,经营渔业。他们带着摄影和测绘设备,登上了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他们以为,南沙群岛是一个无人的群岛。然而,他们在太平岛、南威岛、中业岛、南钥岛等岛礁上,看到了中国人种植的田园、椰林,看到了中国人的墓葬、祠堂、神庙,几乎每一个岛上都有中国渔民居住,都有中国渔民的足迹。

有一天,小仓登上了一个小岛。他发现岛上住着三个中国渔民。主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通过笔谈,小仓了解到,渔民们对南沙诸岛的位置、方向、航程和各岛的物产都了如指掌。他根据与中国渔民的笔谈和探险核实,完成了南沙群岛各岛的位置图。一九三九年小仓在日本出版了《新南群岛记》、《新南群岛探险始末记》。他的著作实际上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即:南沙群岛早就有中国人居住了。

“王教授,小岛上的渔民是潭门镇的吗?”渔民小何问。

“或许是吧。没准还是你爷爷呢。”王恒杰故意逗他。

“可我爷爷不识字呀?”小何当了真。

到南沙远海捕鱼的海南岛渔民大多是文昌人和琼海潭门镇人。老一辈渔民几乎都去过南沙。王恒杰进入南沙群岛,首先在水登暗沙找到古代海南人的踪迹。

永登暗沙是王恒杰一九九二年第一次南沙行的第一站。王恒杰没想到,他刚亲吻了南沙一下,南沙便给了他如此丰厚的回报。

渔民小符从水底下钻出来，手里拎着捕螺用的网袋。“王教授，你看，我给你带回了些什么。”小符喊叫着。

王恒杰一看，原来是一些碎陶瓷片。这些碎陶瓷片组合起来，是一个腹大口小的陶瓷罐。桔黄色，肩有四个对称的耳朵，表面已是礁砂斑斑。王恒杰仔细观察着。他眼睛一亮。“这是一件产于唐代的盛水器。它同海南陵水县一代出土的陶瓷，几乎出自一个人之手！”他兴奋地说。

再往西行，便到了福祿寺礁。这里收获更大。他们捡到了印有“永保长春”款文和月中白兔图画的青瓷，还有“元通宝”、“大德通宝”各一枚。更让王恒杰惊喜的是，他们捡到了一个清代单叶大铁锚。

一天中午，二副小陈说：“王教授，我发现一枝插在水中的铁杆。插得还很深，拔不动。”

“别是爆炸物吧？”王恒杰说。

“不像。”

“那就再去一个人。要小心！”

不一会儿，小陈和另一个年轻渔民拖回了一条沉重的大铁杆，铁杆末端有个钩，杆上赫然写着“大清广造”四个隶书字。

王恒杰一看便高兴得大叫：“孩子们，这是一杆清代的单叶大铁锚啊！”

他钻回舱内拿照相机。他要把这一历史情景拍下来。可等他回到舱面时，眼前的场面把他惊呆了。渔民们正在七手八脚地敲砸铁锚身上的珊瑚礁和铁锈。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王恒杰大声喝道。

渔民们吓坏了。他们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老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平时和蔼可亲的老人，霎时间变成了凶煞恶神。

见大家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王恒杰感到刚才的语气重了些。他和缓了口气说：“孩子们，对不起，刚才我太急躁了。请

你们原谅。这是一件国宝,是我国南沙群岛主权的重要证据。这些锈巴正是它在那里沉睡了数百年的见证。把锈巴敲掉了,就等于把证据敲掉了。如果没有了证据,铁锚还有什么价值呢?将来拿到国际社会去论证,人家说我们的东西是假的怎么办?”

渔民哪知道如此利害?像一群刚做了错事的孩子,不知所措地窘在了那里。船长陈在清见状,主动上前承担责任。他说:“王教授,是这样的,我见铁锚锈得太厉害,便叫他们敲。我不懂规矩,你批评我吧,与他们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好心。也都怪我没讲清楚。”这时的王恒杰气早就消了。他拍着船长的肩膀说。

“以后捡到东西,记住,一定要保持原貌。”他接着向大家强调。

“记住喽!——”大家齐声说。

在历史学家看来,活证据和死证据一样的重要。

文昌县东郊乡老渔民王安庆也在讲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我十五岁(一九二八年)起就与潭门港彭正楷同去南沙捕鱼,直至二十三岁,前后在南沙捕鱼达九年之久。其中有六年长期住在南沙群岛上,三年是冬去夏归。南沙群岛的罗孔(马欢岛)、红草峙(西月岛)、奈罗下峙(南子岛)、铁峙(中业岛)、第三峙(南钥岛)、黄山马东(敦谦沙洲)、黄山马(太平岛)、南乙(鸿庥岛)、称钩(景宏岛)、双门(美济礁)、锅盖峙(安波沙洲)、石盘(毕生礁)、鸟仔峙(南威岛)等岛礁都去过和住过。住南沙群岛,要带足一年的粮食和生活用品,钱向东家借,船向公司租。……捕鱼所得百分之七十归东家,百分之三十归渔工。在南沙群岛上搭棚居住后,把捕获的海龟、海参晒干,过秤,放入木棚地窖内储藏,待船来时再运走。当时住岛的人,每个岛有十人左右,每个岛都留有有经验的渔民(先辈以来都这样)。铺前港的蒙全洲在南沙住了很久,对西、南沙都很熟悉,是很有经验的老渔民。

“在南沙各岛,有井就有人住过。罗孔、红草峙、奈罗、铁峙、黄山马、鸟仔峙等岛都有我们渔民挖的水井,铁峙的水井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奈罗的水井被日本人重修过。在黄山马东、第三峙、南乙也有我们挖的水井,但水味不好,不能食用。

“在南沙各岛,凡有人住的地方都有庙。铁峙、红草峙、黄山马、奈罗、罗孔、第三峙、鸟仔峙等岛都有我们渔民祖先建造的珊瑚庙。渔民到南沙后都要到庙里去祈求保佑平安和生产丰收。渔民死在南沙的也不少,我亲眼见到渔民林猷钊死在黄山马,还有一个保陵港的渔民死在第三峙。传说就更多。‘一百零八个兄弟公’就是一例。这一百零八个兄弟中,有七十二个孤魂,三十六个兄弟。七十二个孤魂是我们的先辈在西南沙下海作业过程中先后死去的,三十六个兄弟是同在船上遭风暴遇难的。其实,我们渔民先辈在西、南沙死去的何止这些人。

“我十五岁去南沙时,有日本人在奈罗、铁峙挖鸟粪,开始是在奈罗挖鸟粪,奈罗挖完后转到铁峙挖,当时一百斤鸟粪值九十元(日元)。(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日本拉萨磷矿公司在南沙太平岛、南二子岛开采鸟粪。)日本人中有一个叫川奇良,懂得海南话。我们在南沙铁峙等岛,除了捕捉海参、海龟等海产品外,还在岛上种椰子、木瓜、西瓜和番薯,还种些蔬菜。

“我二十岁(一九三三年)住在铁峙时,法国三艘军舰侵犯我南沙,上岛升法国旗,并用一个玻璃瓶,内放用法文写的东西,埋在地下,想作为主权的证据。法国人在岛上升旗后,要我们五个渔民在法国旗下照相。当时一起照相的有:王安庆、王安和、(我的哥哥,现住新加坡)、王安荣(堂兄)、王安积(堂兄弟,在泰国)、黄信金。当时我手里拿着二胡,以后又叫我们到他们的军舰上去,舰上有越南人当兵,他们讲的是法语和安南语,我们听不懂。法国军舰以后又开到别岛去升旗。他们离开后的当天晚上,我们认为这是中国领土,我们就将他们埋下的标记挖掉,取出玻璃

瓶,后来把它抛掉了。相隔十天左右,郑兰铤乘盛兴号船来到铁峙,因为他会爬树,就由他上树把法国旗解下来了。(注:这便是著名的‘九小岛事件’。一九三零年,法国人乘日本人撤出南沙之际,派炮舰‘马尔休斯’号占领南威岛。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至十二日,法又派通报舰‘阿斯特罗拉勃’号和‘阿勒特’号侵占了安波沙洲、太平岛、鸿麻岛。南钥岛、杨信沙洲、北子岛、南子岛、中业岛,并于同年七月宣布正式占领。法国占领南沙群岛的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质问时,法国政府辩称:这不是法国政府的安排,是法属越南势力所为。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领西沙群岛,又进而赶走南沙群岛的法国人,于四月九日以官报形式正式宣布占领南沙群岛,并改名为‘新南群岛’,与东沙、西沙一起划归台湾高雄县管辖。日本人在太平岛南岸建有混凝土防波堤,防波堤西建有码头和五百米栈桥,栈桥上有轻便铁轨;还建了电台、电厂、仓库、水井、蓄水池、神社、宿舍、道路、防空洞、晒鱼场、坟墓等。日本人还把太平岛作为潜艇基地。)

“当时的帆船,从文昌到西沙要三十六个小时左右,从西沙到南沙要五十多个小时。从新加坡回(文昌)清澜港,西南风,风力四、五级,半个月可到。在南海航行曾流传一个传说,说天气恶劣时,桅顶有一颗星,这时就要投饭团人海祭之,以保平安。传说这颗星是女神的化身。”

年龄大一些的渔民都知道这个传说。说是古代有一个女人要去南洋,但船上有规矩,不能带女人。因为渔民迷信,远航如果有女人,就会带来厄运,就会有颠覆的危险。在女人的苦苦哀求下,心慈的总簿便悄悄收留了她。船出海了,总簿把女人藏在箱子里,每天给她送饭。一次送饭时被船主发现。船主狠心命令道:“把她推到海里去!”女人被推进了海里。女人死后化为神祇。女人知道,渔民远海捕鱼,凶多吉少,难以预料多少风云变

幻和惊涛骇浪,所以多有禁忌。女人化为神后,专门为渔民指点凶兆。当天气不好时,她便化作星辰,出现在渔船的桅杆顶上,向渔民预警。

女神化作的星辰永远在那里高悬着。她的神色忧郁而疲惫。南中国海已经没有了安宁。她不敢稍有懈怠。她还要警示中国渔民不敢稍有懈怠。

无论是王恒杰的故事,还是老渔民的故事,都已经非常久远了。

“王教授,小仓和中国渔民在一起的岛叫什么名字?”小何还没忘了这个茬。

“双子岛。”王恒杰说。

“哎,前面不就是北子岛了吗!”有人大喊。

北子岛,南子岛,一北一南,便是双子群礁的一对双胞胎。不过,这对中国的双胞胎如今已是分属他人。北子岛被菲律宾人占领,南子岛被越南人占领。

北子岛在南沙群岛的最北端,应该是南沙群岛的第一站。

北子岛越来越近。“咱们上去看看。”王恒杰向船长陈在清建议。

船长一听就急了。“去不得!去不得!他们可凶了。船一靠近,他们就放枪!”

“咱们试试看。看他们敢把咱们怎么样!”王恒杰说。

渔船犹犹豫豫向北子岛开去。北子岛开始还是个小黑点,慢慢放大,慢慢放大,渐渐地能看清楚大轮廓了。

突然,“哒哒哒!”——“哒哒哒!”菲律宾军人开枪了!

渔船在一公里开外受到枪声警告:不得靠近北子岛!

“北子岛不行,咱们再试试南子岛。”王恒杰还有几分侥幸心理。

然而,南子岛越南人的枪声告诉了他了同样的结果。

王恒杰感到愤怒了。“我断断没有想到,南沙群岛竟是这样的情形!这不是在我们家门口欺负人吗?!”他说。

太平岛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太平岛是中国主权的象征。中国人在太平岛行使南沙群岛的行政管理权利已是整整半个世纪。早于任何周边国家。二战结束后,南海诸岛又一次为各国所覬覦。一九四六年六月,法国人回到印度支那。法国人派军舰到西沙视察,并播发了消息,意欲重新夺取南海诸岛。这时菲律宾外长也宣称,要把南沙群岛划入菲律宾的国防范围。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将此国际动态具报中央,并要求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从日本人手里接管台湾澎湖列岛和海南岛后,顺势接管南海诸岛。国民政府行政院责成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会商收复措施。经会商决定:一、由国防部协助广东省从速接收南沙群岛(即南沙群岛),接收之地理范围,由内政部拟定。二、关于该群岛之地理位置及所属各岛名称,应由内政部绘制详图,重行拟定,呈(行政)院核定。三、为应付将来可能发生争执起见,应由内政国防两部暨海军总司令部,将有关资料即送外交部,以备交涉之用。四、以上各点,由外交内政国防三部,会同呈复行政院。三部会后,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外交部长王世杰、国防部长白崇禧向行政院呈报了会议纪录。此后,海军任命海军上校林遵为指挥官,姚汝钰为副指挥官,率领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猎潜舰“永兴”号和登陆舰“中业”、“中建”号组成的舰队,分成两组编队南下,接管原属台湾省管辖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林遵指挥“太平”舰和“中业”舰接收南沙群岛,姚汝钰指挥“永兴”舰和“中建”舰接收西沙群岛。由于国民政府决定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广东省政府任命省政府顾问麦蕴瑜为南沙接收专员,并组织了气象、地理、考古、水利等数十名专家登“中业”舰,随舰队赴南海接收南沙群岛。十一月

初,舰队由广东虎门港抵达海南岛榆林港。这是继郑和下西洋五百多年之后,中国的强大舰队再次进入南中国海,意义非同寻常。

南中国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妙。十一月,正是东北季风肆虐的季节。这不是出海的好季节,然而,形势逼人,刻不容缓。林遵舰队出航了。然而,林遵舰队的见面礼,是南中国海的狂风恶浪,罕见的狂风恶浪!“——轰隆隆——轰隆隆——”,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舰队扑来,仿佛要把舰队撕碎,吞噬!这时的中国海军不熟悉南中国海的脾气,他们要继续航行,要与这狂风恶浪直面搏杀。随舰领航的海南岛渔民不同意这种莽撞的作法。渔民知道南中国海东北季风的厉害。而且,根据计算,如此大的风浪,继续航行有可能把登陆舰拦腰折断!钢铁之躯,生生地被拦腰折断,这是何等恐怖的场面!南中国海在与林遵舰队较劲,在与林遵舰队游戏。林遵舰队两次出海,竟然两次被风浪打回榆林港!真是太不给面子了!林遵舰队是二战之后周边国家进入南中国海的最强大的舰队。它能打败任何一个敢于挑衅的敌人,却对这风浪无可奈何!在林遵看来,舰队被风浪两次打回榆林港,真是不祥之兆。这种情形,是他海军生涯中从未有过的。

正当林遵舰队与南海处于胶着状态的时节,来了一段小插曲。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乘“峨嵋”舰由上海抵广州,准备视察粤琼台澎等地区。恰在此时,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宪章从南京给桂永清发电报,说西沙海域发现一艘法国巡洋舰。桂永清随即将情报透露给了随舰视察的美国驻中国海军顾问团团团长莫雷海军少将,试探美国人的态度。莫雷对法舰行动“一笑置之,态度轻蔑”。桂永清根据行政院决策和美国人的态度,即令林遵舰队从速接管西、南沙群岛。在这种情况下,林遵舰队只好让舰队一分为二,分别行动。“永兴”、“中建”两舰在十一月底,趁着一个好天气赶往西沙,十一月二十四日完成接收西沙的任务。“太

平”、“中业”两舰则于十二月九日中午十二时整从榆林港启航，驶往南沙群岛。

十二月二日上午五时许，林遵舰队在距太平岛一公里处抛锚。当时的南沙专员麦蕴瑜先生已是九十余岁高龄。麦老先生，广东中山人，一八九七年出生，一九二零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一九二二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工程和水工试验，一九二七年回国。抗战胜利后，他任广东省政府顾问，接收南沙群岛专员，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历任广东省水电厅珠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省科协副主席，广东工学院院长。几十年坚持不懈地为南沙群岛的主权奔走呼吁。他回忆说：那几天，天气意外晴好，风平浪静，远望绿岛如线。林遵命令陆战队员乘小艇登陆，武装搜寻，确认岛上无人后，便在树上升起了国旗。当太平岛升起了国旗时，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八时许，指挥部、接收人员、守岛海军官兵乘小艇登陆，时值退潮，小艇不能前行，全体人员下艇，涉水二百米后上岸。涉水时，看见海参、海绵、鱼类、贝壳滞留于珊瑚礁水涡深处，生命灵动，色彩斑斓，极尽奇观！海南岛渔民原称此岛为“黄山马峙”。为了纪念“太平”舰登岛成功，遂用“太平”舰舰名为该岛命名。岛上有椰子树、木瓜树、香蕉树及其他矮树。登岛中国海军官兵摧毁法国和日本的所有殖民地碑记，并在岛之西南方防波堤末端日军建立的纪念碑原址，竖立了“太平岛”碑石；在岛之东端，另立“南沙群岛太平岛”碑石，永作凭志。立碑完毕，全体人员在碑旁举行了接收和升旗典礼。这时，几个士兵点燃了几挂大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太平岛的天空炸响，一群海鸥被惊吓得四处乱蹿，“鸥——鸥——”之声不绝于耳。典礼结束后，随即开始用平板仪多角形导线法环岛测量，共用十个小时，测得万分之一太平岛地图。该岛东西长一千三百六十米，南北宽三百米，算出面积零点四三平方公里。

南沙群岛海域总面积八十二万平方公里,是管辖它的广东省的四倍。如此大的海疆,如此小的岛屿,像是浮游在海上的一一个小小的精灵,一个备受蹂躏又不屈不挠的精灵。要在太平岛建立整个南沙群岛的神经中枢,他既是南沙群岛的“总督”,又是太平岛“岛长”。因为,周边环海,四顾茫茫,没有舰船,插翅难逃。“走一圈,看看需要多少时间。”麦专员极有兴致地说。他在随员的陪同下,环岛漫步,一周下来,“五十分钟”。

广东省在太平岛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随后,又将铁峙命名为“中业岛”(注:现为菲律宾占领。),以纪念登陆舰“中业”号;又先后去到北部的西月岛(注:现为菲律宾占领。)和西南部的南威岛(注:现为越南占领。)竖立主权碑志。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政府将西、南沙群岛“暂行交由海军管理”。五月,台湾大学地质学系主任兼台湾省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台湾大学地质学系副教授郭令智、助教宣桂清、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范传坡及中央气象局人员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随舰到南沙群岛进行科学考察。六月一日,南沙群岛气象组开始工作,每天格林威治时间二点半至十点半以一万三千千周播发气象资料,报告气压、风向、风速、云量、能见度等。二点四十五分至十点四十五分重发气象资料。南沙群岛气象台呼号为“XNJ”。

麦老先生回忆说:南沙群岛收复后,政府作了一系列工作,第一、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广东省政府组织成立了西南沙群岛编纂委员会;第二、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为了唤起国人对南疆之重视,在广东省文献馆举办了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展览会由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主办。展览分五个展室,展品一千三百件。第一室为历史地理文献图籍,展室有从西、南沙群岛发掘的唐代以后开元、洪武、永乐的古钱。第二、第三室为鱼类海产图表于标本,第四、第五室为两群岛带来的物

产,如珊瑚、螺贝等。参观展览的人数达三十万之众!第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确定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及其所属岛屿礁沙之名称,原“南沙群岛”改称“中沙群岛”,“团沙群岛”改称“南沙群岛”,并向全世界公布了南海诸岛新的标准地名。(注:一九四九年后,有一段时间新中国没有完全沿袭国民政府的命名,如在政府声明中仍然称“南沙群岛”为“团沙群岛”,后又改为“南沙群岛”。)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国民党害怕解放军渡海围歼太平岛守军,迅速将太平岛守军撤到台湾。一九五三年,国军重返太平岛。

一晃就是四十年!这四十年,世界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东欧激变,苏联崩溃,随着柏林墙“轰隆隆”倒塌,几十年来所谓两大阵营的冷战宣告结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书写新的篇章。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并没有结束,兄弟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他们隔海相望,咫尺天涯,互相之间充满了怀疑、忧虑、猜忌和敌意,台湾海峡的气氛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硝烟弥漫,空前紧张。

王恒杰在有关部门批准的南沙群岛考察计划中,没有列上登太平岛。他打了个埋伏。他拼着老命闯南沙,首要的目标就是太平岛。他说:“这是我的使命。我一定要以大陆学者的身份登上太平岛。”他在申报计划时,把这最重要的一点隐瞒了。他知道,这是严重犯规。同时,他也知道,正式申请,百分之百被“枪毙”。太平岛对于大陆人来说,是绝对的禁区。可是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考察南沙群岛却不能登上最大的岛,等于没去过南沙群岛。这个风险值得冒。

渔船带着遗憾绕过双子群礁,进入郑和群礁,太平岛已是近在眼前!

登岛前一天,渔民们发现,王教授心事重重,仿佛有许多话

郁闷在心里，满脸的踌躇。对于登太平岛的后果，他实在没有把握，毕竟太敏感，毕竟没有先例，他老头子可以豁出去了，可连累了这些渔民怎么办？他有些犹豫。是不是请示一下家里？

“给我接通指挥部。”王恒杰对船长陈在清说。

镇渔业指挥部接通了。

“请接海口……”王恒杰拿过电话说。

对方是海南省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下面是相隔南中国海和海南岛一千五百公里的一场对话，气氛颇为紧张。

“我要登太平岛考察。”王恒杰说。

“你事先没有计划。”对方说。

“我现在认为有必要。”王恒杰坚持。

“建国以来没有这个先例！”对方说。

“没有先例可以创出先例！”王恒杰不认为理由成立。

“不管怎么说，绝对不能上岛！”对方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不能上？”

“不能上就是不能上！”

“你不能说服我。”

话说到这种地步，便僵在哪儿了。

对方意识到，王恒杰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用命令式的口气肯定不行，规劝道：“王教授，这件事太敏感了，弄不好，人家说你叛变投敌，可是一条大罪状啊！”

一听这话，王恒杰生气了。他说：“你不要吓唬我！我只是上岛考古，怎么能说是叛变投敌？！岂有此理！”

“王教授，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还这么书生气。你说你是去考古，下次文革一来，你跳进南海也洗不清呀！再说，如果台湾驻军说你是中共间谍，把你抓去怎么办？”对方连唬带劝。

王恒杰不吃这一套。“不管怎么说，我是主意已定，非去不可了！”

“你一定要去,我们决定不了,得请示中央。否则,后果自负!”对方态度严厉,绝不让步。

王恒杰也生气了,铁青着脸,“砰”地一声挂了电话。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冲着大海喊道。

他认为,他这不是乱来。南沙群岛考古,是他的宿愿,更是他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果不上太平岛,他将“前功尽弃,空手而归”!而且,他认为,他的行动,“是绝对的爱国主义”!

王恒杰的“爱国主义”感动了在场的所有渔民。他们看着这位年已花甲的独臂老人,不禁要问:他图的是什么呢?

没什么可说的,一定要把王教授送上太平岛!

可这时,有人问船长:“王教授登岛时,万一被岛上驻军打死或打伤怎么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回去怎么向省里县里镇里交代?”

本来支持王恒杰的陈在清被这一问,也犹豫了。王教授出了事故,回去真是没法交代。看着船长沉默的脸色,其他渔民也不说话了。渔船是私人股份合作购买的船,船长既是船老大,又是老板,更是整条船的灵魂,船上重大的事儿,他不发话,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出远海捕鱼,船长对全船的人身家性命担负着天然的责任——不论是北京来的独臂教授,还是船上的父老兄弟,他都要一个不缺地带回去,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他们这一代潭门镇渔民到南沙捕鱼拾螺,风险要远远大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父辈。他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风云变幻暗礁险滩,还有凶残的海盗和外国占领军。一九八四年以前,政府对南沙群岛实行海禁政策,不允许渔民前往南沙捕鱼。而且,这种海禁政策比任何朝代都实行得彻底,因为没有任何朝代把渔民管得像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那么彻底。一九八四年以后,国务院批准南沙捕鱼,潭门镇渔民才开始继承先辈遗产。一九八八年,中国海军进入南沙群岛,渔民欢欣鼓舞,以为这样以来,

在海军的保护下,他们的安全便有了保障。然而,事实却不如人意。渔民说,他们去南沙是越来越没有了安全感,虽然中国占领了七个岛礁,南沙水域还经常有中国军舰巡逻。这七八年的心酸和恐惧真是一言难尽!

“人家不要为难。”王恒杰站起来说,声音低沉。“本人这次来南沙,已作了种种考虑。在海口时,我已经安排了后事。万一有一个好歹,与大家无关。太平岛考古是我此行的主要目标,就是游我也要游上岛去!”

大家没想到老先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没想到老先生有如此这般视死如归的气概。考古,不是作学问么?怎么会弄出如此这般悲壮的场而来?

“这怎么行!”

“这怎么行!”

让一个独臂老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冒险游上太平岛,怎么像话!

“怎么不行?”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件救生衣,好像是说,今天的情景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我会游泳,千儿八百米难不倒我。”

“……”老先生当了真,大家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请大家放心,只要我能上去,就一定会回来。如果被打死了,请船长向省府通报一声就行了,遗体海葬,不必送回大陆。”王恒杰安慰大家的同时,托付了后事。

风萧萧兮——老人神态傲岸,左臂的空袖管在风中飘舞着。

他在等待着渔民的回答,但是他的眼神告诉大家,他登太平岛的主意已定,绝不回头。

渔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或许拿回大陆去说,人家也不会相信,一个北京来的教授,一个花甲老人,一个独臂花甲老人,一个可以叫父亲的独臂老人,居然和他们这些喝南海水长大的渔民较劲,居然要游上太平岛!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仅仅是为

了生养他们的南中国海！这样的安慰和托付比痛骂他们一顿比用鞭子抽他们一顿还难受！渔民们也有自尊心。船行南沙，这种自尊心屡受侮辱和伤害，早就窝着火呢！

此情此景，搅热了年轻渔民的血。

“王教授，你别说了。说什么我们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渔民小何说完，呜呜地哭起来。

“小何说的对。那么多年轻人在船上，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游水上岛，这不会让台湾军人笑话吗？”另一个渔民说。

“谁说让王教授一个人游上太平岛了！”

“我们应该帮助王教授上岛。”

“船长拿个主意吧。”

大家的眼光全部集中到了陈在清身上。

陈在清是个稳重的人，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他在船上有着很高的威信。他平时话不多，但是，他不发话，谁也不敢乱动。在海上，船长就是国王。

陈在清沉默不言，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亚叔，让我送王教授上岛吧！”陈在清的侄儿陈泽和在一旁说。

陈泽和明白叔父的心思，显然，大家说服了叔父。可是对于船长来讲，他必须考虑到此行危险，派谁去比较合适。

陈泽和，二十六、七岁，复员军人，曾在海军南海舰队服役三年，与其他渔民不一样，他身上透着军人的气质。王恒杰对他印象深刻。这是个文静内向又很机灵的小伙子。

陈在清满意地点点头。侄儿水性好，普通话讲得好，办事谨慎踏实，是最佳人选。他对王恒杰说：“王教授，我们非亲非故，天南海北，但是，坐在一条船上就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可能把你扔下不管呢？你是公家派来的，也是为国家办事，我们也有一份责任。这样吧，让我侄儿驾舢板送你上岛吧！”

“谢谢，谢谢！”王恒杰大步上前，握住了船长的手，握住了小陈的手，连声道谢。

船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情便这么决定了下来：第二天中午十一时准时出发。

晚上，船长来找王恒杰。“王教授，跟你商量件事。”

“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明天你们要上太平岛，这可是件大事。我想按照船上的规矩举行一个仪式。”

王恒杰在南海闯荡多年，一听就明白船长是什么意思。他说：“入乡随俗。”

“那好，一切都听我安排了。”船长说。

“摆案！”

“备香！”

“杀鸡！”

一阵吆喝后，全部准备停当。船长设香上案，为王教授与侄儿祈祷。

此时，月光如水，把前舱板清洗得无比圣洁。

王恒杰也跪下了。他是个学者，同时也是个无神论者。国不泰，民不安，人的命运好坏，与人们心目中那些神灵有何干系？南海有一大堆神灵。渔民的祈祷词云：“策赐山峰布斗，明芝兴德显神，顺赞天后圣母元君，左千里眼神将，右顺风耳守海将军，掌仓掌库天仙大王，猫注娘娘马伏波爷爷，一百零八兄弟公，男女五姓孤魂。”而南海最大的神祇是“南海观世音菩萨”。都要一一拜到，碰到是谁就是谁。任何一个海神显灵，都能保佑平安。宗教的起源大抵是人的薄弱，命运的不可捉摸，自然的某种不可知，并同时感觉到冥冥中有一种惩恶扬善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进而成为超越各种人类知识的精神状态。无援无助的茫茫大海，比任何地方都显露出了人的薄弱，所以渔民在祈祷的时候，心中

的神灵比大陆的人要多得多。在一种虔诚和神秘的气氛中，王恒杰不由自主地跪下了。他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他的一生便是不断向命运挑战的一生，要不然他不会在他的晚年只身闯进南海，干出一番让世人震惊的事情来。他说过：“我虽然少了一支胳膊，但是我决不加入残疾人协会。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残疾人。”然而，他跪下了。在他看来，这不是软弱，而是接受挑战前的一次自省。几十年边疆考古生涯，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都能逢凶化吉，以致今天能来到太平岛前来完成一个大陆学者的使命，其中必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他，保佑着他。此时，他祈求着它的来临，能继续支持他，保佑他。

“王教授，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标志？”陈泽和问。

“小伙子，别着急。你看，这是什么？”王恒杰笑嘻嘻从挎包中拿出一面白底红十字旗。

为了这次能登上太平岛，王恒杰作了充分的准备。一年前，他便问过曾经上过太平岛的一位台湾学者，怎样才能登上太平岛。台湾学者建议，“手执白旗”。可他寻思，白旗不好。一个大陆学者，打一面白旗，成何体统！他决定改成红十字旗。打红十字旗，以求医的名义登岛，名正言顺，不失尊严。

中午十一点，准时出发。为什么不早不晚，偏挑中午十一点走，这里面有讲究。王恒杰说，这个时候海面清晰度最高，岛上国军最容易发现小舢板，可以及早清楚地看到红十字旗。再者，台湾学者专门告诫。国军在太平岛周围水域大量布雷，视线好，小舢板也容易出现水雷。只有这个点走才可能最安全。

陈泽和取过旗，跳上小舢板。王恒杰挎上他那个小挎包，与十八个渔民一一握手告别。船长拉着他的手说：“王教授，千万小心，上不去，就回来，人要紧，不要硬上。”

“王教授保重。”

“王教授，我们一定等你回来！”

渔民一个个上前叮嘱。每只伸过来的手，像老虎钳一样有力，仿佛说，我们是你的坚强后盾！王恒杰感动得老泪纵横。

“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回来。再见！”

陈泽和刚把王恒杰扶上船，又被船长叫上大船。

“泽和，你过来，我有话说。”船长把陈泽和拉过一旁，“教授是北京派来的人，你一定要保护好他。教授出了事，你不要回来见我！”

“亚叔放心。”陈泽和神色严肃。

叔侄俩的眼神刹那间碰了一下，船长心里有了几分把握，他拍了一下侄儿的肩膀，说：“好，去吧！”

小舢板离开大渔船，朝着太平岛码头方向开去。这个方向，显然是一条航道，航道旁是布雷区，有着明显的标志。

“小陈，船往雷区开！”王恒杰突然吩咐道。

小陈一愣：这不是找死吗？小陈在后面驾舵，独臂老人背对着他，站立在船头，尽可能高地举着红十字旗。在一片碧蓝碧绿的海天背景下，红十字格外耀眼。

“王教授……”小陈有些不理解。

“别怕。我们要向岛上的国民党军表示，我们登岛没有恶意。”王恒杰没回头，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方说。

小陈立即明白了王恒杰的意思，“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最安全”，一横心，船头偏离了航道。

三海里——二海里——一海里……小舢板慢慢地朝前开，太平岛已是近在眼前。越靠近越是紧张。再往前，后果将是什么，真是难以预料。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来说，等待他的不是历史之迷，而是子弹、炮弹和水雷，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他最担心的是小陈。小陈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三个孩子的家庭失去父亲，无论如何不能让一个年轻人因为他这个老头子血洒南沙！

看见椰林了。

看见码头了。

甚至能看见士兵了！

越往前开压力越大，死神逼得越近。

怎么搞的，岸上还没有一点动静？

突然，“嗒嗒嗒——”，国军的枪声响了。停止前进！小舢板受到了警告。岛上的国军终于发现了他们。王恒杰一直绷紧的神经这才松弛了下来。“停机。”他吩咐道。按照国际惯例，“停机”就是准备接受检查。

不一会儿，一艘炮艇包抄过来。炮艇慢慢靠近。当他们看见小舢板上只是一个独臂老人和一个年轻人时，这才放下心。

“你们是哪儿来的？”艇上一个军官问。

“海南岛。”小陈说。

“北京。”王恒杰也不隐讳。

没等国军军官再往下问，王恒杰便大声喊道：“见到你们非常高兴。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太平岛的中国将士万岁！”

国军官兵非常惊奇。太平岛几十年没有见过大陆同胞。而且，可以断定，眼前这个独臂老人，不是渔民。

“我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来南沙考古的。这是我的名片。”王恒杰主动递上自己的名片和港台报刊关于他的报道。为了证实身份的真实性，他还把那位台湾学者的名片递过去。

军官看了王恒杰的名片和报纸后，连忙道歉：“原来是自己的兄弟同胞！王先生，真是对不起。向自己的兄弟同胞开枪，真是难为情。”

“没关系。”王恒杰感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南沙局势那么紧张，这也是你们的职责。”

军官并没有因为同胞亲情而放松警惕。他又讯问：“你们来

干什么？”

“我要见你们岛上的长官。”王恒杰说。

“求医可以，见长官不行。”军官说。

“请你务必转告你们的长官，我是考古专家，是专门来论证南沙主权的，希望能受到接见。”王恒杰坚持。

军官见状便说：“王先生，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

一会儿，军官跑回来说：“王先生，长官同意见面。”

这时，码头上已经聚集几十个国军官兵。在南沙守卫岛礁，几个月见不到生面孔，别说见人，只要看到一个活物上岛都亲切，更何况来了两个大陆同胞。其中的独臂老人，还是大学教授呢！

就这样，王恒杰成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登上太平岛的大陆学者，并受到国民党守军的鼓掌欢迎。他边走边喊：“炎黄子孙是一家！南沙的中国将士光荣！”

这一天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生死场”？“名利场”？

北京西山，渐渐变得焦红。西山脚下的北京胸科医院，远远躲开了大都市的喧嚣，优美而宁静。一条小路把我引向了病区。

这便是威猛刚毅的“南海独臂侠”？这便是傲视风险以命相搏的考古学家？

王恒杰睡在一张昏暗的病床上。身体蜷作了一团。黑黑的蚊帐，皱皱巴巴的床。同屋的病友见有人来，一旁避开了。

他一九九五年五月第二次进入南沙时，已不胜体力。他感到了胸腔的压迫。船在海上航行。香港记者访问他：“王教授，

感觉怎么样？”

“胸闷，喘不过气来。”他说。

他不知道他的肺部已经出了毛病。回北京，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导致胸腔严重积水。于是就按肺结核治。三个多月下来，不见好转，反添严重。他在病床上只能侧卧，以免胸积水压迫，脸上痛苦不堪。

后来证明，医生误诊。他得了肺癌，已是晚期。

我见到的王恒杰，已是心力交瘁、被南海风浪折磨垮了的王恒杰。

他已经很难恢复了。他好像永远在海上飘浮着，好像永远生活在摇呵摇的状态中。生病蜷着，渔船上也是蜷着。一九九五年出海的情景几乎和一九九二年一模一样。还是那拨人，还是那艘七十九吨小渔船，只是船长换了人，只是大家年龄都长了三岁。因为船小，空间有限，他的床头紧顶着柴油机排气管。排气管终日“咚咚咚”的声音、浓缩在舱内的废柴油味儿，使他根本无法入睡。初夏的南海本来就很热，再加上火烫的排气管，连“闷”带“烤”，实在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浪漫。再看这张床，睡上一个瘦小的海南渔民倒是富余，可他这个一米七九的个儿躺上去，身体根本伸展不开，每天都只能蜷着。“闹”着，“闷”着，“烤”着，“蜷”着，再健康的人都可能折磨垮喽！更何况是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一个残疾人！

还不仅仅是这些。

在海上，淡水贵如油，贵如生命。别说洗衣服，就是洗脸喝水都很困难。要是有人在船上浪费水，渔民把他扔进海里的心都有。王恒杰懂得船上的规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渔民都要照顾他。可他不干。他说：“出了海，大家都一样，不能为我连累大家。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渔民偶尔不洗脸无所谓，他可不行。为了节约洗脸用水，他创造了一种方法，用毛巾蘸上水，擦

完脸,再把湿毛巾封进塑料带里,防止水汽蒸发,第二回再拿出来用。那么炎热的天气,湿毛巾有一两天就馊臭了。他说:“再臭也是淡水呵!”直至臭得不能再用为止。其实,他的身体比塑料带里的洗脸毛巾还酸臭。北京的夏天,一天不洗澡都不行,别说低了几十纬度的南海了。

海军上校亓玉台曾任驻南沙守礁部队政委,一九九二年五月的一天在永暑礁接待了王恒杰。亓上校回忆说:“那天,哨兵跑来报告,‘政委,有一艘海南渔船要靠礁,上面还有一位教授’。我说,‘请他上来’。”

“见面一看,他哪像教授?除了他眼镜里透出的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外,活脱脱是个老渔民。”上校说。他那一身打扮,比渔民还渔民:戴着一顶破草帽,草帽下是一张焦黑的脸,穿着一双破凉鞋,脏兮兮的衬衣,脏兮兮的裤子,浑身的馊臭扑鼻。

“十多天没洗澡了。”王恒杰说。进入南沙群岛后,永登暗沙、双子群礁、太平岛一路下来,既紧张又疲劳,上了永暑礁,一阵轻松,像到了家一样。

王恒杰远比大家脏,全因为他只有一支手。每停泊一个礁盘,上下船,都要渔民背着抱着抬着。渔民倒是耐耐心心仔仔细细,生怕磕着碰着老先生,对老先生实行“特级护理”。船长有话,“王教授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在船上,王恒杰最怵的是上厕所。小渔船所谓的“厕所”,不过是后船帮边挖了个洞的去处。上厕所本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可在渔船上厕所,在风浪摇摆颠簸中上厕所,不但惊险,而且需要很高的技巧。海上无风三尺浪,七十九吨渔船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南海航行,像一滴水一片树叶。渔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船上,与海与船已是浑然一体,大脚丫子像是安了吸盘一样,仿佛渔船旋转三百六十度人都离不开站的地方。王恒杰就不行了。年纪大,个儿高,本来重心就高;渔船一摇一晃一起一伏,把

本来就高的重心又摇晃没了；再加上出了海就晕船，昏天黑地地晕船，吃不进，喝不进，一两天下来，人都变了模样，在船上行走，像是空气一样没有了重量。然后是没完没了永无休止的呕吐，一直到只吐空气。偶尔有从大陆偷跑上船的老鼠，也晕船晕得爬在那儿直吐黄水。一位海军作家在描写晕船的情景：一个战士在军舰上晕船呕吐，一伸脖，吐出了一条蛔虫。蛔虫被弹射出去，在空中急速扭动着，突然，一只海鸥俯冲下来，一嘴衔住它，扬长而去。……总之，晕船的滋味，惊心动魄，痛苦不堪。在这种情形下上厕所，只有一支手，遭罪大了！小便完，扶船帮就系不上裤子，系裤子就立即失去重心，就这样不知摔了多少跤。船长见状，便对他说，“王教授，小便就别到后面去了，哪儿方便就在哪儿吧”。小便问题解决了，大便却只能去厕所。船在海上猛烈摇摆，谁也解不了那么准，船帮上自然有粪便和尿垢，而王恒杰必须靠在船帮才能方便。这一来，麻烦大了。他专门准备了一套上厕所用的衣服，上厕所时穿上，上完厕所再换下来，比别人多了一道手续。这套上厕所的衣服，自然是污秽不堪。天长日久，身上的味道，可想而知。

“勤务兵！”元玉台上校喊道。

“到！”

“领王教授洗澡去！”

“是！”

勤务兵不由分说，拉着王恒杰就走。

王恒杰还想说什么，上校摆摆手说，“洗完澡再说，洗完澡再说”。

勤务兵带着王恒杰穿过菜地，来到一排大棚下。

“这就是澡堂？”王恒杰问。

“……”勤务兵不说话，兀自拿过旁边的一个二十五公斤大塑料桶。

“就在这里洗？”王恒杰问。

面前是一片菜地，菜地边搭了一溜油膜毡大棚，视野极其开阔。几乎就是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教授的尊严何在？

“教授，放心，在南沙，天上飞的蚊子都是公的！”勤务兵看出王教授有些难为情，解释说。

勤务兵看王恒杰行动不方便，便上去，三下五除二，帮着王恒杰脱成了裸体。

勤务兵是个好说话的人。他一面给王恒杰准备洗澡水，一面说：“教授，你知道我们每天用多少水吗？”

“多少水？”

“洗脸洗澡洗衣服，每人每天平均五公斤。”

勤务兵说：“教授，我们南沙守礁部队给客人的最高礼遇，就是让客人痛痛快快洗个澡。”

快哉！快哉！

这是王恒杰一生中洗得最舒服的一次凉水澡。

当然，王恒杰在大澡棚里愉愉快快舒舒服服洗澡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守礁部队已经完成了对他的身份的全部调查。

亓玉台上校三年后告诉我：“就在勤务兵领着王教授去洗澡的时候，我给舰队发了电报，询问是否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恒杰此人。舰队作出了确认的答复。”

亓玉台上校热情接待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几天前太平岛国军守备司令的态度完全一样！他说：“作为南沙守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是起码的责任。”

南沙的特产是：“紧张”，“警惕”，“敏感”。国军守备司令调查得更直截了当一些。国军守备司令肩上扛着少将军衔。十分凑巧，这位台湾驻南沙守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大陆驻南沙守礁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亓玉台上校是山东老乡。设想一下，如果两个老乡能在南沙会上一面，用山东家乡话聊上一番，那将是何

等有趣。

将军把王恒杰和渔民小陈让进他住所的客厅。

刚一落座,将军便问:“想必二位还没吃饭吧?”

王恒杰说:“实不相瞒,我们的肚子饿了。”

将军立即吩咐部下拿来饮料和饼干。“随便吃一点,请不要客气。”

将军以礼相待,热情中也分明保持着几分距离和戒备,问话带着试探的口气。

“教授,南海考古是个冷门,别人都不愿意干,您倒干得很投入呵!”

王恒杰实话实说。“科学研究,无所谓冷和热。再说冷热是可以转变的。南沙问题不是很热吗?”

将军又问道:“您对南沙问题怎么看?”

王恒杰十分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南沙属于中国。我这次来,就是要凭着一个科学家的良知,搜集更多的证据。我坚信,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南沙应该开发利用,只要海峡两岸携起手来,就一定能做到。将军以为如何?”

将军颌首表示同意。这时,他扫了一眼王恒杰的照相机,用若无其事的口气问道:“您是不是中共派来搞情报的?”

王恒杰哭笑不得。他甩着空袖管说:“您看我这个样子,像是搞情报的吗?”

将军指着王恒杰的挎包问:“可以看吗?”

这种“请求”是不容拒绝的。王恒杰说:“请便。”王恒杰非常清楚,要想完成太平岛的考察,没有将军的信任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稍有不慎,便会带来预料不到的严重后果。

将军取过挎包仔细检查,见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便把挎包还给了王恒杰。“请不要介意,这是我的职责。”

王恒杰抓住机会说:“我是自费来南沙考察的,上岛是为了

搜集先人遗物,进行考古研究。将军要是信不过,我们可以定一个‘君子协定’。您看如何?”

这种书呆子式的建议,倒让将军释然了。“那倒不必。不过,教授,您在岛上寻找文物,要听从我们的安排。”

“这个当然。我们来一趟不容易,请将军给予方便。”

同意上岛,同意接见,同意考察,这位将军可谓是通情达理,仁至义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王恒杰说。一九九四年,王恒杰去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南海学术会”,曾托人打听将军的下落。知情人说,他因为破例在太平岛接待了大陆学者,受到了纪律处分,已调离南沙。这个结果,实在是令人嗟叹!

由于太平岛国军官兵的合作,王恒杰不到半天的考察,收获甚丰。他拣到了汉代的陶片和“五铢”钱,宋代的青瓷片、“熙宁重宝”,明末清初的残瓷碗。

他们要离开太平岛了。国军官兵都拥上码头,送香烟,送饮料,送饼干,小舢板都快装满了!

一个士兵跑到码头,送来一摞衬衣,说,“王先生,这是我们长官让我交给您的。我们长官说,海上不能洗澡,穿脏了就扔掉,再换新的。我们长官希望您顺利完成南沙的考察。”

王恒杰捧着一摞九件衬衣,心里热乎乎的。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将军叫什么名字呢!

船开了。“请等一等!”一个刚下岗的士兵穿过人群跑来。他一面跑一面从裤兜里翻出个打火机,朝船上扔过来。“教授,送给您一个打火机,留作纪念吧!”

“谢谢您!谢谢您!”王恒杰大声喊着。

“再见!亲人们!”王恒杰使劲朝岸上挥手。

“再见!”

“再见!”

岸上的官兵也是喊声一片。很多人一面哭一面喊。还有几

个兵爬上树，远远地朝他们挥手！

这般血浓于水的动人情景，让王恒杰老泪纵横！

几天后，他在永暑礁用共军的淡水洗完澡，换上了国军将军送的衬衣，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南沙考古，本来就是探险，风浪鲨鱼自不必说，还要和国军、越军、菲军打交道，再往南，还会碰见马来西亚军人。这些国家的军人都自称神圣的领土领海不容侵犯，因在南海，真刀真枪地火气大了！越军菲军拿着过往和停靠的渔船撒野是常有的事儿。更可怕的是遇见海盗。南沙水域是海盗出没的地方。南中国海海盗，世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从海峡到周边国家沿海，到群岛腹地，海盗奸淫烧杀掳掠，十分猖獗。海盗问题让周边国家伤透了脑筋。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领土争端加剧，各国利益犬牙交错，各国对南中国海实际是争而不管，虽然多有协调，却无实效。海盗骚扰渔船商船，成了经常上周边国家报纸头版的消息。在南中国海闯荡，暗流，险滩，恶浪，风暴，外国军队，海盗，生死之间，隔着一张薄纸，不经意，轻轻一捅就破。

下太平岛后，王恒杰指挥渔船南下，目的地：皇路礁。

孤伶伶的皇路礁。北面几十海里是越南占司令礁，南面几十海里是马来西亚占南通礁，东面紧靠着的是数千米深的南沙大海槽，形势险恶。

这一天，在皇路礁上，王恒杰颇有收获。他拣到了一枚宋朝的铜钱“熙宁重宝”和广东生产的古代青花瓷器碎片。

傍晚时分，南沙大海槽一阵阵风浪席卷而来，小小的皇路环礁显得那么得弱小和孤独。天边尚有一线霞光，拉开厚厚的云层，抚摸着前舱板，仿佛是给这条飘零天涯的小渔船以最后的安慰，继而便消失了。

劳累了一天，大家都早早地睡了。出海后，永远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永远是四顾沧海，万里空旷无人迹。即使如此，仍然

睡不安枕。

“有情况！有情况！”驾驶舱传来的紧急呼叫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

值班的大副符老大报告：“有两条不明国籍的船只正向我们靠拢！”

急忙赶到驾驶舱的船长陈在清问：“哪个方向？”

“西南。”

“什么船？”

“速度很快，好像是海盗船！”

常年在南海捕鱼，渔民不仅要盯着鱼，而且要盯着船。各国的渔船、军舰和海盗船一眼就能认出来。越南渔船两头翘，菲律宾渔船小且速度慢，海盗都是快船。眼下这两条船来势凶猛，必是海盗船无疑！

“怎么办？”有渔民问船长。

此时船长十分沉着。这位小个子船长是南海风口浪尖上闯过来的，什么样的阵势都见过。他不动声色地下达着命令：

“起锚！”

“……”

“方向东！”

“……”

“全船熄灯！”

“……”

“全速前进！”

如果被海盗船追上，肯定有一场恶战。他要求全体船员作好抵抗的准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渔民出海，严禁携带枪支等武器。而越南渔船大多是武装渔船，海盗船更不必说。如果被海盗船或越南武装渔船追上，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船毁人亡”便是中国渔船的命运。

船长对身边的王恒杰说：“王教授，你回到船舱下面去，躺在床上装病。没有通知千万别上来！”

王恒杰回到船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把海图藏好。这张海图是从海南省海洋局借来的，属于国家机密。他从手提袋里找出海图，揣进贴胸的口袋。他说：“如果情况危急，我就把它毁掉。决不让海图落入海盗手里！”

王恒杰知道，船长命令渔船往东航行，不啻是玩命！南沙大海槽，下面是万丈深渊，无依无靠，大海槽那边是马来西亚了！

出海以来，这已经是第四次遭遇海盗船了！

跑，没命地跑！这是中国渔船在南沙群岛遇到情况时唯一的办法。

这么跑多了，如同惊弓之鸟，都有些神经质了。皇路礁摆脱海盗后，渔船驶向北康暗沙渔场，刚准备下网，又发现一条渔船靠拢。还没看清开来渔船的模样，不等船长下令，起锚就跑。跑出百里，发现那条船没有追来，挡不住北康暗沙渔场的诱惑，又磨磨蹭蹭地回来了。那条渔船还在那儿！定神一观察，不像是有意。靠过去时，那边的船老大喊：“我们是一家人！跑什么啊？”

“原来是香港同胞啊！”

一句话逗得两边的人哈哈大笑。

此时王恒杰笑不出来。他躺在病床上，只是一腔的苦涩。“惊弓之鸟”的侥幸，何笑之有？在自己的领海捕鱼考古被别人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真是件丢人的事！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乐章，竟谱出了如此尴尬的音符。他的学术自尊民族自尊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我去看望他。他老伴流着眼泪告诉我，医院已经确诊，他得了肺癌，已是晚期。她嘱咐我：“千万别告诉老王。”

其实王恒杰早就知道了病情，他不愿意捅破罢了。他神情

泰然地说：“我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几十年边疆考古，我是九死一生。我这条命早就是活一天赚一天了！我着急的是，上帝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南沙的文物那么多还没有整理，南沙考古报告还没写……”

他从医院跑了出来。他把医院的治疗方案带回了家。

他的学术生涯的最后乐章不能只有遗憾和尴尬。他要向死神挑战！他在家里面一面吃药休息，一面整理资料赶写文章。他说他必须完成生命的最后冲刺！一个尽可能完美的最后冲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大声说话了。由于肺部积水的压力，他说话断断续续，不能持久。他老伴告诉我，医生断言，他顶多只能活三个月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接受我的访问。我看着这位不屈不挠的独臂老人，内心阵阵酸楚。我看着他挣扎着起来，把南沙收集来的古董，一件件递给我看，内心阵阵酸楚。他说，他的事业得到了许许多多朋友的支持，他生病的消息传出后，他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然而，也有人说他是沽名钓誉。

一位海军将军告诉我，他听说王恒杰的事迹后十分感动，想去中央民族大学看望拜访。却受到该大学一个熟人的劝阻，说是大学有人对王恒杰的行为有看法。

他愤怒了！他吼道：“南沙考古，是沽名钓誉的事情吗？！南沙是生死场，不是名利场！”我不能忘记眼前的情景：他侧卧在医院的病床上。病房光线很不好。他说：“看来，这回身体是彻底完了。南沙可能再也去不成了。我是搞边疆考古的，‘民族’和‘国家’在我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在海南，一位战士跟我说：‘王教授，南海的水有多深，你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就有多深！’这对我是最大的理解和安慰啊！”这位坚强的独臂老人哽咽了。他仅有的那只手捂住了脸，晶莹的泪水从指缝里流了出来，一颗颗滴在病床的枕头上……

独臂老人感动了上帝。

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南中国海风还在吹拂着他那顽强延续的生命！他分秒必争地写着南沙考古报告。他还在给社会各界做演讲。他还在坚持不懈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奔走呼号！

他仿佛还在航行。他迎风伫立，左臂那只空袖管在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上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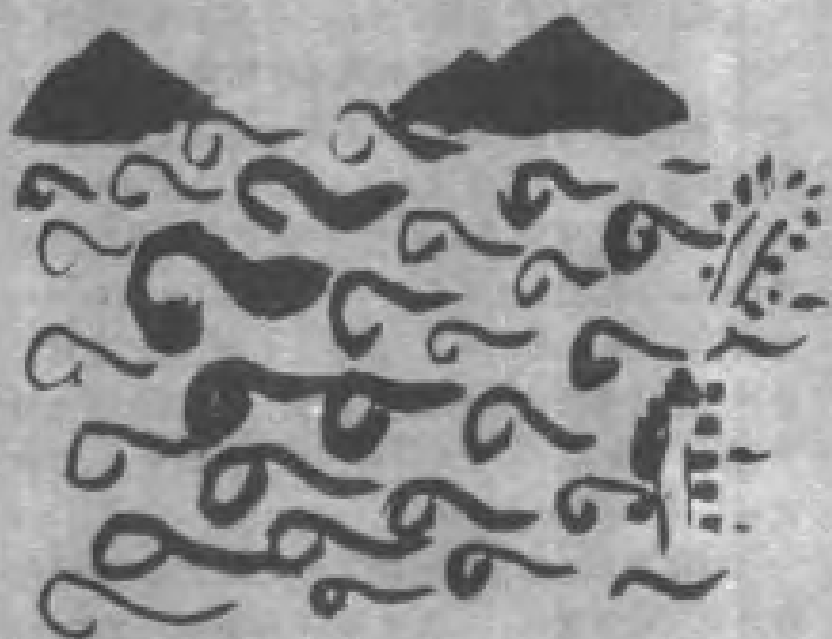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五点于木樨地

作者补记：

就在此文完成后不久，王恒杰教授不幸病逝。那天，北京下着小雨。苍天沉郁而悲泣。许多专家、学者、海军官兵自发来到八宝山，为这位孤独的爱国者送行。海军方面遵照王教授遗嘱，将他的骨灰带到了南沙群岛，撒向南中国海，将他的灵魂葬在了南中中海。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辛未水患



一九九一和一九九八年水灾，
本质是一样的：人祸大于天灾。

世纪末感言

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一九九一年《辛未水患》中的判断和预言，一九九八年长江、松花江大洪水全部兑现。我的判断和预言是：一、中国治水有一对基本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即水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利益构成永远冲突；二、中国治水思想，宏观上“堵”始终占上风，并影响到了政治理念，微观则是以邻为壑；三、出于利益的短视，宁愿花钱买棺材哭哭啼啼送葬，不愿花钱买药长治久安；四、出于政治的短视，非人性地面对灾难，丧事当喜事办，把灾难当作对当权者歌功颂德的机会，凡此，水灾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加剧。一九九一和一九九八年水灾，本质是一样的：人祸大于天灾。

对中国治水思想和水灾历史、现状的考察，促使我产生了如下想法：一、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由于其“西方中心”背景及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陌生，解释力过于狭窄；二、评价文明社会，特别是评价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制度文明是第一指标，简单用“专制制度”很难解释中华文明一统天下、文化传递两千余年而不灭的历史；三、发现了家庭、宗族、社区、乡、县、市、省半径不断扩大的治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治水首先要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才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四、对统治者来说，治水的政治考虑远大于兴利除害。

——作者

序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屈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

——郦道元《水经注·序》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管子·水地篇》

1991年(辛未)年我国18个省市遭受洪涝灾害:

经济损失:685亿

死亡人口:2295人

受伤人口:49973人

受灾人口:2.2亿人

被洪水包围人口:1930万人

损坏房屋:605万间

倒塌房屋:291万间

农作物绝产:1800万亩

成灾面积:1.95亿亩

受灾面积:3.15亿亩

(民政部救灾司截止1991年8月1日的统计数据)

序

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或者说一名严肃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命运和机会是与巨大的灾难、激变的事件和人间疾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必须冷静、更确切地说是冷峻地身处其中,站在人道主义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基点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反应。这不仅是职业要求,也是人类起码的良知。我从苏、皖灾区回来时,一位文学评论家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没有灾难,唯恐不流血不流眼泪!他只说对了一半。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一个重要的人类现象,即人的局限,人类行为——相对于永恒和未来的那种幼稚和缺陷,以及人类社会灾难的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及时、公正、客观、准确地向社会和公众揭示灾难的真相,揭示造成灾难的原因,探索避免、准确地说是减轻灾难的危害。为此,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了“第169号决议”,把从一九九零年开始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旨在通过一致的国际行动减轻灾害所“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生命损失和财产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停滞”。

“人定胜天”曾是何等鼓舞人心的英雄主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然而,天和地是能战胜的吗?自然与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不仅是当今人类的巨大困惑,也将是来来人类的巨大困惑。我正是在这种巨大困惑的背景下开始了我的灾区之行。

我从未有过如此大跨度感官经验。洪水冲毁了铁路、公路、

桥梁、涵洞，淹没了村庄，淹没了庄稼，冲走了粮食，数十万、数百万灾民被洪水围困在土坝和圩堤上，一贫如洗。土坝绵延数十公里的“庵棚”，都是几根木棍草草地撑着破蔑席或者塑料布，既不能遮风雨，又不能避寒暑。在四面是水的狭长土坝上，没有粮食，没有烧柴，缺乏饮水和药品，拉屎撒尿都在水里，疾病肆虐。俯瞰江淮，一片洪荒泽国。灾民涕泗滂沱，奔走呼号，天地为之动容。当我从合肥坐上“麦道—82”飞上天，当我一个多小时后在北京东郊大饭店区奔驰，当我回到木樨地家里打开啤酒瓶盖庆祝生日（八月三日）和平安归来，享受城里人天伦之乐的一刹那，我深深地感觉到，天堂和地狱都在向我微笑。

恍如钟声响了，那金碧辉煌的钟声。在那希望和期待的所在，灵魂似乎得到了宽恕。存在也罢，不存在也罢，这灵魂在熏醉中带些儿麻木和冷漠，浸泡在一股子医院的味道里。

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麦道—82”式的空白。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在合肥给我搞到当天回北京的飞机票时说，“‘麦道’不如‘波音’宽敞舒服”。一片空白中又平添了“十分惶惑”，理不清的惶惑。我无时不感到灵魂的不安：那些眼神——惊恐、绝望、乞求、黯然、愤怒、孤立无援、无可奈何、以至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神，在江淮平原漫无目的地荡着，渐渐聚拢，潮水般向我涌来。我站在长江水道最大的沙洲——长江与淮河的交汇点——江苏扬中县（古称“太平洲”）的最北端防洪江堤上，迎着黑暗中铺天盖地而来的洪峰，迎着凌空的惊雷和闪电，迎着大暴雨，感知着脚下大地的颤栗，感知着灵魂的颤栗。

我进入华东，第一站是南京，再由镇江京口渡长江进入苏北“黑下河”地区——扬州、江都、高邮、兴化、宝应；后又倒转回来沿滁河入安徽——滁县、合肥、淮南、凤台、寿县……我看到的事实是，洪水、眼泪、酷暑、饥饿、霍乱、伤寒、肝炎、血吸虫都在吞噬着灾民。

然而,在七月十一日民政部公开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之前,新闻媒介对灾难守口如瓶,好像华东一如既往,在“莺歌燕舞”中生活着,虽然苏南、苏北正经受着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淮河两岸一片汪洋已是四十多天了!

即使七月十一日后,由于各种因素限制,各大新闻媒介仍是左顾右盼。

天堂和地狱。

谁在天堂,谁在地狱?

第一部 天地玄黄

水呵水!

传说中,“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洛漯而泛诸海,决汝汉,排泗淮,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后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所谓“尧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人类文明傍水而生。黄河、长江之中华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古埃及文明,恒河之印度文明。然而,水又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无穷无尽的争斗,无穷无尽的烦恼,无穷无尽的惊恐不安。

我们的祖先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篇》)。

有统计说,目前世界各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中,洪涝占

百分之四十,热带气旋占百分之二十,干旱占百分之十五,地震占百分之十五,其余占百分之十。

黄河流域近两千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大改道二十六次。

长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十八年间泛滥成灾十一次,其中一九三一年洪灾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河南等省,共二百零五个县,受灾面积十五万平方公里,十四万五千余人毙命,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更是难以胜计。《中央日报》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报道,安徽“全椒市街水深五、六尺,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累累。”芜湖市更是惨状惊人。当地被淹死的人畜还来不及掩埋,新的尸体又相继漂来,一时“腐臭熏天”。《新京日报》载:“自七月四日起至十二日止,大雨滂沱,酿成近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其被灾区域,上自江宁县第七区之谢村,下至长江与南京,长几百余里,两岸本有薄堤,此次因连日大雨,山水齐发,河水陡涨三丈余,虽然农民掩救,各圩相继溃决,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白浪滔天,人声鼎沸,庐舍荡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漂杳烟波间,人类则与虫鸟竞争,同栖树头,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淮河流域近五百年来,水灾三百五十次,一九三一年洪水淹没耕地七千七百万亩,死亡七点五万人。一九七五年八月暴雨成灾,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及一大批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京广线中断十八天,人员死亡一说十二万,一说十万,一说六万;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亿。

海河流域一九四九年以前五百八十年间发生水灾三百八十七次,近三百年有五次淹及北京,八次水进天津。

.....

陪同我们采访的镇江市委宣传部的潘金陵女士告诉我,她就是在洪水的恐惧中长大的,“从小就害怕洪水”。

她家在镇江市治内的扬中县丰裕乡光明村。

淮河水入长江,长江洪水至镇江东行忽然南下,扬中县首当其冲。扬中扬中,“扬子江中”,古称“太平洲”。然而“太平洲”不太平。四面环江,一百二十公里江堤年年岌岌可危,二十七万人,年年都要上堤抗洪,以避免一九五四年的悲剧重演。

潘金陵的母亲朱光华老人说,一九五四年惨哪!农历七月十九,江、港堤防崩溃,洪水顷刻吞没扬中县,数千人死亡,七万三千人无家可归。老人看见一个木盘在水上漂着,里面有个没人要的婴儿在啼哭着,殷红的小身体上爬满了蚂蟥!她家的木板壁上,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洪水的痕迹。

今年洪水更是非同小可。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江淮地区平均降雨达八百毫米以上,比往年的同期高了二至三倍。局部地区,三天承受了全年降雨量的一半!一两米外不能见人。其中安徽歙县最大降雨量达一千五百六十毫米,金寨县前畈乡达一千七百七十五毫米,全椒县一千二百一十八毫米,江苏兴化市一千二百一十八毫米!

“梅雨”整提前了一个月。

天目山、茅山、界领山洪水涌进太湖。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三天的功夫,太湖新增来水三十一亿立方米!相当于倒进了一个中型水库的水。

二十天后,太湖水位超过历史最高点三厘米!而且泄无出路,居高不下。一盆巨大的祸水顶在了上海、“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金三角”和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平原数千万人的头上,极大地威胁着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人们食不甘味,寝不安眠。

鸟瞰江淮,可谓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几近《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和古巴比伦《吉尔加美什史诗》。

国家呼救

终于顶不住了。

洪水汹涌澎湃而来,而且大雨、大暴雨、特大暴雨仍在没命地下,灾情仍在扩大。

“一度梅”从五月中旬开始到六月中旬,已在江淮地区泛滥成灾,由于官方遮捂灾情,外界并不知晓。

“二度梅”不长脸,从六月底、七月初开始暴下猛下连续不断地下,其强度和态势较“一度梅”有过之而无不及。苏、皖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北京。

硬扛着,扛过了七月上旬还不见停,而且趋势难以预料,巨大损失已成定局,防灾减灾已是力所不能及。

七月十一日,民政部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名义,会同苏、皖两省政府官员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受国务院委托,公开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

这天天气闷热,中外记者上午九点以前都早早地赶到了北京台基厂首都宾馆二楼会议室。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今天非同寻常。这是中国第一次放下矜持的架子,实事求是地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并按照国际惯例如实公布受灾具体情况,回答记者诸如“死亡人数”、“灾区传染病”、“洪涝发展趋势”、“灾害原因”等问题。

在场的记者们触景生情,感慨良多。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多灾国。四十多年来大小灾害不计其数,可是从来都是掩饰。在各种新闻媒介上绝对看不到灾区真实和全面的报道。

不采访一九九一年大水,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九五四年中国还有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和巨大的损失。

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崩溃,淹掉二十多个县市,人们却是在十年后的报告文学《洪荒启示录》中了解到事件真相的。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毁灭了华北一个重要的中等城市,数十万人死亡,而损失和救灾情况也是在十年后才知道的。而且当时的最高领导主人是那样坚决地理直气壮地拒绝了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援助。一曰家丑不可外扬,一曰防止外来势力乘机捣乱破坏,一曰靠毛泽东思想、靠自力更生一定能重建家园。

封闭的国度,封闭的心态。

今天的举动无疑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新闻界欢欣鼓舞,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然而,前景并不美妙。

我赴灾区采访的前两天,周围的气氛就已经被制造得慷慨而悲壮了。回到办公室,桌子上堆满了各种药品、电池、胶卷、稿纸、信封,还有两千元钱,我被告知,“这跟上战场一样,后方支援前方”。谁见了都要嘱咐几句,“注意安全”、“祝你好运”、“别傻呼呼地往水里跳,该跑就得跑”,“好自为之”。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我们能做什么?那就是如实报道灾区情况,为灾区赢得更多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援。

这方面,我的同行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吉林大山嘴子镇出现险情,敦化电视台二十八岁的记者张险峰主动请求前往采访,乘船至急流处挂住一电线,船身失控,落水的张险峰由于连续十几昼夜的采访,身体极其虚弱,力不能支,以身殉职。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听说华东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心急如焚。他在半个多月前两只眼睛做了大手术,勉强能睁开眼看人。医生嘱咐至少需要一个季度疗养才能恢复。他说,那哪

儿等得及。他七月十二日背上照相机就去了江苏和安徽,用那双红肿得不忍卒睹的眼睛,用满腔的热情,拍出了许多感天动地的好作品。他说:“一个新闻工作者,尤其在突发性灾难性事件中的行为表现,甚至比他的作品表现更为重要。”

在灾区灾民的呼救面前,新闻界也有孬种。

北京某大报记者,上级指派他去灾区采访时,他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前往。当然受到了纪律处分。

北京某大画报摄影记者,在安徽灾情最重时就在合肥,他竟无动于衷;因为他此行的任务是拍淮河治理成就,而眼下洪水泛滥,哀号滔天,何谈成就?于是就打道回府了!

在灾区灾民的呼救面前,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贺延光许多反映灾区真实情况的照片“不准”发表,我写回报社的稿件又因“不准”的指示而屡屡受挫。

贺延光跳着脚骂娘:“我这些照片能给他们换来援助!”

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们在灾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的时候,北京不断打来电话传达上面的指示精神,末了都要说:“嗨,哥们儿,悠着点儿,别累着,注意节奏。稿子不太好发。”

上而指示,不准报道灾情,不准报道疫情,不准报道水灾原因。原报道计划有重大调整和改变。

看着一幕幕人间悲剧,我却不能说话;看着灾区父老的请求,我连苦笑都没有。

我在苏北黑下河重灾区抓着电话一打就是好几十分钟。和我在一起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急得大声喊:

“我以我二十多年的党龄担保,我们提供的情况都是真实的!”

“真实”这一点都不能做到,那么我们在灾区的采访还有什么意义呢?

谁问我我都会如实地告诉他：在苏、皖灾区，我的眼睛看到最多的是洪水和眼泪。

灾情和灾民的困境，不是在北京蹲着便能想象的。

多少不眠的夜晚呵。

多少牵肠挂肚的故事呵。

一只小船，赶了长长的水路，来到皖北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三里庄庄台。

“庄台”是江、淮地区行蓄洪区一种特殊的建筑，是行洪区内的群众为躲洪水而用土、石平地垒起的一块长条高地。这样的庄台在淮河流域共有一百一十座。

小船抵达的这天，庄台已被洪水围困了十六天了。

乘坐这条小船的人中，有我的朋友、《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他们刚上岸没走几步，一个赤膊老人“扑通”一声给他们跪下了。老人伸出双手向他们乞求：“同志，有馍没有，我饿得不行了！”老人浑身颤抖着，一双饥饿和企盼的眼光直盯盯地望着他们。

陈宗舜平生是那种铁打的汉子。四十多年风风雨雨，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什么场合没见过，文革期间打成反革命，在大牢里，在劳改农场，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可此时此刻，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周围的村民说，老人名叫杜德林，已有四天没吃东西了。

刚上岸的人震惊不已。

不是发了救济粮了吗？不是说灾民人人都能吃饱饭吗？而眼前的人都快饿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位村民向陈宗舜叙述了原委：“庄台上的老住户，家里的存粮没被水淹，比我们好过些。我们这些从水里逃上庄台的人家，日子可就苦了。上庄台半个月，只发了两次救济粮，一共七斤，其中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救济，每人只发了半斤面粉。”

庄台如同与世隔绝的孤岛,没有油,没有菜,光吃粮食,那点儿救济粮,一个青壮汉子,也就是两天的口粮。

洪水不退,只得听天由命了。

蒙洼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家老少三代五口人,饥饿难耐,估算着那点儿救济粮肯定熬不出头。凭经验,如果不采取措施,三代五口人有可能同归于尽。

他们开了个家庭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为了保存刘家后代,五口之家要有两个人去死,以省下两个人的口粮保活下来的三个人。

谁去死呢?

两个孩子是刘家的根儿,家庭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强有力地保护他们的生命,以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他俩当然免死。

死神只能在三个大人中间挑选两个。

在孩子的眼中,在人们如此庄严肃穆的举动,似乎有点儿荒唐。

大人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大家一块在洪水中求生时,日日惶恐不安。今天求死,心境反而平静了。

老太太主持会议,首先提出请死。她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
“我岁数大了,老了,不中用了,身体也不好,死就死了。”

那么夫妻二人谁去死呢?

夫妻争执不下。

丈夫说要去死。

妻子说不行,还是让她去死。

不,我死。丈夫争道。

我死。妻子不让步。

最后争得夫妻俩相对无言,忽又抱头痛哭,只得请老太太最后定夺。

老太太看看儿子，又看看媳妇，沉吟片刻说：“让儿子死吧！”

儿媳一听就急了：“要是不让我先死，你们死了，我也带孩子一块死。留下我，我有这么重的心脏病，孤儿寡妇怎么活呵！”

家庭会议终于最后决定：赴死者——老太太和儿媳妇。

城里人可能会问，怎么没人去帮他们一把？人至于会饿死吗？至于采取自杀的办法去解救别人吗？两个人的口粮，加起来一个月不就是六十斤左右吗？

城里人听这故事，如同听天书一般。

当天夜里，星光灿烂，老太太和儿媳手拉手，一块投入滚滚洪流中……

自杀是一种真正的绝望，或者说是一种希望的绝望。

在灾区采访，自杀的故事不绝于耳。

从个人的角度看，水灾损失最惨重的是农村专业户。

专业户的经营特点是规模大，投入多，大水一来，灾区的成百万专业户几乎全部倾家荡产。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这些一筹莫展的绝望的破产农民专业户。

种粮的，水稻刚刚开始分蘖，就陷人灭顶之灾；种棉、种藕、种菱的今年绝收；养鱼的更惨，鱼都被洪水冲跑了，即使打起鱼来，灾区家家勉强活着，谁还卖得起鱼？高邮的渔民打上来的鱼，一斤多重的草鱼、鲢鱼，卖两三角钱一斤都没人要，整千斤地倒进了高邮湖、邵伯湖。

真是赔了血本。

望着洪水发呆。巨大的投资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私人借钱没法还，信用社贷款没法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些人就选择了自杀这条永远解脱的路。

江苏丹阳县行宫乡有个三十多岁的养鱼专业户，他原本是个意志坚强的青年人，养鱼之前干过不少行当。他高中毕业后曾当过民办教师，他虽然有本事，有志向，但是没路子，几次转公

办教师都没他份儿，一气之下辞职回家种田。他承包了大片的农田，贷款买了拖拉机，可一年下来，天灾加人祸，一算账，不仅没赚，反倒赔进了那台拖拉机。然而两次大挫折都没使他屈服。教书、种田不行就养鱼。一九九一年借了私人二千元，国家贷款八千元，可洪水把鱼全给冲跑了！第三次打击，第三次失败，他彻底绝望了。

他诅咒洪水。

他诅咒苍天。

他诅咒命运的不公。

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当妻儿第二天在房梁上发现他时，尸体已经僵硬了。

丹阳县一个种粮大户，大雨和洪水来后，四度插秧，四度没顶，损失惨重，绝望自杀。

兴化市陶庄乡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儿子结婚负债几千元。今年承包了精养鱼塘，如果不出意外，还债后还有盈余。大水冲了鱼塘后，服毒自杀。

高邮市张轩乡一对夫妇水淹鱼塘，欠债四万元，双双上吊自杀。

宝应县水泗乡一户三口人在毗邻建湖县承包藕塘，破圩后都泡了汤。小孩子落水。夫妻俩都发呆，极度绝望极度麻木，直直地看着孩子淹死。水退后，夫妻双双神经失常。

受灾最重的苏北里下河地区（京杭大运河以东，苏北灌溉总渠以南，通榆运河以西，新通扬运河以北），兴化市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四拍歌”：

养鱼的拍屁股——急得直跳！

取鱼的拍巴掌——高兴得直笑！

养鸭的拍肩膀——喂，老兄，还是我好！

种田的拍桌子——哪有粮交！

专业户有十年前被称作“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专业户经济，随着洪涝灾害的侵袭如同脆弱的圩堤一样崩溃了。

谁衔来了橄榄枝

全国性的特大洪涝灾害，截止八月一日的统计，死亡人数二千二百九十五人，这说明各级政府贯彻“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卓越的努力。

洪水将临，灾民撤离转移的工作极为艰巨。

故土难离，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宁死不走。

不走就逼着走，不走就架着走，生拉活拽也要走。

安徽天长县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上岸就冲着县长武忠群大骂：

“你们公安局的人为什么用枪逼我上船！”

此刻的武忠群已有六昼夜没合眼了。他拍着那汉子的肩膀安抚道：“好啦好啦，人上来了就好，人上来了就好。”

天长这个安徽省的富县，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三点二亿元，但是九万六千七百灾民安全转移，无一个淹亡。

安徽寿县的灾民转移更是宏阔壮观：四十二万人无一淹亡。

一九九一年大水的抗洪救灾，进行了空前的社会动员。省长下到区和市，专员、市长下到县，县长下到区乡，区、乡长下到村，层层分片承包。而且干部都回到过去基层曾任过职的地方，便于进入情况，指挥抗灾。我到扬中县丰裕乡何家大港闸，一个小屋子里就塞着“祖孙三代”三个乡党委书记：现任书记郭太康，前任书记王永鹤，前前任书记黄克进。在基层政权组织普遍存在“集体剩了壳子，会计成了戳子，支书成了桌子”的情况下，这种非常时期的动员工作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军队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调动。

第二集团军三十四师数千官兵调到寿县集结,七月八日进城那天,暴雨如注,通往西门的公路已被全部淹没,公路所有的标志,要么冲毁,要么淹没。公安局长当即决定,由公安民警在西城外组成路标。

大雨不停,水位不断升高。“局长,着不住了!”局长的对讲机里传来大声呼救。

“怎么回事?”局长问。

“水到胸部了。闷得着不住了!”

“着得住也得着,着不住也得着!”局长命令。

大水淹上城墙已有好几米高,部队如果不进城,寿县城难保,六万居民和六万灾民难保。

可寿县县长乔冠秀心里十分清楚,把人救到岸上、大堤上、庄台上好办,救上来后吃喝拉撒睡却是个绝顶难办的事情。六万人涌进寿县城,城区人口一下猛增一倍!县委县政府大院都住上了灾民,鸡、鸭、鹅、猪、羊在大院内大摇大摆,“文明大院”亦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省里对灾区议价粮敞开供应,对灾民的一天一斤的平价供应粮,虽然政府每斤已补贴了两角钱,但是其余部分,一贫如洗的灾民也买不起。

在安徽凤台县问一个小男孩:

“小朋友,你每天吃多少饭?”

“半碗饭。”

“能吃饱吗?”

“吃不饱。”

旁边的大人插话说:“抢着就吃,抢不着就饿肚子。”

安徽灾区很多地方被大水围困,没有饮水,没有水井。

在颖上县一个孤岛上问一个母亲:

“你们喝水怎么办?”

“都是喝湖水的水。”

“湖水的水那么脏,怎么喝呀?”

“小孩子哭着闹着找我要吃要喝,我也没办法呵。”

“不生病吗?”

“大人小孩都拉肚子。你看湖里都漂的是啥东西。”

恰好水里漂来一只一百斤大小的死猪。死的东西都在水里,活物每天的大小便也都排到水里;死人没地方埋,用塑料布裹了,用竹箴夹捆,扔到水里,任他东西南北漂。

被围困的灾民“有家不能归,有粮不能吃(部分灾民的存粮都已发霉),有水不能喝”。

江苏与安徽有很大不同,由于经济实力的明显差异,排灌能力和运输能力都很强,水来得快也排得快,饮水方面与安徽比更有天壤之别。

饮水方面,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江苏灾区有出色表现。“亮晶晶,透心凉”的“雪碧”充斥于江苏城市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可以看见“雪碧”的影子在江淮大地徘徊。

七月十五日,我们与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同时到达镇江市。沈到后即向当地政府官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要大规模陪送;二、四菜一汤;三、不喝“雪碧”。我当时纳闷儿,为什么“不喝雪碧”会代替“不喝酒”呢?

“雪碧”软包装,“雪碧”一拉罐,“雪碧”商标的茶杯,在江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象征。

那翠绿欲滴的包装设计,那打开盖儿后二氧化碳气泡的冲劲儿,那奇怪的甜腻腻的味道,可以说像洪水一样,到了泛滥的程度!

在灾区我总是做梦,总是梦到人们受伤后,身体里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清澈汨汨的“雪碧”!

.....

“有粮不能吃”，这里要有特别的交待。

在凤台县问一个乡党委书记：

“救济粮不够吃怎么办？”

“就吃霉麦子。”

“不是县里保证灾区粮食供应吗？”

“县粮站也供应一些面粉。可是好面粉供给了居民，有的发霉面粉卖给了灾民。”

“真是黑了心肝！”

“我们已向县委书记反映了情况。”

就在这个乡的一个农妇家，打开她家盛馍的铝钵，里面的馒头是黑绿色的！像一滩牛屎！

“你怎么把馍盖着呢？”问农妇。

“救济面这个样子，怕人看见。”农妇答。

怕什么人看见呢？显然是怕记者看见，或者是怕恰好路过此地的恰好是有正义感的更大的官员看见。她自己犯不着遮盖，吃都吃了，还怕什么看？总是有人教。谁教的呢？

唉，中国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

在救济粮不到位和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利用灾民抢收的一点霉麦子，安徽省发明了一种处理的办法。办法是：先把发霉的麦子放到一定比例的黄泥浆中浸泡搅拌二十分钟，然后用清水淘洗晒干，往一个方向碾，以脱霉菌。泥浆比例以能漂浮一个鸡蛋为准。由各级防疫站推广。

可是有专家告诉我，这种处理办法：“真是扯蛋”！霉变麦子食用后不仅会引起一些急性病，而且还会诱发癌症！

什么癌症不癌症，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肚子！

实际上，在特大洪涝灾害面前，人们已经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和自救能力。而这些能力不是靠“精神鼓励”强心剂便能解决的。

但凡有点儿良知的人都不会回避这个现实,直到今天洪水还没有退,数十万上百万灾民还住在庵棚里,卫生条件,饮水,粮食,越冬问题,治安问题;数百万上千万灾民的现状和未来命运都将构成重大的社会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到,灾区的许多村级基层组织已不复存在,乡、区政府也住在大坝的庵棚里,成了“流亡政府”,势必在救灾安置的后期工作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真空。

而这些忧患,眼下已被披红戴绿热热闹闹的表彰会慷慨激昂热泪盈眶的报告会给掩盖了。

秋天降临,蝉在树上永远用一种声调唱着“知了”歌。

枯燥,平淡,毫无情感。

“知了知了”,都“知了”些什么呢?

陈宗舜听说我要写《辛未水患》,非常慷慨地贡献出了他在灾区采访的全部材料,以鼓励我写出真情实感。在这些材料中,有一封安徽凤台县李冲回族乡魏郢村上吴生产队灾民写给他的一封信。征得老陈同意,我将这封信作不任何修饰全文抄录于此:

陈宗舜同志:

您好!

在7月28日您贵社采访了我县白塘乡受灾及救灾情况;并又向我县救灾办公室汇报您采访农民的真实情况。

当时,我也在救灾办公室,您叫我把本乡受灾及救灾情况向您报道。最后我又把6月30日被龙卷风刮到(倒)房屋的灾情向您叙说。您对我身有病痛患者,家属头部及身部被砸伤,现也无处藏身的灾民非常同情。您就把我这真实受灾情况于(与)县救灾办公室张维言主任谈说。当时张主任又把我房屋被刮倒、家属被砸伤拍摄的几张照片交于您观(过)目。你更觉的(得)我受灾的真实情况非常可怜。当时,就请张主任于(与)我乡联系,

在近日内及时解决我无处藏身这个困难。

本月29日我找到乡政府分管民政的金本伟同志,他一再推拖说,无钱款,无物质(资),怎么办?我们乡里也没有东西给你。搞的(得)我连逃(讨)饭的也不敌(抵)。8月1日下午,3时半左右,我又到县救灾办公室,找到了张主任,(他)说:“钱款、物都分到乡里,你还去找乡里”。看:他们互相推脱。

8月2日上午我找到乡党委书记,请求他们给我解决困难,乡里说没有还是没有。(我家)只好在这露水、雨地里,一到下雨急的无处投身。

陈社长(注:灾民显然搞错了陈宗舜的身份),您看我向(像)逃(讨)饭样的,登门请求乡、村给我解决困难,到现在并无影(音)信。

你看外国、中国(台湾)等各省市、无受灾的工人、农民、及干部都发扬人道主义纷纷捐款、捐物、捐粮、捐药品……等来支援我们灾民,而他们呢??

陈社长,您在民政局大门外,交给我一个信封,于(与)我说在最近内如不给解决,及时邮信于您。希望在百忙抽闲之时,能及时到我李冲回族乡魏郢行政村,走群众路线,调查群众受灾以及救灾情况。其他一些贪污救灾款项的干部我也敢于(与)您们说明,怕的他们有职权打去报复。最后,我请老陈到我村来一次,一切事情由群众反应(映)于贵社吧!此礼。

灾民:吴敬陆

1991年8月4日

生存困窘的灾民,又岂止吴敬陆一人一家!

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太少了!

拿灾情当筹码,拿灾民的苦难当发财晋爵和达到某种目的机会,天理难容!

“诺亚方舟”的故事说，水开始渐渐消退了，诺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看水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便飞回方舟。诺亚等了七天，又把鸽子放出去。晚上，鸽子回来了，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诺亚就知道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再放出鸽子，鸽子从此不回来了。

多么美丽的故事。

鸽子衔回了橄榄枝叶，给诺亚方舟仅存的生灵们带来了生的喜讯：洪水退了，万物复苏。与一九五四年、与“75·8”两次特大洪水相比，这次保住了京浦铁路，保住了淮北大平原，淮河大堤安然无恙；淮北被称作“中国的鲁尔区”，煤矿、电厂安然无恙；淮河、滁河、太湖流域的各大中型城市安然无恙！

“诺亚方舟”的故事说，洪水在大地肆虐了一百五十天后，“上帝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站在淮河大堤上，站在洪泽湖大堤上，站在津浦铁路上，站在石头城上，我们可以看见淮河、滁河的水位突然下降，来水骤然减少，洪水正在消退。

这是上帝的怜惜和恩赐吗？

我看见了橄榄枝。

然而衔来橄榄枝的不是和平鸽，而是淮河流域十七个行蓄洪区、滁河流域十二个圩垸百余万灾民的呼号！

所谓牺牲小家保大家，牺牲局部保整体，洪水都进了行蓄洪区。

请记住这些行蓄洪区的名字吧：

蒙洼、城西湖、邱家湖、姜家湖、唐垛湖、城东湖、寿西湖、瓦埠湖、洛河洼、汤渔湖、荆山湖、新民滩 1.3 公里、……

第二部 淮河悲歌

感天动地新民滩

高邮市湖滨乡的这一夜沉闷而漫长。

这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而我们懵里懵懂地进入了台风中心。

七月十三日以后，“二度梅”北移，江苏终于有了晴日。

可是高邮市和湖滨乡的人都阴着脸。

湖滨乡是一个很独特的去处，全乡九千人都住在一个长八点八公里、宽十八米的土垒庄台上。庄台是在高邮湖的新民滩上平地起坝，东部是一点三公里宽的行洪道，与运河西堤紧靠着，运河东就是黑下河地区了；西部是洪水滔滔的新民滩，北部是高邮湖，南面就是邵伯湖了。

这个孤零零的狭长庄台，被当地人称作“智利”，在这里已生存了二十年。

“新民滩 1.3 公里”是淮河下游一条著名的行洪道。二十多年都没有行洪，乡民筑了南、北圩，圩堤其高其固足以抗拒任何规模的洪水灾害。

麻烦就出在这里。

洪泽湖、高邮湖水位进入汛期后便居高不下，入江水道不畅。江苏省决定破圩行洪。

然而地方和当地老百姓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一直僵持到雨过天晴，一直僵持到高邮湖水位下降到没有任何威胁的

程度。

我们在僵持进入白热化的时候闯进湖滨乡的。

此地不欢迎记者。

说是《新华日报》记者对湖滨乡的撤离疏散工作做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深圳特区报》专赴华东采访水灾的两名记者也因为没有按照他们的口径写稿子，被毫不留情地撵走了。

我们刚到隔运河与湖滨乡相望的车逻镇，就闻到了火药味。

我们在车逻政府，受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粗暴盘查。

“你们是干什么的？”

“记者。”

我们递过去“记者证”。他看后又问：

“你们从哪里来？”

“扬州。吴市长介绍我们来的。”本想端出我们曾采访过的扬州市副市长吴孟鏞的名头来唬唬这人。

没想到此人不吃这个。

“哪个吴市长？”

我火了，一把抓过“记者证”，反问一句：“你是干什么的？”

弄了半天，这人是高邮市市长的司机。真是“宰相家臣官五品”！

上庄台的这一夜，正好是湖滨乡等候生死宣判的一夜。

茫茫新民滩沉寂不语，在黑暗中死去了一般。

临湖柏油路边的一盏盏灯都被成千上万的蚊虫围绕着。蚊虫借着洪水的潮气和路灯的光明疯狂地舞蹈。它们互相冲撞，挤压，倾轧，撕咬，组成了一个直径好几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肉球，在八点八公里长的路面上滚动。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了庄台上，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像别人那样嘴一抹抬屁股就跑，他们开始接受我们了。

“我们今天来之不易呵！”

湖滨乡党委书记居述栋沉重地说。

翻开《高邮县志》，我们看到高邮运河西侧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曾经发生悲剧。一九五零年夏，新民乡（即现“湖滨乡”）五千二百五十七人中有四千零一十九人急性感染血吸虫病，死亡一千三百三十五人，死绝四十五户、三百三十九人。后湾是仅有十八户七十二人的小渔村，在很短的时间里死五十六人，其中死绝七户。其惨状如毛泽东诗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湖滨人又被叫做“三瓜人”：“头像西瓜，肚子像冬瓜，腿像丝瓜。”

当地老百姓念念不忘一九七零年，综合治理淮河，消灭血吸虫病，数县两万多名青壮年在高邮境内大运河西大堤西部一点三公里处新民滩挑土，平地起“庄台”，庄台南北长八点八公里，海拔高度十一米，顶宽十八米，以安置新民滩居无定所的“草民”、“渔民”。

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今年高邮湖超历史最高水位，圩外洪水滔天，圩内安然无恙，生机勃勃。在这座圩里，有两个产值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有群众集资兴建的三所小学、一所中学，一千多亩果园，一千多亩精养鱼池，一千多亩西红柿，五千多亩水稻，四千多间房子……

所有行蓄洪区，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长长的清单，让你捶胸顿足，浩浩长叹。

如今眼睁睁看着二十多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如同剖心剜肉般悲痛。

为这“1.3 公里”，历届政府打了多少官司。

在动员大会上，一位高邮县的老书记就直来直去地说了大白话：“我当县委书记时，年年都要来炸圩，我们都顶回去了。水利部门的人来，我根本不理他。好端端的东西，凭什么炸？今年

不行了,上面压力太大,顶不住了。赶快搬吧。能搬走都搬走,别指望人家什么都给你赔。”

老百姓不明白上层的官司。

成千的村民喊着和当初抗洪保堤一样的口号——“人在圩在”、“誓与大堤共存亡”。

他们搭起了草棚,布置了哨位,建立了值班制度。有的送茶送饭,有的驻守观察,有的收听电视广播,有的负责测量水位,他们对高邮湖、洪泽湖乃至整个淮河流域的水情了如指掌。他们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水位最高的时候不行洪,今天水位每天以好几公分的速度下降却要炸圩行洪?

七月十九日,我在庄台得到了一张“高邮湖水位分析表”:十二日水位最高,九点二一米;之后一直下降,十九日时,八点九八米。

我们来到南、北圩,即被护圩的灾民包围了。

他们不让我们走,但对我们十分友好,只想让我们多了解情况,听听他们的想法。

湖滨村一位妇女说:“雀儿在天上飞,晚上还有个窝落。炸了圩,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新民村村民郑大洪说:“今年我六十八岁了。昨天九十四岁的仲广林都跑到圩上来巡逻。一九五零年闹血吸虫病,我家就死了四口人:父亲、婶娘、哥哥、弟弟。这一次我也活不长了。救救我们命呵!”

高邮志镇乡太平村丁作金哭诉道:“我来这里包了二十几亩鱼塘,二十几亩稻田和果园,约定十年。今年就投资五万元,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接到爆炸通知后,一斤鱼才卖两角钱。平常一家五口三代人都住在树林里,老婆神经病,孩子腿也有残疾。这样下去没法活了!要炸,先炸人,后炸圩!”

太平村生产队长徐长喜:“我今年六十岁了。解放四十年,

我吃了三十年救济。邓主席上台政策好,我养鱼翻了身。我承包了三十亩鱼塘。今年贷款一万二千五百元,五个姑娘四个出嫁,借了姑娘八千元,还借了朋友二千元。鱼塘已经投资两万多了。我哭了二十多次。为什么要哭?借了这么多帐,卖人都还不起人家呀!你们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才开始养鱼,就扣了鱼塘生产税七百元,一亩二十五元。应该年底交才对呀。”

说到这里,满头白发的老人“扑通”给我们跪下了。一面哭一面喊:

“我就指望晚年能过上好日子呵!——这下不行了!——你们就是包青天呵!——你们要为我们作主呵!——你们要为我们反映情况呵!——我给你们磕头啦!——”老人像捣蒜似的给我们磕头。

我赶紧挽扶老人。

我长那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一个白发苍苍可以做我父亲的老人给我磕头!

我不知所措。

我惭愧万分。

除了同情,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除了祝福和祈祷,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心在颤栗。

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无法继续采访……

也就在这一刹那,我感到一种幸运和优越;感到了一种卑鄙和罪恶的“庆幸”,和这种“庆幸”潜伏在灵魂深处不易察觉的地方的窃笑;感到了一种同类受难而自己得以幸免的“恐惧”。

我的直感告诉我,这种“恐惧”将伴随着我的一生。

新民滩 1.3 公里,一时成了整个淮河的矛盾中心。

地方各级干部亦在这矛盾的中心悬到了半空中,上不得,下

不得,心情十分复杂和矛盾而又无法解脱。谁也不想惹麻烦,谁也不想危害一方的行动中留千秋骂名。为政一方,自然要为一方百姓着想,自然要直面民间疾苦。徐九经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青天父母”自然成了良知未泯的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护着当地百姓,处处维护当地百姓的利益,成为一种本能和自然的反应。可是他们谁都明白,他们只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中十分不起眼的的一个部分,或仅仅是一个部分。他们必须服从更高的利益,必须在这种“小局服从大局”的利益关系中尽他们应尽的义务。上下压迫,使他们左右为难;上下都得罪不起,使他们举足无措。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处于上下压力的中介部位,扮演一个略略倾向于老百姓的不偏不倚的角色,选择适当的时机,用上面压下边,或者用下面压上面,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既保住了官爵名位,不耽误政治前途,又能得到老百姓的充分谅解。这样就形成了“治水社会”非常独特的政治形态。当然,想修炼表演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要比登天还难。特别是在突如其来的灾害情况下,理智、经验、情感往往交叉错位,夸张,变形,失控,构成了一幅地方官员“战洪图”。

其中辛酸,绝不亚于身先士卒率领众乡亲护堤堵口抢险救灾风吹浪打烈日曝晒。

颍上县邱家湖六月十六日和七月七日两次炸坝行洪,让湖区的半岗区委书记出了名。也让这个近一米八、说话耿直的汉子换了个人。他顶撞和违抗上级炸坝命令,省里盯着要给他纪律处分;不得已执行了炸坝命令,老百姓又指着鼻子骂他是不为民作主的“坏蛋”。他从此沉默寡言,不准人提起他的名字,经常呆呆地望着邱家湖的洪水,欲哭无泪!

淮南市洛河区的洛河洼也是行洪区。洪峰来临时,女区长给大家鼓劲儿,不要怕,圩堤没问题,一定能经受住洪峰考验。

全区上下齐动员，誓与大堤共存亡。可是不久，她接到了破圩行洪的命令。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的诺言被严酷的现实击碎。她无颜面对行洪区内的父老乡亲。望着滚滚入圩的洪水，望着那一村一村的土坯房“轰隆轰隆”地坍塌，她失声痛哭！行蓄洪区内的生产组长、村长、乡长（书记）、区长（书记）、县长（书记）、市长（书记），炸圩行洪后，没有不哭的。

天日昭昭，其情可鉴。

新民滩 1.3 公里也难免一炸。1.3 公里长、十几米海拔高的坚固圩堤严重阻水，江苏省委省政府经过激烈论争后，最后决定坚决炸掉，名曰“清障增泄”。

高邮市政府据理力争，省委常委复议后，驳回。

七月二十六日，我们都被集中到一艘大船上，在距南圩五百米处观看那淮河水利史上颇为悲壮的大爆炸。

这是一九九一年特大洪涝灾害最大规模的炸圩行洪行动：南圩炸开五百米，北圩炸开四百米，并且永远不得合拢！

我的旁边，是那位白白胖胖的高邮市委宣传部长。他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喃喃咕咕絮絮叨叨。

他的眼睛永远在眼镜里面闪烁不定。

这位部长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他在新民滩拉锯战中十分活跃，而且责任重大。新民滩成为世人注目的敏感地带后，他一方面要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实施有效地控制，一方面又要把高邮方面的意图和态度迅速地传递给记者。因此，他的态度随着新民滩的命运起伏而起伏，他的说法随着市里风向的转移而转移。这位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当然深谙“政治”个中三昧，他游刃有余地、不动声色地按照上面的意图操作着。

七月十九日，我们初进湖滨乡，正是新民滩 1.3 公里不炸有一线希望的时候，虽然在前几天已经疏散了一部分群众到运河东岸，但这部分群众又陆陆续续回了家。高邮市专门派了一位

副省长的侄子去南京打探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令人鼓舞：省委省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双方势均力敌，新民滩有可能不炸。这一夜，高邮市委书记离开湖滨乡时，扔下一句话：“不炸新民滩1.3公里，我请客。”

这天，部长理直气壮地给我们讲了炸1.3公里的五大弊端：一是运河西堤船闸与圩堤连在一起，炸圩可能会对船闸产生破坏性影响，特别是闸门极易受震变形；二是运河西堤护坡松散，由于围圩，二十多年没有行洪，炸圩行洪后，若是西堤崩溃，后果不堪设想；三是运河东堤一百一十五公里处地基下降，成为险段，也是爆炸影响范围之内；四是，要是炸圩行洪，毁了圩内十一点四四平方公里的宝地，湖滨乡的群众将无法生存；五是圩内有个高邮助剂厂，是个存放着许多剧毒化学原料的化工厂，污水将会对下游扬州乃至长江沿岸的饮水有很大影响。

条条理由都关系到国计民生，条条理由都人情人理令人信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可第二天，说法全变了。

还是这位部长，他又振振有词地给我们陈述炸圩行洪的四条理由，也是人情人理令人信服：

一是1.3公里圩区原来就是行洪区，不是生产区；二是高邮水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在九米左右，远超过警戒水位，而且淮河流域洪水仍然没退，安徽还有三百五十万人住在大堤上，无家可归；三是从汛期发生规律看，每年汛期都在七、八、九三个月，要抓紧抽底水，迎接更大洪峰；四是当初人家都为我们筑庄台，人家今天有困难，我们也应该牺牲一点利益。他把我们都给搞懵了。

昨天他的慷慨激昂都哪儿去了？

唉，这人怎么这样！

高邮人的很多行为都在变形。光是看运河东大堤公路让那

一溜排开的几十辆高级轿车、警车、大客车，就足以让人感到气氛的紧张。

《新华日报》记者上了指挥船，市长非常粗暴地问他：

“你是干什么的？”

“《新华日报》记者。”

“你下去！”

“我为什么要下去！”

“我以现场副指挥的名义命令你下去！”

“我偏不下去！”

那边岸上也是推推搡搡。

专程从北京赶来拍爆炸现场的中央电视台记者遇到了麻烦。机位被公安局长往后一挪再挪，他瞅空跑回去，又被生拽回来。坐大惯了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哪儿不是当菩萨一样地供着？哪受过今天这气？他大喊：

“我是你们省长请来的！”

“什么省长不省长！省长到这儿都得听我的！”公安局长不示弱。

还在推搡着，那边“轰隆隆”五声巨响，中央电视台连影子都没拍到。

今天即使拍，也不会有风和日丽的效果。

天空阴沉着脸俯瞰大地。茫茫洪水，芸芸众生，在这悲壮的气氛中溶为了一体。

临爆炸前半个小时，夕阳从天边挤出半边脸来，又匆匆地缩了回去，仿佛不忍看人间这惨烈的一幕！

在空荡荡的圩区内，我们遇到了湖滨乡养殖场的渔民王琪良。他还守着那四百亩鱼塘不肯走。他说：“你们听——”

听什么？我们寻声望去，几只鸟在天空“鹅鹅”地叫着，其声凄厉寂寥。

“这鸟叫‘苦鸽子’。它们感到湖滨乡太惨了，所以就叫了。‘苦啊苦啊’，每天都在这里叫。”王琪良说。

“轰隆隆”五声巨响，把圩堤抛上了天空。

二十年像一颗流星，在湖滨人的梦中，成为辉煌的一曳。

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多少天来弊在心胸里的一切复杂情感奔涌而出，化作了感天动地的嚎啕大哭！

“苦啊——苦啊——”，苦鸽子在空中不停地叫着，声如啼血。

金色的蒙洼

麦子熟了。

如果是在六月十五日以前，站在淮河王家坝大堤上北望蒙洼，那真是十八万亩金色的辉煌！然而，灾害正在向他们逼近！

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普降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淮河上游形成洪水，从河南境内的高地奔涌而下，直袭淮河平原。

这是一次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淮河流域二十多个行蓄洪区，蒙洼首当其冲。

蓄洪区的人们以他们几十年、几百年特有的经验和方式，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宣判。

六月十三日傍晚，水利部部长秘书与铁道部值班室紧急联系，要求为水利部长杨振怀解决当天晚上去合肥的火车票。

不能保证全部卧铺怎么办？

没卧铺，坐硬座也走！

第二天晚上，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六十五岁的高级工程师张福义，根据水文站报来的汛情，认真计算着洪峰抵达王家坝时可能的水位。这位与淮河斗了一辈子的“老淮河”深知此举干系重

大。

王家坝位于安徽阜南县与河南的接壤处,是淮河中游的门户。如果洪峰超过二十九点五米的保证水位,淮北大堤、王家坝将受到严重威胁。

国家防总三楼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张福义等人一直计算到十五日凌晨三点,结论是十六日洪峰将在王家坝超过保证水位,必须立即分洪削峰。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大事记”这样记载:

六月十五日四时二十分,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签发了国汛令(1991)第一号命令,命安徽省防汛指挥部十五日八时启开王家坝闸门向蒙洼蓄洪区分洪。五点四十分,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对分洪报告批示:“同意所采取措施,请安徽省政府、省防指立即做好撤离工作,不得延误。”

王家坝对于在河南境内的淮河上游至关重要。

河南、安徽两省的省长都赶到了王家坝现场。

说是来观察水位水情,实际是来互相监督。

安徽省想尽可能多地争取一点时间,把蒙洼里的粮食尽可能多地抢出来些,以减少损失。

闸门缓缓地开,而且始终没有开到位。

河南人一旁不干了。他们电告国务院和国家防总。

第一号命令签署八小时四十分后,李昌安又签发了国汛令(1991)第二号令,要求王家坝闸十五日十七点前将分洪流量加大到设计标准,并责成淮河水利委员会协助执行。

淮河中上游十六个行蓄洪区的开启,是采取节节防守、步步为营的办法,自上而下,如同“多米诺骨牌”,从蒙洼开始,依次倒到蚌埠跟前的汤鱼湖和荆山湖。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对水情就是不把握的,实际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开始动员全部人力上圩堤硬抗着,后来抗

不住了，又炸圩行洪，这一抗一炸，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这里面有很强的侥幸心理。

然而洪水无情。

六月十五日，一个裹着铅灰色雨幕的动人心魄的早晨。被淮河大堤护卫着的整个淮北平原注视着那十二万扶老携幼、赶着猪牛的人民。这是数以百万计的从行蓄洪区迁徙的第一批灾民！十八万亩田地感知着这十二万灾民滞重的脚步。

再看一眼金色的蒙洼！

八年的心血，青瓦房，茅草屋，房前屋后的枣树和槐树，精耕细作的田垄，肥沃的土地——生儿育女繁衍子孙的土地……

王家坝的闸门也是滞重的。从一九八三年到现在，已有八年没有开启了。当事人告诉记者，闸门的传动部分已经锈蚀。即使如此，它仍在一分一分地向上提升。

看着洪水涌入蒙洼，看着洪水淹没了家园，看着洪水淹没了希望，灾民发疯地往闸门上扑，拽下来，挣脱了再扑。

这种努力是无谓的。这种努力是本能和真实的。正是这种努力与每秒一千六百八十立方米涌进蒙洼的洪水一起，拉开了一九九一年之夏淮河流域抗洪救灾的序幕。

“鹰(殷)飞了”

“江淮熟，天下足”。

淮河曾是一条清澈宁静的河。河干道西源桐柏山麓，《水经注》记载的北魏时(六世纪二十年代)淮河，出河南，东入安徽，“又东经广陵淮阳(今江苏省泗阳县)城南”，“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又东过淮阴县(今江苏涟水县)入海”。

《太平广记》记载的神话传说：禹治水，三至桐柏，获淮涡水神，曰无支祁。“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

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劲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则倏忽,闻视不可久”。禹命庚辰治之,“劲索大锁,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一句话,历史上的淮河河道疏通,畅流入海。

然而,此时淮北的黄河——世界含沙量最大的害河已在覬觐江淮的富庶了。

禹捉锁了无支祁,却不能阻挡住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一一一四年)黄河大规模夺淮,淤夺淮河出海口,逼使淮河至洪泽湖南下入江,彻底改变了淮河的面貌,八百多年来祸害两岸,永无宁日。

这是自然界给中华民族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六零二年)开始到清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二千四百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有七次重大改道,北至天津,南至淮阴,在整个华北大平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扇面。

“黄河夺淮”,是自然界演出的一场典型的弱肉强食的悲剧。

从灾区回来,翻看《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就是不愿看到黄河南下的悲剧或企图在历史上极力阻止这场悲剧。

预先知道了悲剧的结局,再去慢慢观看悲剧的过程,是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那神经质般敏感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躲不过那致命的一剑,无论他是多么的无辜,无论他多么的善良和正义,无论他多么的值得怜悯和同情。

一九五零年,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治理淮河。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制定了“以蓄为主,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

所谓“蓄”,一是在上游兴修水库;二是在平原地区的中游兴修蓄洪区,以在汛期保护堤坝,最终保护沿淮城市、工矿企业

和铁路交通。

四个湖洼蓄洪区和二十多个行洪区应运而生。一千平方公里行蓄洪区,二百万人口,五百万亩耕地,成了被供奉给洪魔的牺牲!

人在自然面前显得多么的无能为力!

人供奉给自然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

这二百万人永远在忐忑和恐惧中生活着!死不了,活不好。

颍上县半岗区的邱家湖,自从一九五三年被定为行洪区后,三十八年行洪十三次,平均三年行洪一次!

居无定所,粮无保证,副业更是没影儿,行蓄洪区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没完没了无穷无尽的贫困。

河南省水利厅长马德泉描述淮河上游行蓄洪区生活情景时说:“泥巴桌子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住到大坝上的全部家当:“五十块钱不买,五十块钱不卖。”邱家湖每三年行洪一次,群众生活的艰难和苦涩可想而知。然面对灾民的安置补偿工作也不能尽如人意。

到了半岗,只要谈起行洪,人们就会给你讲在邱家湖地区流传了三十年的“鹰(殷)飞了”的故事。

一九五三年之前的邱家湖是一片美丽的良田,男耕女织,十分富庶。即使为祸甚烈的淮河水声年年不绝于耳,也绝无忧虑。当地民谚云:“铁打的灵台,纸糊的王家湾,破了邱家湖,是湖都不沾。”意思是淮水要破家湖,那可是难上难!

要把这样地区辟为行洪区,自然引起了群众的反对。当时的汪赵区(现在半岗区)殷区长为此使出了全部的智慧 and 口才来蒙大家。他说:

“如果明年(一九五四年)行洪,咱们这里就是三省(安徽、河南、江苏)共管地,灾民每人每天发三斤大米!”

结果,一九五四年行洪之前,殷继周就调走了。

行洪后,甬说三斤大米,每天一斤大米都没落实过。之后的十二次行洪,次次如是。

“鹰(殷)飞了,米没了!”

这个故事就这样一年年流传了下来。

这之后,农民年年抵抗行洪。一九八二年那次最为剧烈。

那年主持炸坝的副县长任治政被打得鼻青脸肿,县武装部长的头部也被铁锹削掉了皮。省长碰巧路过,灾民人人手捧稀泥向省长砸去。殷区长也在省长的船上,他知道灾民对他恨之人骨,在船里没露面。

行洪区的政策也不能令人满意。

每次行洪后,灾民的救济粮,名曰“救济”,实际是要出钱的。国家的补贴非常有限。以往如此,今年洪灾也是如此。许多灾民身无分文,连补贴粮都买不起!

行蓄区农民的负担还不限于买粮食。他们冬天打坝子,打坝子的口粮都由村里自行解决;夏天收麦还债,还要防汛,水大了还要行洪。

灾民年年都在哀怨:

“治淮得个水口袋,水入口袋出不来。”

“保上游,保下游,夹在中间吃苦头。”

愤怒的邱家湖

六月十五日蒙洼蓄洪。

六月十六日便轮到了邱家湖。

当“六月十六日下午六时行洪”的消息传到邱家湖区的时候,一百零四个生产队、四万余名农民举湖哀恸。

前面说到的那位违抗上级命令、最后又不得不亲自执行炸坝的半岗区委书记,抹着泪摔掉电话机。电话机叮铃叮啷地悬

在半空中，里面大声喊着：“喂！——喂！——你回来！——你回来！——”

他冲出门大喊：“我不能当被人千古唾骂的坏蛋！”

湖区的情况，他太清楚啦。

麦子刚收，阴雨不断，都还没来得及扬场！马上行洪，来不及抢呀！眼看着麦垛让洪水都冲走，眼看着一年的汗水和心血，到头来两手空空，就像走“埃舍尔怪圈”中的那些僧侣一样，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虔诚，你的终点永远是你的起点，你的终点永远重复你的起点，那一九五四年开始的没有任何希望的起点：度灾、还债、挨饿、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众神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于是众神在地狱为西西福斯准备了一块巨石，并判处他把这块不断从山顶上滚下来的巨石再不断推回到山顶上。邱家湖四万农民如同悲剧英雄西西福斯，然而，他们不知道“幸福与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唯一能证明他们存在的是，根据四时变化、阴阳圆缺进行不停的劳动，虽感受到他们是这一时间的主人和把握这一过程的幸福。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残酷的。然而这其中含有某种侥幸和希望。而这从头至尾都是人决定着人的命运，既然如此，命运就转换成了人自己的事情。于是就有了侥幸和希望的促使和诱惑下，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蕃衍着劳作着，劳作结果的幸福和淹没、毁灭这种幸福的荒诞。生命力顽强的惊人，生命力抗争的有限和脆弱，也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十三次！十四次！

这次区委书记没有许诺，他也参加了灾民失败的奋争。他想必听过那“鹰(殷)飞了”的故事。不若此，四万灾民的诅咒将会永远跟着他，一直把他送进地狱。

与历次行洪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行洪把农民的耐心和愤怒逼到了极限，逼到了没有生路的份上！

邱家湖愤怒了！

六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也就是在行洪前的三个小时，有人在麦垛上点燃了淮河行洪史上的第一把火。

第一个麦垛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把火点燃了一种可怕的情绪。

紧接着第二个麦垛、第三个麦垛……很短的时间里，四十余平方公里奔走呼号，成千上万个麦垛都燃烧起来了！

邱家湖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本来毁灭她的应该是水，而今却是火。水火不相容。邱家湖的劫难硬把它们拧到了一起，来共赴吞噬四万邱家湖人生存空间的盛宴！

大火燃烧着，滚滚浓烟直冲去霄，哭声一片，天空阴郁而沉重。

高山为之黯然！

江河为之哭泣！

整个淮河流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泄对命运的愤怒。

高邮名产高邮麻鸭，体形硕大，胸深躯长。公鸭头颈墨绿而光泽闪烁，嘴青绿，腹白，尾、爪黑、蹼桔红，俗称“乌头白裆青嘴雄”，雍容雄势。母鸭，方头暴眼，颈部纤细，全身为米汤色麻雀毛，俗称“紧毛细花，细颈长身”。具有觅食力强，善潜水，适应放牧，肉味鲜美等特点，尤以产双黄蛋而驰名中外。“早春鸭”一百三十六日龄开产，年产蛋一百八十枚以上，蛋重七十八克左右，双黄蛋比例在百分之十以上。双黄蛋成为赠人待客的珍品，以锦盒盛之。

高邮麻鸭以运河为界，分“河西种”和“河东种”，两种各有千秋，新民滩是“河西种”的重要产地。而今炸了1.3公里大圩，孤零零的庄台，已是人满为患，哪有麻鸭的立身之地！鸭农只好忍痛含泪卖掉种鸭、蛋鸭。可眼下洪水泛滥，人们自顾无暇，谁还

有精力养鸭子？宝贝一样的种鸭蛋鸭却卖不出好价钱！或者说根本就不值钱！

已经被烈日蒸烤得晕眩狂暴的鸭农，此时已失去了理智，逮过鸭子，一个一个拧断了脖子！

.....

江苏宝应是“柳堡的故事”的诞生地，盛产菱藕。“宝应莲藕”，举世闻名。宝应藕，节长个大，肉厚而晶莹洁白。味道纯正甜美，入口化渣。

江苏的圩田分两种，一是农业圩（或叫“粮食圩”、“主业圩”），一是副业圩。副业圩包括鱼蟹鳖虾、菱藕等。

今年大水，江苏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破副业圩，保农业圩。

大灾之年，保住粮食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农业国首先保农业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江苏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许多地方，如宝应这样的里下河水洼区，过去的“副业”如今成了“主业”。从面积上看副业圩虽然略少，但一亩农业圩只值三百元，而一亩副业圩价值是农业圩的四倍！“副业”是当地人的命根子，一句话，农业圩和副业圩之间有一笔清楚的经济账。

农民被强行破副业圩滞涝，不破当以党纪、政纪和法律论处。

农民的态度是：你破副业圩，我自己破农业圩，让洪水径直进圩淹庄稼！

淹了莲藕塘，两三年内不能恢复元气！还可能断了藕塘的命脉！要完一块儿完！

当然，颍上县邱家湖也有舍不得点这把火的农民。

粮食是他们的命根子。

凌圩乡凉亭河台子队的两位妇女关正英、孔祥英，在行洪开

始后，分别将自己捆绑在自家的麦垛上。她们准备和麦垛一起顺着洪水往下漂，无论漂到何时何地，她们都将与粮食同在，哪怕是同归于尽！

丈夫发现了妻子的举动。

他们大声地呼喊：“下来！下来！快下来！”

她们什么也没听见，她们也不愿意听见。谁也不能阻挡住她们。

江苏兴化市周奋乡时二村的养鱼塘的圩堤被洪水冲破时，鱼黑压压一面墙似地从缺口涌出来。女人们叫喊着“我的鱼呀！——我的鱼呀！——救救鱼呀！——”发疯似的扑上缺口处，企图用肉身堵住鱼群。一、二斤重，三、四斤重的大鱼，被人一堵，便本能在跃出水面，腾身从人的头上飞越而过。鱼头都高昂着，尾鳍强有力的摆动着，结实而矫健的身体在空中闪耀着一片银色的光芒！那令渔民心碎的光芒！男人们也冲上去了。他们去拽回疯狂的女人。他们知道那样无济于事，洪水势头越来越猛，可能连人带鱼都卷进去。女人们不管这些，她们又拼命挣脱，哭嚎着扑回去……

在洪灾的威胁下，女人的本能反应远远超过了男人。而且，在同一本能目标下，她们的行为坚韧不拔地朝两个极端发展，一是不管不顾的疯狂，一是可怕的冷静。

“洪水来了！洪水来了！”丈夫们一面朝麦垛跑，一面嘶喊。

好几米高的洪峰伴着“轰隆轰隆”的声响从不远的地方直扑过来。

关正英和孔祥英镇定地往身上捆着绳子，好像什么都没看见。

男人们冲上麦垛，“你们都不要命了！”他们朝她们吼着。

他们制服了她们的挣扎，把绳子解开，急忙把她们推上树。此时，洪水已经呼啸着冲到了脚下，强有力地托起麦垛。“快上

来！快上来！”女人们上树后，男人还在麦垛上。树上树下，他们的手还连在一起，而洪水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撕掰开……

女人们得救了，男人和麦垛上被洪水裹挟着冲向了远方！

邱家湖西王圩双台村还发生了一个更为悲壮的故事。

炸坝行洪后，洪水奔涌而来。村民陈家堂和儿子、孙子三代人共用一条绳子把身体死死地与麦垛捆在一起。

他们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血汗就这样被洪水冲走。

他们盼望着苍天有眼，能给他们祖孙三代一条生活。

他们跟洪水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冒着陈家断子绝孙的风险跟洪水下了一个赌注。

对于农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赌注了。这在平时，为要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裆里带着“把儿”的人，他们可以任凭乡村干部揭瓦扒房、砸锅摔碗，可以任凭罚走数千元，可以含辛茹苦当牛做马。

洪水涛涛，陈家祖孙三代在大麦垛上紧紧地抱在一起顺流而下。

庄台上，大树上，圩堤上，凡是能看到他们的人都在呼喊，都在流泪。

呼喊和眼泪一直把他们送进了莽莽夜空。

也许是因为他们虔诚地祈祷感动了上帝，也许是因为他们赌注太大唬退了洪魔，麦垛一夜整整飘了二十里，第二天天亮时，在庙台乡保村圩，有人在汇集于此的万余个或烧或散的麦垛中发现了陈家完好无损的大麦垛。

饥饿疲惫的人爬在大麦垛上，显得那么渺小。

部队立即派出营救快艇，冲到陈家麦垛前。

“快下来吧，一会儿就要炸开下口门，你们很危险！”军人说。

“救我们就先救我们的粮食吧！没粮食我们也活不下去呀！”垛上的人不肯下来。

“命都保不住，要粮有啥用！”

“没粮也就没命呀！”

三代人在麦垛上嚎啕大哭，拼死拼活保下来的粮食，怎么能放弃呢？

陈家祖孙三代决死保粮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军人。他们最后出动了大船将三代人 and 大麦垛都拖到了岸上……

淮河两岸，历史上地灵人杰，多出安邦定国之伟人。

春秋战国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就是颍上人民。

管仲有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圣哉！

新民滩也罢，蒙洼也罢，邱家湖也罢，他们的抗争、愤怒、控诉、悲泣、哀伤、乞求，都只不为一个基本的生存要求，青天白日下能有一块立锥之地，能够勉强养家糊口。

吃都吃不饱，何谈礼节、荣辱？

中国素以解决温饱问题为基本国策并享誉世界。

那么，淮河行蓄洪区二百万人，还有长江、黄河数百万人的长治久安、过正常人生活的问题，当不可等闲视之！

诸神不灵

谁都明白，淮河二十多个行蓄洪区的二百万人口的生存已经构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不身临其境，没有这场洪水的荡涤，恐怕很难感知和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也是在洪水几十年来、数百年来没有出路，治淮“没有办法”，资金难以为继的最简单、最节省、最无能的办法。以至要永远为淮河供奉着二百万牺牲！以至要永远让灾民的子孙成为灾民！以至要永远用

“牺牲小家保大家”、“牺牲局部保大局”这样的法则来让灾民承认现实,承受命运! 这是不公平的!

但愿我的来世不要降生到那块土地上! 但愿天下所有勤劳善良的人来世不要降生到那块土地上!

承认治淮“没有办法”,承认对这条灾难之河的无能为力,探索根治淮河的出路,以最终消除中华民族数百年来的心腹之患,这是我所接触到的水利专家和有识之士基本的态度。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事求是,正视现实。一个管意识形态的大官摄影记者:你们照了那么多没在水里的房子,有的只露个房顶,你们知道吗,那些房子都在行蓄洪区里,都是违章建筑,本来就该淹掉!

简单说不错,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这里面有行洪区和蓄洪区之分,而且行洪区和蓄滞洪区都是搅在一起不可分的。目前为止,国家并没有行蓄洪区的专门法律,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公布的《水利部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不仅没说“不准搞永久性建筑”,反而比较详尽地对蓄滞区的永久性建筑和未来发展,作出了原则性和技术性的规定,虽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一条说:“在防洪河道和滞洪区、蓄洪区内,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防洪的要求。”也没说不准行蓄洪区搞建设。关键在于是否阻水,是否影响防洪抗洪。

说行蓄洪区的老百姓该淹,那真是天地良心!

更严重的事实是,行蓄洪区管理松懈,人口膨胀。蒙洼在解放初期四万人,而现在十二万,是过去的三倍! 安徽凤台县董岗乡在董峰湖行洪区内,八十年代人口出生率达千分之二十二,人口自然增长率千分之十五点二! 高邮市湖滨乡人口也较解放初期翻了一番! 这几乎就是整个行蓄洪区的情况。

超生现象普遍存在。

水灾后,苏、皖灾区都分别组织了巡回报告团,安徽省报告团中有一位肥东县撮镇赵光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她在七月初曾用奶水为武警战士治疗蜈蚣咬伤,被称作“当代红嫂”。可是细心的人发现,这位“当代红嫂”屡次报告团露面,都坐了“冷板凳”。负责报告团的省委副书记向询问者陈述了两条原因:一,她不会讲普通话,口才表达不太好;二,她超生二胎,群众反映很大,计划生育也是基本国策呀!因此宣传上要注意分寸。会听的人都清楚,要害是第二条。

“当代红嫂”用超生刚七个月的婴儿奶水为武警战士疗伤,弄得想为之大张旗鼓宣传的有关单位欲干不能,欲罢不舍,好不尴尬。

当然,一事一议,超生归超生,宣传归宣传,报告归报告。有关单位还专门把这位青年妇女的丈夫从安徽请到北京来,为她在招待所带孩子,以使她能安心地在北京作报告。

许多问题本来就是死结,或者是死结的死结,互为因果。

其实老百姓把问题分解得很简单明了,那就是:吃,住,生存。其他都扯蛋!他们不指望谁能恩赐些什么,来行蓄洪区的人多了,一拨一拨,最后什么事情还不是得自己担着。出大力,流大汗,建家园、奔富裕已属不易,可如今保家园却成了问题。尤其是一些已经开始致富的农民心情很是复杂。

新民滩 1.3 公里爆破前几个小时,我来到庄台下一个二层小楼的人家。主人是湖滨乡农机配件三厂采购员吴国栋。一九八八年底,他花了四万元修了这幢上三间下四间的二层小楼。炸开 1.3 公里大圩,这幢小楼当在被淹之列。

楼下简简单单,几间屋子已被腾空,准备行洪。

顺水泥楼梯上楼便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楼房间地面铺的是塑料地板革,质量和样式不比我北京

家里的差。堂屋和偏房卧室布置得好不热闹！

从里往外看：吴国栋的卧室内显赫地挂着一幅请人写的字：“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的大字下面还有许多诠释的小字：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这幅字显然是主人的座右铭，以说明和警策今天的来之不易。

堂屋里最热闹。

又有一幅字，与卧室内同出一人之手笔，大书“忍”字。诠释文字写道：

“忍字头上一把刀遇事不忍祸先招但能忍得一时气然后方知忍字高”。

这幅字显然是主人的处世哲学。

堂屋正面贴着一幅“中堂”年画：“三堂菩萨图”。

从未见过的“三堂菩萨图”。

好生奇怪的“三堂菩萨图”。

上尊观世音菩萨。《法华经》中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中间是关羽关帝爷。这关帝爷美髯，颜若重枣，一脸的侠义和正气。当初关帝爷死在吕蒙刀下时，没想到明万历四十二年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无镇天尊圣帝君”，清顺治九年又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当然有驱魔镇邪之功用。

第三层是满脸一团和气的“财神爷”。

“三堂菩萨图”左右有联：

上联云：神力永扶家道盛

下联云：佛光普照子孙贤

左壁还有一条横幅：“文昌比解”。

“文昌”乃文昌君，是主宰功名和禄位的神。“比解”是个很奇怪的词组。“比”大概有“为”、“替”之意。主人解释说是“逢凶化吉”。

诸神都请到了，虽然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但都按主人的意思，各司其职，主题鲜明：

保佑平安

驱魔镇邪

和气发财

逢凶化吉

门上还少不得现代春联一幅：

华夏有天皆丽日

神州处处有春光

更有趣的是，二楼晒台烟囱旁还供着个黑熏熏的神龛，额书“张公土地之神”。神龛约半米高，龛内一层灰烬。

晒台上端坐一老者，精神矍铄，问及高寿，曰：“八十有五”。吴国栋说：“这是我岳父”。

何谓“张公”？

老人说，张公名张德林，是南阳开荒的农民。汉光武帝刘秀败走南阳，有人追杀，张公把刘秀藏到水沟里。刘秀得了天下做了皇帝后，封张德林为“土地神”，并称要为张公盖一座宫殿，命他拉弓射箭，箭射多高，宫殿就盖多高。张公没有住高大宫殿的福气，一拉弓就断了（注：我怀疑弓的质量腐朽乃刘秀有意而为之），所以只封得个“小土地”。只是个承受不起“大干部”（注：引老人原话）磕头的小土地，诸神谁都能拘使的小土地，战战兢兢而来战战兢兢而去的小土地，只能承受老百姓磕头的小土地。

此说不可考。

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对这么一个窝窝囊囊毫无回天之力

的土地爷寄予了那么大的希望：好一个“即器安天下”！好一个“鼎鬯定乾坤”！神龛两边的对联一口气拜了二十个日月！

也可能是土地神主管一方土地，与百姓贴近亲切、深察民间疾苦？也可能是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所以有什以话偏要来找他诉说？这时候，是一个人愿意听他们诉说，管用不管用，他们都会滔滔不绝地诉说。

此时的土地爷，一个拄着拐杖诚惶诚恐农民打扮的白胡子小老头，也已是朝不保夕，几个小时之后，新民滩诸神就要换拨儿了。1.3 公里一炸开，龙王爷便要取而代之。

吴国栋家里，环绕四壁，各方的神仙一勺烩，都供奉和磕拜到了，好话该说的都说了，每天的香火该烧的都烧了，然而，终不免灭顶之灾！

诸神都不灵了！

这是农民脆弱的生存状态生动写照？

当初我曾去浙江温州采访，那里富裕了的农民，无论是腰缠万贯还是玉盘珍馐，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花几万十几万，买一个做城里人的资格；便会花几十万，买一个清静安宁的日子。温州飞云江大桥进行社会集资时，有一个农民说，他必须给他一个许诺或者保证，他和他的子孙后代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靠自己的努力赚钱而不为骚扰。

行蓄洪区的吴国栋们怎样才能彻底改变这种朝不保夕、居无定所的生存状态呢？

反抗没用。

在淮河的所有分洪行动中，新民滩 1.3 公里的反抗是最激烈的。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地区成为江苏省最敏感的地区，牵动着各级政府官员的神经。

我们采写了二十六日新民滩 1.3 公里南圩爆破的消息返回南京，高邮市的电话就追到了省委宣传部。

二十八日一点三十分,电话铃急促的响声把中国青年报记者站站长从被窝里拽起来。

“我是省防汛总指挥部宣传组。新民滩 1.3 公里的稿子,我们建议不要发表!”对方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说。

“为什么?省委副书记曹克明同志和高邮市都分别开了新闻发布会,而且还组织了中央和地方的记者观看了整个爆破经过……”

“我只负责传达上面不要发稿的指示。”对方冷冷地说。

“您贵姓?”

“……”对方不说。

“您姓什么?”戴追问。

“……”对方仍然沉默。

“您叫什么名字?”紧追不放。

对方吃不住劲了,说:“请你稍等,省委宣传部王部长跟你讲话。”

原来,按计划二十六日下午炸开南圩后,二十七日炸开北圩。农民拚死涌上北圩,军队为了避免直接冲突,奉命撤出现场。二十七日炸开北圩的计划流产!

一直到省委宣传部长通报情况时,北圩还在僵持!

反抗没用。

高邮市委宣传部长在第二天换了腔调给我讲新民滩该炸的理由时,我曾担忧护圩的数千农民。

他很轻松自信地说:“这个我们都想到了。只要武警和警察一上去,农民就会下来。”

二十八日,终于炸开了北圩。

“新民滩 1.3 公里”这个用了二十多年的专用名词,今天终于成为了历史,终于成为了一场梦。

治理淮河,日前确实找不到根本的办法,原因何在?我们知

道祈祷和抗拒一样没有用处,但还是让我们为命运而祈祷吧!

第三部 治水:一部难念的经

运河悖论

中国的治水,从来都在“堵”和“疏”之间兜圈子。

辛未水患,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是涝灾。淮河洪水和降雨总量并没有超过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至三十一日降雨总量九百八十一亿立方米,洪水总量六百一十三亿立方米;而辛未年六月十日至七月十一日降雨总量为八百一十七亿立方米,洪水总量五百七十亿立方米。分别少了一百六十四亿和四十三亿!可是水位却超过了一九五四年。太湖情况类似。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洪水疏流不畅。

我想先说的是,这一现象所包含的信息量之大,足以使我们的思维空间,纵可溯源到人类文明的初始状态,横可涉及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

中国的治水观念,没有比“大禹治水”搞得更混乱不堪的了!

走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迎面一幅高数米、长数丈的巨幅壁画:《大禹治水图》。江河之水咆哮而下,大禹像个水利工程师,手执耒,指挥水工。其依据,大概是如右叙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耨,以为民先。股无毛,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王蠹》)。”

黄河岸边,今天亦有禹王手执耒而眺望黄河水的巨型雕塑。

平原水系中,到处都有禹治水的痕迹和传说,到处都有以禹

命名的地名、村名，到处都可以见到纪念这位“治水英雄”的庙宇。安徽凤台县的峡山石，相传是被禹挥斧劈开的。

在治水原则和方法上，禹因为采取了疏导的办法而使天下归心，从而避免了其父鲧的悲剧性结果。

夏禹首先是一个实现了中华民族一统天下的大政治家，一个在统治方法上比其父远远高明的大政治家。

治水完全是因为政治的需要。

尧时，洪水“泛滥于中国”，水系混乱，中土割裂，各部落自成体系，占据一方，没有律度，纲纪不张，禹父鲧“息壤以堙洪水”，九年无绩。而禹“治水”，“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宝居九澳，合通四海。（《国语·周语下》）”《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都是一些治国的原则和方法。最重要的是治水以后形成了“九州”这一政区制度，并把天子与诸侯的关系用贡赋维系固定起来。

这是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任何政治家都没有完成的伟大业绩。以至功高盖主，“禹逼舜”，并取而代之。

分析所有的史料，禹之所以数千年来人民都不会忘记他，拥戴他，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一是因为他治水，给人民确实带来了好处；二是因为他身体力行，“股无毛，胫不生毛”，平定天下，凝聚了中华民族；三是他治理国家“悬钟、鼓、磬、铎、置鼗”，听“五音”而治天下，每当此时“一饷而十起，一沐而三提发，以劳天下之民”。

治水如治国，夏禹疏导和安抚有办法，成为后代帝王和政治家效法的楷模。

遍查中国历史，但凡有进取心有作为的大政治家都重视水

利,都直接参与治水。

汉武帝时,公元前一三二年五月,黄河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南侵“东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淹及十六郡,泛滥二十三年,堵而无功。公元前一零九年,汉武帝亲临决口祭祀,沉白马玉璧到河中,并督令堵复。他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亲自背柴参加施工。堵复后,汉武帝在决口处筑宣房宫,他站堤坝之上,临河风而作颂歌:

河汤汤兮激湍缓,
北渡迂兮浚流难,
塞长茭兮沉美玉,
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捷石灾,
宣房塞兮前福来。

翻译成今文是这样的:

黄河激湍呵波涛翻滚,
北沟迂远呵不易行舟。
长茭堵塞呵沉美玉祭河,
河伯答应了呵薪柴又缺。
缺薪柴呵完全是卫人的过失,
柴草都烧光了呵何以御水患?
又用竹捷堵呵又用巨石塞,
宣房堵塞成功呵前福咸来。
好一个意气风发的皇帝!
为什么瓠子决二十三年才堵住呢?

司马迁愤怒地揭露说:“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食邑

郿。

郿居河(黄河)北,河决而南则无水灾,邑收多。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为应天。”从此,“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可这决口不堵,十六郡富庶之地长此以往,国将不宁呀!

满腹惆怅的汉武帝来到决口,望滔滔南下的洪水,“悼功之不成”,慷慨悲歌:

归归川兮神哉沛,
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
久不反兮水维缓。”

瓠子堵,“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天下“用事者争言水利”。

梁、楚之地,多在江淮。

宋代以江淮漕运为国脉所系。宋太祖就曾向送他宝带的人说:“朕有三条宝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极言对河道的重视。

清时康熙、乾隆都是重视治水的皇帝。康熙多次诏谕淮河方案,起用人材。乾隆对山川地理素有兴趣,曾命人勘查河川源头,并亲自动手撰写过《热河考》、《滦源考》、《济水考》、《淮源记》。

历代皇帝,除大禹外,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时间最长,当属隋炀帝。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从北京到杭州,经京、津、冀、鲁、苏、浙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五大水系，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乃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可这两个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荣耀不已的伟大建筑，却产生在两个不怎么让人喜欢抑或让人憎恶的皇帝手里。一个是残暴的秦始皇，一个是荒淫的隋炀帝。

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一大悖论。残暴的秦始皇、荒淫的隋炀帝创造了两部伟大历史作品。为了这两部作品，他们横征暴敛，动员数百万青壮，凿石挖土不止；他们汇集了最优秀的堪称世界一流的人材队伍来指挥施工，他们把中华民族的智慧、才华和创造力凝固在这些伟大的建筑上，使这些智慧、才华和创造力发扬光大，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那些天才的想法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他们让许多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迫使许多老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最终把他们的王朝送进坟墓，并在坟墓上建立起新的性质没有任何改变的新王朝。

然而，新的统治者会去焚毁阿房宫，可以掠尽金银财宝，把旧皇帝的老婆变成新皇帝的老婆，但是，新的统治者不会去毁掉长城和运河！

多么天才的想法！

跨了一两千公里，去把长江的水，去把世界第三大河、中国第一大河的水，奇迹般地由南方引到北方来。

隋炀帝完成了这一奇迹。

这一奇迹让后代万世之民不胜其利！

当自己天才的想法成为现实时，隋炀帝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急于想去欣赏自己的伟大作品。他的心情可能像一个作家刚刚完成一部被他固执地认定为不朽之作的小说，像一个诗人刚刚完成一部史诗而去田野里赤身裸体地狂奔；可能像贝多芬刚刚完成了《英雄交响曲》便立即把它送到音乐厅，去接受欢呼和鲜花；或者可能像一个焦急地等候在产房外的父亲，在心底里渴

望着谛听婴儿那面世后的一声嚎哭,冲进去把他(或者她)举高,在阳光下寻找自己心灵和肉体的痕迹……然而,他不是普通艺术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是皇帝!他是天子!他当然应该以他的方式、每一个中国皇帝都应该有的方式去欣赏自己伟大的艺术品!河水沿着宽阔的人工河道,数千里南北合流,畅行无阻!通济渠(洛阳至淮河)开通后,隋炀帝便巡游江都,龙舟相接,逶迤二百余里,彩女拖纤,锦帆蔽日,运河沿岸栽插柳枝,五百里内各州县都要进献山珍海味,劳民伤财,民怨鼎沸。

白居易在他的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地唱到:

“二百年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古人,评价隋炀帝和大运河,心情也是矛盾的。

唐朝诗人兼政治家皮日休曾说: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的功业和灭亡,为唐朝成为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运河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水利本身。

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惋惜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

把隋炀帝比作了大禹!

人道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谁都没错。

隋代修河亡国,成为历代统治者和政治家的“前车之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如果按照现代观念搞一个公民投票,在当时的国家财力和物力的情况下,京杭大运河的提案十有八九会被否决。那么浩大一个工程,即使在当今社会都完全有可能被否决!

这是个悖论。

这个悖论就这样抛给了未来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和政

治家！

治水，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远远超出了治水本身。

水利部摇摆舞

“谈治水，当然要找水利部；水利部在跳着摇摆舞。”我去追根溯源的时候，一位知情人唯妙唯肖地说。

这摇摆舞是怎么跳的呢？

就拿淮河流域说吧。

毛泽东一九五零年看到安徽淮洪泛滥的电报上说，蛇与人争树，人攀树而得救，却因蛇咬而致死，潸然泪下，奋笔写道：“一定要修好淮河。”

在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沉重压力下，大兴淮河整治工程。建成大中型水库一百八十三座，其中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三十六座，总控制面积二点五八万平方公里，共有防洪库容一百一十亿立方米，总库容一百八十六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一千六百四十万亩。先后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苏北灌溉总渠、淮沐新河，以解决出海通道；新挖了茨淮新河、新汴河、濉潼河、东鱼河等一批骨干排水河道，以改善平原地区的排涝条件；加固了淮北大堤以提高淮河防洪标准。

工程之浩大，黄河夺淮八百年来所未有！

解放初期治淮的丰功伟绩，沿淮的老百姓至今还在传颂。

治理之后，淮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情况得到改善，加上一九五四年后，基本上风调雨顺，渐渐地给人一个错觉，淮河治好了。去年是治淮四十年，可以说是举国同庆。我去灾区采访，到处可以看到大庆后的痕迹：锦旗、印着红字的茶怀、热情洋溢的演说和文章，不一而足。

歌舞升平，深深地把忧患给淹没了。

五十年代初治淮后,未来二、三十年基本上是吃老本,走下坡路。

看看治淮机构的沿革就很能说明问题。

解放前,蒋介石曾兼任过直接隶属国民政府的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由于战乱,国民党时期毫无建树。一九三八年,以水代兵,决黄河花园口,反而加重了黄淮地区的灾难。

解放后,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议》,“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成立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副主任是皖、豫、苏、鲁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吴芝圃、刘宠交、惠浴宇。

一九五三年,淮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

淮委享有相当高的规格和权威。

一九五五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淮委主任后,淮委权威每况愈下。各省认为,曾希圣任淮委主任后,把淮委办成了安徽的淮委。尤其是一九五八年开始大办群众水利,各省边界矛盾激化,安徽的一些水利工程明显不利于上下游地区,周边各省群起而攻之,直至一九五八年七月撤销治淮委员会。

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经国务院批准,在治淮规划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水电部治淮(没有委员的)委员会。

这个局级淮委实际上至今都无力节制各方诸侯,以达到规划治水之目的。

要权无权、要钱无钱,要级别无级别,夹在各省中间受窝囊气。

这之后又有由淮委变治淮领导小组、治淮领导小组变淮委两次摇摆,算是确定了眼下的治淮格局。

治淮三十多年小摇摆误事。

水利部三十多年大摇摆也误事。

这方面,水利部刘家父子、叔侄都有一肚子故事。

天天早上八点准时到、十一点半准时走的刘德润老人,今年已经八十五岁,声音洪亮,走路蹬蹬的。

刘家是水利世家。他的弟弟和儿子都学水利,都在水利部工作。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 410 房间是他个人的办公室,也是他呼吸水利书籍芳香的根据地。

刘德润是中国水利界的老前辈。有着非凡的经历。

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九三四年五月考上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学习水利。一九三七年回国,任西北联大水利系主任。当时的西南联大水利系和西北联大水利系,都是我国最早的水利系。

解放前夕,老人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治下领导着黄河调查处,在他的带领下,处里几十个人都没去台湾,解放后进入水利部参加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近十年来,他参加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三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可谓德高望重。

他讲话时,翘着二郎腿的动作里浸透着那种老知识分子的清高。

唯一能让老人踏实的是,他一辈子都在执着地爱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那天,他正在归国途中。一条法国船载着他在地中海南下。他在广播知道了日本人大举入侵华北,他心急如焚,嫌这条法国船开的太慢,他恨不能早一天回去报效祖国。他有美国伊阿华州立大学(他留学时的母校)的免试推荐留学的荣誉,但是他从不轻易推荐,即使推荐,都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第二、对外国要不卑不亢;第三、学成回国。并固执地说,要是做不到这三条,他就不推荐。

虽然老人深知中国条件不理想,干事很不容易。

今年六月,老人脑血栓住院,已被医生判了“死刑”,说即使

度过这一关,也别想再下地了。可老人硬是挺了过来。病还没好,就急匆匆赶回国家防总,每天参加防汛例会。

江淮雨停后,黑龙江和吉林又发大水,吉林小丰满水库吃紧。那天防总在研究小丰满水库泄洪量时,在“小丰满水库不能出事”的压力下,吉林省和水利部在是否把洪水流量从每秒三千立方米提高到每秒四千立方米时犹豫了。这笔帐,在座的所有的水利和防洪专家都很清楚,增加一千流量,将意味着多淹吉林十五万亩耕地,而且还将严重威胁哈尔滨。但是上面有死命令……会场沉默了。刘德润在一旁憋不住了。他深知在场的决策人物和吉林省的首脑完全有可能迫于压力,打足小丰满水库的安全系数而牺牲十五万亩地,甚至哈尔滨!

老人洪亮的声音在三楼会议室震荡:“加大泄量,不只是吉林省多淹十五万亩的问题,还有黑龙江好几百万亩!再说哈尔滨市,要接受三股来水,嫩江,松花江,拉林河,松花江一旦多来水,你们哈尔滨还要不要!”

老人像是一尊守护神,一番话,让那些心里揣着私心的官员胆颤心惊。

一番话,救了小丰满水库下游几百万亩耕地和哈尔滨市!

今天说起来都轻松,可当时的紧张气氛,可谓是“谈笑间灰飞烟灭”!

请他讲讲水利部的故事,老人翘着二郎腿,冲我俏皮又神秘地眨眨眼,问我:“你去过对面水利部机关大楼没有?”

水利部六层大灰楼,以往门可罗雀,如今大水让它成了大明星。

进大楼,里面不像个正经的国务院部机关,乱七八糟地挂着各种与水利部毫不相干的牌子。

二楼稍微利索点儿,一溜都是部长和总工程师办公室,等等。除了二层以外的各层楼,五花八门的单位都在里面塞着,箱

子柜子挤满了楼道,把大楼都挤变了形。楼道内本来就不怎么亮,一堆一挤,大家都得“摸着石头过河”。

与治淮摇摆舞不同的是,水利部几分几合,皆由水、电之争。

本是两个庙敬水、电两个菩萨,可这两个菩萨总往块儿凑。既是冤家,又是亲家。发电离不开水,可水、电又想不到一块去。本来各大水库普遍缺水,来一次水不容易。汛期一到就可劲儿地把水位往高里憋,保持高水平,满负荷发电。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这防洪的在一旁着了急,你要是不开闸把水放到一定量,大坝将承受不起未来洪峰,赶快开闸吧!等洪峰一到,两家又拧着想。发电厂说,不了,洪峰来了,大坝有问题了,必须加大泄洪量了!这时水利部门可不干,他们还要考虑下游防洪设施和淹没面积,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既然是冤家又离不开,干脆就合一块。

为了给第一次水利、电力合并提供依据,刘德润等人给周恩来总理拉了个账单,分析了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小丰满水库的洪水份额占哈尔滨洪水份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由于电力部门不严格遵守限制水位,给下游沿江各地的农田和城市形成了很大威胁。

一九五八年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

一九七九年分开;

一九八二年又合;

一九八六年再分开。

总的来看,合的时候比分的时候多。

其实无论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的人都很清楚,两部合并,实际上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好几十年。

刘氏兄弟都参加了“分与合”的讨论。

刘德润胞弟刘德滋原是水利部计划司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初在兄长的影响下,投靠到哥哥门下,读西北联大水利系。

因为他管计划,所以对原来那套合的体制和矛盾非常熟悉。

国家计委每年下达计划,水利和电力虽在一部,却分属两套系统。电力属工业口,水利属农业口,水电部各司都有两套系统,管电管水各管一摊,亲兄弟却是两种待遇,农口资金少,水利待遇明显低于电力。两个任务,两个目标,部长也分管电的部长和管水的部长,因此就有了“水电之争”。电力里面由于投资比例关系,水电和火电死掐,于是又有了“水火之争”。

“水电之争”。

“水火之争”。

都是自己的亲儿子,不知道如何是好。

亲兄弟互不相让,争得红眉毛绿眼睛。一时风云突变,刀兵相见。

刘德润老人回忆了一段“水电之争”的有趣经历。

一九五九年汛期,因官厅水库的放不放水问题,管发电的生产管理司和水利管理司在水利副司长兼总工程师刘德润的办公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水管司:官厅水位应该适当降低些,要准备防大汛。

生管司:不行。官厅的水来之不易,放了以后,拿哪儿的水蓄?

水管司: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晚和第二天,官厅水库上游要普降三百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

生管司:这个预报是否确切?

水管司:官厅最大库容二十二点七亿,现已有九亿,这场洪水下来,至少水库要达到三、四十亿水!

生产司仍然坚持己见。

会议从下午一点开到五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刘德润不得不宣布散会。

最后的结果是水管司屈服生管司,作出了一个准备“玩命”

的三条决定：

一、今晚不睡觉；

二、及时掌握水情；

三、通知官厅下游沿岸作好防特大洪水的准备。

结果一场虚惊，官厅上游只降了三十毫米的雨！

“幸好只下了三十毫米，要不然下游老百姓就要遭殃了！”刘德润说。

合在一块不顺，干脆分开，省得抬头不见低头见，那么别扭。

分开矛盾更突出。呼声一高，又合吧！

合了又重复老毛病。再分吧！

“水利部跳摆摇摆”，真是绝妙的描述。

天天自己都不安宁，怎么顾得上让天下人安宁呢？

俗话说，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这句俗话还可改一下：神仙打仗，国家遭殃！

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

治水运动，运动治水

五十年代初期，在淮河流域有效地动员了广大群众，国家集中财力、物力成功地对淮河进行了整治，这之后又在黄河流域、海河流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河道治理，这给人们一个启示，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完全有可能在“兴修水利”这一利益目标下凝聚和动员起来，与国家工业化相匹配，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水利建设的成本。

一八五三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先驱论坛报》上著文说，“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农业的基础”。毛泽东也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马克思进一步说：“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

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水利的管理和建设。这种干预,再加上分散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形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联合的困难和不可能,然而,他并没有深入了解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下的区域利益分割给社会动员和联合行动带来的困难,以至于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

解放初期中国农民的那股子热情,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一九五八年把这一机会掀上了高潮。

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成了大兴水利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外部兴奋剂。“领导大胆拍板,工程师小心论证”,是风靡当时的现象。谁也不想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也不想当“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绊脚石。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原副总工程师何孝倬先生回忆说,那时某领导只要手在空中一划,就可以在山与山之间领导划的位置上建一个大水坝。何先生那时去某县指导水利,亲眼看到一位只有十七、八岁,脑后边扎着两只小揪揪的小姑娘,非常自信地充当着该县两座大型水库的技术负责。“她不过才刚刚上完县水利培训班呀”!何先生万分感慨地说:“那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还能说什么呢!谁还敢说什么呢!处处都在反右倾的技术权威。”水利成了彻头彻尾的群众运动。并形成了“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这一方针主宰了中国水利几十年。

毛泽东提倡“蓄(以蓄为主)、小(以小型为主)、群(群众自办为主)”,进而批判“排(以排为主)、大(以大型为主)、国(以国家办为主)”。

在排水能力非常不足的情况下,“以蓄为主”带来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

“盐碱千里，一片白茫茫，像是下过了一场小雪！”

何先生描述说，他当时负责海河流域规划设计，明明知道排泄不畅的情况下搞“以蓄为主”后果的严重性，而当时海河流域的盐碱化已经开始蔓延。既要不犯政治错误，又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进行规划设计，只好大着胆子作“蓄、小、群”的表面文章，把“蓄、小、群”当橡皮图章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避免和挽回损失。

其实，国家和水利水电部的许多领导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周恩来就非常忧虑地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飯可能，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但是“最高指示”不能动吗！

怎么办？

周恩来在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全面管理”的方针。

但是，对于不了解背景的局外人，很难体会到这其中的分量和高超的政治艺术。

苦衷不能明着说。六十年代正是毛泽东神化空前的时候。乍一看一九六四年的方针不过就是“蓄、小、群”的延续。怎么会是针对“蓄、小、群”？

毛泽东不能得罪，一些治水观念又要调整，周恩来夹在中间，充分施展了一个政治家的卓越智慧，在新方针里拓展了外延，模糊了概念。

“老水利”都心领神会。

“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全面管理”，简而言之，就叫做“大小全管”。

这真是一个高级文字游戏。

“大小全管”彻底与偏执的“蓄、小、群”分道扬镳了。

当然，哪边都有聪明人。

“文革”期间，造反派斗争水电部长钱正英，主要的“罪状”就是钱正英反对毛主席“蓄、小、群”的水利方针。

“毛泽东的指示为什么不执行？”

台下许多善良的人都为钱正英捏着一把汗。

“我在哪儿讲了反对‘蓄、小、群’？”

“成都会议。”

“我没参加。”

钱正英坚决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她心里非常清楚，一旦承认，就会牵累总理。

一九五八年“大办水利，大炼钢铁”，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出够了风头。

安徽搞“河网化”。

河南、河北搞“一块天对一块地（全面蓄积天水）”。

水电部“水利运动办公室”每天都能统计到这几个省挖土方的天文数字。这些天文数字天天见报。

各省的土方量，每天都是比着往上翻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年水利工程共做土石方工程八百亿立方米，仅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占了五百八十亿立方米！

“水利运动办公室”机构庞大，由工程管理局全部和工务司的一部分组成，一位办公厅副主任任办公室主任，刘德润老人任办公室副主任。

刘德润先生说，“我们的工作程序，就是每天打电话，向各省询问上了多少工程、多少人，挖了多少土方。你可没见到那阵势。搞运动跟防汛一样，许多数字明知里面浮夸有诈，但是根本没有精力去核实。”

如今全国有八万六千多个水库，大部分都是“大跃进”时修

的。可是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病险库。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司马寿龙愤愤地告诉我：

“那个时候的屎，今天还擦不干净！”

怎么能擦干净呢？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建了一百一十多座大水库，到一九六六年就垮了一半（包括自然垮坝和人工扒掉的险坝）。

“大跃进”时的目标是相当宏伟和振奋人心的。“在三年内要求多数地区达到如下标准：在长江、珠江和松花江等干流的中下游地区，抗御五十年到一百年一遇的洪水，其中长江的汉水、珠江的东江、松花江的第二松花江等支流，要能抗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在淮河、海河和辽河流域的主要地区，能抗御百年一遇到三百年一遇的洪水；在黄河下游，能抗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在为害严重的中小河流地区，能抗御二十年一遇到五十年一遇的洪水。”

而今不仅没达到目标，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据一九七三年的统计，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有一万零二百八十六座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其中工程没达到设计标准，工程质量不好、不能安全度汛的水库四千零五十一座，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有的省隐患水库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省几十座大、中型水库没有一座能正常运行，其中近二分之一即使空库迎汛也不安全。

冀、鲁、豫大量引黄灌溉，盐碱化的结果是“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

河南省著名的“共产主义渠”，长二百多公里，由黄河老观嘴至卫河，进入河北，因淤积和盐碱化而荒废。

黄河干流上修建的花园口、位山、洛口、王旺庄四座枢纽，被迫扒掉两座，停建两座，浪费二亿元。

“伟大的引洮工程”（甘肃省东梁县）也因不切实际而一共浪费资金一点六亿元。设计一百三十公里长的浙江义乌“东兰共

产主义大渠”，成千上万人折腾了半年，不得不下马。

.....

水利部“水利运动办公室”一九六一年撤销。

一九五八年的教训是深刻的。

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建设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总理说：“我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能转过来，水利和林业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

他还说，水火无情，治水稍一疏忽大意，稍有怠慢，或者出现赤地千里，或者出现汪洋一片，都将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

刘德润老人留学美国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获得硕士学位，破了学院四年硕士学位制的规矩，院方授予了他一把金钥匙。

文革期间，这把金钥匙被造反派拿走了。

金钥匙被搞丢了！

老人说到这里，眼睛茫然在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那把聪明智慧的金钥匙还能找回来吗？

临淮岗公案

辛未水患告诉我们，淮河没有治好，太湖没有治好，中国的江河没有治好。

因此，从今冬明春开始后的五年时间里，淮河和太湖将受到特殊的待遇。

仿佛淮河、太湖的前途出现了一缕曙光。

奇怪的是，大家却抱着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

治水,说来就是一本难念的经。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国务院治理淮河、太湖会议。京西宾馆新楼四层会议室,轮到河南代表团发言时,会场气氛立即变得肃杀而严峻。

河南省代表团鱼贯而入,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副省长宋照肃、省计委主任姚如学、省计委副主任马连兴、水利厅长马德全、水利厅总工程师司马寿龙。

阵容庞大而整齐。

与别的省不同的是,各省到会的都是副省长,而河南省省长李长春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这位在一年前刚刚从辽宁省调到河南与程维高换防的省长,白净脸皮,神情严肃。

今天,河南省将重提三十多年前的旧话,或者说将重申三十多来不断申诉的重大话题:安徽淮河干流“临淮岗工程”。

这项工程在会议上已摆进了总体设计,将决定工程上游一百二十万人(安徽七十万,河南五十万人)的命运。

这是一项淮河中游的特大洪水控制工程,“其主要任务是在淮河中游发生超一九五四年洪水(约五十年一遇)时,调蓄淮(河)干(流)上中游洪水,配合淮北大堤及下游怀洪新河共同使淮北大堤保护防洪标准从目前的五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该工程位于淮河中游洪水汇集点正阳关以上二十八公里、安徽霍邱县临淮岗村附近,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库容九十三亿立方米,淹没地区的人口一百二十万,也就是说,比三峡移民还多!而且,河南省相关部分将增加洪水淹没时间十至十五天,百年一遇洪水时将增加淹没面积四十八平方公里、五万亩(此说依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吴本瑞先生介绍的情况)。

这项工程是一九五八年水利运动时期安徽省“河网化目标”的遗产。“大兴水利”的水利运动,除了众所周知的后果外,由于各自为阵、以邻为壑的治水方式,省际边界矛盾空前紧张,几十

年来,留下无穷的争端和后患。临淮岗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当时,兼任淮委主任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断然拒绝河南的抗议和激烈反对,开工兴建“临淮岗工程”。

为此,河南省告了安徽的御状!并与各省联合指责淮委“实际上成了曾希圣的淮委,成了安徽的淮委”!

一九五九年五月,毛泽东听说豫、皖两省对兴建临淮岗和对工程蓄水位意见相左的情况后,指示水利部“派懂技术、有分析头脑”的人到安徽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向他汇报。

由于河南省的坚决反对,由于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一九六二年临淮岗工程完成了一个雏形后,被迫停建至今。

在这种背景下,在辛未洪涝灾害的打击下,今年治淮,重提“临淮岗”,当然又遭到河南人的再次反对。

河南人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临淮岗水利枢纽实际上是一个平原水库,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训看,得不偿失;二、临淮岗水利枢纽是豫皖两省边界工程,应该充分考虑两省的意见和两省的困难、利益。

河南人对淮委、水利部临淮岗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许多重大质疑。比如最大洪水量的计算问题,技术经济论证,淹没区一百二十万人的安置办法,临淮岗水位及汛期处理,等等。

这些问题过于专业化,局外人很难弄清其中奥妙。每一个问题究竟与修不修临淮岗有什么关系?里面有多少是公正、客观、科学的意见,有多少是地方偏见,地方利益?但是,可以认定,每一个问题都十分要害。

古人称,中国有“四渎”,黄河、长江、淮河、济水。

从流域工程功能和动机看,淮河之临淮岗与长江之三峡有相似之处,它们的主要设计功能都是为了防洪。当然,三峡涉及的综合性指标更加宏大,更加庞杂,更加深远。

河南人首先是从可行性报告、设计任务书最敏感最薄弱的

软腹部开刀的。

一百二十多年来，淮河公认有三次最大的洪水：一八六六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五四年。

哪次洪水最大？这将决定着淮河最终的防洪标准和修建临淮岗的意义所在。所以，河南省要求首先要先审查“设计洪水”。

这里就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三年洪水量规模排序。

《报告》排序：

一八六六年最大

一九三一年次之

一九五四年最小

那么《报告》的结论是，修建临淮岗，提高淮河中下游的防洪标准势在必行。这种结论是在修改了相关重要的水文资料、而修改这些基础参数资料的理由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得出的。河南人的证据表明：

一八六六年，淮河受灾县五十七个，洪泽湖水位十五点九二米；

一九三一年，淮河受灾县八十六个，洪泽湖水位十六点二五米，正阳关三十天洪水量，一九五六年计算，二百四十八点七亿立方米，一九七零年计算三百亿立方米；

一九五四年，洪泽湖水位，一九五六年计算三百零六点八亿立方米，一九七零年计算三百一十五亿立方米。

洪水排序结论非常明显：

一九五四的最大

一九三一年次之

一八六六年最小

这将意味着一九五四年的洪水是一百二十多年来最大的洪水，而现在淮河防洪标准是根据一九五零年防四十年一遇洪水设计，按防一九五四年洪水加固提高的。河南人的进一步推论

是,现有防洪体系足以防范一九五四年洪水即百年一遇洪水,问题的根本在于中游河道堵塞、退堤清障,以保证洪水通畅。安徽先把自己屁股的屎擦干净再说。

洪水量的排序非常要害。

钱正英曾说:一八六六、一九三一年的洪水“如果超不过一九五四年,那么临淮岗就没有修的必要。”

两种排序,截然相反,一个是正金字塔,一个是倒金字塔。

孰是孰非?

其实,解决矛盾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把河南的质疑当作一个提案,交给一个权威机构,对设计洪水进行审定便知分晓。

然而,令我十分不解的是,在一些重要的治淮研究会上,都把干流设计洪水问题明确排除在外,不予讨论,也看不到令人信服的答复。

再者,与三峡论证明显不同的是,临淮岗论证,水利专家分歧很大,技术经济结论不够周延,决策人物显露出犹豫和不很自信的迹象。

临淮岗拦腰一断,在淮河中上游的交界处拦截了干流主要洪水,淹没豫、皖固始、淮滨、霍邱、颍上、阜南五县二百万耕地、一百二十万人口(淮委方面的数字是一百万),保护耕地一千万亩,两淮煤矿,津浦铁路,六百万人口。

淹一百二十万人口,保护六百万人口;淹二百万耕地,保护一千万耕地!天底下竟有如此荒唐的一笔账。不知道是昏了头,还是装孙子,拿一百二十万人和二百万亩耕地开玩笑!

淮河干流拦河作坝以至大面积淹没,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工程——浮山堰。

东晋之后,南北朝对峙大抵以淮河为界。公元五零零年,南朝豫州刺史裴叔夜降北魏,豫州首府寿阳(今安徽寿县)归魏,南朝屡次举兵,企图收复寿阳,都被打的大败。萧衍推翻南齐而建

梁朝后,又多次兴兵,也是出师不利。

收复寿阳成为梁武帝心中大病。

北魏降将王是窥破萧衍心事,想出了一条损招。他向萧衍转述了一则童谣:“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巨野泽”。

淮河有三个著名的峡口,依次为凤台的峡山口、怀远的荆山—涂山、嘉山的浮山。巨野泽在山东省。

王是的这则“童谣”分明是说,如果在浮山拦淮筑堰,引潼、沱二河之水,北可以直接灌到山东的巨野泽,地势低洼的寿阳更不在话下。

萧衍采纳了王是的建议,下令筑浮江堰。

浮山堰筑成后形成的水域面积约六千七百多平方公里,覆盖或淹没了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怀远、寿县、颍上、霍丘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总蓄水量达一百亿立方米以上。是临淮岗工程蓄百年一遇洪水量的二倍以上!

真是声势浩大,烟波淼淼。浮山堰拦淮之水,“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北魏寿阳皆在水中,军民惊恐,只得戍守城北的八公山。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从水利工程的角度看,浮山堰的截流技术、筑坝技术、引水分流技术、固堤防浪技术,堪称世界一流。而且如此规模和技术土石坝,也是当时世界绝无仅有的,完成了中国拦河筑堰的一个创举。

负责修浮山堰的官员祖暕,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的孙子,素有家学渊源。祖暕曾经察看过浮山堰址,断言“其功不可就”,然而在梁武帝的威逼下,他又不得不干,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尽最大努力想出了筑堰的办法,使大堰一度筑成。可是就在堰筑成的当年秋天,“淮水暴涨”,冲溃堰堤,洪水“奔流入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惨绝人寰!同

时代的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愤怒地说，筑浮山堰，“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矣”！

当然，筑临淮岗大坝拦淮与一千四百年前的浮山堰拦淮的动机有着本质的不同。

梁武帝拦淮是利用淮水攻伐，置生民于水火之中。

临淮岗拦淮则是淮河治理规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提高中下游地区的防洪标准。

问题在于“临淮岗不是好招”（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黄文宪语）。

岂止“不是好招”，可以是只顾中游利益的损招！旷古未闻的损招！

仍然是“堵”的思路。

仍然是平原区滞洪的思路。

仍然是一种对洪水出路毫无办法的思路。

我与许多水利专家、防洪专家讨论中国水利和大江大河防洪问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抓主要矛盾”。

长江的主要矛盾是长江堤防脆弱，洪水量大，防御标准太低，需要有效地控制上游来水。

黄河的主要矛盾是“淤”、“决”、“徙”。

淮河的主要矛盾是洪水没出路（太湖亦如此）。按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说法：“淮河的屁眼儿被堵住了。”

没有出路，就应该在解决出路上下功夫。振振有辞地说，“临淮岗淹没区百分之六十是行蓄洪区。”这是无能和不负责的说法。言下之意，这些地区本来就该淹！根本无视行蓄洪区农民生活没有出路、长期贫困这一悲惨的现实！

眼前事实，把我给弄糊涂了。

我们究竟是“鲧”的子孙，还是“禹”的子孙？

先哲言：“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当代治淮应该在“以民为本”、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抓住大思路解决大思路问题。

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潘季驯总结了前人经验教训,提出了著名的“筑堤障河(黄河),束水归槽;筑堰障淮,逼淮入黄。以清刷浊,沙随水去”的治水主张。“会河于淮,……合河、淮而同人于海”,既治黄河夺淮之病,又解决了淮河的洪水出路。但是筑洪泽湖高家堰,却淹了泗州城边的明祖陵,令皇帝大为恼怒。后启用杨一魁,在保陵、保运的指导思想下,采纳了“分黄导淮”之策。这两种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两代形成了洪泽湖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归束淮河洪水;逐渐建立了入江水道,以解决洪水出路。

——一九四年,南宋黄河夺淮后,治淮思想,归结起来是三条:保运河漕运,保明皇祖陵,导淮入江、海。国计民生、社稷江山、皇权威慑、根治水患,民生需要、统治需要、皇权需要、治水需要,那么复杂而奇怪地纠缠在一起。

“蓄”的思想产生较早,但是影响最大者当属潘季驯的“蓄清刷黄”。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蓄”不是滞蓄洪水的含意,而是“蓄”淮河清水,以成高势,逼入黄河水道,解决淤积和河水出路问题。总体态度是积极的。

一九四九年后,治淮“蓄泄兼筹”,上游大规模建造水库,中游大规模建造行蓄洪区和束水大堤,下游开苏北灌溉总渠、分淮入沂,堪称数千年治淮之壮举。然而,“蓄”、“泄”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兼筹”,治淮思想一直是“重蓄轻泄”占上风,蓄有过之,泄则不及!出路堪虞!于是便有了辛未年洪水滞滞不退,于是便有了辛未年水灾涝灾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于是便有了洪水数月之后,数十万灾民仍被涝水围困在庄台上大堤上惨不忍睹的现实!

而今的治水格局作了一些调整,叫做“蓄泄兼筹,以泄为

主”，仍然为历史留了个大尾巴。把洪水灌到上游行蓄洪区以保护中下游地区，终究不是好办法，当然是最节省的办法。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八日，河南省副省长宋照肃的发言咄咄逼人。

临淮岗工程将给河南带来无穷的后患。

“生产、生活、安全怎么办？”

“成群结队上访怎么办？”

“怎么消除诸多不安定因素？”

“我诚恳地希望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诚恳地希望水利部考虑我们的意见！”

“我诚恳希望淮委和部里决策慎之又慎！”

“我诚恳希望淮委和水利部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向中央汇报时非常慎重，决策时非常慎重！”

会场肃静。

大家的脸都是铁青的。

连续的“希望”、“诚恳”、“慎之又慎”，通的人喘不过气来。

会上，中国最大的水官杨振怀和淮河最大的水官袁国林碰一块了。

杨对袁说：“我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呵！都想的是淮河如何治，淮河的出路在哪里？”

袁对杨说：你现在焦虑没用。“你的治法是二零零零年的治法”。

杨与袁的对话，说明淮河的症结都在明处，谁都清楚，在现有的经济状况下，淮河没有出路。

袁国林也非常坦率地承认，河南省的“发言都抓住了关键”。可是，“淮河的情说不清”！

“关键的问题讲不清”！

河南人非常严厉地质问：讲不清为什么要决策？！

如今的“治水图”竟是这番情景。

各种利益关系,各种历史宿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科学治水,团结治水,复杂和奇怪的状态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防洪和治水早已不是单纯的水利问题了,已经牵涉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原来以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把某些社会关系都简化了,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人类面临生存威胁而共同对灾难作出反应,可以体现出高度的和谐和统一,可以把团结互助、体恤和怜悯、善的人类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不然,人的本能反应是自救,然后救人。如果双方利益同时都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拿起武器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战。在这种非常时期,你很难用一种恒定的道德观去衡量判断。人类每一个行为都能找到合理的依据。

第四部 水之战

里下河风云录

面临水患,没有永恒的道德,只有永恒的“战争”。

江苏人说,苏、锡、常是“金三角”,宁(南京)、镇(镇江)、扬(扬州)是“银三角”。

辛未水患,“金三角”和“银三角”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损失惨重。

我七月十三日赶到南京时,苏南灾情逐渐缓解,降雨带已经北移。

苏北里下河“锅底洼”——高邮、兴化、宝应三个县市一片汪洋，苦不堪言。

中稻被水泡得枯黄绝收；棉田里的棉花，矮矮地便挂了果，然后很勉强地绽出些根本无益的白色来。

里下河地区是苏北著名的粮仓。兴化市粮食产量最高年份，曾居全国第二，皮棉全国第七，粮食、棉花、农业总产值三个指标同时都在前十名的县（市），居全国第一。在江苏，兴化是农业第一县，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皮棉单产、提供国家商品粮、猪肉禽蛋淡水鱼都是全省第一。这次可被大水淹惨了！百分之五十的水稻绝收，百分之七十九的棉花淹死。专家估计说，三年都恢复不了元气。

大暴雨、特大暴雨从五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在里下河没命地下，早把“锅底洼”撑得满满的。兴化市水位由一点零一米猛涨到三点四六米，除老城那点高地外，全部淹进水中。

七十年代中期，曾有一批记者采写新中国水利建设二十五年成就，他们可能没料到九十年代的第二年的这场特大洪涝灾害，话说的太满，或者说大话连篇。他们也曾采访了淮河流域，也曾来到里下河地区，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五日发表了长篇通讯《驯水记》。关于兴化，记者写到：

“就在记者来这里采访的前几天，兴化全县范围内普降暴雨，两天时间降雨量达三百多毫米，圩外水位达一人多高，而圩内秧田却一片翠绿。当一些老年人看见强大的机电排灌设备把圩内积水迅速排到圩外时，一个个乐得哈哈大笑，他们指着天空说：现在，老天就是把天河的水全倒下来，我们还照样种庄稼夺丰收。”

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今天捧读起来，实在是令人感动和钦佩。

掩盖矛盾，掩盖问题，形势永远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是

那个时代宣传工具的主要功能。

我七月二十三日住进兴化宾馆时，齐腰的水刚抽完。宾馆大院里，到处可见一群群的鱼儿戏水。鱼不怕人，脚站在水里，都来叮你。

公路都不通，我们乘汽艇，南到兴化周庄镇，北到周奋乡察看灾情。有一个奇异景观让我们惊讶不已：雨已经停了一个礼拜，水位却不见下降，破圩的地方水天一色，没破圩的地方水面都高出地面。

里下河的水都在天上走！都是悬河！少则高出地面一米，多则高出地面三、四米！

里下河地区一则离海很近，二则河湖港汊，四通八达，水往哪儿不走？

可这水偏不走，逗乐似的在里下河转悠着。

兴化市水利局长刘文凤在他的卧室兼防汛指挥部办公室里给我拿了一摞卫星照片，其中一张由江苏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中心提供的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九日里下河水灾卫星图像帮我寻找到了答案。

兴化的洪水有两个出路，一是南下，一是东走。主要是东走，经盐城市的“四大港”（射阳港、新洋港、黄沙港、斗龙港）入东海。可是，盐城采取“上堵下泄”的办法，封死了兴化——盐城一百多公里边界，堵死了十几条河道，筑起了很高标准的圩堤。刘文凤说：“他们说要把河道整治好，改善泄洪能力。实际上是破坏水系”。

在卫星图像上可以看一个多么有趣的景观：沿着兴化市和盐城市弯弯曲曲的边界线，西边是兴化市，洪水滔滔，一片汪洋；东边是盐城市，一片绿洲，生机勃勃，好像没有水灾似的。

真是泾渭分明！让人感到滑稽！

兴化的洪水，到了边界便被堵回了头。

兴化的水位足比盐城高了一米多！

兴化洪水东望而兴叹。

国务院工作组来里下河视察，七月十六日从兴化去盐城。

通常去盐城，必须走邮（高邮）盐（城）柏油公路。兴化市早已算计好，带国务院工作组好好看看盐城的“堵水劣迹”，好好看看“泾渭分明”。

按规矩，上面来人，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都是在边界交接迎送。这次盐城人前一天晚上就赶到了兴化宾馆，与国务院的人见了面。

规矩破得好生蹊跷！

第二天一大早，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

兴化市委书记吕振林的车在前而带路，出兴化宾馆后沿着设计好的邮、盐公路走，可没走几里地，突然发现后面车队没跟上来！等一会，没见车队影儿。再等一会，还是不见影儿。他突然意识到他这辆带路车被后面的车队给甩了！

他被盐城人给耍了！

盐城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前一天晚上作了手脚。第二天上路，兴化人、盐城人自然是各怀鬼胎。

里下河的特点是水富余，“大旱大丰收，小旱小丰收”。因水而斗法，上游斗不过下游。下游圩堵，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次盐城人来了个“釜底抽薪”之计，手脚干净利落，成功地躲过了兴化人的陷阱，说服工作组的人没走几步远，就把吕振林的带路车抛弃了，让车队拐进一条砂石路，一条偏僻的小路。

这个车队在砂石路面多绕了五十公里到盐城。国务院的人懵里懵懂像一群羊被人牵着走。对于他们来说，看哪儿都一样，哪儿都是水灾，不明白这里面的风云变幻，花花肠子。

吕振林在车里气得大骂，又不得不自认倒霉。

我在周奋乡遇到了这个矮个、白面、精干的市委书记。我问

他当时的情况时,他手一甩,说:“别提了! 别提了!”

那窝囊事儿,让他不堪回首!

人家把他甩了,他还不肯转身就走,他还得掉头去追车队。在砂石路上追上车队,还要装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样子,跟着车队后屁股,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老吕呵,刚才去哪儿了啦,怎么没见着人呀?”

吕振林是兴化的首脑人物,在这块地界上当然十分显眼,消失了一会,就会引起客人或其他人的注意。

盐城人故意恶心他。

他当着客人又不能发作,只得“嗯——啊——”地打哈哈。只希望赶快结束这场闹剧。

洪涝之水东泄不通,那就南下吧!

南面是江都县,是当初隋炀帝巡幸的终点站。

然而南下也不通畅。

七月十一日,周庄镇祁西村的圩堤被洪水冲垮,邻近祁西的江都县吴堡乡七、八千亩耕地被淹。首当其冲的吴堡龙耳村认为周庄保圩不力,故意破圩放水,一下聚拢三、四百人冲到祁西村,卸走居民的门板,抢走七条渔船,用来堵口。双方后来啸聚数千人,准备更大规模械斗,被兴化市、江都县赶来的公安干警制止。

历史上,里下河地区淹怕了。

康熙时,为了保运河堤防,建造了“归海五坝”——南关坝、五里中坝、新坝、东逻坝、昭关坝。洪水来时,开启五坝,淹里下河地区的农田以保护运河安全。从此里下河灾难深重。嘉庆、道光年间,即一七九四年至一八五零年五十四年中,有二十八年、九十五坝次开归海坝,平均每两年有一年开坝,平均每一年开坝近两道。一八五零年至一九三八年,有十九年、三十九坝次开归海坝。开坝过水时的惨状,清人有《避水词》写到:“一夜飞

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牵船。田舍漂沉已可哀,中流往往见残骸。”

康熙三十九年(一七零零年)和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先后在洪泽湖大堤上修建了“仁、义、礼、智、信”滚水五石坝,以备洪水漫溢。

然则洪水漫溢,何“仁”之有?何“义”之有?何“礼”、“智”、“信”之有?

兴化北面的宝应县的境况更为窘迫。

在宝应县水利局局长唐金富的办公桌上扔着“特”等级的“明传电报”,是由扬州市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吴孟镛签发的。电报全文如下:

宝应防汛指:

省防指组织扬州、淮阴、盐城等三个市防指有关同志参加副业圩滞涝检查组,于15日14时前往宝应境内执行检查业务时,在林上宝应入口处,遭你县数十人乘船强阻,用空柴油桶报警,并用木棍等工具砸检查组小船,两块玻璃被砸,一人被打,致使检查组无法执行公务,性质是严重的。现特责成你部立即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并将查处情况迅速向市防指汇报。

扬州市防指

1991.7.15

唐金富并不忌讳此事。

他愤愤地将电报递来:“你们可以看!”

宝应从地图上看,北是淮安市,东是盐城市 and 建湖县,南是兴化市。有人说宝应平时“四面树敌”,洪水来了便是“四面楚歌”!现实是外排水根本出不去!

全县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只好拼命壅高圩堤,大晴天还要高度警惕防洪,把人折腾得精疲力竭。

就在此时,“淮安和盐城合着伙整宝应”,拉着检查组来凑热

闹。

省防指来宝应是“有的放矢”，宝应在执行省市两级政府保农业圩、开副业圩滞洪的命令时，采取了软磨硬抗的办法。开副业圩根本无法执行。一级压一级，到村支书这一级时，群众说：“支书哎，你靠边站，不要你负责”。检查组来了，开闸；检查走了，合闸。反正你检查组不能在这里住着守我们一辈子。

副业圩滞涝实际是相邻市县互相监督互相告密的。理由很简单，宝应多滞洪水，淮安苏北灌溉总渠以下六百平方公里洪水就可以走的更快些，建湖县和盐城市也可以减轻洪水压力。

为了寻找确凿的证据，盐城市和建湖县的领导带了七条船潜入宝应县的水泗乡偷拍滞涝情况。之后宝应又组织人马去水泗乡搞录像采访，准备收集情况反击建湖县。水泗乡群众以为建湖人又来了，顿时锣声、盆声、桶声响成一片，一会聚集了一、二千乡民。一、二百条船把来人团团包围，结果是一场误会。

里下河水利纠纷由来已久，积怨很深，原来，只要水利局长凑在一块，都是要面红耳赤，指着鼻子用最粗野的话骂大街的。这次检查副业圩滞涝，因为意见不合，就有某市领导骂省水利厅负责的工程师：

“你啃我的××！”

洪水来了，大家的形势都很严峻、大家都希望祸水赶快离境，随便往哪儿流，为此想方设法，费尽心机。

宝应有一肚子涝水，唐金富有一肚子苦水。

他给我们展开了宝应地图。

这真是一场战争！

淮安一九八五年以来将排水系的十三条河全部调头向南，直入市、县的界河——下引河，对宝应形成威胁。而且围垦靠近宝应的绿草荡和马家荡，缩小了蓄洪面积，截住了宝应洪水东排的出路。

你排我堵。

一九八六年冬天,宝应动员了六、七万民工,在与淮安和建湖的边界上修筑了一条长十公里、海拔五米高、顶宽四米的控制隔水大堤,把南下之水牢牢地堵在了北部边界上并逼往淮安、建湖。

淮安、建湖联名上告。

此事惊动了市、省、中央。

中纪委专门派调查组赴宝应处理,并要求宝应拆除大堤!

唐金富大声说:

“淮安、建湖说宝应挡住了排水出路,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我们只是顺着边界线筑大堤,完全符合‘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宝应向省、市领导申诉宝应日益恶化的排水条件,反诉淮安擅自改变排水方向,完全是他们损人利己、自我保护的做法。我防止南侵,并不阻你东排。他们是想用宝应的射阳湖作为他们家里的水缸!省里以清障为名,要求宝应在大堤上开五个口门、一百五十米宽排水。宝应被迫在当年开了。但是宝应不服。

“不服的理由是:

“第一,里下河没有排水出路,省里没有指明方向。宝应八十万人民要生存!宝应不是大水缸。

“第二,我们搞的隔堤工程,完全是按省里下河治理规划的原则‘高低分开’的自我保护工程,不存在挡人家排水出路的问题。水往低处流。你原来的水就东向。

“第三,淮安擅自排水调向,省里为什么不干涉?”

知情人说,宝应的老水利局长树敌太多,应该联合建湖攻淮安,既可以缓和宝应东部排水,又可以抗拒淮安南下之水。

淮安水利局的一位副局长原籍扬州,扬州水利局长指着他说:你不是我们扬州人!

这是宝应人的意见。

去盐城、建湖、淮安，还能听到完全相反的意见。

平时大家相安无事，洪水一来便是纷争四起，矛盾百出了。

兴化和盐城斗，和宝应斗；宝应和盐城斗，和建湖斗，和淮安斗；斗斗斗，互相没斗出个好结果，反而出路越斗越糟糕，环境越斗越恶劣；七斗八斗，连互相对话互相谅解的可能都斗没了，斗成了一锅粥！

里下河治水的原则是：上抽、中滞、下排。

这个原则大家未必执行，反而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取其利。

宝应县说里下河的治水原则是：上挡、中滞、下排。稍不注意就会被蒙了过去。“上抽”与“上挡”有着本质的区别。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好生奇怪，就那么点儿事，就在那么有限的空间里，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互相之间都打的不得开交。

句容县江宁县边界洪水的排泄之争，要不是镇江市长跑得快，江宁乡民差点把他的汽车扔进水库里去。

丹阳县行宫乡与金坛县登冠乡因金坛棺材坝堵水发生数千人的大规模械斗，镇江电台记者董晨鹏被金坛抓作人质，镇江、常州两市出动军警方平息事态。

兴化市周奋乡崔二村与时二村因倒圩泄洪发生争端，数百人大打出手，伤二十七人，重伤五人。

淮河中上游地区豫皖两省，亦是屡见不鲜。

旧帐未了，新怨又结。

何时不再结？何时能了结？

难了滁河糊涂帐

滁河洪水今年出奇地凶猛，严重威胁在南京市郊横跨滁河

的晓桥津浦铁路。

淮河的戏都围绕着保晓桥铁路而演。

保晓桥也只有两个办法，护堤阻洪和启用苏、皖滁河沿线的滞蓄洪区。

与淮河众多行蓄洪区明显不同的是，滁河启用的滞蓄洪区都紧密地分布在苏、皖两省交界处。

滞蓄洪区启用多少、怎么启用、遵循什么原则才能公平地兼顾到两省利益并使蓄洪收到最佳效果，每一个细节都能构成苏、皖两省之间、以及苏、皖两省与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之间争论的焦点。

七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国家防总三楼会议室每天的汛情通报例会。

例会一般都由水利部部长或副部长主持。

会议室里早就挤满了水利部和国家防总的水利和防洪专家。

会议正开着，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个小伙子，大声地向大家通报：南京市没有按时破七联圩，滁河洪水大都涌进安徽！

安徽省向中央发来电报，“对江苏省不执行中央破圩命令”，嫁祸安徽“表示抗议”。

安徽省关于滁河蓄洪的抗议电报和要求中央对江苏不执行中央命令和损人利己的行为予以纪律处分的电报，从七月十二日开始，一直到八月份，雪片般不断。

按照“对等原则”，国家防总决定，七月十一日安徽省破汪波西荡蓄洪，江苏省破七联圩。

可是直到第二天江苏省都按兵不动。

国家防总值班室直接打电话到南京市政府防汛办公室质询。

“七联圩破了没有？”

“没破。”接电话的人是南京市政府秘书长。

“省长已经打电话给了市长，你们知道码？”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执行？”

“……”对方不说话。

“你们是不是要违抗省政府的命令？”

“……”

“你们是不是要违抗中央的命令”？

其实，南京市近在省政府的眼皮底下，怎么可能“违抗省政府的命令”？

今天的结果，无疑是省与市两级政府默契的结果。

江苏省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

安徽滁县境内的汪波西荡破圩蓄洪后，淮河水位由十二点六五米猛然回落到十二点零六米！晓桥保住了。

江苏的七联圩也保住了。

安徽人实诚，破圩吃了大亏。

安徽人说：“老实人吃亏！”于是不懈地告状。

国家防总办公室总工程师黄文宪先生的“水帐”证实了这一点。

黄总是个乐哈哈的福建老头。

他的办公桌塞在防总三楼一间大办公室的旮旯里。

椅子后面午休或者是晚休的“床”，是一个长约一米、高约六十公分、宽约四十公分的杂志、资料堆。

“这儿能睡觉吗？”我问。

“总比没床好。”

黄总是国家防总的“四分之一笔”，即四个新闻发布和审稿人之一，发言十分谨慎。但是说到滁河蓄洪时，也对安徽深表同情，毫不犹豫拿出了今年行蓄洪的“水帐”。

“一比较,你就明白了。”他说。

一九九一年六月和七月两次破圩,安徽省先后破了:

荒草三圩

荒草二圩

西关圩

蒿子圩

江波东荡

塔子圩

麦子圩

汪波西荡

淹没面积:80.2 平方公里

淹没耕地:84400 亩

淹没区人口:20880 人

江苏省先后破了:

蒿子圩

孟家圩

小熊圩

淹没面积:12.52 平方公里

淹没耕地:14500 亩

淹没人口:1760 人

滁河百分之八十的洪水蓄泄安徽。

安徽怎能不跳?

既然事实经过如此清晰明了,那么为什么至今没有“处理”的动静?

江苏人理直气壮地说:“国家防总内部有争论,现在不敢处理。他们中途变卦!为此,江苏省政府专门有一份详细经过的报告呈送国务院。”

中途变什么卦呢？

防总有什么“短儿”捏在江苏手里，致使江苏理直气壮？

问题集中在七月份第二次开圩蓄洪。

七月十日二点，国家防汛办公室电告安徽，要求江苏扒圩行洪，并在晓桥水位十二点四零米时，“在晓桥以上选一个与汪波荡面积相当的圩垸行洪。在江苏破此圩垸后，安徽省立即破汪波西荡滞洪。”

江苏接此令后即破了孟家圩和小熊圩，然而安徽的汪波西荡并没有按命令相继破开蓄洪。

这就是江苏所说的“第一个程序没有完成”。

江苏省七月十一日的“抗洪救灾简报”是这样记述的：采取以上措施后“滁河水位继续上涨，（10日）23时达到12.65米，险情不断发生，铁路桥岌岌可危。……凌启鸿副省长赴晓桥与顾浩同志（南京市领导人）会商后，急电水利部杨振怀部长，恳请督促安徽破汪波西荡滞洪。24时许，国家防总突改计划，通知利用我省七联圩和东观圩滞洪，不再要求开安徽汪波西荡。为此，凌副省长立即打电话向田纪云副总理汇报。11日上午8时40分，凌副省长与田副总理通话。田副总理说：淮河形势比预计的要严重的多，看来不光是破汪波西荡的问题，还要破大的滞洪区，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统一考虑。”

后来在安徽破了汪波西荡和东观圩后，江苏亦未破七联圩，从“对等（对等损失、对等受益）原则”看，确实占了便宜。

汪波西荡滞洪后，效果出乎意料。国家防总即有专家出面请决策层不要再逼着江苏破七联圩，造成无谓的牺牲。

那么“对等原则”怎么办？

怎么才能“对等”？

以“对等”破圩的原则来平息纠纷应该算是一个双方无话可说的办法。你淹我也淹，你多大面积我也多大面积，你倒霉我也

倒霉,咱们大家认倒霉。这样就使边界防洪抗洪深深镶嵌进了一些与防洪抗洪。科学治水毫不相干的因素,实际上加大了灾害损失。因此,有人说,对等原则就是殉葬原则,心理平衡原则。

这个原则有多大的合理性?

然而,舍此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尤其是在抗拒百年未遇特大洪涝灾害的特殊时期,人们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弄清楚事情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无法评定你是他非。

没有办法。

这就是人可悲的局限。

所以,有的帐就是毫无理由的糊涂帐,而且要继续糊涂下去。

有的道理是可以讲的。有的道理是不能讲的,讲出来太残忍,太伤人。

第五部 辛未人患

禹山坝“战地教育计划安排表”

七月三十日,安徽凤台。

“七月流火。”

太阳灼人。

气温都在摄氏三十八度到四十度。

寿县和凤台是我灾区采访的最后一站。

寿县要看古城池,凤台要看禹山坝,说是洪水来时两处固若金汤。

寿县古称寿阳、寿春,曾是楚国都城。起初,楚都在郢(湖北),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将吴超攻破郢都,楚都多次迁徙,公元

前二四一年迁至寿春,并把寿春改称为“郢”,以不忘亡国之恨。公元前二二三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破寿春(郢),楚国灭亡。寿春城内人纷纷出逃,流亡到江淮间居住下来,他们居住的村落仍以“郢”来命名,以系故国。

楚人这种顽强、坚韧的精神,令世人震惊。“亡秦者,楚也”。果然。

辛未大水,寿西湖、瓦埠湖行蓄洪,寿县城被洪水围困,二十六公里淮西大堤险情不断。疯狂的西北风卷起浊浪,猛烈冲刷着大堤的薄弱部分。其中一千五百米险段岌岌可危。大堤一溃,淮河洪水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土坝渐渐有些支持不住了,三千多光着脊梁的农民手挽着手扑在大堤上,用肉身贴着土坡,迎风组成一道“肉堤”。冷了,就跳上岸喝一口烧酒,然后再跳下去;不会喝酒的,就用酒漱一下口,数小时不上岸。情景悲壮!

更吃惊的是寿县城。

我们在八月初进城那天,汽车刚刚开通。在此之前,洪水都封死了寿县四座城门,离城墙顶只有一米多高。寿县城由于地势低洼,历史上每次被洪水淹没,所得筑城时除了有备攻战,更用于防洪。为了减轻洪水冲击,北门向西出口,西门向北出口,四门都有内外云梯与城堡连接。我在北门看到,水漫北门,木船皆靠云梯摆渡。

四门都有说法。东门“宾阳”、南门“通肥”、西门“定湖”、北门“靖淮”。

可如今,既不能“定湖”也不能“靖淮”。瓦埠湖、寿西湖引蓄洪区的洪水至今没有出路;淮河之水至今难以羁束。

寿县城始建于宋,修缮于元、明、清三代。可我看到的寿县七千一百四十七米城墙,文物景观早已破坏殆尽。西墙、南墙“文革”期间已是“旧貌变新颜”,青石条换了青砖;北墙二百米一九九零年底正准备用石条整砌时,遭到省文物局的查处。一座

城墙，一青一白，古今反差强烈。城墙倒是结实了，但是历史文物价值却大大降低。文物局来人指着县长的鼻子说：“你是历史的罪人！”

残垣断墙也该整修了。可是没资金。用青条石砌，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资金。寿县城内六万人为了确保安全，一九八七年自愿捐出肉食补贴十八点五万元修墙。足见寿县在洪水压迫下惊恐不安的心态。

登古城墙，北望八公山，“淝水之战”古战场增添了几分伤感！

寿县县长乔传秀告诉我们，巨大的瓦埠湖行蓄洪区，至今不能享受“行蓄洪区的政策待遇”，几十年反映，杳无音讯。

凤台县是另外一番景致。

凤台禹山坝，一点七公里，是淮北大堤十分险要的一段。相传钱正英当水电部长的时候，年年必来禹山坝看一次。一九五四年禹山坝溃决，洪水把淮北平原淹得一塌糊涂。

八月天上禹山坝，尤其是洪水滔天的八月天上禹山坝，可是件受罪的事儿。在烈日的炙烤下，水气蒸腾，大坝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方可以蔽荫。大坝两边住满了灾民，中间地段，则是守坝的民兵，高挑着红旗，红旗下是蒸笼似的庵棚。

柏油路面都化作了稀泥，上面根本没法走，走一步，凉鞋就要被拔掉一次；路面摸上去都烫手。

钻进庵棚躲一会儿，正遇见守坝的农民跟一些干部模样的人诉苦：粮也没了，钱也没了，国家的粮食还不见来，这样下去，大坝没法守呀！

这些干部吱吱唔唔，没说清什么东西，便闪出身走了。

农民告诉我们，他们上坝好几十天了，是轮流值班，上教育课不少，听鼓励话不少，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

上什么“教育课”，听什么“鼓励话”？

我从有关方面获得一张“凤台县关店区(禹山坝)抗洪抢险民兵营战地教育计划安排表”(一九九一·七·二十二)。根据时间安排,一共需要四天半才能完成教育和学习。

四天半的学习内容如下(在此我需要特别向读者申明并致歉的是,为了加快阅读速度,姑且去了标点符号。理由有二,一是这些教育和学习的内容,大家都比较熟悉,容易“点读”;二是加快一点本文的叙述节奏):

一天明确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计划目的和要求充分认识战地教育意义抗洪抢险中大量生动的事例既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又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战胜灾害的动力请经历新旧社会的老干部老党员半天老农民谈体会进行新旧社会灾年对比说明新旧社会两重天请经历过年年治河的干部谈体会说明战胜百年罕见的大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顶住这么大灾没有人挨饿无一人逃荒要饭社会稳定人心安定请县委书记作报告介绍风半天台灾情谈洪水无情党有情干部有情民兵有情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况民兵座谈身边党员干部顾大家舍自家重人民薄亲人的生动事例请县人武部领导做报告半天讲民兵在抗洪抢险互助自救重建家园中如何发挥作用讲抗洪抢险中的先进典型增强民兵的使命感坚定战胜洪涝灾害的信心联系抗洪救灾和实际讨论如何适应沿淮地区抗洪救灾的要求搞好民兵训练整组等发动大家献策一天深入学习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抗灾救灾的通知精神树立不怕困苦顽强拼搏的思想连续战长期抗灾的思想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团结协作战胜灾害的思想面对现状如何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怎样帮助军烈属五保户搞好生产自救订措施谈一天半天方法抓落实先个人谈体会谈收获结合表彰抗洪救灾中的好人好事先进人物把社会主义的成果归纳提高。

“禹山坝地方那么窄,两个民兵营二百七十多人,没地儿站

呀？”我问。

“我们搞了两条大船，一条船能装一百多人，把大家集中到水里。”

“这倒是一招”。

问题是在大太阳下动员。教育，在庵棚里一伙一伙挤着学习讨论，其热难耐啊！

这些守坝的农民，每天补助五元钱，县里补七角，另外四元三角由上坝农民所在村补齐。可大家都受灾，村这块大头，农民说根本无法最后落实。这块大头，县里的办法是，由乡政府在村交粮款中统一提留。

精神重要，物质同样重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精神再变物质，物质再变精神。

正在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灾区的灾民更需要什么精神，更需要什么物质？

正在学习和接受教育的灾民心里想的都是与政治教育毫不相干的东西，救济粮款怎么落实，县粮站不要再卖给我们发霉的面粉；吃水困难，流行病横行，多么希望有足够多的药品能到手呵！被水冲倒的房子怎么办？今年怎么过冬？明天“春荒”吃什么？

凤台人民、沿淮灾区人民更希望早一天把淮河治好。

我手里有一篇稿子，是凤台县李冲乡魏郢村下吴家农民吴汝俊寄给我的一位朋友并请求这位朋友能帮他交给有关部门或刊物，标题是《关于治理淮河清除水患的一点设想》。我想在这里摘抄部分内容，能帮助我们了解，灾区农民到底在想什么。

关于筑堤防洪，吴汝俊写道：

“往往是堤坝筑得越高（大水情况下），则水位也越高，相应地，洪水对堤坝的压力、人们固堤的难度、洪水对人类构成的威胁也随之加大。一旦破堤行洪，便有大段大段的堤坝被冲毁，大

片大片堤坝两边的耕地变成塘洼沼泽；这睦堤坝上耕地里的泥土，随波逐流，游积河底。所以，往往发一次洪水，便毁掉一些堤坝，失去一些堤良田，抬高一次河床，给人们留下一场修补坝的劳役——又是一次对土地的再破坏。这样挖土筑堤、堤破土失、再挖土筑堤……形成一个消极的恶性循环。”

关于清障防洪，吴汝俊写道：

“群众靠自己的力量，辛辛苦苦筑起来的圩堤，好端端的，硬要拆除，群众听说这是顾大局，心中不悦，却也不好讲什么。但大水过后，又说圩堤可以保持一定水位，要群众把那些被洪水冲得断断续续坑坑洼洼的圩堤重新补平修好。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毁坏了耕地，流失了泥土，游高了河底，坑苦了群众，难为了干部。”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广忠先生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的内容与农民吴汝俊想法不谋而合：“我们今天还在采用加高大堤的办法防止洪水泛滥，作为防洪方针，实际上这也是人类的盲目行动”。

写到这里，我们可发现，“教育计划安排表”中所规定的学习教育内容与老百姓和真实想法真实情感真是互不相干。

谁是真正的祸首？

中国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

中华民族是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把这块东方土地所承受灾害的种类、强度、频率推到了世界的首位。本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魏格纳建立了“大陆漂移学说”，五、六十年代，“大陆漂移学说”逐渐发展到“板块学说”，对地球地貌的成因作出了富有魅力的

解说。

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在喜玛拉亚遭逢了。印度板块俯冲，把欧亚板块高高地抬起，在无法说清的时间里，喜玛拉亚山脉——世界屋脊诞生了！

地壳的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形成了东西南北向的高山和丘陵，形成了中国地貌西部高耸挺拔、东部突然平缓的“三阶地”特征。

肥沃、富庶的华东、华北、东北平原，成为亚热带季风定期光临的天堂。

这真是老天爷的“恩赐”。

季风带来充沛的雨水，给中华民族带来舟楫灌溉之利，也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烦恼。

季风雨过于集中，不为利润，反为祸患。

以北纬四十度至四十五度为例，我国这一地区连续最大四个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七十二至百分之八十二（这还只是东北地区的情况，华东的比例更大，今年两个月就下完了以往平均一年的雨量），欧洲该区域的十三个国家仅占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五十五；最大一个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比例，我国百分之二十四至百分之三十四，而欧洲仅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而且，由于地形的原因，河道洪水湍急，破坏性很大。

欧洲永远风调雨顺，“蓝色的多瑙河”永远弹奏着高贵、华丽、舒适、安逸的华尔兹舞曲。中国的景况就不同了。

中国的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七大江河，每年都让中华民族绷紧了神经，每年都让中华民族惊恐不安，以至于国家必须设置一个常设机构——“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来对付大水系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灾害。

建国四十多年所有的自然灾害中，洪水灾害造成的损失占

百分之四十。

关于辛未水患的原因,几乎是该说到的都说到了:“梅雨”提前,“梅雨”暴下,“梅雨”持续时间长。更专业的原因还有一大堆:副热带高压,菲律宾皮亚纳博火山,“厄尔尼诺”现象,海湾战争油井大火……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辛未大水,淮河洪水总量没有一九五四年多,但是各处的水位都超过了一九五四年,这是为什么?

洪水的发展趋势,为什么来的速度更快,势头更猛?

行蓄洪区的保障系统何在?

辛未水患后,淮河、太湖大规模治理的真正背景是什么?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专家提供了过去四十年我国水利投资情况。

水利基本建设占国家基建投资的比例:

“一五”,24.3 亿,4.1%;

“二五”,96.64 亿,8%;

“三五”,70.14 亿,7.2%;

“四五”,117.11 亿,6.6%;

“五五”,157.24 亿,6.7%;

“六五”,93.01 亿,2.7%;

“七五”,164.89 亿,2.3%。

投资比例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而且在投资动机中,获得较短期效益的思想略占上风,用于防洪和河道流域治理的资金更是微乎其微。

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水利工程欠账太多,二是原建工程普遍老化失修,不能发挥正常作用。

现在的动作,不过是“亡羊补牢”!

安徽行蓄洪区的灾民本可以不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

三年前,安徽省保险公司都提出建立淮河行蓄洪防洪基金,

实行行蓄洪区农作物防洪保险,直至汛期来临之前的五月二十二日还有正式报告给有关主管部门,遗憾的是,这项利国利民的保险没有批准实施,保险公司曾测算,如果行洪农作物保险五月底开办,该公司也要为其中六个行蓄法区行洪受损农作物赔付三千三百多万元!按一九八九年人口计算,平均每个灾民可获得经济补偿一零四点八五元。

这是安徽省的一个重大失误!

说起来,主要有两条非常可笑的原因:一是认为淮河整治,行蓄洪几率降低,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就会赚一大笔钱。没那么便宜!二是害怕“中央卸包袱”,认为中央五年为淮河行蓄洪区拨款二千五百万元补助防洪基金,以后遇大灾中央不再管,是卸掉安徽这个大包袱,把责任交给地方。

这些阻挠行蓄洪区保险部门,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翘首以待的数百万行蓄洪区的灾民!

太湖也有类似的本末倒置的荒唐举动。

“文革”期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二年一月,曾召开过一个“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座谈会”,其中包括太湖防洪治理,历时五十六天!一个超长的会!与会几十位专家,不仅要集中精力讨论长江和太湖流域治理这样重大的主题,而且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政治学习武装思想的时间占了相当部分。这会没法不长!

当时长江、太湖的事情再不办就不行了。因此就“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革命生产双丰收”!

长江规划办公室所在地——武汉,沿江大堤,巍峨伟岸,虎距龙盘,牢牢守护着武汉三镇。可这长江大堤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像开屏的孔雀,正面辉煌无比,后面却裸露着肛门。距大堤五百米范围内有六百三十个防空洞,距大堤一百五十米处有一百七十九个防空洞,后者已有四十七个与长江洪水沟通,严重威

胁长江堤防和武汉三镇。当时的武汉也是“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人们腾不出功夫来想防洪的事情，更何况，“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英明决策，它怎么可能会给这个中南最大的城市和数百万市民带去灾难呢？

一九七九年，刘德润老人来武汉收拾残局填堵地洞时，感慨万千。

如果酿成灾祸，中国蝼蚁溃堤的成语可能就需要改了。

人类更大的祸害是破坏环境。

前不久，林业专家们聚会，研讨分析辛未水患的原因。他们指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灾害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朝日新闻》七月二十日发表“社论”，指出，江淮流域的水灾与森林减少和环境破坏有关。

联合国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也强调说，河流流过的地区，凡是植树造林的地区只有总雨量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泄入河流；但是林木砍伐殆尽的地区，则有百分之九十七至百分之九十九的雨水排入河流。

西周时期，黄土高原约有四点八亿亩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五十三，经过两千多年人类的劫难，到解放前夕，劫余森林不足零点三亿亩，覆盖率降到百分之三。千沟万壑，赤地千里。

长江流域森林植被破坏严重。据专家调查，水土流失面积由五十年代的三十六万平方公里到八十年代的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许多支流含沙量巨增，如金沙江含沙量已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点五。

再看淮河流域。

据淮委资料，由于淮河流域植被破坏，导致生态环境严重失调。土壤年平均侵蚀深度为二点六毫米，年侵蚀量达二点三亿吨，淮河一些支流河床淤高两米多，而且上游水库也淤积严重。现在森林的水源涵养能力太低，以致洪水发生率提高两倍多，干

旱发生率提高七倍,洪涝干旱交替发生,给淮河流域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从江苏到安徽,还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人与水争地,河、湖大规模的围圩造田,既破坏生态,又堵塞了河道,阻碍了行洪。

盲目围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同乱砍滥伐。

有的地方的河道还建起了永久性建筑,甚至盖起了严重威胁水源的化学工厂。

新民滩 1.3 公里大圩内的高邮市助剂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临行洪的时候,我在助剂厂拿到了一份该厂产品和原料的清单。

增白剂

A-1 催化剂

(以上产品)

对甲苯酚

氯化亚砷

硫化钠

硝酸

硫酸

二甲苯

甲苯

二甲基甲酰胺

保险粉

.....

还有厂边三亩地、三千吨含挥发酚、硫化物等有害物质的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池!产品、原料可以搬走,可废水池搬不走!

炸圩行洪,有害化学物质必须污染水源,影响下游扬州市和长江沿岸的饮水。

.....

没有去过江淮灾区的人,很容易把“堤”、“坝”、“圩”、“垸”的概念搞混。

《康熙字典》云:“江淮间水位高于田,筑堤而扞水曰‘圩’。”

《辞海》云:“沿江、滨的低洼地区,外水高于农田,须筑堤防护,成为与外水隔绝的封闭区域。在长江下游为‘圩’。中游称为‘垸’。统称圩垸。”

《梦溪笔谈》记载,圩田在唐时已很盛。可见“圩”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影响之深广。

“圩”,在自然灾害面前,在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无疑记录着人类的努力和智慧,同时又深刻地暴露人类的局限和短视。

“圩”也记录了人类与自然的巨大矛盾。

水自西部来,东流到海不回头。

中国的大江大河纵横交错,汹涌澎湃。所谓“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然而他们遭到人类的抵抗。

自然与人类,是两条不融洽的系统。

在自然的系统上,人类建立社会。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用红、黄、绿标出的人类社会各种独立的行政单元,省(郡)、市(州)、县、区、乡、村,一环套一环。

各个利益单元的人,都必须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战。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盲目的。

人类是自己生存空间有力的捍卫者,同时也是自己的掘墓人。

人类一边在抵御着灾害,一边又在制造着灾害。

今天,生存环境如此之恶化,灾害如此之频繁,人们呵,你们做了多少孽!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能说是“辛未水患”吗?

“统天下，理中国”

（最后的祷告）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带着刘德润、刘锺瑞两位工程师从北京出发，沿淮考察。

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一路火车汽车走下来，上中下游一千公里，整走了两个月！

刘德润一九四九年由南京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转到新中国水利部，第一次与共产党最大的水官共同勘查淮河流域，一路上充满了新鲜感。

毛泽东一九五零年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无疑是给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副部长提出了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难题。

两位部长都不是水利出身。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后，担任第一任水利部长。这对于他来说，水利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他有那么股子踏实朴素的军人气质。按当时的规定，他出巡可以挂一节专列，他坚决不干，说那样会脱离群众。相传他治军就以与士兵打成一片而著称，所有将校军官，只有去南京开会才能穿呢子军装，回来后即要脱下换上粗布大吊兜。如今，他也靠着这股子踏实朴素的气质来办新中国的水利。

李葆华的“谦逊宽厚”给刘德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葆华兼水利部党组书记，但是从不摆架子。每到一处算水帐，他都要先认真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再谈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位“纳谏如流、善于跟人合作的部长，同是也是一位有信念的共产党人”。

一天早上，刘德润从软卧厢出来，刚好碰见从另外一厢出来的李葆华。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李部长，这社会为什么这样杂乱无章？”

“社会应该是有规律的，不应该杂乱无章。杂乱无章，这是说明我们还没有掌握规律。”李葆华说。

“那么怎样才叫共产主义呢？”

这是刘德润在肚子里憋了好长时间的问题。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

李葆华脱口而出。

窗外，中原大地初春的阳光，催出了一望无边的嫩绿。

这是让刘德润终生难忘的一次简短的谈话。他意识到，这些早期共产党人是在一种坚定的信念下做事的。对于他们来说，“水利”已经不是单纯的水利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何等光辉灿烂的社会目标呵！这不正是他一九三七年国难当头的时候从美国毅然归来所探寻的目标吗？

三个月前，刚开过“全国水利会议”，淮河水系的治理被放到了诸江河的首位。

此举规模空前。

上游：河南境内至王坡等四个行蓄洪区要在一九五一年汛期前完成，达到蓄洪二十亿立方米的标准。

中游：湖泊洼地蓄洪区，有效蓄洪四十亿立方米。修筑加固淮河北岸干堤、颍河东堤、涡河支堤，以及蚌埠、淮南矿区圈堤。疏浚干流。

下游：加强运河堤防，整修里下河归海坝，疏通入江水道和归海港口障碍。

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蓄为主”的治淮纲领。

傅作义、李葆华此行主要是落实行蓄洪区的问题。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他们都在为淮河两岸的长治久安、为老百姓免遭洪祸而深深地祈祷。

然而刘德润当时和部长们圈定行蓄洪区时，没有想到四十

年后的行蓄洪区人口激增了一百多万！当他听到一九九一年城西湖行蓄洪区有四十万人口时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各行蓄洪区的人口极为稀少。

解放初期的火车只有每小时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咣啷咣啷”，一步一步往前拱，但是开得很执着很顽强。人们缺衣少食，生活困苦，但是愿意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与这新生的国家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他们愿意为未来和希望作出牺牲。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紧紧地维系在治水上了。

传说中，大禹手下有两个善走的使臣。一个叫太章，一个叫竖亥。大禹治水治天下，使太章和竖亥测量大地。

太章跑东西两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竖亥跑南北两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一个方方正正的中国！

大禹治水，就是要强有力地维系住见方“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的中华土地。

自汉高祖“统天下，理中国”以来，汉武帝临瓠子，隋炀帝挖运河，康熙巡扬州，乾隆考水源，孙中山《建国方略》，毛泽东治淮河黄河长江，都深知治水对一统大业的利害关系。管子，这位诞生在淮河边的杰出政治家，对“水”有着极其深刻的体察和形而上学的表述。他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血气阻滞，筋脉不畅，国将奈何？

原以为，水患如同地震、火灾，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祸水终归会很快注入大海，人们就像报纸说的那样神话般地建起新的家园；灾害不过是只萤火虫在夜空中轻轻地一曳。可事实并不是那样。问题涉及的是如此庞杂而广博，历史的纠葛是那么深沉而不可解，凡是有水的地方，在六畜兴旺、枝繁叶茂、五谷丰登的后面，都隐藏着一触即发的危险。谁都以为洪水滔天，水便多的不得了。其实不然。中国河川径流量居世界第六位，可是人

均占有河川径流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苏联、印尼的七分之一,加拿大的五十分之一。

一边是闹水,一边是争水。看够了洪水,和如何把祸水引给邻舍,再看看怎么争水。“红旗渠”引漳河灌溉河南林县,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建起一条“人造天河”。这不啻是人间的伟大的工程:一条总干渠、三条干渠、五百九十五条支渠,三百多座中、小型水库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总长一千五百公里!可河北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红旗渠”破坏了河南、河北交界的漳河水百分之五十二和百分之四十八的分水协议,在上游截走了漳河水。于是河北人也以改造山河的气魄在离“红旗渠”水源上游不远的地方建了一座抽水电站,把水引向河北。为此,河南人正为河北人准备了上百吨的炸药。

为水可以赌命。这是一个很久远很恐怖的故事,某天,一块空旷地上支起了一个大锅,熊熊的火焰烘托着一锅热油,里面有十个铜钱,两个村各派一名代表,谁赤手空拳从油锅里捞出来的铜钱多,谁分的水就多!

哪儿沾了“水”,那儿总有事儿。“H₂O”,神奇之极的物质!

我只想早早地合上“辛未水患”这一页。然而不可能。

我的耳畔总是响着四十年前那辆老火车“咣啷咣啷”的声音,那在四十年后决定了淮河行蓄洪区二百万人命运的“咣啷咣啷”声!“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总是在地平线向我们召唤。

我曾经祷告过,那是在江苏扬中的长江大堤上,特大洪峰即将来临,我仰望着浑沌的苍冥,“太平洲”在长江的洪水中一起一伏。我真心地希望上帝的惩罚降临时,扬中变作“诺亚方舟”,保佑着扬中数十万生灵。

我的祷告灵验了。那边的朋友来北京告诉我,扬中安然无恙!

我曾经祷告过,那是一幅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五万多条河流把中华民族的各个区域强有力的缝合起来,形成了一统天下。然而随着区域分割,以邻为壑,“诸侯”之争不息,灾害必然增巨。我真心地期待着人们从“圩垸”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在协作与和睦中改善生存的环境。

我必须完成最后的祷告:

为了数百万还无家可归的行蓄洪区灾民,为了蒙洼、邱家湖、新民滩,为了老人徐长喜,为了那个家里供了那么多神灵也难免来灭顶之灾的吴国栋,为了刘德润老先生……

我终于合上了“辛未水患”这一页。

我的台灯出了毛病。

天边泛起了舒展而宽阔的晨曦。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凌晨于北京木樨地

长江三峡： 半个世纪的论证



三峡水坝是中国人的一个宿命，
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民族为了一个工程
萦回纠缠七十三年才有其始终。

世纪末感言

三峡水坝是中国人的一个宿命,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民族为了一个工程萦回纠缠七十三年才有其始终。一个工程的论证几乎贯穿一个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三峡论证实际上是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治水”思想,即长江治理,应该是“先支(流)后干(流)”,还是“先干(流)后支(流)”;一个是“治国”思想,即是否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实质,就国家重大决策而言,就是允许有反对派,尊重反对派意见,并创造一个保证反对派发言的制度性环境。三峡论证如果没有反对派意见,工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上马,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即使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也承认这个判断。

根据我对三峡工程长期跟踪,有些问题必须记录在案:一、三峡建设资金,反对派的计算基本准确,即建成后所需动态投资约四千至五千亿,还不包括三峡库区地方配套改造和其他间接投资,主上派在投资问题上打了埋伏;二、移民投资管理有明显的腐败黑洞,库区一百一十四万移民将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三、三峡上游每年流进库区的五至六亿吨泥沙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而只有二百亿立方米库容的三峡水库,其寿命将一直面临挑战;四、库区环境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作者

我必须声明,我没有能力回答三峡工程那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同样也没有能力回答三峡工程一定能上或者一定不能上的问题,虽然我也曾去苦苦地追究过某些技术性的要害,去分析某些重大争论的焦点及其背景,去捕捉历史的流星划破夜空时那灿烂的一刹那,并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和经验去作出某种处理或判断。断然作出是非的判断,我认为,那将是极不严肃和幼稚可笑的。

我还想说,长江是伟人和天才们施展智慧和伟力的场所,三峡工程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世纪性的历史命题。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命题面前,我们多少有点茫然彷徨,多少有点忐忑不安,甚或多少有点恐惧和宿命感。

我还想说,无论是三峡工程的赞成派还是反对派,他们都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精忠爱国,关心民族现代化大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肝胆相照,激烈论辩,构成了一部撼动世界的宏大史诗。

我把这部史诗叫做三峡史诗!

——题记

—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下午,林一山略有些反常。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对他来说,是个快乐的时光。每天午饭后,十

二点到二点,他都要一字不漏地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节目。可今天,躺在床上的那只高性能九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似乎受到了冷落。他下意识地摸到床边,拿起收音机,凑到耳根打开,听不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扔回床头。

林一山已经双目失明。他只能靠收音机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在大客厅里来回地踱着,像往常一样地镇定、熟练,绝不会碰着客厅里的任何家具。可他内心的激动和焦急,却瞒不过家里人的眼睛。

三十多平米的大客厅空旷而简单,两对旧沙发和一个长沙发,一张三屉桌。唯有东、西墙面上高挂着的几个大镜框光芒耀眼。

这些镜框似乎都在证明着下面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昔日的举足轻重和灿烂辉煌。

西墙上,四个大镜框依次排开:荆江分洪闸(一九五二年)、湖北陆水三峡试验坝(一九五八年)、丹江口水利枢纽(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葛洲坝水利枢纽(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些都是林一山亲自主持的在中国水利史上惊天动地的工程。

东墙上的大镜框,正在叙述一个故事:一九五二年二月,周恩来冒雪视察长江中游长江大堤。周恩来在大雪纷飞中侧耳倾听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讲述着什么……

客厅里,此刻仿佛响彻着毛泽东五十年代接见林一山时戏谑的湖南口音:“哦,你这个长江王!”

林一山则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问候毛泽东:“主席好!”

一切都仿佛近在咫尺,一切都仿佛十分遥远。

林一山常常仰首“凝视”着西墙:何时能在葛洲坝后排上三峡大坝的雄姿?

他梦寐以求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今天快要实现了！

他居住的北京和平门内新壁街四十七号，异常寂静。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正屏住呼吸，等待着往东七百米处人民大会堂的表决。

这将决定着三峡工程的命运。

三峡工程，长期在党内、在国务院、在全国人大、在全国政协悬而未决，争论不休。赞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初开始，中央各大新闻媒介在统一指导下，对三峡工程作了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仍然不敢保证人大代表百分之百地过半数。

如果通不过，那将是何种局面呢？

二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四月三日下午的闭幕式，气氛非同寻常。

会前，台湾代表黄顺兴坐在进大休息厅过道的第一张桌子旁，向中外新闻界散发了《关于三峡工程议案表决方式的动议》。

黄顺兴在“动议”中说：“按往例，国务院处理建设工程，无须提交人大会审议，然而，因为三峡工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无论从科学技术涉及面之深广与复杂，无论对长江流域生态与环境影响之严重，无论从移民数量及工程经费之巨，施工周期之长，都堪称世界之最，举世瞩目。虽然代表们都努力认真审议此案，但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而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

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本来,闭幕式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程序,因为在此之前,所有提交表决的“报告”、“决议”草案,事先已得到与会代表的充分审议,“报告”和“决议”都尽可能地体现了代表们的意志,可黄顺兴把“动议”的风一放出来,闭幕式的弦便绷紧了。闭幕式成为中外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

一开会,摄影记者们便有意识地往台湾代表团旁边凑。

三点二十分许,主持大会的万里委员长说:“现在开始表决《三峡决议》。”

黄顺兴突然站起来喊:“主席,我要求发言。”

全场顿时哗然。

“大会没有安排发言程序。”万里说,“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黄顺兴的发言请求被拒绝后,旋即随着台湾代表、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刘彩品退席。

《三峡决议》表决结果:

赞成:一千七百六十七票

反对:一百七十七票

弃权:六百六十四票

未按:二十五票

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

万里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三峡决议》通过!”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峡决议》在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三峡工程的兴建,走完了法律程序,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

当天,消息传开后,许多人老泪纵横,许多人设宴庆祝,一醉方休。

林一山更是狂喜。他见了我就说:“不容易呀,不容易呀!”

从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利用三峡水

力发电到现在,已逾七十三年矣!

一个工程,花了七十三年时间,才走完了论证的过程!几乎是一个世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无论是赞成派还是反对派,熬到今天这种结果,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仅仅是高兴或者沮丧吗?仅仅是喜悦或者悲哀吗?仅仅是胜利或者失败吗?

在这七十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九四六年美国大坝权威萨凡奇推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到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作出的《三峡决议》;从一九八四年国务院确定“150方案”(即以吴淞口基面为准,海拔一百五十米正常蓄水位),到一九九二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三峡决议》,惊动了多少能改变历史、主宰人类命运的伟人;孙中山、蒋介石、罗斯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风云变幻,世事沧桑。

三峡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从古至今,从内到外,上至天堂,下至地狱,近一个世纪,人们激烈论争,据理抗辩,生出多少是非曲直,恩恩怨怨;生出多少人生蹉跎,悲欢离合;生出多少宏篇巨制,奇思诡想。

今天,我们在长江宽阔的胸膛上航行,还能强烈地感觉到那些天才和伟人不朽的灵魂,从那巫山烟雨中踏歌而来,与我们结伴前行;还能强烈地感觉到三峡夹岸数百公里那山的严峻和对峙,如同两个营垒,以江为界,水火不能相容,论辩声若洪钟大吕,在山脉间回荡,振聋发聩。

“三峡是‘上帝的恩赐’。”

“三峡工程是人类伟大的理想。”

“三峡工程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不可替代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然而,上面的判断和说法遭到了反对派强有力的驳难。

正是半个多世纪的激烈论辩,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相互碰撞

和驳难,使三峡论证的科学化、民主化得以深化和发展。

正是半个多世纪的激烈论辩,为我们揭开了“三峡史诗”的第一章。

三

《科学家》杂志在潘家铮一篇自传文章的篇首,用那种中学作文的浪漫笔调写下了一段话:“他将与缪斯女神的初恋和翱翔蓝天的遐想珍藏在心灵的深处,走遍祖国的天涯海角,制服一条条桀骜不驯的江河……”

其实,潘家铮压根儿不想将缪斯女神“珍藏在心灵的深处”。

我在一九九二年第七期《科技发展与改革》上看到了他的一篇科幻小说:《机器人的爱情悲剧》。讲的是“本来攻水工结构”,后又深醉于计算机的向普陶教授与他制造的机器人康柯的恋爱故事。小说充满了调侃和诙谐的味道。心态十分年轻。

他的沙发靠椅紧挨着你,毫不遮饰,让你能仔细地观察他:小小的个儿,已花白了的头发,西服皱皱巴巴的,脚上那双半高跟皮鞋加上绍兴腔的普通话,多少有几分迂。当他说:“我爱写小说”时,他高度近视的眼神闪耀着那种“文学青年”的真诚、热情和痴迷。我把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的小说集送给他时,他如获至宝。“哦,威尔斯,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然后急急地翻几页,那神态,仿佛世界上没有比小说更重要的事情了。

真是不能想象,他几十年来,曾主持设计了包括新中国第一座大坝——新安江水库在内的数座大坝,发表、出版学术文章和著作六百余万字,怎么还能腾出功夫来写小说?

真是不能想象,这位六十五岁的著名大坝专家,这个集三峡

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和能源部总工程师，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重任于一身的小说迷，怎样在一九八六年六月至一九八八年底两年半的时间里，主持了世界瞩目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怎样在各不相让、尖锐对立、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中，正襟危坐，在全国相关领域四百一十二名一流专家学者面前，保持着应有的“长者”风度。一位老先生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发言完后，潘家铮说：“我来归纳一下刚才发言的要点……”没想到老先生当堂大声喝道：“不要你归纳！”十分不给面子。潘家铮顿时噤声。

真是有点难为我们的小说家。他曾说过，他不写小说搞水利，纯属“历史的误会”，“自幼热爱水电建设”云云，“更是与事实相去万里”！他一听到别人说他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卓有贡献”，“总是面红耳赤”。

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

读了他刚出的《春梦秋云录》，一大厚本，三十万字，字里行间都让你感觉到，搞水电，是为了生计，是撵鸭子上架。

在党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要求水电部组织各方面专家，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并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作为当时的水电部总工程师，潘家铮便当然成为论证领导小组的技术总负责。

谁都清楚，这是三峡工程最后一次机会了，专家评议的结果，将在技术和理论上决定三峡工程的命运。

潘家铮也很清楚，他被卷进了中国一个既敏感又错综复杂的大漩涡里了。

由“文学梦”而“三峡梦”，成为历史赋予他的唯一选择。

四

这种选择是突如其来的。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三峡决议》后，由于毛泽东的犹豫，三峡工程一直处于冷却阶段，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虽然小有起伏，仍然没成气候。

一九八二年底，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

十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当汇报到为适应翻两番的要求，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即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之后，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先后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形成了三峡工程党内最高决策层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

这就出现了所谓“一五零方案”。具体的指标是，可有防洪库容一百四十多亿立方米，装机一千二百万千瓦，移民不超过四十万人。尤其是移民比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一七五方案”（吴淞基面，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一百一十三万移民减少近三分之二。

一九八四年国务院批准“一五零方案”，并要求即刻进行“三通一平”等前期准备工作，筹组三峡特别行政区，争取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

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讲法，“一五零方案”是个“小裤衩方案”，意思是，三峡大坝如同一块非常好的布，可是没钱做成一件理想的衣服，只好做条“小裤衩”遮羞，随便凑合着。关于三峡正

常蓄水位，萨凡奇四十年代提出的是“一九零方案”，五十年代“长办”（即“长委”前身，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曾提出“二三五方案”，因为考虑到移民数量巨大，淹没面积太多，周恩来指出，三峡蓄水位不能超过二百米。

“小裤衩”方案遭到重庆市的强烈反对。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重庆市向中央提出《对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一五零方案”回水末端在重庆以下的洛碛和忠县之间，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没有得到改善，万吨船队不能抵达重庆。而且回水末端泥沙淤积，反而恶化了重庆现有航道和码头条件。

据此，重庆方面提出了“一八零方案”。

与此同时，三峡工程著名的“反对派”李锐上书党中央，对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方针，对三峡工程是否合理，对泥沙、航运、移民等重大技术问题，提出了全面的质疑。

一九八五年，以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为团长的调查组，沿江进行了三十八天的调查，并编写了《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提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至少“七五”期间不该上。纵观全文，这篇报告实质是从投资、防洪、泥沙、航运、移民、安全诸方面分析，全面否定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孙越崎先生在国民党时期任资源委员会主任时，就与他的前任钱昌照先生积极与美国政府合作上三峡的意见相抵触，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前者曾在一九四六年派出了五十多名中国一流水专家赴美国丹佛的垦务局，在萨凡奇的指导下，进行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而后者则于一九四七年代表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合作，并撤回了专家。

现有方案和三峡工程本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对。

这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促使中央对三峡方针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

一九八六年中央决定,撤销已工作运转了快两年的三峡省筹备组,成立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并责成水电部对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进行重新论证和审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潘家铮走上了三峡的历史舞台。

这种局面,他是很难应付的。

围绕三峡工程,几十年来的所有重大技术问题,由于各种政治斗争积淀下来的恩恩怨怨,眼下都一古脑地搬到了桌面上,问题和矛盾全部公开化了。许多几十年彼此未曾谋面的对手,今天终于坐到了一块,刀兵相见了。

三峡论证,是否能听取反对意见,是否能科学论证和民主论证,是其要害之要害。

中央十五号文件明确指出,论证“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论证机构的设置和论证的方法、程序都是十分精细的。

论证领导小组由原水电部部长、有关的副部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共十二人构成。下设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等十四个专家组,聘请国务院所属十七个部门、单位,中科院所属十二个院所,二十八个高等院校和八个省市专业部门和有各种专长的专家四百一十二名。其中中科院学部委员十五人,全国政协委员二十余人,有高级职称的三百五十九人。专家共涉及四十个专业,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财政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工程和人防等。其中水电系统以外的专家二百一十三人,占百分之五十一一点七。同时,还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三经办、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交通部、机械电子部、财政部、四川和湖北省政府推荐了二十一名特邀顾问。

而且,为了支持各专家组工作,还委托了高等院校、设计、勘测、科研等单位数千人,承担试验、勘测、调查、计算、研究的任务。

程序设定,各专家组在本专业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工作。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充分讨论,提出专题论证报告,并签字负责。凡是对专题报告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拒绝签字,另提出书面意见作为专题论证报告的附件一并上报。

一个工程项目,论证规模如此庞大,论证程序如此精细,实乃闻所未闻!前无古人,甚或后无来者。

五

专家论证结果:四百零三比九。

论证报告有九位专家十人次没有签字。

主上派以压倒多数的结果,为半个多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拉上了沉重的帷幕。

然而,论证结束了,论争并没有结束。

况且,论证过程中,反对派虽然是“极少数”,也对主上派构成了威胁,也向主上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主上派不能像许多工程那样马马虎虎,顺利过关。

三峡工程,严格地说,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的变迁,渐渐地不那么单纯了。

论证过程始终笼罩着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历史的阴影,“对台戏”的幕后,总有些不尴不尬不干不净的东西窥视着。

潘家铮作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似也看出了些端倪。心里恼火,却也无奈。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由于“左”的影

响,领导说了算,严重损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热情,给两代知识分子留下了许多惨痛的经验教训。如三门峡工程。潘家铮大声疾呼:为什么不能进行同志式的讨论?!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大会发言后即转身离开会场。他不愿听对方的反驳或者说明。

“不用听,所有的解释都是陈腔滥调!”另一位老先生断然说。

潘家铮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呢?

七届政协五次会议上,一位记者采访某著名水利专家,请他谈谈三峡工程。他反问:“你怎么看?”

记者说:“眼下国家财力匮乏,能不能缓上?”

“放屁!缓上就是不上!”记者一愣,没想到这位受人尊重的专家也如此粗鲁。

一位老先生说,气功能够把降雨云团阻挡住,让暴雨降到长江险段以外别的什么地方。

这种以“空中调水”来取代三峡防洪的方案,受到许多科学家的嘲笑和挖苦。

这时一位老专家为方案的提出者挺身辩护,他在列举了人工降雨对灭掉一九八七年大兴安岭山火后,说:“如果长江上游各支流星罗密布的水库群,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都修起来,把暴雨人为地迫降到该处,不是可以起到治水作用吗?个别人……除掉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

一位水利专家提出了“一六零方案”。

而一位反驳者即说这是一种“缓兵之计”,与李锐的缓上三峡工程同出一辙。并向与会者暗示,这种“缓兵之计”有某种政治涵义。

一个事关民族大业的科学问题随着政治动向而发生了转换。

反对派向主上派扔出了白手套。他们在各种会议上顽强地表达着意见，影响着决策。

主上派也发起了反击。

一九八七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与该所研究员林发棠合作编出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汇集了反对派的意见与公众见面。而计委一位领导以“老朋友”的口气向田方传达了“上面的意思”，希望停止公开发行《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这种压制出版反对意见的作法，适得其反。

因为这本书由国家科协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作序，其中的作者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谈的问题都没有超过三峡工程的范围。

这一压不要紧，紧接后面，又“压”出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压”出了《长江，长江》这本更加轰动的书来。

而某些单位和个别人，却把此事上纲上线，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向《长江，长江》中被采访的专家学者所在单位或原单位机关党委寄信，并提供了相关材料，供“单位在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

这种用政治判断、用告密来解决学术争端和不同意见的“文革”式的做法，当然遭到了许多单位领导人的抵制。理由很简单，这些反对意见由来已久；更重要的是，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学者拳拳爱国之心不容怀疑。观点是否正确，另当别论。

就拿孙越崎老人来说，一九八五年，他已是九十二岁高龄，却以惊人的毅力，与其他七位老专家一起爬山涉水，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三十八天的实地考察。目击者说，孙老不要人搀扶，精神矍铄，真是难以想象。

对反对意见的作用评价很高的潘家铮，听到那些过格的故事后，直皱眉头。

他对两边的过激行动都有看法。

他作为主上派的关键人物,实际上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科学家和论证技术总负责人,必须牢牢地站在科学的和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听取意见,并将正反两方面意见的有益成分归纳吸收进来,为决策提供没有任何偏见的参考;一种是艺术家,对三峡,他有态度,有梦想,有激情,而梦想与激情被前一种角色的社会要求给压抑了。他必须寻找一种渠道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找到了文学。

一九九一年,他在《大江文艺》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三峡梦》。

六

为了实现“三峡梦”,潘家铮也拿起了剑,向对方扔出了白手套。

潘家铮首先做的梦是一个恶梦:

他乘时间机器,穿过时间隧道,来到同治九年(一八七零年)的湖北宜昌城头。他看到,“长空漆黑如墨,大地阴雨怒号,整个四川、湖北笼罩在暴雨云团之下。那雨,倾盆倾缸,无休无止,百川千溪,各汇长江。江水日升夜涨,四天之内长江流量由四万秒·立米猛涨到十万秒·立米。城里乡下,不论是官吏百姓,富豪平民,都面如死灰,烧香磕头,祈求上苍开恩。”

半夜里突然锣声四起,哭天喊地,“大水进城了!”全城乱作一团。他混杂在逃难的人群里面,拼命奔跑。“可这两条腿又怎能逃得出这全城灭顶之灾呢!一个巨浪打来,我被卷入浊流之中。等我再睁开眼,我已在空中飘荡。我明白自己已成为百万

水底冤魂之一。低头一望，滚滚江流，无际无涯，南扑洞庭，北吞江汉，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一座座城池和一片片乡村。江湖已连成一片，什么江陵故郡、公安新城，什么松滋、石首、监利、嘉鱼、咸宁、安乡、华容……全部消失了。”

这便是著名的一八七零年千年一遇的大洪水。

这是三峡工程锲而不舍最根本的动因。

水灾惨状，不忍卒睹。潘家铮赶紧钻进时间机器。“这一次，我飞进了已经是小康水平、繁荣昌盛的二十一世纪。”不幸的是，一八七零年的水灾正在重演，数百万生灵涂炭。

近几百年的水文资料证明，长江枝城站洪水、流量超过八万秒·立米的有八次，其中超过九万秒·立米的有五次，一八六零、一八七零两年则超过了十万秒·立米，而下游防洪的安全泄量只有六万秒·立米。

据我所知，“长办”（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同）一万二千多人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从事水文勘测基础工作。全流域共有基本水文站八百九十四个，水位站一千四百一十八个，雨量站四千六百九十七个，长办还有水文勘测队七个，河道观测队十个，整编水文资料站九万一千九百三十四个，年刊布二百三十九册。河道观测共刊布二十三册资料。

为了搞清历史洪水情况，从五十年代开始，长办即组织了雄厚的力量调查历史洪水，即进行所谓的“水文考古”，查得一一五三年以来，重庆至宜昌六百公里河段一千二百处洪痕，特别是对一七八八年、一八六零年、一八七零年等特大洪水的调查，有相当高的精度。

长江数百年水文资料的完整和权威，远近闻名。

一九六二年，存放水文资料的大楼发生爆炸事件。毛泽东闻讯后，大为震惊，焦急地问中南局书记王任重：

“水文资料损失没有？”

“没有。”王任重肯定地说。

毛泽东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长办这套水文资料是长江流域唯一的一套完整的水文资料，如果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当即请王任重转告林一山，将水文资料复制四份，分置全国各地，以免毁于一旦。长江洪水不治，永远恶梦不断哪。

潘家铮做的第二个恶梦，便是三峡大坝与战争威胁。

……某核大国发生军事政变，希特勒元首上台，潘家铮奉命充任元首战略咨询。

此刻正在召开帝国军事会议。其中心议题是，趁洪水季节炸掉中国三峡大坝。

“元首”，潘家铮慌忙进言，“洪水季节不行，中国人为了拦洪冲沙，三峡水库在汛期放得很低，造不成太大损害。”

那就推迟两个月炸！元首一脸不快。

这时安全顾问斯勒杜博士站起来，小心建议：“中国人有好些氢弹，火箭命中率又高，动手前我们是否把大城市疏散一下……”

“不行不行”，潘家铮连声大叫，“中国人的卫星满天飞，要是这么大动干戈岂不等于告诉他们要打仗了，他们只要几天就可以把水位放低。”

“不行也得行”，博士横了一眼说。“炸三峡就是大战揭幕。中国人能不报复？！不疏散，风险你能担当得起？”

元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果断下令：“传我的令，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一级城市和基地疏散，限七天完成，第八天我要按电钮了，三峡大坝一垮，半个中国被淹，三江两湖之人尽成鱼鳖，第十天我就可以接受他们的投降。”

“元首，你千万不要上当。要做长期战争准备，争论三峡修不修时的用词。要知道中国是个弄文字游戏的国家，用起形容

词来是不怕亏老本的。他们的诗人李白曾说过‘白发三千丈’，实际上三十厘米都不到，差三万倍呢，你怎么当起真来了。”

“胡说，炸掉三峡还淹不了武汉、上海？淹不死她一两亿人？”

“哪有的事？只能淹掉宜昌一带。至于说武汉，江里的水位还上不了坝顶呢。”

“你这狗娘养的，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元首大光其火。

“元首，在我投靠你以前，我是中国三峡工程论证技术总负责人，个个报告和试验成果我都看过，还能不清楚？！”

“他妈的中国人！”

元首气急败坏。

他掏出手枪毙了一个人后，又把枪口对准了潘家铮……

一九九零年四月，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与会代表都在大厅等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

原总后勤部副部长、政协委员胥光义将军站在第二排。他转过身对第三排的防洪专家组顾问陆钦侃先生说：

“老陆，你看了那篇关于人防的发言没有？说得不对。”

陆钦侃急忙介绍站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这位是老殷，那是他的发言。”

殷之书教授，总参工程兵顾问，总参工程兵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一九六零年开始，即在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种炸坝溃坝评估。评估意见认为：第一，现代战争有预警时间，三峡工程有足够的放水时间。第二，溃坝后，荆北地区和下游广大地区不会一片泽国，只是局部危害。

在这短暂的当口，便有一番唇枪舌战。

“这么大个事情，你们工程兵就能定吗？”胥光义问。

胥光义将军在总后工作时，专门负责研究战争和突然袭击情况下的后勤保障，在政协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

“不是工程兵定的，是总参定的。”

“总参哪个部门定的？”

“一九八五年总参谋长联席会定的。”

胥将军听一愣。总参谋长联席会议无疑是军方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层次。这消息从未听说过。因为在此之前，军方意见都是以总参工程兵专家的名义发表的。

“我们六十年代就研究突然袭击。”胥将军笑着说。

“现代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殷教授委婉地反驳说。

整个论证期间，随处可见这种背景复杂、局外人很难听懂의 争论。

真是“谈笑间，灰飞烟灭”。

七

潘家铮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生态环境问题。

加拿大一批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加筹组了“国际生态环境法庭”，审判十座大坝，三峡大坝首当其冲。

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河流网系会议上，各国专家把三峡大坝列为世界二十座可怕的大水坝中的第一位。

一九八八年，由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研项目领导小组编写的《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其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产生的影响，有弊有利，但弊远大于利。

内压外迫，不胜其力。

他正在经受一场恶梦。这是他的《三峡梦》中最让他痛苦的一场梦。

他梦见自己被押上“国际生态环境法庭”的被告席。

检察官的公诉书说：

“自从世界上出现大坝这个家伙后，森林遭毁，河道变态，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大坝尤为首恶。被告置世人反对于不顾，悍然主张修建这一超级坟墓，使库区良田沃土尽沉水底，百万移民流离失所，泥沙淤积，长江驼背，地震频繁，库岸崩坍，航道堵塞，破坏中国生态，祸延全球，务请法庭依法严惩，以警效尤！”

没有律师为他辩护。

他只好自己为自己辩护。

“庭上，起诉书所称，纯系不实之辞。三峡库区并无亚马逊森林，三峡调节库容，不到河道总径流量百分之五，何致于森林被毁，河道变态？三峡水库及河道型水库，排浑蓄清，永久使用，‘长江驼背’实属无稽之谈！建库淹地三十五点七万亩，其中水田十一万亩，仅占有关县市耕地总面积的四十分之一，‘良田沃土尽沉水底’缘何而来！移民皆安居乐业，城镇均新建扩建，库区桔园如云，工厂鳞次栉比，农民收入成倍增加，加之每年从发电收入中提成建设库区，使昔日贫困之地一跃为富饶发达之乡。若无三峡建设，何谈这云泥之变？原告席中库区代表空缺，实在令人不解。至于说地震频繁，航道堵塞，更是幻觉梦呓，全非事实。”

“胡说，三峡建坝，弊大于利，天下人皆知，你还敢抵赖？”

“庭上，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有利有弊，此在‘论证报告’中述之详矣。依我看来，利之大远胜于弊。中游洪灾已得到控制，千里平川免受分洪之累，此其功之一也。三峡水电站替代了十八座百万千瓦之火电站，减少巨量废气毒气排放，全球为之一爽，泽被子孙万世，此其功之二也。八百里洞庭已近湮废，今日湖库相济，洞庭烟波，长留华夏，此其功之三也。试问检察官对此等丰功伟绩何不稍稍提及？”

“被告狡诈万端，妄图逃脱罪责。为建三峡，张飞庙、孔明碑、牛肝马肺……百里画廊，千古胜迹，尽数消失。人类付出了何等惨重的代价！三峡乃人类之共同财富，中国无权处理。未得海外华裔的首肯与国际认可，被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三峡长眠库底，罪该万死！”

潘家铮抗辩说：“庭上，公诉人说三峡长眠库底，实系缺乏常识。三峡两岸重峦叠嶂，隐天蔽日，三峡建库后，汛期前水位抬高不及八十米，又如何使三峡沉入水底？建库以来，消失者唯恶礁险滩，减弱者仅若干河段之‘峡感’耳！然瞿塘不失其峻，巫山更增其秀。云雨依然，烟波不减，加以大坝锁江，巨轮登天，天然胜景与人工奇观交相辉映。旅游事业之繁荣前所未有，岂非明证！至于孔明碑、张飞庙，乃后人缅怀先贤所建，卧龙先生从未在碑上挥毫，翼德公亦不曾驻马庙中，依式迁建，足资凭吊。牛肝马肺不过两块钟乳石，今日人体器官当可移植，牛肝马肺取下另粘又有何妨？”

“审判长！三峡水库不仅毁我人间仙境，而且残及珍稀物种。库区固遭灭顶之灾，下游中华鲟、白鳍豚亦近绝种。如此可爱之物种即将消失，我人类心中岂能安逸？上帝岂能宽恕者乎？”原告端出一只奄奄欲绝的白鳍豚。看上去，端的可怜。

“庭上，库区并无特殊珍稀物种。中华鲟、白鳍豚之危在于滥捕乱杀。经中国政府及生态学家的努力，已得到有效制止。现已不断生息繁殖，丁口日旺。不唯如此，一切受影响的生物，均有专款改善补救，务使人物共荣，同享太平之福，岂不懿欤！”

“被告避重就轻，负隅顽抗。须知三峡利在明处，弊在暗处。暗中这弊，至重至大。中游数千万亩农田将成沼泽，河口大上海之命运亦已堪虞。理论上言之，建库必然影响到下游，无可否认。”

“庭上，三峡水库对天然流量之调节幅度至为有限，且均在

天然变幅之内，何致于千万亩农田化为沼泽？上海远离三峡一千八百公里，建库影响微不足道。若非从理论上推断不可，则在三峡撒泡尿亦将污染上海，甚至影响大洋彼岸。难道法庭能据此对撒尿者课罪，或受理美国政府之抗议乎？”

潘家铮不顾法庭警告，继续慷慨陈词：

“庭上，千百年来，人类为了生存与繁衍，对自然界只知索取，不加保护，以致恶果丛生；森林消亡，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环境污染。因此，目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此理所必然，人所共愿。但亡羊补牢固为重要，因噎废食则大可不必。言过其实，更非科学态度。三峡工程是功是罪，事实俱在，请庭上明察。”

此刻的潘家铮，活脱脱一个血气方刚的愤怒诗人。与那正襟危坐的谦恭长者判若两人！

法庭的宣判出乎意料，我们的诗人将被“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诗人在梦中大呼。

“公理何在！”

诗人的敏感和心理压力，不是没有人间依据。

三峡大坝修成蓄水后，四川奉节夔门旁的白帝城将四周环水，成为一个孤岛。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说，将来应该像杭州岳王庙那样，在白帝城铸三尊像，一女居中，二男居左右，都面朝长江跪在那里，女的是×××，左男是×××，右男是一红脸汉子，代表那些积极上三峡的头脑发热的人。让小孩子们朝他们撒尿。

在这位老教授眼里，那些主上派，足以与岳王庙前秦桧夫妇同类，千人唾骂，遗臭万年。

八

潘家铮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人，生性柔韧，含而不露，即使发火，也很有节制。

看得出来，他不善交际，亦不善直而答辩，却有一手好文章。他内心世界波澜汹涌，却在表面不著声色。

所以，他一回家，就钻到书房里不出来，全不顾夫人和女儿的反反对，全神贯注向这无声的世界倾诉肺腑之言。

他不习惯这种争斗、倾轧，不习惯互相嘲弄、攻讦，不习惯敌视、诅咒。他多次说，他要去“改行写小说”。

他曾在能源部总工程师办公室里，用一种极其温暖的语调回忆他写第一篇小说的情景：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小孩子喜欢看小说可以理解，可我迷进去了。我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也是搞文的，却是个十分古板的人；抗战爆发后，还不忘在兵荒马乱中以经史课子。他把我关在小阁楼里，每日除做些算学外，还要讲授一段四书或古文，第二天必须背诵出来。我在万分枯燥之余，发现了一个秘密，屋角一个霉烂的木箱里竟藏有大量的诗文和小说。从此一切活动皆废，终日沉醉其中。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故乡旧书店能买到的小说，都被我看遍了。什么调词唱词，新小说、古小说、民间文学，真是奥妙无穷。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写好后，心情十分激动，悄悄地用纳鞋的麻线装订起来，仔细放好，想看时，便翻出来……”

一九八七年秋天，论证正紧张的时候，潘家铮率代表团赴法国考察，因为经费紧张，他们住在巴黎市中心一家叫

“ARGENSON”的小旅馆里。

北京与巴黎，八个小时的时差，生物钟很难调过来，晚上难以入眠。

这位来法国考察大坝的中国大坝专家，每天晚上都不停地写，十月一日，他完成了以留法学生真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花都遗恨》。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老先生一九九一年再次访问法国时，偏偏又带着这篇小说，远渡重洋，在巴黎将第三稿改定。仿佛这次访问让他期待了四年。

这种寻找艺术感觉的虔诚，这种无须解释的执著，着实能让那些专业小说家汗颜。

潘家铮有一个梦，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三峡梦。他自己曾明确地说过，三峡工程也不是个理想的工程。这个梦当然应该是为理想而构筑的梦。

对于这个功成名就，有着崇高威望的大坝专家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梦呢？

九

真正做三峡梦的人，是毛泽东。

三峡，确实是梦幻般的地方，确实是个能勾起人无限遐思的地方。

毛泽东朝三峡走来了。这位伟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以其开国封疆的宏大气魄，以其改天换地的伟大理想，为三峡塑造了一个更新更高更有魅力的境界。

一九五六年的一天，长江三峡这一巨大的历史舞台正上演

着最辉煌的一幕：江水湍急，惊涛拍岸。千帆掣过，飞猿啸哀。高唐神女，裙裾袅袅。巫山云雨，梦魂萦绕。多少英雄豪杰，今天荟萃于此，觥筹交错，对酒长歌，寻找着昔日的风骚。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吟诵那气度恢宏的诗篇《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如此磅礴的境界，可謂是占尽了人间风流！

两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便把“高峡出平湖”的理想，端上了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桌面上。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泛滥成灾的历史误会。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读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的。一方面为毛泽东诗篇的魅力所倾倒，一方面又认为“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乃诗人之一时兴起，便在其神圣的光环下被鼓噪为长江治理之蓝图，并被草率地作为三峡工程毫无根据的“总动员令”，以此证明三峡工程早期决策之幼稚和荒唐。

这似乎不太公平。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更是一位伟人，是一位立志改天换地的政治家。与当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有所不同的是，他是那种带着浪漫色彩的政治家，他是那种能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宏大理想变成华丽乐章流传千古的政治家，一句话，他是一位充满了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毋庸讳言，这种政治家品格曾在近几十年，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不懂经济，曾经带着诗人或开国元勋的自信对他的秘书、电力部水电工程总局局长李锐说：世界上还有比打仗更困难的事情吗？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吗？然而恰恰是在治理长江和三峡问题上，他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以至抱恨而终。

十

三峡筑坝，蓄洪发电的思想，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提出“闸堰”开发的想法后，一九四四年，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提出了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的“潘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另外一个美国人——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世界著名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的极大兴趣。经过实地勘察，萨凡奇在中国同行的帮助下，于四川长

寿县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他在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信中说：“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四十年来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甚幸。”

早期真正推动三峡工程车轮飞转的，就是这位萨凡奇博士。

在局外人看来，萨凡奇是个神秘的人物。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神力推动三峡？

当时在美国，他是公认的大坝杰出设计师。“二战”前，他提出要在美国西北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世界最大的大古力坝。一九三八年，美土木工程协会在芝加哥集会，斥责萨凡奇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到一块不毛之地建坝，是不是老糊涂了？结果是，罗斯福总统力排众议，支持了萨凡奇。致使大古力水电站在“二战”期间为战时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电力，也为西部带来了繁荣。因此，务实的美国舆论认为：萨凡奇赞成的事一定是对的，萨凡奇想干的事一定能干成。

更重的砝码是，萨氏来华前，已设计建成了六十多座大坝，包括居世界四座最大水坝之列的美国鲍尔德坝和大古力坝。其权威享誉世界。

萨氏来中国时，已是六十三岁。

他是个古怪的美国老头。大个儿，大块头，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沉默寡言，除了谈工作，什么都不谈。待人接物，按照曾在长寿县陪同过他的陆钦侃先生描述说：“很认真，很老实，很严肃，不太爱说笑。但是没有权威的架子。”他唯一的爱好和乐趣是，早上在长寿龙溪河的山上跑步。

他在美国的生活似乎也很单调。他早年丧妻，一直鳏居，家里由一个老姐姐操持。在丹佛进行三峡初步设计时，他对中国工程师很友好，经常请到家里去聚餐。

他是个固执的老头。他到中国后，即要求踏勘三峡坝区。

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宜昌，在三峡出口南津关，能看到日军前沿阵地和钢盔的反光。日机还经常到三峡区沿江轰炸。因为太危险，当局请他放弃踏勘计划。

老头干脆立下“遗嘱”，以表示生死在所不惜的决心。

那架式，像是去追求一个永恒的恋人。

在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兼江防司令吴奇伟将军的陪同下，萨凡奇完成了长江三峡区历史性的踏勘。这次踏勘的重要成果，就是选定南津关作为三峡水库的坝址。

一九四四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将“萨凡奇计划”托请在重庆访问的美国战时供应局唐纳德·内森转交罗斯福总统。据美籍华人、著名水利专家徐怀云先生回忆说“白宫将此世界最大水利工程透露给新闻界，轰动了全球！”

这是中国三峡大坝——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也可能将后无来者的水利工程，第一次向世界亮相。

在萨凡奇的推动下，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政府先后派出了五十四名由徐怀云先生为领队的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进行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短缺，完全丧失了一个巨型工程所必需的社会环境。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初步设计被迫中辍，人员遣散。

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在“长江”舰上，向雄心勃勃的毛泽东重温三峡旧梦。

十一

林一山突然接到中南局的通知：毛泽东要在“长江”舰接见他，并要他陪同毛泽东巡视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已是上午九十点钟,平时喧闹的汉口码头出奇地清静。

突然从入口处开进几辆黑色的“吉姆”轿车。毛泽东在罗瑞卿、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专用码头的“长江”舰。

“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缓缓驶离码头。这是满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次巡视长江。呵,长江!苏子瞻在“念奴娇”中说什么来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宽阔的楚江,长长地舒展开,稳稳地托着“长江”舰航行。九江登舰时,也是个春光明媚、朝霞满天的清晨。岸上的群众发现了毛泽东,一下子都聚拢到长江岸边,朝着渐渐离去的“长江”舰欢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走出舱来,凭栏向岸上成千上万越来越小的群众挥手致意。

林一山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被这种场面震撼了!

林一山在汉口登舰后,毛泽东即在二楼卧仓里接见了她。

“你见过我没有?”毛泽东问。

“见过。”林一山说。

“在哪里?”

“西安事变后,我是白区代表,去延安开中央会议时见过您。”

那时的毛泽东,面容憔悴。

十二

在新壁街四十七号，我与这位埋在沙发里的双目失明的老人交谈着。我实在是弄不懂，当初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而不是别人，来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林一山是传奇般的人物。

翻开他的履历，在他当“长江王”之前，实在看不到“水”的影子。

南下之前，林一山任辽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南下时，任南下工作团秘书长，一九四九年赴南京接管国民党“YVA”（“扬子江流域委员会”），回到武汉后即改行水利。“不，抗战时期，我搞过水利。”主人纠正说。

那时，林一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当游击队司令，曾经试验过旱地改水田。“《解放日报》还登过我们的经验呢！”他说。

细一想，倒也确有个“水”字。可是，在田边地脑挖几条蛔虫般粗细的引水渠，跟在中华民族的大血脉上叱咤风云，与天下英雄博弈，实在有天壤之别！亏他敢说。

他作为白区代表去延安开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前，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是：为了能去延安开会，又不被校方发现，他想了个绝妙的主意。他糊了个大信封，大信封里套了几个写好了地址的小信封，然后寄给家乡的姐姐。信中嘱咐，按期将小信封发回北平学校，发完为止。他跟校方说：家里逼他回家娶媳妇。获准后，即朝向之往之的革命圣地远走高飞了。

校方还蒙在鼓里，隔三岔五地收到山东寄来的信——那些

事先写好的证明林一山在家乡“度蜜月”的信。

再翻开他的履历。

林一山，山东文登县人，1935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闹革命，搞地下活动，经常不上课，点名簿“林一山”的名下都是“缺席”的符号“○”。都是“缺席”，早晚会被撵出校门。于是他找到教务处同情革命的青年教师，自己拿过点名簿，统统在“○”下加了“—”，由“缺席”“○”变成“迟到”“⊖”。从此，“迟到”便成了林一山的代名词。那么，对水利来说，他也算是个彻头彻尾的迟到者。

正是这位“迟到者”，鬼使神差，一九四九年放弃了继续南下赴广西给张云逸当副手的机会，不爱当官爱水利，一头扎进长江，在武汉组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革命家向水利专家的转变，在长委实力很强的知识分子群中树立了很高的领导和技术权威，对毛泽东关于长江的治水思想有着重要影响。

十三

毛泽东是有备而来。

毛泽东是带着治国安邦的宏伟设想来找“长江王”林一山的。

当时的林一山已有较强的实力。一九五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出色地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闸。他手里掌握着新中国草创时期任何单位和部门都绝不具备的技术力量。

毛泽东问林一山：

“你有多少工程师？”

“二百七十个。”

“工程师讲百呀！”毛泽东眼睛一亮。

“有多少技术员？”

“一千多。”

“呵，技术员讲千呀！”

毛泽东没想到林一山手下有一支如此庞大的技术队伍。

简单地寒暄后，毛泽东即切入主题。

“北方水少，南方水多，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毛泽东问。

“可以。”林一山答。

“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

“为什么？”

“我不敢那么想。”

毛泽东展开林一山带上舰的纪念《申报》创刊六十周年印制的《中国地图》。

他用红蓝铅笔指着四川北部的白龙江问：“白龙江水大，能不能调到秦岭以北？”

“不行。”林一山说。

“为什么？”

“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水越大，但是地势低了，秦岭高大，打洞过不去呀，既不经济，又不可能。上游工程量小，但是水小，不划算。”

毛泽东觉得言之有理，便没有再问。他又用笔指着嘉陵江干流上游的西汉水问：

“这里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道理和白龙江一样。”

接着笔又指向汉江：

“汉江呢？”

“有希望。”

毛泽东见林一山回答得那么肯定，追问道：

“你说有希望，道理何在？”

“汉江与黄河、渭河平行，中间只隔着秦岭伏牛山。越往东，山越小地势越低，水量越大，引水工程却越小。”

毛泽东顿时精神振奋。他在汉江干流陕西汉中以下的一个小峡谷上划上一道红杠：

“这里修个坝行不行？”

“可以。但是水小。”他又沿汉水在陕西安康以下的位置划了一杠：

“这里行不行？”

“也不太好。”

红杠又划到湖北均县。

“这里行不行？”

“这还可以。”

回答比较勉强。

毛泽东又把红笔划到了丹江口。

“这里行不行？”

“这里可能最好！”

“为什么最好？”

“这里是汉江下游，水量充足，而且引水不用过洞，又在巴山脚，保持着一定高度。这里我们作过规划。但是没有考虑南水北调的问题。但是很有希望。”

红笔又指向丹江口以下。”

“再往下呢？”

“那可不行了。”林一山说。“再往下游，河谷变宽，河水进入南阳、襄阳平原了，没有高山，没有条件建高坝。”

毛泽东立即说：“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给我写信，不一定要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一张大地图，一条汉江，从上游到下游，被毛泽东的红笔一道道拦腰切断。

那气势仿佛在说，我就不信，南水不能北调！

这种焦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南北雨量差距很大，南方诸河平均年入海和出境水量都在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西南水资源更是丰富，而且开发利用程度很低，平均年出境水量占天然年径流量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河川径流量几乎全部流出国境。而北方的海、滦河入海比重只有百分之五十六，黄河百分之六十二。而且黄河和海、滦河流域入海水量占天然径流量的比重随年代递减的趋势很明显。枯水年份，入海水量的比例更小，如一九七二年海、滦河入海水量只有二十九点七亿立方米，为该年天然径流量百分之十五点九。八十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一九八三年，海、滦河流域入海水量只占当年径流量的百分之二点六。黄河历史上也多有断流现象，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连续两年都有断流。这都表明，海、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很高，缺水矛盾相当突出。不仅工农业供水不足，城市，诸如青岛、北京、西安等，甚至出现了生活用水危机。

关于南水北调的巨大水利工程是否合理可行，关于“东线方案”（利用大运河道，提升长江水，从山东入黄河），“中线方案”（丹江口引水，从郑州入黄河），“西线方案”（引雅砻江水，从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入流）孰优孰劣，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但是可

以看得出毛泽东此行长江,是想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兴利除害,维系民心,以达到权威的整合。

南水北调是“兴利”,那么“除害”呢?

二十二日,毛泽东请林一山吃饭。照例两菜一汤,味道都放的辣,而且是素菜。林一山曾跟毛泽东一起吃过六、七顿饭,只有两次荤,其中一次在武汉的“老通城”吃“豆皮”。山东人林一山,不吃辣,而且一九五二年后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吃也要吃。这是与毛泽东第二次单独吃饭,这是一个一般人看来千载难逢的机遇。第一次是前两天,毛泽东听他汇报完后。看来谈话效果不错。

林一山谈话很有魅力。他知识面广,快人快语,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旁征博引。说到兴头时,佐以手势,甚或起而蹈之舞之。党内高层都知道林一山嘴厉害,善论辩,三峡工程反对派讥之曰:“煮不烂的鸭嘴巴。”

其最大的特点是,从不唯诺,因而畅快。

饭后毛泽东和林一山来到甲板上。

毛泽东指着长江对林一山说:

“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研究得怎样?”

林一山汇报说,这几年“长办”组织了一批力量,整编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这些资料页以万计,重以吨计。

他谈到,如果汛期四川洪峰到达中下游地区时,中下游地区也下暴雨,往往极易造成大洪灾。

毛泽东警觉起来,马上问:“长江洪水的成因是什么?”

林一山说:“是暴雨。根据资料,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达一千五百毫米,一夜淹死了汉水中下游八万余人,澧水下游四万余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二千毫米。”

“真了不得！”毛泽东笑着转身问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一米八几。”罗瑞卿说。

“嗨，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年降雨量，比你罗瑞卿还要高呀！”毛泽东惊叹。

毛泽东又问道：“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你有什么设想？”

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他指着图上的大小水库说，计划逐步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修建一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根本解决长江洪水灾害。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整个长江流域，无所不谈，无所不论，纵横捭阖，十分投契。时而讲，时而论，时而问，时而答，不觉已经深夜。窗外一轮明月在天空上高高悬挂着，它注视着“长江”舰二楼还在闪耀的灯光。脸上露出几分诧异。她不明白，这间闪耀着灯光的卧舱里正在进行着一次决定长江命运的历史性长谈。江面上泛着银光，远方几星渔火明灭，在那早春寂寥的夜色中，偶尔能听见惊起的沙鸥掠过长空的哀鸣。

长江流域青、藏、川、滇、黔、鄂、豫、湘、赣、皖、苏、沪、甘、陕、桂、闽、粤等十八个省市，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此时都装进了这间小小的卧舱。

毛泽东十分兴奋。“太好了，太好了！”他在规划图上划了个大圆圈，说：“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

“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林一山说。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毛泽东说。

林一山实际上在汇报中，绕了个大弯子说三峡水库的重要

和势在必行，以试探毛泽东的口气。没想到毛泽东那么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意见。

林一山顿时兴奋起来，他说：“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紧接着又谈到了“萨凡奇计划”。

毛泽东问：“那时修三峡，造价多少钱？”

“十三亿美元。”

“美元和人民币怎么比？”

“不知道。”

“把罗瑞卿叫来……”

罗瑞卿说，十三亿美元，约合四、五十亿人民币。

“不算贵嘛！”毛泽东轻松地说。

十四

“长江”舰谈话，是严格限定在毛泽东和林一山两个人之间的。快到此行的终点站南京时，毛泽东特别把林一山叫去，嘱咐“三峡问题暂时不要公开，我只是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不需跟他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但是，经过几天长谈，林一山非常清楚，毛泽东关于长江的想法再明白不过了。他想在长江上干成两件大事：一是南水北调，一是三峡工程。前者贯通南北，使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连为一体，在我国干旱缺水的北方行灌溉舟楫之利。后者则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根除长江中下游水患，创造

一个世界奇迹。何等壮丽、何等激动人心的构想啊！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当时人的心情，可能无法体会到当时人的痛苦与喜悦。一八四零年后，一百多年的外辱内乱，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仁人志士，痛心疾首。毛泽东由一个韶山冲立志改造中国的农家青年成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领袖，他必须向全世界证明年轻的共和国生命力之所在。毛泽东的理想自然托付给了林一山。林一山本人，也有一种实现毛泽东理想“非我莫属”的气概。他曾多次对我说过，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长江的事情，“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你这么个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六十年代初，三峡论证处于低潮，中南局书记王任重和水电部长刘澜波多次有将林一山调回北京之动议，都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最知道毛泽东肚子里揣着什么心思，只要这种心思一息尚存、没有化作灰烬，林一山就不能离开长江。刘澜波见周恩来不允，便打电话给正在北京的林一山，要他跟着一块去找周恩来谈。

“我都订好回武汉的票了。”林一山说。

“把票立即退了！”刘澜波态度坚决。

“那怎么行！那样总理会怎样看我林一山？”林一山也不妥协。

他也非常清楚。他后半生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毛泽东的伟大理想，把三峡工程推上马，把南水北调工程推上马。而且这一历史使命，别人不可替代。

刘澜波见林一山是这种态度，话还没讲完，气得把电话摔了。

林一山笑着对我说：我和刘澜波闹了个“摔电话的事件”。他说：“刘澜波是好心，他想让我到水利部当官，害怕我干成几件事后，陷在长江出不来，不能回北京和他一块干。”

林一山和他主持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当然把“长江”舰谈话。

精神当作了长江规划治理的基本指导方针,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这些指导方针而努力。

今天,当我们在三峡工程走完法律的程序、把理想付诸实施的时候,去追踪和挖掘导致这个人类划时代结果的历史原因和细节,我们不能不面对“英雄创造历史”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需要有起码的心理准备,或者说需要有起码的常识:绝大多数人都注定是小人物。谁都想充当历史或命运的主人,那是滑稽和荒谬的,因为在一种错觉中生活,是滑稽和可笑的。

当我们看到“长江”舰二楼卧舱彻夜不眠的灯光时,当我们看到一个大大个子和一个小个子在长江和炮塔的衬托下相对畅谈时,我们就应该意识到,长江后来发生的事情包括三峡大坝,都是命中注定的了。

当然,毛泽东此时的三峡设想留着“天机不可泄露”的余地,一直到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严重威胁中南重镇武汉,这种设想才公诸于世。

十五

一九五四年大洪水过后,毛泽东决意要把三峡工程推向议事日程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林一山上了专门停在汉口车站的一辆专列。这时,会议厢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个人正在等着他。

刚坐定,互相简单问候后,毛泽东就问林一山三峡大坝技术上的可行性问题。

林一山说,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上,自己的技术力量

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可以完成。

毛泽东问，依据何在？

林一山说，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技术和规模与美国已建成的差不多。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相信苏联水利专家也有同样的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建，那必须等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建完取得经验后，因为丹江口水库的规模也算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工程。那样的话，三峡工程可能要晚些时间才能兴建。

毛泽东问到坝区地质情况。

林一山说，选定的三斗坪坝区是花岗岩地带，从已做的地质工作看，风化比较严重。

毛泽东担心地问：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怎样？

“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世界上花岗岩风化层最深可达百米。”

“如果三斗坪也有一百米，那么一百米以下呢？”

“一百米以下当然是新鲜岩石了。”林一山见毛泽东露出失望的神色，又补充说，三斗坪风化层只有三十米，而且可能是这一地区最深的了。而且一段坝区是片麻岩区，目前还没勘探。

刘少奇问：“什么是片麻岩？”

没等林一山回答，毛泽东使用他那张开五个手指晃动的习惯性手势，情不自禁地对刘少奇说：“好了！好了！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没有风化问题。”

这次京汉线上谈话后，周恩来即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尔加宁，请求派专家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填《水调歌头·游泳》时，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已初具轮廓，并已有了三峡建坝肯定性的结论。

所以才有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

十六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作为一个超巨型的、牵动国民经济全局的大坝,八十年代中开始的重新论证所遇的问题,在当时都是存在的,拦腰截断长江,平地起高坝,以防洪为主、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很难解决。诸如生态环境、移民、泥沙、航运、机电设备、坝工技术等等。在此之前,除了日本人外,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最大的水电站,是四川长寿县龙溪河下碛水电站,发电量只有三千千瓦。而几年后便要搞一个发电量超过下碛水电站五千倍的水电站,实在是差距很大。别的不说,发那么多电,卖给谁用?而且,移民、泥沙、生态环境等问题,当今都是世界一流复杂的重大问题,而四十年前的认识是非常幼稚的。在认识非常幼稚、技术水平不高、资金很难保障的情况下,把三峡工程仓促推上马,后果将会如何呢?

理想与现实之间,就这样无情地拉开了距离。这个距离,毛泽东即使有超凡的力量,也难弥合。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建三峡的提议,在党内最高决策层遇到了阻力。三月份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议(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草稿上批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八个字。可是分析这份决议的全文,完全可以把这个“决议”理解为一个对三峡“冷处理”的“决议”。据参加过“成都会议”并参加了“三峡决议”起草的李锐回忆说,“成都会议”是一个掀起全面“大跃进”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决

议,唯有“三峡决议”是个“调子偏冷的决议”。以至于一些主上派对此非常不满。有人曾在一个大会上说,“成都会议”所有的决议都是“跃进”的,只有“三峡决议”是“跃退”的。因为“三峡决议”无论怎么表述,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目前不予考虑。

潘家铮同意“成都会议”对三峡是“热背景,冷处理”的说法。他认为,一九五八年上三峡,无论是国力还是认识能力、技术水平,条件都不具备。在“大跃进”的情况下“热”上去,一两年后肯定要停下来,后果将是严重的,灾难性的。

林一山和现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当时三峡工程与其他建设项目不同,已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魏廷铮告诉笔者,现在的三峡方案,基本就是一九五八年的格局。魏廷铮风趣地形容他与林一山的关系,是“萧规曹随”。言下之意,眼下长江的事情,包括三峡工程,都是林一山治水思想的延续,都是在一步步实现毛泽东的生前夙愿。

“三峡决议”还能确凿无疑地证明: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与林一山和长办乐观、亢奋的情绪相反,毛泽东犹豫了。

一九五八年的毛泽东正处于巅峰状态。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逐渐生存、壮大起来,之后只用十五年便打下了江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三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人;三年实现了农村合作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着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无限魄力和权威,唯独在三峡工程面前犹豫了。

他的犹豫,把三峡问题搁置了。他考虑问题的热点已随着世界和国内局势的变化而转移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失败,六十年代初期被迫反省,进行调整。毛泽东在六、七十年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持下,对国内政治局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来解决党内斗争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去了,以致“文革”

浩劫。外部环境也很恶劣。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与中共发生公开论战,撤回所有苏联专家,蒋介石嚷着要“反攻大陆”,美国人发动越南战争,中苏边境战争……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是,在冷战的格局下,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起来。其对应的策略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建设大三线,把工厂和机器都搬到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藏起来。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建一个大坝,不是找死吗?

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当面向毛泽东请求上三峡。毛泽东慢悠悠地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二百亿方水,怕不怕?”

六十年代,毛泽东数度拒绝上三峡的请求。

今天我们考察拒绝的原因,除了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自己说的泥沙以及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外,其他几次都是“战争”。

其实技术问题是次要的,或者只是某种敷衍。打仗,战争的因素,世界大战的考虑,才是毛泽东真正犹豫的原因。

在一九六三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朱德说:三峡问题,你过去反过,我赞成,现在我也不干了。林一山哪里去了?好久不见了。

一九六九年“九大”时,毛泽东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体学:“林一山在干什么?”

“林一山靠边站了。”张体学答道。

“靠边站,有问题没有?”

“没有。”

“没有能不能站出来呀?”

其实,不管国内外局势如何恶化,毛泽东仍是念念不忘林一山,念念不忘三峡梦。他曾伤感地对人说:将来我死了,三峡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呵!

与三峡结缘,并在关键时刻影响了毛泽东决策的,还有一个

重要人物：李锐。

恐怕在将来三峡大坝建成后的祭文中，也断然漏他不得。

十七

李锐也是个精力过剩、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他比林一山小七岁。略胜林一山一筹的是，他耳聪目明；又略逊一筹的是，哮喘病把他搅得寝食不安。而林一山眼不见，心不烦，放宽了心养老，身体棒棒的，放出大话来：“我这身体，感冒都不会得。”

李锐住的北京医院 404 病房，哪像病房，完全是个大工作室。桌子上堆着书，抽屉里、柜子里藏着各种各样的资料。他正在赶写一本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书，医生也拿他没办法。星期一、三、五和星期天，家属探视时间，他夫人瞒着医生，大包小包的资料、书籍往病房里拎。夫人埋怨说：“整幢楼的病人，没有像他这样的。人家探视都是大包小包的水果、糕点。你看我拎的都是些什么！”

“我都七十四了，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写。比不得这些年轻人了。”

李锐，湖南平江人。五岁时丧父。其父是早期同盟会员，民国元年国会议员，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即追随孙中山赴广东参加非常国会。其母，晚清师范毕业，会写文章。李锐乃独生子，家教甚严，母对其期待甚高。一九三四年，李锐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参加学生运动，母亲亲往武汉督学。“一二·九”运动时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抗战前期加入共产党。一九五二年，李锐由湖南调任水电总局局长。按他的说法，“改行搞一点实际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任毛泽东秘书，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

打入反党集团获罪为止。他“一辈子坐过共产党两回牢”，一回是延安时期，为期一年，幸得周恩来搭救；一回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押秦城，其隔壁是陆定一。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任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现为中顾委委员。

李锐，高个，魁梧，大眼睛警觉而敏感，言谈举止间，能让你感觉到他青年时期的英俊、潇洒来。

李锐是三峡工程著名的反对派。他的后半生是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后半生，是与三峡奇缘不解的后半生。

谈起三峡，他是满目苍凉，万般感慨。“唉，就因为这三峡，耽误了我二十年大好时光呵！”

李锐仰天长叹。

十八

在北京医院，李锐送我一本《龙胆紫集》。这是他秦城监狱吟就的旧体诗集，蓝色皮纹纸书皮，一支孱弱的“勿忘我”，一扇牢房的小窗子，窗外的暮色中，一轮桔黄色月亮，清冷寂寞。这本诗集一九八零年出版后，即引起不小的反响，一年后再版。

这本诗集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是因为这是一本“拨乱反正”后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几十年来蒙冤老干部的狱中诗抄，诗中真实记载和叙述了李锐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记载和叙述了包括三峡论争在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这本蓝白皮小书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日丽云轻闻噪鸟，风恬波静绝行舟。碧光万顷独呼吸，翠色千重一览收。”“日烈波平，山静鸟啾啾。”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李锐在安徽佛子岭磨子潭水电站那与

世隔绝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了。当几个解放军把李锐从磨子潭流放地押走时，当地那些纯朴善良的老百姓才发现，这位教国文的老师，原来是一个大人物，一个京畿要犯。

李锐到合肥后的第二天，即用专机送到北京，投入北郊小汤山下的秦城监狱。

李锐的一生，享受过两次专机待遇。前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下令派专机把他从北京接到南宁会议上，听取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而这次则是作为囚罪之身，被押解回京。两次乘坐专机的性质有着天壤之别，心情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两次飞行却有着逻辑关系，没有九年前那次飞行，绝不会有今天这种结局。李锐苦笑着说：“没有和林一山关于三峡问题的论争和纠缠，我一九五八年就不会去南宁，不去南宁，毛泽东就不会选我当他的秘书；我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就不会参加，不参加，而后这些故事就全没有了。”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而人也正是在被捉弄的过程中，创造并完成了历史。

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对此，李锐也深信不疑。他认为，他人生蹉跎，是“在劫难逃”，“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庐山会议’不倒霉，往后也会倒霉！”

李锐到秦城后，单身监禁。

他的囚号是：67126。

“67”是入狱时间，“126”可能是序号。如今“126”已经成为北京最畅销的“BP机”传呼台的总机号了。但愿因此会有更多的人能记住李锐的“囚号”。

从此，“李锐”这个名字便消失了。

犯人不配有名字。

“67126！”

“到！”

“出来!”

“是!”

看守人员互相议论,也绝不说人名,只是说“67126”如何如何。

“单身监禁”,对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来说,多少有些陌生,猜想那可能像是住旅馆,不住通铺;住单间,那是你的运气,免了多少嘈杂。

八年的“单身监禁”生活下来,李锐说,这是“世界上最重的刑罚”,“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里,我也看到这种说法”。

李锐说:“据我所知,秦城单身监禁逼疯了二十多个人!”

说得人毛骨悚然。

没有身临其境,恐怖的情景是难以想象的。

李锐开始还挺乐观,以为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呆不了多久就会出狱。可一年后的一天,他看见院子里来了大吊车,监狱要扩建,他明白了:一两年他是别想出去了!

空虚、烦躁、无聊、绝望……朝他袭来。

他必须面对现实,必须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

为了保持身心健康,他开始在牢房中坚持慢跑,开始根据报纸新闻练习作诗。

当时不准带书看,只有随身一本《毛主席语录》,实在是闲得无聊,便一韵到底,吟成五言“毛主席语录歌”二百句。这些枯燥的诗句还得到了看守的表扬。

李锐在医院将发黄的“语录歌”原稿拿给我看时,让我想起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纳粹为了摧毁作家的意志,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告诉时间,也不给书看,作家后来冒死偷了一本棋谱,这本棋谱支持了他的意志,也给他埋下了精神崩溃的种子……

一九七二年底,在他的苦苦哀求下,“提审”开恩,从他六铺

炕家里拿来了二十多本书，有《辞海》、《英汉字典》、《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等。

一九七三年，有一回跑步，不慎摔伤了肘关节，找医生要了点“龙胆紫”和棉签。上药时，突然灵机一动，发现可做“奇墨怪毫”，用于书写。后来李锐有诗记录当时欣喜若狂的心情：“怪墨奇毫不废书，今朝发现喜何如！鲋鱼涸辙忽天雨，病叟怡然一榻居。”

到目前为止，我都不太明白，像李锐这样单独关押的高级犯人，已经完全与外界隔断了联系，也就是说对政权或者任何组织都没有威胁，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支能书写的笔？防止自杀？有这种先例吗？

这之后，哨兵发现李锐在牢中的行为有点古怪。他总是靠墙坐的床头、面朝着哨兵的监视孔看书、规规矩矩的样子，一坐便很长时间。这种姿势一直坚持到一年后被哨兵发现为止。这时，他已经用棉签蘸龙胆紫，在两卷集《列宁文选》上的空白处吟抄了几百首诗词了！这严重冒犯了监规。《列宁文选》被没收了。

但是，龙胆紫和棉签并没被拿走。

李锐又继续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空白处写。又被发现没收了。

说和写，冒险也要说和写，这是文人的一癖。仿佛说和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形态，如同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丢了，便会魂不守舍。可这监狱，就是剥夺你自由权利的地方，包括剥夺了你说和写的权利，或者说剥夺了你自愿想说和自愿想写的权利。这种要求非常之低，只是想将一个健全的大脑所思所想的东西袒露无误地表达出来，只是想以一种幻想的自由空间里将那不安宁的灵魂停放一会儿，只是想将一生无限的爱与无限的憎说给根本不存在的读者听或说给自己听，只是想面对着铁窗面对

着厚墙悄悄地倾诉久久压抑在心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是想用凄风寒雨轻轻地弹奏起那落满尘埃的记忆琴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应该宽恕诗人的“胡涂乱抹”，他们甚至应该和美丽的诗一起帮助诗人回到十多年前风流倜傥、叱咤风云的年代……

十九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

李锐此行，给毛泽东急于上三峡的想法泼了盆冷水，可是毛泽东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一反常规，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着大家的面，突如其来地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打趣说：“李锐，你中了状元。”

李锐在此之前，并不熟识毛泽东。他曾写过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流传颇广，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见过他。

事情来得太快，没容他认真地想一想，一切便成了不可更改的现实，他由反对上三峡而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

“南宁会议”实际上是准备“大跃进”的“成都会议”的预备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毛泽东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说，把林一山接来。

当即有人提醒说，林一山赞成三峡，也有反对搞三峡的人哟！

毛泽东问：“谁？”

“李锐。”

“那把李锐也接来。”

一位是三峡工程的积极推动者，一位是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者。在毛泽东的调度下，两个人在邕江水畔相遇了。

在会议饭厅吃晚饭时，人们笑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这是三峡论证史上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

二十

其实，在南宁会议狭路相逢时，林一山和李锐就已经打了两年的笔墨官司。

他们是老相识、老“冤家”了。

一九五六年，《中国水利》五、六期合刊，刊登了林一山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针对林文，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也以个人署名的形式回敬了一个两万字：《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并组织了一批专家分别著文，在当年的《水力发电》“长江规划专号”刊出，就长江规划总的指导思想、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要了解五十年代三峡论争的焦点，林、李二人的长文不可不读。

林文认为，“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长江流域规划第一期计划即完成拦洪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公方”。根据防洪要求，第一期工程的枢纽“必须以大库容控制主要洪水来源为首要条件”。“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有巨大的防洪库容，在正常高水位二百三十五公尺时，有效库容可达一千一百五十至一千二百六十亿公方，……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

林文认为,三峡工程可改善川江航道,保证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城陵矶与重庆之间(注:后因修了武汉长江大桥,万吨轮不能过桥,此说改为“万吨船队”)。发电方面可以装机二千三百万千瓦,每年发电一千五百亿度。

李文则认为,“综合利用是规划河流的唯一总方针和总原则”。林一山把防洪问题绝对化了,特别是强调干流三峡水库解决防洪问题,实际上离开了综合利用的原则。而且三峡方案并没有从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和可能给予充分的保证。

李文指出,要建三峡大水库(二百三十五米高程)满足防洪要求,回水将至泸州,迁移人口二百一十五万,重庆大部分被淹,不能“武汉永安澜,渝州可淹没”(《龙胆紫集》一百二十八页)。防洪和发电可以“先支后干”,分步实施。

从国家投资能力分析,李文认为,三峡投资巨大,而用电企业投资一般约为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到十倍,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修建三峡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尚不能解决。

简单地归纳起来,长江流域规划林、李争论的根本要点是:林一山认为,首要防洪,先干后支,一步到位;李锐认为,应综合考虑,先支后干,分步实施。

这便是水利、电力界著名的“林、李之争”。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分析一九五六年关于三峡工程的公开论战,作出一些客观判断是不难的。

很明显,林文的规划思想,有着“‘长江’舰谈话”和“京汉线谈话”的背景。而这时的毛泽东对现代科技、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知识和经验还十分缺乏,甚至没有“数”、“量”的概念。林一山在南宁会议用“剖面图”讲解三峡大坝时,毛泽东问:“这是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林文规划显然把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而李文的可贵之处在于，里面包含了“经济”的思想，包含了“动态”和“综合”的方法。很有些超越政治势情的理性。

两文应该有很强的互补性。可惜，一些非常好的意见未能得到及时的利用，反而演变成为怨怨不解的根源，演变为打击对方的政治判断素材。

因为涉及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三峡论争的高层化就成为必然。

二十一

事出蹊跷。一九五八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李锐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第二天乘专机经武汉接上林一山飞南宁。李锐问会议内容，办公厅负责人说：“电报上写的是讨论三门峡事情。”

“讨论三门峡问题？”李锐纳闷：“三门峡正在施工，没发生什么问题呀？”

又忽然想到飞机要到武汉接林一山，必定是讨论三峡问题。电报很可能是多了个“门”字。于时，立即请一位老工程师赶制了一张全国各大水系近期远景应予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示意图。

飞机到武汉后，林一山和他的秘书魏廷铮已经在机场等候了。

两个冤家第一次迫不得已坐到了一块。他们互相礼貌地打了招呼，举止多少有些不自然。这两位长江上的风云人物，一路无话，然而“知己知彼”，互相都知道此时此刻对方肚子里念的是什麼经，都知道南宁“御前会议”将等待着他们的是分庭抗礼、一

场你死我活的激烈厮杀，心里都把对方的分量掂量了一遍。

林一山和魏廷铮在商量着什么事情，李锐则看着窗外的风景，大家都故意保持着一段距离，作出互不相干的样子。

李锐，林一山，他们至今还保持着距离。这对有趣的冤家老头，曾经互不相让，当庭论辩，甚或嘲笑挖苦、讽刺攻讦，却又私下互相倾慕，绝不敢小觑了对方。

李锐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他调到北京之前，湖南省委几位负责人参观荆江分洪工程，林一山“天文地理侃侃而谈”，李佩服林“很博学，知识丰富”。

李锐曾对作者说：“毛泽东、林一山谈话都很有魅力，都是人物。”

林一山也曾对作者说过：“李锐大个，长得可英俊了，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夫人原是重庆一枝花，要不然怎么会跟他？南宁会议时，拿了张水电站分布图，一目了然。”

所谓都是“道”中之人。

李锐“单刀赴会”，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他反对上三峡的意见十分不利。此行可谓是“凶多吉少”。

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一九五八年初，“春江水暖鸭先知”，再迟钝的人也感觉到了日益增长的政治热度。在农村，将要加快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准备为尽早跨入共产主义铺路架桥。经济上，超英赶美，层层加码，为即将展开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大兴水利作了舆论铺垫。

“南宁会议”也开得不轻松。

李锐中午刚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急切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当面批评了周恩来。柯庆施也攻击陈云，“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毛泽东大怒，认为周陈的作法挫伤了群众的

积极性。会议调来了由中宣部起草,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改定的《人民日报》“反冒进”社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原件。

修建三峡也作为超英赶美的一项主要内容。

预感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将来临的毛泽东,情绪高昂。反对上三峡,当三峡的反对派,往毛泽东高昂的情绪上泼冷水,李锐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李锐在这种形势下,内心略有些不安。然而,事已迫近,容不得他有丝毫犹豫了。而且,毛泽东召他来,就是要听取上三峡的反对意见。

当晚,林、李便一块参加了已近尾声的“南宁会议”。

会议室布置得很简单,中间一张长条桌,大家围桌而坐,似乎没有专设“主席”座。

林、李被安排坐在同一边,面对面便是毛泽东。毛泽东左右,坐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第一把手。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即问林一山,“你要讲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

“半个小时。”

李锐自然谦让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打开话匣子,便是滔滔不绝。他从西汉贾让治水谈起,长江二千多年洪水危害,平均十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平均五年一次,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坝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同时阐述了三峡工程发电、航运的诸多益处。他提出了水库正常蓄水位“二零零至二二零方案”,可装机一千三百四十万千瓦,年发电量一千亿度以上,投资约需七十二亿人民币。

说到投资,周恩来插话道:“少装机,装五百万千瓦,五十亿够不够?”

“够了。”

“就按你说的五十亿”,毛泽东说,“你会不会中央决定上马后,你又说不够了?”

“不会。”林一山口气肯定。

“为什么呢?”毛泽东又问。

“我们不搞‘上马预算’。我们都算清了,没算清的,从多不从少。”

苏联专家对三峡投资的估算是二百亿人民币。林一山认为这种算法,是不够了解长江的具体情况的结果。

汇报加上插话,林一山发言超过了两个小时。

李锐发言则针锋相对。他将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长桌上,引起了毛泽东和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他在阐述了三峡短期不能上的理由后说: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是经济发展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按水库高程二百米,一个装机近二千万千瓦,能发一千亿度电的大电站,何年需要投入呢?”“最乐观的估计,三峡这样大的电站,中国要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

从会场的气氛看,李锐的发言打动了人心。他看见“那些为他担心的人和担心三峡上马的人,似乎有一种宽松了一点的表情。”

李锐顿时增添了几分自信。他心中暗忖:“如同下围棋,林一山执黑先行,可是现在棋局的主动权已操在执白者手中了。”

林、李讲完后,毛泽东突发奇想,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再开三峡的会。

毛泽东还专门嘱咐林一山:“你能不能写一篇像样的文章?”

“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帮助你好不好？”

“好！省委第一书记当政治委员当然好！”林说。

毛泽东当堂命题“作文”，这一着，林、李在开会前都万万没有想到，不免有些吃惊。

毛泽东把南宁会议“林、李冤家聚头”这出戏，推向了高潮，推向了极致。

这是场异乎寻常的竞赛。

三天交卷，时间太紧了！

林一山一来手头材料缺乏，二来他的右手腕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指挥胶东著名的“雷神庙战斗”时，被日军子弹打残废，只有一只小手指尚有些知觉，平时写作就很困难。可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毅力，残废的手半握着笔，居然两天写了两万字，洋洋洒洒，提前一天交卷。

第三天早晨，胡乔木还没看见李锐有什么动静，急忙跑来找：“林一山的文章已经印发了，怎么不见你的？”

李锐说：“已经写好，这就交出。”

李锐似乎写起来更难些。他说：“我的材料更少。林一山还跟着个秘书，拎着个大皮箱，我只夹了个寒酸的小皮包。”

他写了八千字，按期交卷。

林、李两篇文章，第三天晚上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

这真是一场智力量级相当的天才较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两篇“作文”都不同凡响。

林文纵横捭阖，材料丰富，逻辑严谨，有如长篇论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长江流域规划”概论。

李文提纲挈领，观点鲜明，且行文流畅，深得毛泽东嘉许。毛泽东在会议最后，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给南宁会议的三峡问题定了一个基调：“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

“三峡的事情交给周总理管吧。”毛泽东说。

周恩来谦让道：“还是主席管吧。”

“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毛伸出四根大指头说：“你每年至少管四次！”

南宁会议，林一山和李锐的较量，或者说主上派与反对派的较量，后者略占上风。

李锐是非常聪明的。对于众多没有水利和电力知识、又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宏观决策者来说，他在介绍情况和写文章时，都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和不容易记忆、反而会影响视听效果的数据，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其深度，深深地影响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听众和读者。

在政治局这样的最高决策机构，在研究重大问题时，直接听取反对派意见，并让反对派实际上扭转了原来的形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是没有先例的，甚至在毛泽东生前是空前绝后的。

这之后，李锐参加了在长江上举行的“三峡会议”，又以“话不投机惊满座”的效果参加了成都会议“三峡决议”的起草，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成功地阻止了三峡工程被“大呼隆”上去。

当然，李锐取得这种效果，与当时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策应有关，与朱德、薄一波等人的意见有关。

李锐作为“执白者”，被毛泽东“点了状元”真是何等风光！占尽了人间殊荣！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点。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

这让李锐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回北京，他见到电力部长刘澜波，开玩笑说，这是“自投罗网”，“碰鬼”喽。

没想到，这些话，竟成了“谶语”。

二十二

此时,李锐在秦城,用棉签蘸着龙胆紫书写着以往瞬息即逝和梦幻般的风流倜傥,是一腔苦涩和怅惘。

.....

二十三

谁都没有逃过“革命”和“斗争”的洗礼,谁都没有逃过历史的厄运。

除了毛泽东和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党内几乎所有的风云人物都被撵进了“文革”的炼狱。死的死,残的残,疯的疯。

说起来,李锐还算是幸运的。秦城监狱,是国内级别最高的监狱,与外面世界的混乱、疯狂和歇斯底里相比,秦城不管是文明的天堂了!起码没有生命之虞,皮肉之苦。

老冤家林一山就比李锐惨多了。

就在李锐被押进秦城时,林一山也被“长办”的革命群众关进了“水牢”。而且还要被革命群众吊起来毒打。人一吊起来,就像挂起了一片没有生命的肉,身上所有的薄弱部分就全部暴露了。革命群众当然以满腔的阶级义愤,挑那扎实的硬杂木杠子往死里打。打死了像碾死一只臭虫,打不死的再接着打,一直打到革命群众精疲力尽为止。“长办”党组书记、老红军李庭序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林一山挺一场下来,还算运气,数一数,

只断了六根肋骨、一根腿骨，有一只腰子被打移了位。

林、李二个罹难关在牢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死不悔改”：李冒险吟“反诗”，林筑坝防“洪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了三峡主上派和反对派的某种区别。

林一山呆的“水牢”，是“长办”新楼地下室，一百多平方米，一个人住，真是够宽敞的！所谓“水牢”，因“长办”紧挨着长江，水位高，施工质量不好，水渗出来，地下室一片汪洋。

您不是治水专家吗？那就请您进水牢。

林一山一进水牢，便有事情可做了。他首先说动革命群众中的“内奸”，秘密给他拿进来些沙子、水泥和碎砖头。先勘察冒水点，然后筑坝防洪。开始技术欠佳，屡筑屡溃。后来摸索出经验，终于成功。由于全是手工操作，一双手被水泥烧烂了。他夫人张彬说：“那双烧烂的手，看上去真吓人！”

防洪成功，水牢变成了地牢。

他非常清楚，革命群众想把他在牢中折磨死。

他也和李锐想的一模一样，必须保持身心健康。所以，天天坚持在牢中跑步，天天研究筑坝。他坚信，毛泽东、周恩来早晚要把他请回去主持长江大业。

一段时间后，革命群众以为林一山早就垮了，便组织另外的革命群众前来参观林一山身心被摧毁后的狼狈样。谁想到这个老不死的家伙，还身体棒棒地朝着小铁窗外探头探脑的人笑呢！

第二天，愤怒的革命群众贴出大字报：林一山还在笑！

二十四

“九大”后，张体学传达了毛泽东解放林一山的“圣旨”。

一九七零年二月，林一山拖着被打得快散架的躯体，懵里懵懂被召到北京开计划会。

经过几年非人的折腾，一下子从地狱来到天堂，角色还一时半会儿转换不过来。革命和反革命，走资派与革命派，真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句话，分不出是非伯仲了。

开会时，周恩来大声喊：

“林一山到了吗？”

“到了。”林一山答。

“解放了吗？”

“解放了！”

“我祝贺你！”

周恩来说完，带头鼓掌，顿时会场响起了一片祝贺林一山解放的掌声。

“毛主席、周总理还惦记着我呵！”想到此，林一山一阵委屈和辛酸。

林一山哪里知道，这次计划会是准备让他唱主角的会。

计委已经起草好了一份很厚的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下发给每个与会者。可是，后来报告突然被全部收回了，没有任何解释。

看来，毛泽东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形势下，拒绝了三峡。

林一山又被闲置了。

但是，一九七零年，林一山脑子里这根弦却非常紧张。

五、六月份，林一山在武汉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即刻来北京。

正准备走，周恩来又来电话：暂时别来了，随时等候通知。

看仍没动静，林一山拔腿去了郑州。“想看看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他说。

可他到郑州后，刚进宾馆大厅，一位服务员就迎上来问：

“林主任吗？”

“是。”

“北京刚来电话，周总理请你即刻赶到北京。”

可慌慌张张赶到北京后，周恩来的秘书却在北京站告诉他：“谈不成了。总理走了。请你在北京稍等。”

谈什么呢？林一山隐约感觉到正在紧张地谋划着一件大事，一件与长江有关的大事，但肯定不是三峡。他被明确告知，他在北京，一是等周恩来，一是等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后者正率领着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后来又知道，周恩来紧急去了庐山，参加导致陈伯达下台、毛泽东南巡讲话、林彪出逃的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北京饭店，林一山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二十五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九日。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局规划处技术经济室。

我们面前这位中年汉子，技术经济室主任，操湖北口音，花呢鸭舌帽下，一张黝黑面沉着的脸，透出几分观察和警惕。

在长委这个群英荟萃的地方，他只能是一个无名后辈，一个小人物。他今年已是五十六岁。他宁愿维持现状，平平静静地生活，谁也别来干扰他。

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还会有人来翻葛洲坝的陈年老账，来翻他这个早就销声匿迹的小人物昨天的显赫和荣耀。

邱忠恩，二十二年前，在长江上可是一个红得发紫的人物，

大名鼎鼎的人物。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某种契机,在“长办”所有的技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学经济的普通技术员,担任了“长办”“三结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小组的技术人员代表,实际上负责“长办”长江事务的技术工作,提出了最初的葛洲坝工程设计报告,也作为核心人物之一,参与影响和推动了葛洲坝工程的决策。当时他可是一个坐专机的主儿。

也可能是因为那段经历是他人生经历中最值得抚摸的时光,也可能是他搞经济对数字敏感,二十二年前的事情,时间、地点,如同昨天一般清晰。

一九六九年九月,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宜昌桃花岭饭店传达毛泽东与张体学谈话要点:暂时不建三峡,要准备打仗。

在此之前,张体学曾经督促“长办”成立了“三峡坝址选址领导小组”,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夏世厚任组长,副组长由老干部、军宣队代表、工人代表和技术人员代表组成。邱忠恩是副组长,负责全盘技术业务,下设“规划班”、“枢纽班”、“施工班”、“地质班”,每个班都由工人当班长,技术人员当副班长,以体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全组约有六十多人。

不建三峡,这帮人便没事可干了。

这六十多人分别在武汉和湖北秭归县茅坪镇讨论毛主席指示精神 and 下一步打算。大家提出,不能搞大的,能不能搞小的,也就是说能不能搞葛洲坝?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个葛洲坝水利枢纽?为什么会有一个“葛洲坝方案”自天而降?

这与林一山有关。

五十年代中期,林一山与苏联专家有一场关于三峡坝址的争论。

一九四四年,萨凡奇踏勘三峡区,把三峡坝址选定在三峡的东出口南津关一带。

后来“南津关方案”被视为经典方案。苏联一批一流的专家也是如此认定。

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可不是一般意义的专家,他们的意见或学术思想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说不得,碰不得。很多地方,光是“反苏联专家”这一条,就可以定罪,就可以打成“右派”。

世界大坝权威和苏联一流专家,“南津关方案”似乎可以作为数学公理那样无需证明了。

然而,深入的地质工作结果表明,南津关地区,是“喀斯特”石灰岩地区,在“喀斯特”地区建坝,犯了水坝之大忌。

林一山对南津关坝址提出了异议,也就意味着向权威们提出了异议。他提出了美人沱花岗岩地区的三斗坪方案。

苏联专家说:在三斗坪地区建坝,“水头”损失了好几米,少发电,在经济上不划算。

对此,林一山提出了在三斗坪下三十八公里处建葛洲坝的低坝方案。这一方案基于两点考虑:一、可以利用水头补足坝址后移损失的发电量;二、也改善了三斗坪以下几十公里的航道,即所谓“反调节航运梯级”。

邱忠恩把大家的讨论意见汇总后,分别向“长办”革命委员会和生产组、钱正英和张体学作了汇报。

邱忠恩记得非常清楚。一九六九年“国庆节”那天,钱正英、张体学上午上街庆祝游行,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一楼会议室听取了汇报。

邱忠恩是主讲。

他在简单地汇报了三峡选坝工作后,即提出了“葛洲坝方案”。认为葛洲坝一可以缓和“三西”(鄂西、湘西、豫西)、“一东”(川东)用电紧张状况,二可以为三峡做准备。但问题是:一、坝

区地形空阔，防空难度大；二、会有坝前泥沙淤积。

钱正英有些恼：“在宜昌时，你为什么不提出来？我可以去看看。”

“当时，我们还没有讨论。”邱忠恩解释说。

“审查清江隔河岩方案时，总感到小了些，是个很遗憾的事情。”钱正英说：“我先摸中央的底，在大江大河搞不搞。”

“如果要搞，是先搞三峡还是先搞葛洲坝？”邱忠恩探钱正英的口气。

钱正英肯定地说：“葛洲坝。”

一九七零年一月六日，水电部发文，要求“长办”抓紧搞葛洲坝报告。

三月八日，宜昌军分区政委何镇浪向邱忠恩传达了“放弃隔河岩”，“百分之九十九要搞葛洲坝”的信息。

四月，邱忠恩等搞了“葛洲坝初步设计简要报告”。

五月，邱忠恩等到水电部汇报，水电部组织了五十多位专家讨论葛洲坝“简要报告”，认为“是个好方案”。但是钱正英认为十三点五亿投资太多了，可又说，“就算那么多吧。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

对十三点五亿的投资预算，十二月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说：“我只同意了这个工程，还没同意十三点五亿。”因为他和钱正英都知道，葛洲坝一九五九年的预算是八亿多，两条船闸，二百五十万千瓦装机，六十六米蓄水位。可新方案只有一条船闸，装机二百零四万千瓦，规模变小了，却要十三点五亿！

请注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历史事实。

在三峡论证过程中，投资规模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反对派认为可行性报告把预算打得太低，是一个“上马预算”，以达到“钓鱼”目的。理由之一，葛洲坝预算只是十三点五亿，而修完却花了五十四亿。

我们暂且把三峡投资问题放一放,先分析葛洲坝的投资预算及其动机,似乎也得不出故意“埋伏”的结论。要埋伏,应该是水电部、“长办”的一块埋伏。可周恩来、钱正英不是嫌钱算得少,而是说太多!

葛洲坝投资不准,以至后期发生大规模突破,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动乱时期,本来就是一本毫无根据的糊涂账,二是一九七二年工程被迫停工后,设计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当时资料缺乏,核算标准失度。邱忠恩说,他们上北京汇报初步设计时,只带了份很旧的地形图,坝线也就是草草地在地形图上划了一道!

回顾和剖析葛洲坝早期的决策程序是很有意思的。

先说兴建理由,除了邱忠恩从技术角度提出的两条之外,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句即是“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这在当时,可不是一句随便说的套话。

五月,在京西宾馆向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汇报时,说到战略防空,李德生说:我给你们派两个防空师。

五月二十九日,给国务院业务组汇报。虽然会议意见一边倒,末了组长李先念扔给大家一句话:现在不算数呀,要等主席和总理点头才能搞啊。

邱忠恩说:“十月份,张体学在工地传达了周总理同意修葛洲坝的态度,并召开了数万人的动员大会。我们都上台发言。发言前,先朝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挥舞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轮到林一山来发表建葛洲坝的意见时,一切都决定了。不过,毛泽东在最后签字时想听听林一山的意见。

而这时,三个民兵师、一个基建工程兵师约十万大军已经调

到了工地，那阵势仿佛是说，毛泽东签字批准，只不过是走一个形式。

二十六

历史是这样有趣。

南宁会议十二年后，林一山扮演了与李锐一样的角色。

十二年前，林一山力主三峡工程上马，十二年后，却极力反对先于三峡高坝而修葛洲坝，成了名副其实的“反对派”。据说在宜昌，“林一山反对毛主席”，妇孺皆知。

十二年的时间，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革”中期，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成了“神”，被七亿人供奉着。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简直是自取灭亡。

所以，林一山比十二年前的李锐承担着更大的政治风险。

有谁比林一山更清楚呢？

在长江规划中，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下游反调节的航运梯级。规划是先高坝而后葛洲坝，或者高坝、葛洲坝同时建成。

如今完全颠倒了。

先修葛洲坝，问题是明显的。一是葛洲坝先建，抬高了水位，会给未来高坝造成水下施工的困难局面；二是葛洲坝在规划时，工作深度不够，很多基础工作都没做，更谈不上初步设计了。所以葛洲坝是一个严重违反基建程序的“三边工程”。

林一山极度矛盾。年初刚被毛泽东、周恩来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祝贺他的掌声还在耳畔轰鸣。要么面对可能发生的恶果，随大流，苟且偷生；要么实事

求是，犯颜上谏，担着身家性命。

他选择了后者。

终于等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

参加会的有曾思玉、钱正英。

曾思玉将军首先汇报。他说：

“毛主席说，要修葛洲坝。”

“主席在哪里说的？不要强加于人。”周恩来纠正道。

当时曾思玉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还兼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林彪事件”后，他与武汉军区政委刘锋作为林彪一党被免职。

曾思玉汇报完后，林一山便起而反对。他认为葛洲坝许多重要问题无法解决，比如将来三峡水下施工问题。

“可以降低一半水位。”曾说。

“放低一半，意味着发电量就要减一半。”林提醒。

“还有这个问题呀！”曾显得有些吃惊。他是职业军人，技术问题根本不懂。

周恩来插话道：“你管这个事，不会就要学嘛！”

钱正英说：“三峡淹没没问题。长江水深四十米，减二十米，只增加二十米，无所谓。”

林一山讥曰：“三峡如果修纵向围堰，是冬季枯水季节，水深是‘零’，你增加二十米，零除二十，在数学上是无限大！”

林一山的反对意见听完后，已是中午。周恩来说：“你把反对意见写出来，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后来，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纪登奎告诉林一山，要他的反对意见，是毛泽东的意思。

晚秋季节，天气冷得紧，枫叶已是繁霜重重，但那鲜红的颜色仍不失其性格的刚劲和浓烈。

下午，周恩来便打电话到饭店急催“意见书”。

这一夜，林一山没有睡觉，洋洋数千言，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反对葛洲坝在毫无准备和违反科学逻辑的情况下，仓促上马。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把林一山的“意见书”附在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和中央批复送审稿，一并直呈毛泽东。

在陈述这段历史事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疏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是十月三十日完成的。

十二月十七日听取林一山意见。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却拖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报告中说：“现将中央批复送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二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林一山意见书一并送上，供参阅。”可是中央批复给毛泽东的送审稿的落款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生日的前一天。也就是说，可能把中央批复送审稿的日期迟填了数日或数十日，以给毛泽东的生日增添欢乐和喜庆。

周恩来煞费苦心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把葛洲坝作为生日礼物，敬献给了七十七岁的神一般的毛泽东。

二十七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作了后来争论不休的、也给后来研究者带来无限烦恼和迷惑的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书法大有怀素遗风，奔腾狂放，淋漓畅快，气魄宏大，如同他的诗词。可是葛洲坝批示的字迹却是那么迟滞和犹豫，笔划拐弯抹角，发“犟”，发“涩”，有一种老人的企图控制、又无能为力的抖动。有人分析说，这种“抖动”是毛泽东看到“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即将实现、心情激动所致。

这未免把毛泽东看得太简单了。毛泽东作为本世纪的伟人，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何况葛洲坝与三峡高坝相比，不过是一个小池塘！虽然其规模位居全国之榜首。

林一山陷在大沙发里，眼睛平视着，这是他失明后惯常保持的谈话姿势。门前有几只觅食的麻雀在叽喳跳跃着。他认为他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有重要的影响。关于长江事务，他知道他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心目中的分量，以至毛泽东的批示留了“活口”。

“可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决定了，你再说还有什么用呢？”我说。

“那怎么行！仓促上马会坏大事。我看到了，为什么不说？我必须对毛主席负责，必须对周总理负责，必须对党的事业负责！”林一山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东再与你有交情，万一哪句话把他惹恼了，后果会如何呢？”

“那可顾不了许多喽！”

对于毛泽东的批示，林一山有着非常自信的理解。

他说：“毛主席在冒一个很大的险。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三边工程。这严重违背了基建程序，违背了科学。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很有艺术，我理解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同意，第二层意思是有可能干不成，第三层意思是准备修改设计、换人！”

事情正如林一山所预料的那样，葛洲坝工程动工两年后，由于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的被迫停工。

当时的情况，在今天简直是不能想象的。

光天化日之下施工的葛洲坝，对外界是保密的，代号曰“三三零工程”。典出于毛泽东“成都会议”后的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视察三峡。

工程的第一指挥长是曾思玉，第二指挥长是宜昌军分区司令员李地山。施工队伍十万人在师、团、营、连、排、班的军事编制下，进行着军事化的管理。清晨，军代表要带着工人“跑操”，工地上数万人喊声震天。

十万人汇集在狭窄的工地上，在毛主席指示的号召和鼓舞下，人拉肩扛，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可谓是“气壮山河”！

邱忠恩说：“那时的人都奇怪，干活不觉得累，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干活都不觉得累。必须下命令，工人才睡觉。”

可是，狂热代替不了科学。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不搞温度控制，施工的主要负责人说：可以不“吃冰棍”。加上质量控制不严，使已经浇筑的一万多立方米的混凝土强度很低，到处可见“蜂窝”、“狗洞”，出现了重大的质量事故。

技术这一摊更是糟糕。为葛洲坝专门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庞大设计团。设计团中虽然有刚刚解放出来的一流大坝专家，但他们处于卑微的地位，很难发挥作用。体制上又推广石油部经验，搞所谓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设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设计方案都要到基层施工单位听取广大干部和工人的批评意见。出现了葛洲坝“千人设计，万人校核”、技术图纸无人签字负责的奇观！

以下的结局便是必然的了。

葛洲坝大坝“蜂窝”、“狗洞”二十九处！大的狗洞一米多！

大坝裂缝八十六条！

枢纽布置方案，船闸、航道方案，因各方意见争执不下，无法定论！而此时大坝施工已整两年了！

二十八

周恩来愤怒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晚，中南海西花厅国务院会议厅里气氛紧张。听汇报的国务院领导人有：周恩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余秋里、刘西尧、王观澜、陈华杰。参加汇报的有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湖北省、“长办”、宜昌军分区、三三零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

大家的脸都不好看。

深秋肃杀的中南海，奇花异草都没有了声息，唯有松柏在那秋风的抽打中还有几分生机。

周恩来大声的叱责震撼着与会者的魂魄：

“第一指挥长、第二指挥长，都是司令员、分区司令员，都没有搞过，怎么能搞，容易瞎指挥。”

（三三零指挥部负责人汇报时）：

“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你学了主席批示了嘛，怎么不吸取教训？”

（三三零指挥部负责人说设计现在还没定时）：

“（开工前）应该准备一年。我们当时不想马上上，就是你们急得不得了，以为机不可失。最积极的就是张体学同志，还有一个曾思玉同志。”

“我也是积极分子。当时体学同志说，葛洲坝出了问题，把脑袋挂在天安门上。”纪登奎说。

“要挂都挂，不是他一个人挂！”周恩来说。

第二天，西花厅继续开会。周恩来当众表达了他对长江筑高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心情。

林一山呆在会场不显眼的地方。他在观察。他在思忖。他隐约感觉到，周恩来主持的西花厅会议，好像专门是为他设计的。在整个汇报过程中，周恩来紧紧地抓住毛泽东批示的最后一句“要准备修改设计”不放。张体学说：“三二零工地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要鼓干劲。”周恩来立即把方向扭回来：“光鼓干劲不行吧！主席批示不是这样。主席批示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要修改设计，重点在这里。”大家都不明白，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林一山还注意到，周恩来十分有意识地把会议焦点往他身上引。

“林一山，你身体好吗？”周恩来问。

“眼睛不好。”林一山指指眼睛说。

“你去看过吗？”

“去了。”

“你可能有点不同意见吧？”

“没有不同意见，讨论过了，现在是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都一致了？不见得吧！不会没有不同意见，总有点吧？是顾全大局。”

后来提到提意见问题时，周恩来大声说：“我与林一山没有共过事。林一山敢提意见，敢提就是好。提意见有正确的，很好，意见提得不对也不怕。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他紧紧抓住林一山不放。

“泄洪出问题，发电不成，航运更谈不上。林一山，要你去挂帅，敢不敢？”

林一山说：“我不是那种材料。”

“你不敢啰？”周恩来将林一山的军。

“设计，他当统帅；队伍，他管不了。”李先念在一旁帮腔。

“大家领导，我当参谋。”林一山谦让道。

“这是长江的工程，是在长江上建坝。葛洲坝设计出问题。找林一山可不可以！你不能看笑话。”李先念语气严肃。

“当然，主席批示的工程，我决没有看笑话。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林一山只好同意，当场领了军令状。

周恩来见火候已到，接着林一山表态同意的话音，又重样朗读了一遍毛泽东批示，说：“现在，请林一山同志主持讨论。”

之后，周恩来拿出一张早就拟定的名单，明确林一山为葛洲坝技术委员会主任。他麾下的委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张体学，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交通部常务副部长马耀骥，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三二零指挥部主任廉荣禄。

人们恍然大悟！开了几天会，绕了半天，真正的目的，是要改组葛洲坝核心决策层，推林一山执掌帅印！

二十九

大家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周恩来会在葛洲坝命运攸关的时刻，起用“反对派”林一山来充当葛洲坝的灵魂，把挽救葛洲坝的权杖授给林一山。

这种违反常规之举，着实令与会者吃惊不浅。谁不知道“林

一山反对毛主席，反对葛洲坝”？

大家都明白，周恩来交给他们的是一个不容商量、只能无条件接受的现实。败将岂敢言勇？林一山临危受命，当仁不让。事情虽然来得突然，然而他有预感，葛洲坝这个摊子，早晚要他林一山来收拾！

然而，林一山并不轻松。他面前不仅有葛洲坝这个烂摊子，而且还有包括他顶头上司在内的中央各部委同床异梦的大员所组成的技术委员会。

我问林一山：“技术委员会有七个部长、三个中央委员，您只是‘长办’主任，有把握领导他们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有把握！理由有四条：一、毛主席、周总理的任命和信任；二、我的官比他们大（林一山解放初期就是行政七级，曾在东北局任辽南省委书记）；三、长江的事情，我比他们懂；四、我有‘长办’这支不可替代的技术队伍。”

一副“舍我其谁”的大将风度！

林一山主持葛洲坝技术委员会后，即大力革除以往争论不休、论而不决、最后无人负责的弊端。他说，以往工作方法，是“筑室道谋，三年不成”，提出了技术委员会三条工作原则：一、委员会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大国一致”；二、各委员点头摇头都要有根据，都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后再表态；三、委员会每次会议达成协议的文件，委员会成员都要签字负责，不同意见，一并上报。

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在林一山的主持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十三次会议，每次会议都对葛洲坝建设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协调各方意见，取得一致或比较一致的看法后，即行上报，使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决策机构。当然，争论也十分激烈，各部的委员代表着各自的利益，经常给林一山难堪。袁宝华看不下去，大声说：“林一

山是毛主席、周总理派来的，请大家注意尊重他！”林一山则不以为然地说：“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可以争论。”十年时间里，每一次会议结果，都由林一山亲自起草，各委员签名后，上报给国务院。

“您写那么多东西，手行吗？”我问。

“那怎么不行？”他举起残废的右手，“这只手写累了，再换左手。我练习左手写字在当时已经八、九年了！”

可是，饱经造反派摧残的林一山也累。

周恩来在汇报结束后给他的重要嘱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长江上如果出问题，砍头不是你一个人，要砍头，我带头。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要载入党史的！”

第一次技术委员会忙下来，林一山回到饭店，想静静地休息一会。

可休息不成。右眼疼，疼得钻心！

三十

葛洲坝是人类首次在世界三大河流（亚马逊河、尼罗河、长江）之一的长江干流上拦河筑坝。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全体签名，向中央郑重报告：我们正面临一些前人未经历过的重大技术问题。

更严重的是，工程技术委员会继承了前期研究不够、仓促上马的重大技术疏漏。此时已经投资二点六亿，还有近三万人的施工队伍嗷嗷待哺！

以林一山为首的全体委员十分清楚他们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他们穿上了红舞鞋，却是在危机四伏、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

沼泽地跳舞！

而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林一山病了！

医生诊断，他患了癌症！一种很奇怪的癌症：右眼脉络膜黑色素瘤。而且癌细胞已经突破骨膜，情况严峻。

周恩来听说林一山得了癌症，大为震惊！在林一山主持下，修改设计工作刚刚步入正轨，重大技术问题经过梳理，已经初见端倪。这种时候，不能没有林一山！林一山不能死！

周恩来安排林一山住进北京同仁医院，并亲自过问治疗方案。为了十分稳妥和保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将林一山从北京转到上海华东医院，请北京和上海中国一流的眼科专家会诊，组成医疗小组，制定万无一失的手术治疗方案。为此，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专门致电上海，必须竭尽全力保住林一山的生命。

真是奇人得奇病。

林一山老人指着已被摘除了右眼球的空眼眶说：“脉络膜黑色素瘤很顽固，钻六十都杀不死。这种癌，白种人容易得，黄种人极其少见。有资料说，白种人发病率比黄种人高两千倍！为这病，全国的专家讨论了一百天。我说，别讨论了，允许有误诊，干吧！说起来，都是造反派干的。把我关进水牢，根本没有光线，还要逼着写交待材料！”

当确诊为癌症时，医院和家里都瞒着他。他却对周围这些愁眉苦脸的人说：“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我得的是癌症，你们得的是恐癌症！”

林一山快人快语，把医生和家里人都逗乐了。

他安慰日渐消瘦的夫人：“我死不了！革命那么多年，八次阎王关都闯过来了，第九次也能闯过来。葛洲坝建不起来，我林一山怎么能死呢？”

手术方案由上海报水电部，又由水电部报给周恩来，由周恩

来亲自批准实施。林一山从住院到治疗方案,治疗效果,整个过程都在周恩来的严密关注和监控之下。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一切都是在林一山非凡的毅力下完成的。

他在北京同仁医院住院期间,正在筹备召开第三次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

这次会议,将最终确定悬而未决又非常棘手的坝线方案。

五十年代末,在进行三峡工程设计时,葛洲坝作为三峡枢纽的“航运梯级”,只进行了规划性设计。在宜昌至前坪五公里河段内,研究了上、中、下三个坝段,认为三个坝段同属一个地层,均能建坝。其后根据诸方面条件,选择了横穿葛洲坝的中坝段作为以后勘测设计的重点。

一九七零年葛洲坝上马时,亦选定了中坝段坝线。而且,在该坝线,已完成了一期围堰和基坑土石方六百五十万方,浇筑混凝土十万方,并在附近修建了公路、铁路和企业。

然而,其后重新研究暴露出来的船闸通航、泄水闸消能防冲、大江截流等重大技术问题,向原设计坝线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航运方面的挑战。

有专家认为,由于出南津关后,长江水流湍急且复杂,葛洲坝上游静水航段太短,行船危险。建议全部抛弃现状,坝线下移四百五十米至七百米。

这种方案有一定道理,因为葛洲坝的问题,必须首先是航运问题。周恩来和李先念多次表示,如果葛洲坝碍航,那就要炸掉大坝通航。

但是,这种方案意味着前功尽弃。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案来替代呢?

北京城南,四维路饭店一间小会议室里,烟雾弥漫。

这伙人在这里面,整整闷了一天一夜!大家脸都绿了,却个

个精神亢奋，毫无睡意。

林一山右眼还塞着纱布，便从医院偷跑出来，组织专家为委员会起草文件。

静水航道解决不了，交通部这关就不能过，再好的设想都白搭。

凭直觉和经验，坝线可以不移，但是缺乏说服力。

南津关到葛洲坝不到三公里，这一河段极为奇特。长江出南津关后，海拔高度由三百米突然降至七十米，河宽由三百米展开为二千一百米，水流湍急紊乱，形成了巨大的“泡漩”。林一山老人在新壁街四十七号的大客厅里给我描述着：“长江水从南津关出来，突然遇到一个斜坡，水又翻卷回来，咕嘟嘟，咕嘟嘟，嚙，好大的泡！好大的漩！张瑞瑾教授主持的葛洲坝模拟试验，一放水，他就跑来找我：‘林主任，那水流得奇怪’。我问：‘怎么奇怪？’他说：‘你去看看。’我去一看就笑了：‘这水流不奇怪，应该是勾股，不该是弦。’‘为什么？’他问。我说勾股水深，摩擦小，弦水浅而粗糙，水当然就不走弦了。他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这是河流学问题。这长江水，怎么流，怎么走，她是有性格有脾气的，摸准了才能分而治之。”说得兴起，盲老人从沙发倏地站起来，用那龙钟步态和手势，模仿着长江翻卷起伏，变化多端的姿态，仿佛他就是那长江水在自然的状态中流动，奔腾、旋转、咆哮；仿佛他就是那江之精灵，如痴如醉地融化在长江中，用那赤诚的心灵依偎着生命的水流，喃喃诉说着一个亘古不朽的神话；仿佛只有任那长江的波涛拍打着他的脸颊，才能证明他的存在，才能让他感知到一个生命的光亮明媚的世界。他身上涌动着的活力，令人惊骇！后来，他创造了所谓“关刀宝剑”——大坝中部向上游两条垂直平行的长堤或叫“竖坝”，一柄曰关刀，一柄曰宝剑，劈波斩浪，约束了湍急诡谲的江水，将长江分隔成了三条平静如镜的人工运河，根本上解决了原坝线不动静水航道太短的通航问

题。他还为了顺应江水流态,数年坚持并力排众议,创造了一个“没有葛洲坝的葛洲坝”,奇迹般地搬走了足有八百万土石方的葛洲坝,为后续大江截流,下泄洪水等重大技术措施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关刀宝剑”、“没有葛洲坝的葛洲坝”这些曾被百般嘲笑的技术措施,后来成为葛洲坝工程独具特色的奇观,被专家称之为“天才的想法”。

那都是后话。

当务之急是要给不移坝线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

桌上铺着图纸,大家切磋着、争论着,却没有结果。

林一山以为一个上午便能解决问题,可是,从上午到下午整个一天都没有解决,晚饭后,继续接着干。过了午夜,还是没有眉目。而且他的眼睛疼痛,看东西看人都变了形。

著名的泥沙专家,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誉院长张瑞瑾望着坝线发呆,突然,不知哪根神经被天使轻轻地拨动了一下,他突发奇想:能不能坝线不动,闸门下移,修两条人工运河,保证八百至一千米的静水航道?

林一山一听,沉吟片刻,猛地大声叫绝:“妙呵!我们可以给大坝开两个大抽屉。”

林一山及时总结归纳这个方案的精髓所在:“这是一个最坏的方案,但是它可以保证最好的方案出笼。正是因为可以开抽屉,我们将来才可以不开抽屉!”

这便是著名的“开抽屉方案”。

这个方案,是葛洲坝停工修改初步设计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方案并没有实施,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僵局,有效地平息了争论,使其他重大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整个局面豁然开朗!

沉闷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化解了。

“天亮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大家早就没了时间概念，这一声喊，把大家从那忘我的欢欣鼓舞中拽回来，突然感到了疲乏——极度紧张后的极度困倦和疲乏。有的人坐在那里便睡着了。

初春的阳光，悄悄地踱进这间刚刚产生了天才想法的会议室，人们关了灯，打开房门，烟雾渐渐散去，房间里充溢着温暖和生机。

林一山跳起来，“睡觉，睡觉”，一路呐喊着出去。坐上车，便往同仁医院奔。

回到医院病房，医生和夫人张彬都埋怨地盯着他。

“睡觉，睡觉。”

林一山做出一副知罪的样子，倒头便睡。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上海华东医院的手术非常成功。

林一山右眼球摘除，左眼高度近视，几乎看不见东西，处于半失明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以非凡的生命力，继续主持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后的十次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有效的工作以及一些重大的决策，为葛洲坝一九七四年复工、一九八一年大江截流、一九八八年基本建成创造了可能和条件。

林一山大难不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长江和我们民族的幸运！葛洲坝不起，中华民族何颜自信于世界民族之林？！葛洲坝被称作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不起，何谈三峡？！

至今思来，惊心动魄！

三十一

林一山多次对我说：“能做葛洲坝，就能做三峡。”

言下之意，三峡大坝在工程技术上比葛洲坝简单。

“为什么？”我不解。三峡大坝比葛洲坝大了好多倍，怎么可能建三峡反而会比建葛洲坝简单呢？

周恩来也怀疑这种说法：“你原来主张先做高坝，后做低坝，你那个高坝不是更难？”

林一山说：“葛洲坝的位置、地形、地质、河势都比三斗坪复杂得多。”

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能建成葛洲坝，三峡也不在话下。

官方提供的资料说，截止于一九九零年底，中国一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八万三千三百八十七座，号称八万六千座，水库总数居世界之冠。其中大型水库有三百六十六座（库容在一亿立方米以上）。修建了一批如龙羊峡、刘家峡、三门峡、丹江口这样的大型水利枢纽，葛洲坝等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坝。中国拥有一流的坝工技术，无可怀疑。中国人能建成三峡高坝，也无可怀疑。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三峡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坝，她所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她牵涉范围之广泛，因素之复杂，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已建成的大坝皆不可同日而语。她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大坝本身。

泥沙淤积、生态环境的影响、库区移民等，特别是包括四川、湖北两省、四个地区、三十九个县市的一百一十三万移民，其规

模和难度，令世人瞠目结舌。

在三峡所有问题中，移民安置问题，被公认为“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甚至被一些反对派人士称为三峡的“死结”。

李伯宁来了。这个河北任丘人，就是来解三峡这个“死结”的。

一九八五年，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被国务院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党组书记，全盘负责三峡库区移民这一世纪性的工作。

他一到位，即成为三峡重新论证的风云人物。此后，三峡推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行动，几乎都能找到他强有力的影子。

三峡库区的每个角落，都有李伯宁的传说。

“形象如何？”有人问。

“传得很神，看也平常。”我坦率地说。

“具体点呢？”

“是个倔老头。看准了的理，坚持到底，敢做敢当。”

“还有呢？”

“好话坏话都有，库区干部群众是一片赞扬。另外，也有人对他不感冒。”

三十二

见李伯宁之前，先见到了他的秘书小冯。

小冯给我一摞资料。李伯宁著的《论三峡工程与开发性移民》和主编的《开发型移民好》。还有李伯宁不久前完成的九集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打印稿。打印稿后，有一份看来是给电视台的作者简历：

李伯宁：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花卉协会副会长，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主席，北京杂文学会顾问。著有儿童小说集《铁娃娃》，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先后出版了小说《梅香如》，报告文学《随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记》，诗集《感时吟》等。他手头还有几十万字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还未写完。

根据简历，我们起码可以作出如下归纳：

其人搞三峡，搞水利，搞经济，搞政治，喜欢种花草，还是作家！还得过文学奖！

根据简历，我们似乎还可以作出下判断：

精力过剩，日理万机。爱好广泛，东奔西跑，四处开会。

儿童文学作家与“三经办”主任有什么天然联系？

看完《水困古城》剧本，不得要领。

他却非常郑重地告诉我：“这是一个以北京水利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一个政论性的故事片：主要想唤起人们对水的忧患意识。”

好一个“忧患意识”！

原以为“忧患意识”只是愤怒青年的专利和时髦。

这些背景材料跟我预先想象的倔老头相去甚远。

与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对话，我已经预感到了一种反差的兴奋。

李伯宁行走如风，总是那么匆忙。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按钟按点的快节奏，清瘦，灵俐，跟他谈话，你能感到他的大脑清晰而活跃，不像古稀老人，更不像吞吞吐吐、把自己的观点藏着掖着的在职高级官僚，他身上时时透出一种与官毫不相干的诗人气质。敢于说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上至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下至部里的顶头上司，意见不合，刀架在脖

子上,他也要把话说完。这一点,与林一山、李锐极其相似。

不算当三峡省筹备组组长之前,光是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他就为三峡等国家事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各部委写了数千封信,有的数百言,有的数千言,甚至上万言。秘书给他统计了两年:一九九零年五百七十封,一九九一年七百多封。可谓是高产书信作家。我挑了几封看,情绪之激烈,观点之鲜明,用辞之锐利,绝无闪烁或世故,语言气度里,多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古风。

有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个灵活多变的政治氛围里,是显得有点不识时务和“倔”。

李伯宁的“倔”,在水利部可是出了名的。

不知为何,“文革”初期,李伯宁“红得发紫”。造反派画了张漫画,李伯宁背上插了四面白旗,白旗上写着他四职一肩挑的显赫:水电部文革主任、党组办公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水管司长。水电部党组在“文革”初期,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是因为他直爽,敢和造反派斗。因此,不久,他便成了斗争的重点,成了水电部第一戴高帽子的人,游街示众时,左边是钱正英,右边是刘澜波,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成了主角。

第一次给他戴高帽子时,他一把揪下来,用脚踩烂。不知谁到厕所拿了个手纸篓,还故意抹上屎,强行扣在他头上,弄了一脖子大粪臭。

走资派列队报名:

“我是走资派。”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我是叛徒。”

“我是特务。”

轮到李伯宁,他梗着脖子大声说:

“我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

顿时遭到造反派劈头盖脸的毒打。打完了还问:“你是什

么？”

“我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他仍不改口。

见打不服，干脆有李伯宁在场就不报名，省得搅了虔诚忏悔的气氛。

在“文革”中，再硬的干部都被打服了，如果不服，又难免于羞辱，保持气节，那就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了。像李伯宁这样始终不服，公开抵抗造反派，没自杀，又没被打死或打残的老干部，真是凤毛麟角。“‘文革’中期，所谓‘解放干部’，要我写份检讨，便能顺利过关，恢复工作。我坚决不写，‘文革’是他们那帮人胡闹，我和他们斗，没错！”李伯宁说。他甚至拒绝用“革命群众”、“解放干部”这样的词组。他认为那都是没有是非的“扯淡”！

凡是他认定的事情，准是一股道走到黑，绝不妥协，绝不半途而废。

三峡库区的移民试点，便是在这股子劲头下顽强推进的。

三十三

几乎所有采访三峡的记者，都把李伯宁在三峡论证后期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都没有注意到，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的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所取得的直观效果，是促使决策层最终下决心扩大移民试点、并将三峡提交人大表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峡工程一九八六年开始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重新论证，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论证后，以四百零三人赞成，九人反对，提出了十四个专题论证报告。一九八九年九月，向国务院提交了重新写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于“六·四”，决策层无暇顾及三峡，便暂时搁置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四日，李伯宁等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的提案，李伯宁又写信给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王任重将此案直接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这个提案促成了“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而汇报会的结果，成立了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担任主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陈俊生为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由各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担任。其后，审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即所谓的“一七五方案”。使三峡论证获得了实质性进展。

一九九一年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李伯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强调三峡表示不满，他给王任重写了措词激烈的长信。王任重即将此信转给江泽民、李鹏和邹家华。江泽民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

中宣部将“下毛毛雨”的指示通报首都新闻界，并布置了正面宣传的要点。

中宣部和水利部随即包租了“天鹅”轮，组织了记者团，购买了飞机票，赴三峡区采访。后因华东水灾，此行取消。

这便是著名的“下毛毛雨”的由来。

“下毛毛雨”，以及华东水灾后，要新闻界的三峡宣传“下中雨”，是一九八五年以来，正面宣传三峡工程的又一个高潮和转折点。有人称之为“东风压倒西风”。

李伯宁谈到三峡库区开发型移民，从发端到今天初具规模，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大有一言难尽的慨叹。

他着实被“短命的三峡省”“闪”了一下。

一九八四年二月，国务院批准“一五零方案”后，即决定筹组

“三峡行政特区”(后又更名为“三峡特别行政区”)。

一九八四年十月,在国务院的专门讨论会上,全国人大政法委员会认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与《宪法》有悖,建议改为“三峡行政政区”,后又改用“三峡省”,才名正言顺。谁来当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未来的三峡省委书记?

在此之前,钱正英部长奉命找李伯宁谈话,请他担当此任。

李伯宁知难却步,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纪律。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三峡区划,湖北、四川三十个县市,都不能动;

二、由他挑选一位中意人选当省长;

三、他年纪大了,只负责组建,组建完后,仍回水利部当顾问。

可是在国务院讨论人选时,先提的两个人选都当场被否定后,才提到“也找李伯宁同志谈过话,但是他不愿意”。

万里当即说:“伯宁同志行。”

“伯宁行。”赵紫阳也支持万里。

“当堂点将”,大庭广众之下,当着本人的面,臧否人物,选拔领导人,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可是,筹备工作不到两年,移民试点工作刚刚起步,三峡省刚刚有了雏形,李伯宁在湖北宜昌的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板凳还没有坐热,“三峡省”,便在一片“质疑”声中,随着“一五零方案”流产而流产了。

然而,正是草草率率的两年,奠定了李伯宁开发型移民的基础和思想;正是草草率率的两年,使他了解到了库区人民贫病交加的真实情况,为改善库区人民生活,坚持移民试点而奔走呼号。

三十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李伯宁作为三峡省筹备组长出席会议，爆了个大大的冷门。

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到一九八五年，农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柳暗花明，引起世界瞩目。然而，农村经济的增长，却掩盖了农村一些初见端倪的矛盾，掩盖了广大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仍在贫困线以下的事实。

李伯宁参加西南组讨论，满耳灌的都是“大好形势”。他终于憋不住了。

“大家都讲大好形势，我讲不好形势！”李伯宁一出口，场面便有些愕然。“杜老（杜润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报告中说，全国贫困人口有七、八千万人。我问，到底有多少。他说，恐怕一亿多。我问，为什么不讲。他笑着说，不能讲太多呵！为什么不能讲呢？无非是怕给大好形势抹黑，影响改革开放形象！”

李伯宁到三峡地区时间不长，跑遍了区划所属的绝大部分县市。那里贫困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告诉我，他曾去过宁夏西海固地区，“说西海固穷，一家几口人合盖一床被子，可这三峡比西海固更穷，不但穷，而且还有地方病，贫病交加！”

美好的三峡，壮丽的河山。多少文人墨客穿峡而过，留下多少赞美的诗篇；多少游客拍下那奇险峻拔的峡谷，记下那美丽的神话，以为永恒的纪念。然而，这壮丽的大山背后，还有数百万人吃不饱肚子。

他对省委书记们说：“三峡地区地处武陵山脉和大巴山脉腹

地,江汉平原的边沿。百分之八十五的面积是丘陵山区,是历史上一个出名的老、少、山、边、穷地区。三十个县(市)中,有二十四个县是中央和地方挂了号的贫困县,每年国家财政补贴三亿多元。”

他对省委书记们说:三峡区“一九八四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五百一十元,居全国第二十五位,农业人均值二百八十八元,居全国第二十八位。尤为严重的是,全地区尚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农民(即五百万至六百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有二百六十九万人和二百三十多万头大牲畜饮水还有很大困难,还有一百四十万人患有严重的地方病,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

他对省委书记们说:“以(四川)彭水县为例,一九八四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在八十元以下的有四点三五万户,二十一点四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七和百分之四十三。因家境贫困找不到对象的三十至四十岁未婚男子达四千三百多人。该县小厂乡,全乡社会总收入人均五十至一百元,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欠国家贷款,百分之三十的农户人畜共居一室或住岩洞、窝棚,百分之五十的人无棉衣,百分之三十的户无棉被,冬天只能全家偎依在火塘边过夜,有的小腿上的皮肤都烤焦了。有的钻在玉米皮中度夜,情况十分凄惨。农民赵寿合,全家财产只有一口烂铁锅和一只烂木箱,作价不过五元,三年未吃过一片肉,有时连盐巴都吃不上。毛朝均一家三代合盖一床用了几十年的烂棉絮。像这样的人家,彭水全县不下四百户。”“彭水县群众中还流传着‘小厂乡的跛子,大同乡的驼子,郁山乡的瘫子,饿死不嫁鹿青乡的傻子。’这个县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四点一岁。”“(湖北)巴东县边连乡庄尾顶村二百三十八户,有七十八户住草房,六十二户无棉衣,三十四户无棉被。该村农民向仕根一家五口,仅有一间半旧房、一只破木桶、一床烂棉絮、三个饭

碗,(屋里)全部家当值不了四十元。”

他对省委书记们说:“解决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有关安定团结和巩固农村大好形势的大事,应该提到战略地位来对待这个问题。”

田纪云副总理听说李伯宁有这个发言,第二天专门到西南组来,李伯宁又复述一遍,田纪云和在场的省委书记们,莫不为之动容,莫不为之潸然。

这些情况为什么几十年没有披露?李伯宁分析说,很多干部害怕给“大好形势”抹黑!所以遮着掩着,下情不能上达。而李伯宁本人,从一九四九年就在水利部任职,长期的都市生活与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他以极大的刺激。

李伯宁在会议期间,还向大会播放了由他组织录制的纪录片《穷山在呼吁》。通过形象诠释,证实了李伯宁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李伯宁把片子带回北京,要求有关部门将此片分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该部门认为该片渲染了阴暗面,拒绝呈送。

李伯宁不服。他仗着长年在京工作人熟地熟,将片子复印了几十套,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协主席、人大委员长和其他领导同志,人手一套。国务委员陈俊生告诉李伯宁:“不看不知道,看了,触目惊心!”

李伯宁还带着录相机和片子,分别到民政部、卫生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门,放给部长和司局长看,并现场解说:这部片子还只是在汽车能到的公路旁拍摄的,更穷更惨的地方根本进不去!

卫生部长崔月犁看后,感到震惊,对在座的卫生部官员们说:三峡地区的地方病那么严重,我也不知道,你们也不汇报!

李伯宁为三峡贫、病山民的一片赤诚,感动了上帝。

卫生部和有关部委决定凑出七八百万来,组织医疗队,专门

去三峡地区治病、防病。民政部也专门拨款支援这一地区。

有“运动”经验的人说，像李伯宁这样的地方干部，如果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肯定逃脱不了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厄运。

官场三昧，要么视若无睹，要么缄口不言。而李伯宁却恰恰相反。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才长期当司长，办公厅副主任也永远扶不“正”。

三峡所涉及的所有大人物，几乎都是毁誉参半。李伯宁也不能例外。他的脾气得罪了不少人。三峡省由四川的万县、黔江和涪陵地区、湖北宜昌地区和恩施地区的巴东县组成。湖北在讨论三省区划时，想把枝江、当阳等几个县拿回去。李伯宁不干。结果是总书记、总理、副总理等都支持李伯宁的意见，问题才得到圆满解决。关于移民试点费的使用，李伯宁则认为这不是移民，而是为了创造开发型移民经验，因此，需要在统一领导下，组织省、地、县共同合作进行，经费则直接到县。为了这一点，两省都有点意见。有的说：“明明你李老头对我们省、地信不过嘛？将来移民出了毛病，我们不管，全由你李老头兜着。”

其实，两省的人要是知道三峡省撤销后，“李老头”是怎样争到这每年两千多万移民费的，他们就会理解“李老头”为什么手攥得那么紧了。

三十五

三峡省撤销后，三经办并没有拿到当时许诺的那么多扶贫和移民试点款。“七五”又许诺十亿，一落实，又没影儿，只能每年两千万，后来又变成一千万。一落再落，总是看落不看长。

三峡移民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要想将来得以顺利进行,基础必须打好。移民试点成功与否,关系到初步设计一百八十四亿移民经费是否够用,关系到移民安置的政策方向,关系到三峡工程能否顺利兴建的大问题啊。

关于移民试点情况,看过的国务院领导和人大、政协考察团,都肯定这是成功经验。但有人说三峡移民经验造假,拍电视片,移民试点柑桔累累,都是到柑桔研究所拍的;又说,柑桔根本不可能在如他们所说的海拔高度上存活;还说,移民就地后靠,环境容量不够,就地后靠缺乏应有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更有甚者说,库区淹没怨声载道,上面根本听不见库区移民和当地政府反对的呼声。

根据我的实地调查,前两种说法不存在,实验地里,我们看见拳头大的“脐橙”挂在树上,可以肯定地说,果树管理很好。就我所跑到的沿江县,如丰都、奉节、巫山、巴东、秭归等,都有相当的移民安置环境资源。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三峡库区人恰恰把三峡的兴建看成是一种机遇,一种脱贫致富、改造由于长期没有投资或投资很少的困窘面貌的机遇。这与我们的移民常识有很大区别。反对的呼声,并不来自库区干部群众。这是试点还能够搞下去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费解的现象。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我登上奉节的码头,在清晨雾霭的环绕中,只见那山的高处,矗着一幢豪华建筑。在这破旧的县城里,有鹤立鸡群之感。想必是宾馆,走近一看,外贴黄瓷砖,窗户都是铝合金框和茶色玻璃,六层楼,大理石柱,还有电梯预留。移民局的人告诉我们,这是县政府刚刚竣工的办公楼,县委也盖了一处别墅式的办公地点,都在淹没线以下! 可据我们所知,奉节是财政赤字县,县级机关经常是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 可这办公楼的水平,敢与北京的一些政府机关和东南沿海富裕省份的政府机关比高低!“要想富,下水库”。看来奉节县委、县政

府对这种做法,作出了不应该做的表率。

这种情况,给我们以警示,超大规模的移民能否成功,取决于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如果哪一级政府在某一个环节出于某种考虑,略有一个小动作,那就麻烦大了。

从整个建设过程看,移民是最敏感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李伯宁是中国水库移民政策近半个世纪演变的见证人。三峡工程实行“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开发型移民”的方针,改一次性补偿为帮助移民建立一个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并站在社会系统工程的高度制定移民安置规划,使中国水库移民有一个全新概念。他说:“组建水利部不久的一九五一年,我就是工务司第一副司长,负责基建工作。那时就接触到了水库移民问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水利运动,我是水利部水利运动办公室主任,大规模地搞水库,大规模地移民。那时移民很简单,政治动员,大家爱国嘛,建设社会主义嘛。都是低标准的一次补偿。标准低,而且还层层克扣,拿不到移民手里。移民到新地区定居后,有的当地人欺生,加上背井离乡,手里没钱,又不会经营,有困难时没人帮助,所以水库建成后,返迁数量很大。四十多年来,全国建了八万多座水库,一千多万移民,基本评价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生活比较稳定,三分之一平平常常能够勉强生存,三分之一没有安置好,有这样那样问题,有些则返迁,闹事。文革期间到水利部上访造反的,有相当部分是水库移民。其中给我们以很大启发的是三分之一安置好的部分。如山东烟台地区,移民安置就是生产生活一起抓,帮助移民旱地改水田,搞水利基础设施,结果是土地少,生产好,收入高。这便是开发型移民的雏形。我们七十年代还在山东开过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然而,三峡移民难度将远远大于历史上任何水库移民,包括三门峡、丹江口、新安江等。

按照移民规划,先迁七十二万人,二零一零年迁完一百一十三万人。真是一个撼人魂魄的浩大工程!

所以,国务委员陈俊生在视察三峡区时,多有感概地说:嗨,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三峡移民是“伯宁工程”!

这三峡对于李伯宁来说,确是魂牵梦绕的地方。

三十六

美国人在八十年代一份官方报告中,把三峡工程称作“史诗般的治江壮举”。

萨凡奇老人把三峡大坝称作“中国大坝”。

一九四六年,萨凡奇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说:三峡计划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我已经六十五岁了,……如果上帝给我时日,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一定會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一九六三年,八十二岁高龄的萨凡奇十分伤感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徐怀云先生说:“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起来的。你们中国人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摆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又痛苦的梦境啦!”

毛泽东生前曾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三峡渺茫,他又把“高峡出平湖”的理想寄托在葛洲坝上。然而,遗憾的是,葛洲坝不像请示报告者所估计的那样,只需要“五年左右竣工”。而是足足干了十八年!毛泽东没有等到这天。没有根据的空想与现实就这样无情地拉开了距离。

作为科学家的萨凡奇与作为诗人和革命家的毛泽东,怀着

三峡工程的无限痴恋和怅惘，走完了他们的人生旅程。他们的心情那么惊人地相似。

三十七

李锐还记得当年周恩来的那一番话：“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李锐反对长江筑坝……李锐现在关着。可以把（葛洲坝）现在的设计给李看一下，提点意见，也是劳动嘛。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

李锐还不显老，为了保持思维和身体的活力，他几乎每天上午去北京养蜂夹道游泳。对于他来说，好像并不在乎四百零三比九的论证结果。他一生为缓上三峡工程上马已经写了两本书二十多万字了。他还在继续写。一九九二年元旦这天，他完成了给党中央的“最后一次上书”，是建议推迟三峡工程的兴建期。他好像也不在乎人大已经“决议”。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鼻子插着氧气，还在对我说：“只要我不瞑目，我还会坚持到底。”

他的行动似乎顽强地证明着，论证结束了，论争并没有结束：论证结束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还在继续。

李锐和他所代表的一批“反动派”专家们，林一山、李伯宁和他们所代表的“主上派”专家们，还有已故去的毛泽东、周恩来、萨凡奇等等伟人、大师和科学家们，一块筑起一座“中国大坝”。这座“大坝”向世界顽强地证明着一种生命现象：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格的追求，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都将经受历史的考验，直至永恒！

三十八

一九八五年春天，湖南科技版社出版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李锐将此书序言和另一篇文章寄给了报社。报社将清样送中央审，胡耀邦批示不同意发表。并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讲李锐“不服从纪律”。因为中央曾决定，不公开争论三峡问题。当时胡耀邦也曾明确表态支持上三峡。

一九八八年，李锐将《论三峡工程》送给胡耀邦。胡耀邦看了李锐的著作后，又知李锐擅写旧体诗，故写了三首旧体诗交李锐修正。

这三首诗是李锐关于三峡的资料中非常精贵的部分。原诗从未发表过。

李锐将一张折叠的硬壳纸交给我，上面是耀邦用钢笔书写的原迹：

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

妾本禹王女，

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

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

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流断永使妾哀伤！

此诗经李锐修订后发表于《新观察》1989年第8期。

妾本巫山女，
含怨侍楚王。
泪滴三春雨，
愁染六月霜。
泪愁应随东逝水，
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计，
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
流断永使妾哀伤！

我从未见过耀邦的诗作，我只知道他是个充满激情、十分有魅力的革命家，万万没想到他能写出这般幽怨流长、愁结万端的“婉约”诗来。人若没有去炼狱走一遭，情感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大起大落的。

人是这样的丰富，又是这样的复杂。伟人更是在所难免。

李锐改诗虽未超出耀邦诗作原意，增加了原诗的气势，但有些过于强化了原诗对三峡的态度和意见。原诗有赞成李锐想法的意思，但情绪似乎更曲折、更复杂些。原诗侧重于“侍楚王”的“怨”、“愁”，和“禹王女”对“断流”的“哀伤”。禹与鲧的“疏”与“堵”，实际上是对治国方略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耀邦在九泉之下，以为然否？

三十九

我沿江而下，涪陵、丰都、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秭归等县市在那灯火明灭中发出深深的叹息，十多年后，它们将会带着对过去平静生活和祖宗基业的无限眷恋而沉没。十多年后，将有一百多万移民，完成一次前无古人的迁移；我们所熟悉的自然景观将会有较大改变……

无论是谁，想到这里，都不免伤感。更不要说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了。

人的伟力和人的局限，人的梦想和人的短视，人类社会企求改变生存现状和逐渐恶化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奇怪而矛盾地纠缠在一起，无从简单地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历史自会评说。最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的局限和短视及其无可挽回的后果，却不能不去牺牲，去殉道，去付出代价。

这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这是“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回答的沉重主题。

轮船一进夔门，便拉响了汽笛。崇山峻岭中回荡着呜咽的声音。人们在瞿塘高峡下匆匆穿行，生命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我的胸中塞满了苍凉和悲壮之感。

半个世纪前，萨凡奇老人冒着挨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去勘察三峡工程坝址；三十四年前毛泽东顺流而下，去圆那“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他们似乎都看到了生命的尽头，看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有限，看到了那不远处可望不可即的三峡大坝。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史诗的民族，它注定会不甘寂寞，继万里长城、大运河之后，为世界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这是一个历史的宿命。

在长江上航行,我被这种宿命感深深地笼罩着。

长江三峡的论证,足足用了七十三年时间!真是太长太长了。

长江三峡,这真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梦想么?这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梦想么?以至需要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空间来让中华民族承载她的痛苦、忧伤和欢乐?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完稿于北京木樨地

超越世纪： 性艺术在中国



22 “人体油画艺术大展”与稍后的
“现代艺术大展”，被认为是一九八
九年春夏之交大悲剧预言性的事件。

世纪末感言

什么是“性艺术”？有点儿莫名其妙。“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有点儿大而无当。但是，用“性艺术”来概括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人体油画艺术大展”倒有简洁之妙。“人体油画”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可不得了。平时门可罗雀的中国美术馆门票两角钱，现在门票两块钱还人山人海，波澜壮阔。“人体油画艺术大展”由一个专题性艺术展览，演变成了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重要社会现象，“人体油画艺术大展”与稍后的“现代艺术大展”，被认为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大悲剧预言性的事件。

这期间，还发生了模特儿起诉画家侵权官司。这场官司一打十年，今年我在报纸上看见模特儿胜诉的消息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作者

波撼紫禁城

—

北京。中国美术馆，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辉煌。

当中央美术学院的二十八位画家把他们一百三十多幅写实的、表现的、象征的裸体油画(绝大多数为女裸体)，悬挂在展厅洁白无瑕的墙壁上时，巍巍紫禁城都为之震撼了。

中国美术史也许将会有这样的记载，一群画家以人体为主题，把这许多“光屁股的女人”搬进平时令凡夫俗子们望而却步的神圣的艺术殿堂。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在我们民族某根绷得很紧而显得有几分脆弱的神经上弹出了一个刺耳的音符。在众目睽睽之下，这许多健康、美丽、身条欢畅的具体和抽象的裸体女人，由画家们率领着，涌出中央美院那一间间简陋杂乱、拥挤、颓败、弥漫着油彩化学气味、令人压抑的画室，歌着、舞着，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如同屈原笔下的“山鬼”，戏谑地朝那些大张着嘴、眼睛望直了的脸上撒着五彩缤纷的花瓣和香草，梦幻般地在北京寒冷而干燥的空气中飘荡着。她们旁若无人地挤上公共汽车，与那南来北往鼓鼓囊囊像一个个痈瘤瘰袋的人们为伍，品味那惊讶、惶恐、贪欲、满腹的牢骚；她们坦然爽朗地走进猥琐的四合院，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驰骋想象任意蹂躏的谈话佐料；他们毫无羞涩地与那些正襟危坐目光游疑的道学家促膝论道，给正人君子内心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些儿躁动和波澜，给那霉臭扑鼻的故纸堆中注入些脂粉气，给那行将老矣的躯体注射肾上腺

激素……

以两角钱的门票显示着自己“雅俗共赏”风度的中国美术馆，今天门票毫无顾忌地猛涨了十倍，然而却不能阻挡四面八方山南海北潮水般涌来的观众。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十八天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使平时颇为冷落的美术馆门庭若市，平均每天接待观众近一万二千人，最后一天时，观众增至两万！蔚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奇观。

二

开展第一天，一个戴着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着肩膀从美术馆大厅中挤出来，满脸的潮红，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他妈的，像进了女澡堂子！”

下了台阶，他表情复杂地侧头仰望了一眼“中国美术馆”毛泽东金光闪闪的墨迹，脖子缩进绿军大衣领里，走了。

三

作家史铁生双腿残疾，美术馆破例用电梯把他和轮椅升到二楼展厅。

末了，他扔给美术馆和人体大展一句话：

“今天净看了腿！”

四

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据画家和社会学家们的估计，来参观的人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或者很少进美术

馆。那么,他们到美术馆来干什么?那么长的队。中央美院原学生会主席艾安在描述他去美术馆的感觉时,一把拿过我正在书写的圆珠笔,在我的采访本上用他那职业的线条给我画了张排长队的示意图。

我不能对那些已经花了两块钱和排队正准备花两块钱参观“油画人体大展”的人们说长道短,他们花了两块钱,就等于买到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进去,不管是正视还是斜视,不管是匆匆而过还是紧盯着某个部位看,在理论上讲,都无可指责,在这里,他们和部长、总理待遇一样。在这里我甚至要向他们致敬,比起那些在大门口徘徊犹豫恐被窥破了内心世界的人来说,他们还在表现着某种冲动的选择,而“某种冲动”恰恰是生命力的肥沃土壤。

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太晚了!与所有积重难返的中国病一样,都赶到一个车站赶人类社会的末班车。

现实是,诞生了整整四十年的共和国公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不认识自己了。那种在教科书中在众多的回忆录和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解放”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们长期陷人在禁锢之中,不仅失去了人的精神属性,而且还失去了人的自然属性。人成为神话。清教徒式的罪恶感在统治着我们,禁欲主义泛滥成灾。人连认识自己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

黑暗中,人类渴求知识和光明,渴求知识和光明带给人类的崭新的灵魂。于是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嗅不到古希腊、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那种使人类社会生机勃勃的向前发展、并给人类带来无限生命力和财富的清新气息。我们今天似乎还不能理解米开朗琪罗为了探索人、塑造人,解剖了十几年的尸体;似乎还不能理

解好几个世纪以前,他是怎样地获得尸体,任意地割下人的脑袋、划开肚皮、掏出肝肠肺胆、剜出眼睛、敲碎头盖骨……然后去塑造人的真正灵魂。

二十八位艺术家把他们的人体面挂到中国美术馆,或多或少可能都基于这样一种态度,即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有认识自然认识自己的天赋权利和自由。艺术家们可能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缺乏科学进步,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的民族,对于“人”来说,不仅缺乏真理,而且更缺乏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面对“人”的真理,关闭了所有的闸门。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改造社会、最终改造人自己的最基本前提,失去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巨大的失落感笼罩下,内心更为敏感的艺术家长们冒天下之不大不韪,把局限在画室弹丸之地的裸体练习及创作像北京冬天里撮堆卖的大白菜一样,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满意,现炒现卖,一古脑倒给了这个令人绝望的民族、这个精神价值全面崩溃而后茫然的民族。

“中国人给剥光了”

五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引起世界性关注,引起全社会的震动,完全出乎艺术家们的预料,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总策划人、中央美院油画系副教授葛鹏仁已经接待了一百多位记者和各种社会研究机构的访问

者。

美院宿舍楼十一层十六号，葛鹏仁画室兼卧室。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现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葛鹏仁，年近五十，小眼儿，长脸，尖腮，一脑袋蓬乱而疯狂的齐肩长发。

他的屋内，左右各靠墙支着张钢丝床，床单枕头被褥早就不成了形状，谁来了都坐在上面，五湖四海，群贤皆至，藏污纳垢，常年不洗，自然是惨不忍睹。这可能代表着中央美院油画系第四画室——现代艺术画室（依他说，第四画室的诞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负责人的某种现代艺术气质。

他满口东北屯子里的土腔儿，言必称自己是农村长大的苦孩子。他爱喝两盅，桌上几个空啤酒瓶，充溢着酒精分子的小眼睛，可以让你感受到他平常很少让外人感受到的纯真和友善。他走到屋子的尽犄角，魔术般地掏出一瓶“北京啤酒”，灌满一大杯：

“这瓶酒归你！”

然后又把马粪纸包的血肠、肚子、舌头、耳朵之类的杂什和一小碗盐花生米推到我面前：“这也归你，没筷子，干脆上手。”

下酒菜，一天前是它们，一天后也许还是它们，也不知道这位艺术家曾经和多少人说过“干脆上手”。我借着北京的大冷天，仰脖儿灌进一大口啤酒。

“好，我就喜欢爽快人。”艺术家在对面喝彩。“你慢慢喝，我不陪你了，我还没吃饭。”他从冰箱中取出一团生面。面表层已结了硬壳，一掰开，面已发酵，布满了蜂窝，一股酸馊气味扑鼻。他把面拍扁，用刀切成条状，扯长，一条条放在床上。他告诉我，他最擅长做也最喜欢吃拉面。

他从我坐的床底下摸索着掏出个电炉子，嘿嘿一笑说：“我是不是觉悟不太高？这已经是第三个电炉子了。前两个都被没

收了。每个罚款两百元！”

他发着高烧，咽喉发炎，声音越说越小，一直到沙哑着说不出话来方肯罢休：

“你来一趟不容易，那么冷的天，大老晚的，家住十五层，电梯都停了……”

如果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如果不是他屋里竖着一幅一米高的大油画，你很难断定他是位卓有成就的画家，你很难断定他居然能在中央美院油画系挑头，搅得社会那么不得安宁，你顶多只能判断他不过是一个始终躁动不安、有着同情心、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同时也是个被累得疲惫不堪的人。他的声音被压在咽喉里面，他告诉我：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啥？”

“……”

“我就想躲得远远的，蒙上头，好好地睡上两天觉。”他在苦笑。“嗨，被绑到了战车上，身不由己了。”

六

蛇年的第二个周末。

美院宿舍楼十一层十六号。满屋的烟草味呛人。烟雾朦胧中，一伙人围书桌坐了一圈，这儿在开会。都是“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核心成员。像大革命时期某个激进团伙的露水聚会。这间屋子常有这样的聚会。许多关于大展的重大决定都是在这里作出的。一听说我来采访，并且是被认为发表了对画家不利的新闻报道的报社记者，画家们眼睛中射出明显的是敌意。

“我找葛鹏仁。”我说。

“今儿没功夫，下个星期再说吧。我们已正式委托孙景波老师作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怎么个找法？”

“壁画系副主任，副教授。”

葛鹏仁指着坐在他旁边一个不太显眼的大眼睛有些谢顶的小个子。

我要被请出来的功夫，门被推开，愣头愣脑冲进来个穿红羽绒服的女记者。

这位皮肤白皙、脸上略施粉黛的女记者跟这伙人都认识。所以说话旁若无人，大声大气。

“我们正开会。”葛鹏仁解释。

“我占不了你们多会儿功夫。”女记者有一种打持久战不容商量的劲头。

这种场合，仿佛只有女性才有资格讨价还价。

“好好好，这样吧，孙景波……”

封锁了，孙景波当即被委托，接受这位女记者的采访。

孙景波与这位女记者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

女记者非常郑重地告诉孙景波，她是代表妇女来提出问题的。

“既然是人体艺术大展，为什么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男的不暴露生殖器，女的都暴露生殖器？就那么几个男的，还遮遮掩掩。广军自画像，就用手把下面遮盖着。”

直愣愣毫不修饰的问题，颇像是女权运动者的口吻。

问题提得异常突兀。孙景波略思忖了一会儿，这是个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广泛的问题。他说：“我们没有暴露生殖器官。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应该知道，男的生殖器是暴露在外面的，女的生殖器是长在下方的。正因为男的生殖器是暴露的，所以要遮起来。道理很简单，我们是人体展，不是性器官展！女的性器官长在下边，看不见。阴毛不是性器官。女的性器官，只有妇科检查腿叉开翘起来才可能暴露。如果说大展暴露了女人性器官，

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靠想象去完成的。”

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更加直率和不隐讳,甚至可以说有点恶狠狠不容回旋。也可能只有这样才显得真诚,直截了当。

其实,这位女记者还不是那种饱经沧桑脸皮厚的记者。我去访问她时她对我说:

“那帮画家挺不佞的,什么都说。”

她的脸居然红了。

我有些于心不忍。她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一个颇为复杂和整个画展都敏感的问题——即人体艺术与性的问题。如果抽象地谈人体艺术与性的问题还好办,专门有《裸体艺术论》,拿一些欧洲艺术史上早有定论的经典作品和文化范例和一些外国人的裸体来说事儿。然而眼下是,那么真实鲜凌那么生机勃勃的中国人体,赤裸裸地簇拥在那里,吸引了几十万观众。一方面这几十万的观众说明画展的轰动和“成功”,另一方面这几十万的观众又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文化(包括性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在我们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荣耀的归结的同时,又可能授人以柄,给人体大展在中国文化史和美术史上得到公正的评价蒙上阴影。虽然谁都明白这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系统,谁都知道艺术创造尤其是人体艺术创造初始的动因是什么,然而大家都故意模而糊之,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用“人体美”来简单地装饰人体绘画艺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中央美院青年教师艺术研究会、文艺报、摄影报主办的“人体文化讨论会”,企望把大展办成更高更深入更广泛的层次,然而,它却没能做到。

七

北京国际饭店。

“人体文化讨论会”：“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筹备组织者总体设计的一个部分。

北京的美术界、思想界、新闻界三教九流一百七十多人蜂拥而至。

许多闻风而至的与会者，都企图在这个热烈隆重的讨论会上听到些惊世骇俗的东西，因为当时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给社会带来的震动简直是太大了。然而他们失望了。

上午的发言，名流们按官职大小尊卑贵贱挨着走。美术家们大谈画人体的意义，大谈人体美，诗人朗诵着人体艺术的赞美诗篇；有一搞建筑学的说，人体艺术是仿生艺术……这在私下里引起了一些青年理论家画家的不满。此次大展的参展青年画家、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孟禄丁跟我说：他们都在给一个“圆”画切线，从来不想切入“圆”的内核。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强化讨论会的戏剧性、使讨论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会议组织者请来了造型哑剧创造者、哑剧表演艺术家王德顺为讨论会助兴。

我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副教授、人体大展参展画家吴小昌家中偶然碰见了这位表演艺术家。

他告诉我，原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有一个惊人的设想：

王德顺先生自告奋勇，愿意在二楼展厅的某个角落把全身涂白，向观众展示他的裸体真人造型艺术。

“生殖器也裸露吗？”我问。

“不不。生殖器用石膏作一模子扣上。”王先生说。

这个建议提出后，遭到一些参展画家的反对，认为这样与整个油画展不协调。又决定挪到美术馆画廊办。一个方厅，王先生立在中央一台座上，在灯光的辅助下完成某个造型。他的周围四壁挂上“王德顺哑剧造型艺术”三四百张照片，观众可以在

任何角度观看。

“后来为什么没搞成？”我遗憾地问道。如果搞成了，一定会更轰动、更爆炸。

“画廊没有暖气，室内温度解决不了。”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当时，美术馆馆长刘开渠先生也有些顾虑。”王说。

这种顾虑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一大胆而充满着浪漫色彩的设想近乎于大逆不道了！这等于硬要拽着中国社会在一天内跨越好几个世纪！

王德顺先生也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人。他今年五十三岁，个头在一米八以上，身材挺拔，经常捋着他那无羁无束的披肩发。他坐在沙发上，他讲话，他站立着，无时无刻不让你感觉他的眼睛、他的手指、手臂、他的每根头发、他的突出的颧骨和脸部肌肉或者准确地说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充满了活力和戏剧性。

作为艺术家，他不仅是心灵漂泊无着落，而且他在北京没有户口，是个没根没底的“黑人”，从事他那世界独一无二的造型哑剧。

他说——

我是辽宁人，十五岁到现在，当过乐队号手合唱队员，相声评书广播歌剧话剧都干过。你问我为什么会想去中国美术馆搞真人裸体造型。为什么不呢？古希腊人说：上帝给我们如此美妙的肢体，我们为什么不展现给人们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哑剧造型艺术家，却不知道我曾经先后在辽宁鲁迅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民族学院当过模特儿，而且时间不短。1980年我领女儿到沈阳考中央音乐学院，路费用完了，生活窘迫，我就到辽宁鲁艺当模特儿。学生问我：“王先生，您是不是来体验生活？”我说不是！我首先是为了生存。不过是生存的目的意义有所不同，追求有所不同，我高兴我愿意把自己的人

体展现给别人。当模特儿是为了生存,为了赚钱。北京当时模特儿的收入一小时一块一,我上午都排课,一个月收入二百多元,相当可观。当然,模特儿不应该觉得是被人雇用的肉体,他也应该是艺术家,并参加画家的创作,不仅要激发起画家的创作激情。许多女老师女同学特别爱画我,说能在我的身上看到生机、看到力度。由于我的情绪变化很大,他们干脆不画油画了,干脆画速写,干脆拿照相机拍下我瞬息变化的有意义的姿态。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构成了一种不朽的艺术形式时,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后来我创造了造型哑剧艺术。看完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我真想写下这样的话:

人体,你可恶的东西!你让我激动不已,你让我欲情难耐!我始终思辨不清,这是美感还是邪念。但我却能证实我生命的存在。

一个戏剧性的人,要给“人体文化讨论会”创造一个戏剧性的效果,然而,这给会议要讨论的许多重大而严肃的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增添了不协调和滑稽。

王德顺在讨论会上一上场,电影厂、电视台的灯光立即转向了他。身上穿的那件棒针线毛衣,挺花哨,格外耀眼。他在作了一二十分钟开场演说后,说“中国现代戏剧。要使戏剧振兴,一定要引进性意识。性意识将对我国戏剧产生革命性的作用。为了助兴,他为会议准备了个小节目。大家可以出各种各样的情绪题目,现场即兴表演。”

说完,他跑到了主席台的右边。

大家早就听腻味了老夫子们的什么“美”和“人体美”,都轰过去凑热闹。

狞笑。

大笑。

苦笑。

窃笑。

傻笑。

皮笑肉不笑。

演出完这些后便有些冷场。王德顺催促：“你们快点！越快越能表演。动作很好看的。”

台下有两个人有些“忍不住了”。一个是某大报的记者，一个是某知名的青年学者。他们嘀咕了一阵，想了一个恶作剧的题目。

记者走过去。

调戏。

挑逗。

“性冲动！”

一说“性冲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表演者和嘻嘻哈哈的围观者都愣了。表演者僵持在前一个动作上问：

“谁提的这个问题？”

“我！”

记者拨开众人说。

“那好，我可要开始表演了——”

场面顿时有些紧张和不自然了。这儿毕竟不是实验剧场。主持人赶忙说：“算了算了，还有发言呢。”方解除大家的尴尬。

会下王德顺说，“性冲动”是可以表演的，只需盖上一薄被单。他曾在外国大使馆表演过“性冲动”，大家都看得很高兴。

面对着那么重大的一个文化事件，面对着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面对着民族文化的这许多棘手、超敏感却迫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极其需要无数锋利的势不可挡的理性解剖刀，在我们社会的最痛处深深地切进去。然而，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就使艺术家们也感到极大的失望。

惯于任形象思维的小鸟自由飞翔，惯于在相对狭窄的空间

里生存，惯于孤独寂寞并在孤独寂寞中感知人类共有的情感和困惑，惯于在灵与肉的碰撞矛盾中使灵魂得到升华的艺术家们（亦是“人体文化讨论会”的组织者们）可能从来没有打算为“结果”负什么责任，他们更强调感觉的过程，更强调在直觉力的作用下去做某件事情或不去做某件事情，而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先作一番理性的清洗，弄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社会的强烈冲击下，显得有些茫然和手足无措，虽然出乎意料的轰动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兴奋，并在兴奋的惯性作用下作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反应。但都给人感觉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八

我国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中央美院，是美术精英荟萃的地方。

这里仿佛是遍布污浊中的一片净土，这里仿佛是远离尘世的殿堂。“中央美术学院”，红底金字匾，毛泽东御笔亲书，悬挂在“凹”字楼低矮的大门额头。它的北面是“吉祥剧院”，西面紧贴着东安市场和繁华的王府井商业街，东面是宏伟高大现代的“王府饭店”、“和平宾馆”。它蓬头垢面与周围环境十分不协调地矗在那里，大有些仙风道骨与世无争的古风。“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虽然有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副院长朱乃正、油画系主任闻立鹏等人参加，但在理论上讲，画展与院方无关。油画系葛鹏仁、吴小昌等中青年画家筹办大展，公开打出的旗号是：“自筹资金，自己组织，自负盈亏。”也就是说，大展是非官方的，纯属民间性质。

民间合作主办这种规模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亦属首次。

应该说，大展的筹备组织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小到展览所

涉及到的所有技术细节,大到联系国外如日本、美国的展出,都在大展一年前全部设计好了。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大陆将举办人体美术展览”的消息后,参展的画家们便惶惶不可终日了,生怕稍有风吹草动,某首长一句话,就把大展扼杀于摇篮中了。这种危机感始终笼罩在画家们的头上。

我在中央美院红砖拐角宿舍楼二门六层见到了大展筹备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宣传事宜总负责人”吴小昌副教授。

吴先生是山东大汉,大块头,脸膛酱红,善谈吐,豪爽。组合柜上有一小镜框,一张少年时期的照片,穿着小八路的军服。

我采访这位副教授的原因是展前的几次风波。

大展开幕时,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不期而至,这似乎是精心安排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官方支持的态度。然而采访中,知情人告诉我,在筹展初期,文化部却是态度暧昧,当时文化部与筹展画家达成的默契是:一、不暴露文化部态度,是否能展出,与中国美术馆商量;二、如果要展,要保证质量;三、院方领导要审查把关。也就是说这次大展必须接受准官方的监督和审查。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登了消息后,中央美院天天接到询问的信件和电话。美国电视广播局从纽约打电话来,联系拍摄专题新闻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来联系……国内外新闻界的高度重视迫使大展筹备组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在北京珠市口山城饭庄举行了第一次“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吴小昌主持。

招待会当天,法新社记者麦宁根据一个西方记者的观点发出了“中国一些画家集资准备年底举办裸体画展”的电讯稿。该消息从各个方面强化了此举在中国的政治敏感度。一位画家愤怒地说,她把我们这帮人当作了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第二天,这则电讯稿在新华社《参考消息》上译出登载后,立即引起了

各方面的注意。文化部美术处打电话来询问。同时也使画家内部产生了恐慌,那种挑衅性的咄咄逼人的西方新闻语言,很可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吴小昌则是怒火中烧,按另一位画家的形容,吴“暴跳如雷”。其状可以想见。这帮驻京的西方记者报道中国,哪壶不开提哪壶。

为了稳住各方情绪,澄清有关事实,重申大展的一些观点,力挽狂澜。大展筹备组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吴小昌以个人名义致法国驻华大使公开信,并附上经过整理复印的“招待会答记者问”等八份文件。花了五百多元钱,复印了六十多套,分送文化部领导和法国驻华大使。

吴小昌告诉我,那段时间可累坏了,材料的复印、装订、寄发、联系都是他一个人。结果累发了胆结石,五月底住进了医院。

大展的组织者,谁也不愿意担这种政治责任,把艺术活动与政治搅在一起。首先,初衷不在于此,至于说文化反思,那是副产品。再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影响社会生活。他们极其脆弱。

“诚惶诚恐,担惊受怕”,八个字,可以概括筹展期间画家们的全部心态。

虽然是小心谨慎,却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就油画人体艺术大展采访吴小昌,发了专访电讯稿。电讯稿在报纸转载后,中央美院院长办公室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办公室同时收到四川一个化名“点儒”隐去具体地址的读者来信。洋洋数千言对刘海粟、吴冠中、吴小昌关于人体、人体美、性文化、人体文化的论述提出全面质疑,有十三条之多。并在信的结尾向中央美院院长提出了四条“建议”:

一、取缔该次画展。

二、吴小昌的表现充分反映他的文化修养及道德水准,不具

备为人师表的素质。该生(永远应该是学生)生活在组织之中,请考虑调离。

三、吴小昌对犯罪心理学学科进行亵渎,实则宣扬犯罪,并提出一系列听觉刺激及视觉刺激,文字刺激及画面刺激。为了防患于未然,予(预)防犯罪,请转告接受(收)单位对他施行文化教育及法制教育。

四、余(喻)红(注:喻红为参展的唯一女青年画家。)参展,本为丑行,此生留校任教不适。调离为妥。

更容易引起国人义愤填膺的是,更容易激发国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是,“点儒”指出:

东渡日本,西进美国,难道是文明之举吗?目的是什么?!让外国人站在中国人的光身子面前评论?!送展系什么行为?!先生您也是中国人,其体态如出一是,中国人的光身子画面能给中国带来声誉吗?!

“点儒”向院长要求:

为了挽回贵院声誉,请您将我之意见公诸于贵院师生,以标明院方态度。

这封信写自于大展前的一个月,而且一信多投。据可靠人士透露,由“赵紫阳办公室”转给了文化部。

这封信又让故意不声不响地埋头准备、尽可能地不惹是非的画家们稍觉轻松的神经绷紧了。

这哪里像是在进行一个纯学术的活动!这简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冷战!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势力随时都可以扼住画家的咽喉。

吴小昌先生和我谈到:人体艺术是性文化的一个部分。画人体本身是人的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情欲也是欲望。中国人体文化和性文化源远流长。六千年前我们就有女人人体泥塑,两千年前就有男女人体岩画。再如《老子·第六章》篇道即说“玄

牝门,天地根”。“玄”即“黑”,黑即“阴”;“牝”,女性阴户;“门”,女性生殖器符号。“根”,则与男性生殖器有关。生殖化育天地万物。这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观和生殖崇拜。汉语中许多很高级的辞汇都起源于性,如“高潮”、“激动”等。

他与中新社记者也谈到以上的观点。

著名画家,也是人体大展特邀参展画家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急了,找到吴小昌说:

“你怎么这么解释?!”

“‘玄牝门,天地根’。你去查查辞典嘛。”

“你这个人办不成大事。因为你说大实话!”仿佛这个社会不需要真诚、不需要真相、不需要真理。唯有假话,才能使社会这部庞大的机器的每个齿轮得到润滑并有效运转。

大展后,画家们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让画展向纯学术靠拢,向艺术靠拢。按大展总策划人葛鹏仁先生的话说,要逐渐降温,逐渐减轻分量。所有活动组织、对外发表讲话,新闻媒介可资引用的材料都是温和的,偏中性的。触及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敏感话题如同危险的雷区被绕开了。他们的艺术行为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外观形象开始剥离。艺术家们的行为一旦属于社会,他们就在社会的同一张网下和普通人一样等量齐观了。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传统意义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芸芸众生中有着普通人一切情感的一分子。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中最有良知最富于智慧最有理性精神最有创造力的一层,他们走在社会进步的最前列,他们企图超越历史、超越社会、超越令人窒息的传统,然而他们的超前量是被历史、社会和文化严格限制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超越!他们的行为甚至只能是某种文化的演绎。可能有限超前,不能超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这批艺术家可悲的文化现状。

九

一位外国记者说,在裸体艺术前,“中国人被剥光了”。其实,裸体艺术的创造者们也不能幸免。

正因为艺术家们在社会舆论下的犹豫和自身难以自拔的困惑,他们总是对大展的一些事情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为这样会少给他们招惹麻烦,然而事与愿违。

两元钱门票的风波 ——美院学生愤怒了

十

毋庸置疑,“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有很大程度的商业动机,并且是在中国庸俗市民文化勃兴或者说泛滥背景下准备和诞生的。一是大展商业化,二是庸俗文化,是筹展艺术家两个最头痛的包袱,很突易让人抓住把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要回溯到一九八七年秋天。

当时,葛鹏仁和参展画家杨飞云应邀到广西桂林举办画展。画展期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编辑人员来看望画家并组稿,当他们客套寒暄中突然听葛鹏仁说,想组织中央美院中青年教师办一个油画人体艺术展览,眼睛顿时大亮。就在桂林丹桂大酒店,出版社与画家一拍即合。广西人民出版社以为画家提供活动经费两万元极其便宜的代价,获得了独家出版大展

全部作品画册的权利。然而筹到的钱与大展所需费用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粗估大展费用,将在八、九万元。亏空怎么补?由谁来补?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美术馆的门票。

中国美术馆的门票价格,几十年的老规矩,一张两毛钱。这就是说,任谁都可以花两支红果冰棍的钱,到中国第一流的美术馆一次看到好几个一流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的艺术家们已呼吁再三: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太不值钱了。

美术馆何尝不想涨钱?你只要注意看一下就明白了。中国美术馆像一座零件都锈蚀的古老座钟,楼下楼上 墙皮都大片地老化脱落了,设施陈旧,布满灰尘。一副捉襟见肘的窘迫样。伸手要钱,谁给?国家更是处处捉襟肘,更何况文化事业是“小娘养的”!

筹展画家与美术馆协商结果:“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票价两元!同时决定,该展取消“三证”(美院学生证、工作证,中国美协会员证)特权,即文化部规定持有三证的人有权免费到中国美术馆参观特权。

门票涨价十倍和取消“三证”特权在社会和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应。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震动社会的事件,让本来被画展筹备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画家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又一个漩涡。

十一

首先是中央美院内部炸了窝!

学生们愤怒了!他们觉得受了侮辱!他们要通过行动来发泄不满,来争回国家赋予的权利!美院学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始行动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美院大门口广告牌。有

人用报纸向院领导和油画系的老师写了份“诉苦书”，大意是：

本人生活贫困，吃不饱，脸上只有菜色。听说办人体展览，非常高兴，很想去看，掏腰包，没钱。看不成展览我们很遗憾。爹妈养活我也不容易，还要花爹妈的钱来看展览，于心不忍，所以请通融一下，放我们进去吧！看一眼就行了。只看一眼！

署名是“一学员”

地下铺一张很大的白纸，白纸上画了两只大手，肆无忌惮地朝每一个观众张开着。

大手中间放着一个故意敲碎了边的土瓷碗。

龇牙咧嘴的瓷碗里，居然有人扔了两块钱！

与“诉苦书”的幽默、挖苦、讽刺、嘲弄照应，同时贴出的还有一份署名“美院一万元户”的大字报。

这位“万元户”先生在摘抄了一大张《北京青年报》参展画家答记者问的一些“精彩”片断后说：

人体艺术大展两块钱的票价太便宜了。画的艺术性越高，画展票价就应该越高。建议把画展票价提到五至十五元。

看了两份大字报。大乐。

十二

迫于学生的压力，大展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壁画系孙景波副教授前入美术馆与馆方商量，能否为美院学生安排一个专场，并把专场时间定在开展后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十八时以后。这个决定在开展前一天贴到了学生宿舍楼下。没想到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因为，这个结果与学生们重新获得美术馆自由出入的要求太远。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一张“告美院全体同学书”号召全院同学在二十五日“圣诞节”到美术馆义卖募捐。并将义卖募捐所

得作如下安排：

- ① 作为学生观展资金；
- ② 损献给云南地震灾民；
- ③ 损献给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地震灾民；
- ④ 损献给“油画人体艺术大展”。

满是戏谑和调侃味儿。

院方听说学生要组织上街，党委书记赶紧到学生宿舍劝阻。

同时请院学生会贴出大展筹备组的公告：

经研究决定：本院学生持学生证可随时进入美术馆。

这则“公告”和党委书记都没能有效阻止学生们第二天上街。

十三

美院操场南边的灰色大楼，与那些低矮而老化的“凹”形楼和一排排简易平房画室相比，是美院一幢最有现代意味的楼房，壁画教研室、大画室、院长办公室、学生宿舍、教师画室兼宿舍，杂居于此。

男男女女都在一楼等候电梯。与别处的男女不同的是，这里的男女眼神打扮都是不齿世俗的狂放不羁，两个电梯口，不锈钢楼层显示灯的周围被画了一圈放射状线条，暗示阴性生殖器官；电梯口对面的白墙壁亦有许多线条构成同样的暗示。像谁在睁着眼睛诧异不解地盯着你。这些性符号常在北京的公共厕所里看到，被戏称为厕所文学或厕所艺术。

一天晚上，我摸上了七楼的一个学生宿舍。

屋里一盏桔红色的灯，萤火般地亮着，两张上下铺，四个人。好几个人挤在屋里看电视。黑白电视，十二寸。电视里正播着一部外国电影。

——长脸学生凑过来和我聊——

您是说那天美院学生去中国美术馆？我也去了。美术展览门票收两块钱是空前的，使艺术带着一种商业盈利色彩。他们又请报社，又请电视台，搞得热热闹闹地，就是想捞钱。如果说他们是艺术家，那也不过是一些人体艺术家。本来我们对教师都是尊重的，可是现在觉得他们不值得尊重。他们利用了老百姓的好奇心。（另一学生转过脸来插话：美术馆有那么多的大师去展览过。你们不就是画光屁股吗？如果你们说你们的作品是艺术品，就不应该收两块钱门票。）艺术品是商品，我也承认。面对商业冲击，开画廊、卖作品，这都正常。美术馆是沙龙性质的，把商业性质掺进去，就不正常了。其实我们一上美院就画人体，没什么稀罕的。人体对我们来说，天天看，太一般了。什么人都去看展览，和菜市场似的。美术馆可逮住一次赚钱的机会。平时星期一闭馆休息，可这次什么展览都休息，唯独人体展览仍然开放；美术馆平时下午四点停止售票，允许参观到五点，这次却延长到六点！说是“应广大观众的要求”。

我们决定在25号圣诞节的时候去美术馆，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去争得美院学生的权利，一是向公众说明，人体展览在美院内部也是有争议的。

我们在美术馆写了黑色横幅。用整张的元书纸一张一个字，写了“两块钱意味着什么？”由九个同学各拿一张，排着队，从购票观众队伍的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回头。大家走得挺整齐的。《文艺报》还登了。哈哈。

十四

美院学生会主席艾安的宿舍。门上贴了一便条，上写：

“记者先生：因要上课，实在没功夫久等。若来，请到后排平

房找。艾安”

不能想象这儿居然是民间艺术系的画室。这是排简易平房（按北京市有关规定，简易平房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抹外墙缝。）没窗户，也没有一扇正正经经的门，“艾安！”

“那边！”有人像是从墙壁上伸出个头来，用手给我指了指个方向，我刚想上去问明白的一瞬间，那头便缩没了。

准确地说，他是原中央美院学生会主席。这位美院的学生头，布尔什维克；一米八几的个儿，有些谢顶；嘴唇脸上稀稀拉拉长着些胡髭。他的经历令我吃惊。他今年只有二十六岁，却有十年的军龄！二十三岁由部队复员后考上中央美院。

他说——

美院的学生可没有清华、北大学生那种本事，遇到这事儿，早就去发表演说去了。他们去美术馆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意愿。我们是正当的。说得郑重点，党和人民给美院学生的权利剥夺了。我们要争取权利。其实，办人体大展没什么不好，别人怎么说我管不着，我认为办人体大展还是个正当的事儿。这个大展，教师们办，有艺术活动的意思，也带着点儿嘲弄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针对大展本身。当时我想搞得幽默一些，搞成一个艺术活动。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挺没劲的。

美院学生有个特点，思潮杂，门派多，特别强调思维独立和行动与众不同，很难有统一的群体想法，很难有一种内聚的合力。

我在民间艺术系还碰见一个高年级学生。他的观点更新鲜

大展开幕那天，我去了，还领着我的女朋友。看见美术馆里外人山人海的。门口有公安局的把门，而且还竖着“三证”一律购票参观的告示。我在美术馆外面整整转悠了一下午，看那盛

况;也希望能见着一两个老师。结果一个老师也没见着。后来准拿美院学生证进去看了,我反而没去看。据我了解,那么多的平民百姓平常根本不进美术馆!

有些同学认为人体展亵渎艺术。在某一个时代和地点,我可能也是这样看,但在中国,我不这样看。人体大展本身就有艺术含意。

说实在的,我们去闹,看见参展的老师们紧张,看见警察很紧张,看见那么多人注视我们,我们就很愉快。快活快活,增加点乐趣和刺激,有什么不好?

为正义、为艺术、为权利、为刺激、为找乐子,令人眼花缭乱。我根本不可能对美院学生在美术馆也算是轰动社会的“壮举”作一个概括。他们与他们的老师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他们以他们的方式发泄着某种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好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塑造一种形象和品味由此而产生的快感。因此,当警察把他们的头儿叫到美术馆里去的时候,许多人见好就收,大模大样地给看门人亮一下“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证”便进去欣赏艺术去了,就这样四五十人的“闹事”队伍便作了鸟兽散。

中央美院距中国美术馆不远,两站地儿,我想象不出几十个学生如何潇洒地抱着大黑布横幅,拎着笔墨,夹着纸张,三五成群地来到美术馆的,并由谁一声唢呐,呼拉拉拉开场面。我看不出这些学生能对社会形成大威胁,能有多大气候。社会真犯不着对他们军警林立,剑拔弩张。

走出二十世纪(一)

——模特儿罢课

十五

模特儿在中国是一种神秘的职业。关于模特儿的故事,从本世纪初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办上海艺专与军阀孙传芳打的那场著名的是否“有伤风化”的官司,到解放后美术院校使用裸体模特儿长期名不正言不顺并受到非议。六十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致函中央政治局诸委员,恩准美院作为教学而使用裸体模特儿,首次确认了模特儿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到本世纪末的一九八六年逼疯南京艺术学院女模特儿陈素华,社会舆论大哗。我在美院采访,我在新近的报纸杂志上看到,美术界的权威们今天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地引述当初老人家的语录,以证明模特儿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受到社会的充分尊重。同时,我又在新华社记者拍的照片上看到江苏省六合县十九岁的农家姑娘陈素华,一个“举手投足舒展自如”的优秀模特儿,怎样被生她养她的古老土地折磨得神经失常!照片上的她,神情恍惚,面色浮肿,一副精神被彻底摧毁后的茫然!报道说,她家里天天挤满了人,就连同情她的人都抱怨她:“你就是去要饭,也不要卖身呐!”报道说,她神经失常后,口里不断地喊着:“我是为艺术献身!”她发疯似地跑到公路上拦汽车,高喊“我要回南艺!我要回南艺!”无论今天给模特儿赋予多么崇高的精神

价值,无论怎样诗一般地赞美与永恒的艺术同生同长的模特儿创造性的活动,但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模特儿在中国社会是一种不被理解、备受鄙夷和歧视的职业。以至于美院在使用模特儿和模特儿从事职业活动,都是在相对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大多数职业模特儿,都是在亲朋好友、邻里单位、甚至丈夫妻子都不知情的状况下到美院工作的。

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和艺术家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这一冲击波甚至影响到了中央美院和整个首都美术界。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大展开幕后的第五天,上午八点至下午两点,中央美院二十多个模特儿(约占美院模特儿总数的一半)宣布罢课,抗议美院画家的一批写实人体画未经模特儿本人允许在“油画人体大展”上展出,谴责美院违背了当初对模特儿“保密”的诺言,同时提出了增加模特儿单位时间工资的要求。

《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相继对模特儿罢课事件进行了报道。外电外报也转发了这些报道。

模特儿行动后,立即打电话通知有关报社,请求新闻舆论支持。他们无疑是想向社会公布美院的模特儿所处的生存困境,并通过行动申明,模特儿与美院绝不仅是温情脉脉和冠冕堂皇的为艺术献身的关系,同时还应该有一层赤裸裸的契约关系,一种劳资关系,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这些关系一旦建立,模特儿的合法权益就应该受到保障。

这在美院引起的震动,非同小可!美院用模特儿,也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情了。从一九五零年徐悲鸿先生主持中央美院算起,已有四十年光景。这期间,美院与模特儿,画家与模特儿,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许多美院的老师和学生娶模特儿为妻。一九八四年,奥地利画家蔡特尔在中央美院进修,与一位姓徐的

模特儿结为伴侣。蔡特尔在华学习期间靠奖学金，经济并不宽裕，结婚后，小徐仍当模特儿，与老师同学亲密无间，后来蔡特尔学业期满，将小徐带到了令人神往的维也纳。然而，命运之神不可向每一个模特儿都惠以恩宠。当模特儿，对于绝大多数模特儿来说，首先是谋生手段，其次才是别的追求。因为作为一种职业，作为靠挣工资生活的人来讲，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对于模特儿罢课和报纸的报道，院方和画家，开始是震动，而后是震怒，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一方面对模特儿统一口径，不予让步；一方面对外界坚决否认“罢课”。

十六

我去美院采访时，有关部门都接到院方的指示，有关模特儿的事情一律不谈、一律回绝。他们被蜂拥而至的记者搞腻了。

美院教具科，专门掌管模特和教具。我不明白为什么把模特儿与教具搁一块管理。美院有关人士说，总得有个部门管。

教具科在“凹”字楼拐角处。里面好些个大玻璃柜，陈放着石膏头像、根雕之类的东西，毫无表情地注视着各方面。教具科负责人姓田。

写字台上散乱地放着一摞打印的“中央美术学院模特工记工单”。

写字台靠墙的一叠旧报纸上摆着一张密密麻麻填满了人名、地址、电话的大硬纸。那是模特儿的“联络图”。“联络图”是由院方掌握，绝对保密的。美院使用模特儿有专门规定。院方制定的“使用模特工规定”说，各班正课摆模特时间每人不得超过二小时，所画类别也不得随意更改；教师进修必须三人以上才可使用模特；云云。平常模特儿不来学院，在家等候排课通知；男女模特儿上课如果不排课或排课时间太少而不能维持生计，

就意味着被砸了饭碗。所以,模特儿都明白与院方搞好关系至关重要。这显然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

这位掌管模特儿生杀大权的老田,这位管了模特儿十二年,模特儿“又怕又恨”(某模特儿语)的老田,垮着脸,等我提问。

“您这儿有模特儿招生简章吗?”我小心翼翼。

“没有。”他面部毫无表情。

“简章不是模特儿人手一份吗?”

“底子被别人拿走了。”

“我能采访几位模特儿吗?”

“不行。”

“这份材料上写的模特儿‘来得多,走得快’是什么意思?”

“这你可不能报道,报道出去会引起群众误解,效果不好。”

“我们的模特儿管理规章制度是不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保密’问题?”

“保密?怎么保法?没法保!公开场合我们没说过要‘保密’。教具科内部讲清楚,校外来电话问模特儿在美院干什么工作,我们不正面回答。再问,我们就说,扫地扫厕所,这很光荣嘛!”

老田的顶头上司,教务处处长周健夫风格不同。他是版画系副教授,四五十岁,是个有些学者风度的山西人。

处长先生坐在写字台后,被烟雾笼罩着,没有过滤嘴的烟,一支套着一支抽,满口黑牙。

“你的烟瘾令我吃惊。”我说。

“抽得不多,一天也就是一两包。”

他的谈吐,滔滔不绝——

模特儿本身不是问题。一九五零年第一任院长徐悲鸿先生请毛老人家为美院写了块金字招牌,一挂四十年了。这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画了画就要给人家看的。文革前模特儿是正

式工，称模特儿叫“范人”，文革前叫“八大员”。文革中，这些模特儿纷纷转业。文革结束后，我们在社会公开招了四个女模特儿正式工，文化部给的特殊招工指标。一九八三年八月北京十院校登报公开招聘模特计时工，报名的人有三百多名，录取了二十多人，中央美院只分到了六个。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央美院自己登报招模特儿，报名四百多人，招了十五个女的，十个男的。这次组织了一个由十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打分挑选。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我们又新招了十五个女的，十个男的。现在有男女模特儿五十人左右。模特儿来后没有任何约束，干完领工资。有的只来了一次，有的一次都没干完就走了。报纸上说美院有“保密承诺”，我可以正式说，我们没有任何书面和口头的保密承诺。美院就是画画，画画是视觉艺术，画了就是要给人看，就是要展览，就是要出版。画了画压箱底，能有这样的保密吗？美院和模特儿关系非常好，也待她们不薄。

十七

对这样的解释和答复，模特儿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模特儿内部，由于各自的目的要求不同，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出于各自自身的利益考虑，迅速出现了分歧和裂痕。有的认为院方的答复远不能满足要求，应该坚持罢课，直到模特儿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保障为止。这一派的模特儿认为，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团结起来，一致行动，为真正获得模特儿的权利而努力。斗争目标应该看得远一些。大多数罢课模特儿以实惠为目标，只要院方愿意考虑涨工资就行。

十八

我手里捏着一份材料。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高等艺术院校在京美术专业第四次联席会议在中央美院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调整模特工工资的决定”。虽然第一条非常明确指出:“油画人体大展与这次提工资无关”。但这次涨工资,与罢课推动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种结果起码说明,模特儿罢课中所提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并给美术院校形成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压力。而且美术院校非常清楚,模特儿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职业,流动性很大,如果不保持相对的稳定,必将冲击美院正常上课秩序。涨工资,记时模特儿,取消原附加奖金,全裸由每小时两元一角涨到三元,半裸涨到两元七角,着衣涨到两元五角,每月可报月票一张。

涨工资对北京十大美术院校二百多名模特将意味着什么呢?

中央美院一九八八年财政拨款由上年度的一百八十万元降到一百六十万元。光是美院人头费就得花一百万元。一九八八年教学费预算不到二十万元,在财政拨款减少的情况下,美院唯一的选择就是压缩使用模特儿的课时。提高单位时间工资,减少绝对工作时间,对于许多没有第二职业支撑的计时模特儿来说,仍然不是好兆头。

周健夫告诉我,美院一九八九年的教学计划已经修改。他一副无奈的样子说:“你们不是要涨工资吗?”那我没办法,只好压你们的课时。这就像生态圈:虫子多,树倒霉。鸟吃了虫子,树长好了。虫子吃没了,鸟饿死了,虫子又多了。虫子多了,树又该倒霉了。

“虫子——鸟——树”,多么残酷的一个故事!福兮祸所倚。

槽中无食猪拱猪。最后倒霉的仍然是模特儿。

十九

我在美院，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模特儿的收入是一个副教授（月工资一百二十二元）的两倍，甚至是靳尚谊院长的两倍！如果靳院长拿的是教授工资，倒有这样的可能。有报道说：“国外模特儿明星，同时是富得流油的大富翁”。中国的模特儿还没有经济地位高到足以让社会羡慕和尊敬的程度。模特儿与画家收入比较，似乎也能说是美术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收入倒挂，似乎也能作为“造原子弹的比不上煮茶鸡蛋的”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佐证，以此来说明模特儿收入甚丰，本该知足。这种比较显然是情绪化的。知识分子，教授画家工资收入太低，是轻视知识阶层、排斥智力劳动社会观念的产物，画家与模特儿的收入实在是不可比。从观念形态的角度看，画家和模特儿应该同病相怜才是。而且，模特儿所处的困难境地，却是享有高尚荣誉的画家所不能比拟的。

中央美院的模特儿，原先无职业和从事第二职业的各占一半。她（他）们怀着不同的动机从社会各个方向聚拢到中央美院。她（他）们中间不乏那种人，来到这艺术家生存的空间寻找罗曼蒂克的梦，来寻找灵魂的归宿。

孙景波副教授给我讲过一个“小马约尔”的故事。他曾遇到过一个女模特儿，胖胖的，很纯洁，很有活力，是中央工艺美院一位教授推荐过来的，说：“画画她，很有意思。”他们画她，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马约尔”。马约尔，是法国著名雕塑家，以爱用那种肥胖，充满活力，像炸弹一样的女模特儿从事艺术创作而闻名于世。小马约尔与艺术家们长期接触后，无话不谈。有一天画间休息，小马约尔看着艺术家们画的画，突然冒出来一句：

“还是你们艺术家好!”

“还是你们模特儿好!”孙景波说。

“好什么好!人生不过如此。你们不给我钱,我才不干呢!”

“模特儿不好,那你为什么要来呢?”他逗她。

小马约尔不说话了,垂下了眼睛,沉默片刻后,说:“孙老师,你不知道,我已经死过三回了。”

“……死过三回了”,声音轻轻地,语气十分平静。这让孙景波震惊万分。他不敢相信,就是这个小姑娘?这个一言一行那么纯洁快活的小马约尔?

小马约尔年纪不大,却有着非凡的社会经历。她有过一次初恋,然而却被对方欺骗和耍弄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经人介绍来当模特儿。她期望创造新的生活,并在新的生活中忘却过去的幸。

“孙老师,我自杀过三次。三次都被救活了。您不知道,第一次那天,自杀进医院的女人,算我有七个!”

她对生活绝望了,所以才来当模特儿!

T模特儿,二十二岁,没有正式和固定的工作。一九八七年底考上中央美院当模特儿。她做梦也没想到,当她穿着游泳衣接受教授评审委员会打分时,她的身段竟得分最高,在三百多名考生中与另一名报考者并列第一!自己平时被衣服裹得没有了形状的身体,今天居然熠熠生辉,在艺术家这里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对于她的身体,连自己都没有发现,或许连她文化程度不算太高的爱人都没有发现,竟如此之美妙,竟如此充满了韵味和魅力。在艺术家眼里,她的身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之源。这给她带来自尊、荣誉和金钱。在艺术家笔下,她的身体将被赋予永恒的生命。谁都愿意画她。她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令一些老模特儿嫉妒和羡慕。她陶醉了。

这儿仿佛是远离尘世的仙境净土,她像在梦幻中生活的花

仙子。

现实把她梦幻般的生活给击碎了。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筹备期间，画家们为了赶制足够量的人体画，她和另外两个女模特儿，被筹展人和靳尚谊、朱乃正、詹建俊等著名教授和画家挑中。应该说，作为模特儿，能被二十多个著名艺术家（还包括中央美院的院长、副院长）挑中作画，那真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然而，当她在大展期间和伙伴一起看见以她们为裸体模特儿的写实和抽象油画高悬在中国美术馆，供成千上万懂艺术的和不懂艺术的，来看画和来看裸体的观众欣赏品味；她们看见出版商把大展油画印成廉价的小画片出售，她们看见奸商把大展油画制成小瓷砖画出售，她们看见有人偷拍大展作品，并制作成黑白照片在前门高价出售；她们看见画家在大展期间像英雄一样被观众簇拥着，不停地为观众签名留念，而她们却没有接到首展的邀请，甚至开始时没接到一张赠票。她们被冷落在一旁……她们原来良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她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笼罩着她们。

她们的生活由此遇到了许多麻烦：

T模特儿的婆婆知道媳妇的光屁股像挂到美术馆后，即与儿子说，要他们搬出去住，而不管T已是身怀六甲；

H模特儿的姐姐知道妹妹当模特儿后，就非常严肃地告诫妹妹，别让她公婆家知道。因为她姐姐公婆家“是干部家庭，容不得这个”；

W模特儿有工作，有人买了画片送给她丈夫，同事们亦是议论纷纷。而且单位也在劝她调动工作；

S模特儿是售货员，她对面柜台就在出售盗版的精装大画册，同事们也在画册中认出了她；

……

模特儿职业大曝光。模特儿们在社会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感到孤立无援、势单力薄。不管在理论上怎样解释,都不能改变模特儿的弱者地位,都不能改革模特儿在社会中的低层次类别。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一脉相承,如一片一望无垠的沼泽地,似乎永远也走不出来。人们在想,为什么中国人推翻封建统治后跋涉了近一个世纪,仍然没走出封建传统的沼泽地?著名画家丁聪说,我出生的时候,刘海粟大师就在打模特儿官司了,为什么现在还打?!

模特儿们在谁也靠不住的状况下联合起来了。她(他)们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靠怜悯和施舍。

当这种没有宗旨没有统一目标或者说不可能有宗旨和统一目标不堪一击的联合迅速分化瓦解后,迫使一些模特儿走向了法律。

走出二十世纪(二) ——模特儿诉讼

二十

人类文明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这样颇具悲剧角色的一幕:模特儿把艺术家送上了被告席。诉讼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第一百条,指控艺术家及有关出版社侵犯模特儿肖像权和名誉权。接受委托的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参加“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艺术家在未征得模特儿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展出了酷似模特儿本人的写实油画作品;大展收取高额门

票,具有营利性质;所以构成了对模特儿的侵权。并上诉了法院。要求艺术家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委托人是H模特儿和T模特儿。没多久,W模特儿也向经纬律师事务所提出委托,正式加入诉讼队伍。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在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正式接受模特儿诉讼委托的当天,大展主办人在中央美院画廊邀请首都新闻界,公开阐述了艺术家的立场。大展总策划人葛鹏仁对记者说:展出作品,不存在侵犯肖像权问题。因为这些模特儿是公开招聘的。他们做人体模特儿时,已经按美院规定付酬。成就的作品是艺术,或展出、或出版,这是我们的权利。公开展出根据模特儿创作的作品,这不是第一次,不打招呼是惯例,这次为什么要正式打招呼呢?大展今天撤换了五幅写实作品,并不是说我们错了,而是考虑到有关模特儿和家属的现实处境采取的一种让步性的措施。如果她们诉诸法律,我们倒乐于法庭上相见。

大展筹备组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新闻发布人孙景波副教授则进一步说,模特儿与画家是个非常特殊的关系,模特儿提供形象,画家画。模特儿一旦与画家结合,就意味着出卖了肖像权,不能把模特儿等同于一般人。在法律上讲,只有认为模特儿职业是堕落的时候,才会认为暴露了隐私。如果画家败诉,将是历史的笑话。将会影响我们这个民族在国际上的形象。

对这场诉讼作出谁是谁非谁输谁赢的判断和预测,不是我这里所能做到的。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画家和模特儿昨天还是艺术的合作者,今天却视若仇人对簿公堂,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模特儿不仅是个神秘的职业,而且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它几乎是与艺术同时诞生的。古希腊宏大的人体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永垂不朽的人体油画,不管神还是人,无一不能感受到普

通男人的刚劲和普通女人的芬芳。如果绘画中没有人体,如果画家与模特儿情人般的合作中掺杂进艺术的异己力量,那今天的世界将是不可想象的,人的精神将不能得到人文主义希望之光的普照,将在冥冥之中枯萎。

二十一

我不能不说这次与两位模特儿的会见是令人失望的。她们在展览大厅的油画上是那样的光彩照人,那样地生机勃勃,而现在坐在我的面前,却是这样地疲惫和憔悴。H没有油画中那么丰满,T没有油画中那么修长。

我们的谈话有律师在场。模特儿把她们与画家的纠纷诉诸法律后,即被委托律师告知,不得随便接见记者,如果必须见,事先要与律师联系,征得同意后才能见。我采访两位模特儿,律师当场告诉模特儿,不愿意回答或者不好回答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律师反复解释,案子已经上诉法院,他不想出现对当事人诉讼不利的材料。

双方的谈话,开始时很谨慎,模特儿回答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律师的指导。

H比较活跃,T比较沉静。她们都是当上了模特儿后辞去了原先的工作。所以,从一九八九年元月份开始,她们已经断绝了收入来源。

H也是二十二岁,她有个男孩,只有一岁多,丈夫在学习汽车驾驶,没有工作,家庭生活主要靠她的收入支撑。T的丈夫是个普通工人,自从整天跟她打官司,影响了工作,单位搞优化组合,把他给“优化”掉了。委托律师权绍宁告诉我,鉴于她们各自家庭的困难状况,他所在的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将作为特殊情况对待。官司如果打赢,模特儿将在经济赔偿中按事先商定的

比例付给律师事务所费用；如果官司打输了，或者没有经济收入，事务所将对两个模特儿免于收费。诉讼期间，模特用于收集证据的费用可在律师事务所报销。

其实，画家与模特儿在筹展阶段就有过不愉快。

H说话像喜鹊一样，喳喳喳，速度很快，接连不断——

二十二号首展那天，我们去看画展，好多人认出我们了。有两个女人说：“站着像个人似的！光屁股让别人画，给我多少钱也不干！丢人现眼的，下面和画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看见画家们都在忙着给观众签字。一画家跟我说：“我的笔签完两三支了。”好多人都拿着两块四的小画片来签字，还念叨着：哟，这哪儿出的，可真赚钱。我特气，心想，好啊，你们拿我们赚钱；你们扬名，我们丢丑。

二十三日下午，我们找靳（尚谊）先生，发行物对我们损害太大，请院里出面制止，靳先生说，我没权制止。我是被邀请的，我可以顺便反映一下。美院现在有人说，我们打官司就是为了敲诈钱。其实开始时，我们根本没想到钱的问题，只想干涉一下发行物，当时甚至连撤画都没想。我撇下孩子，T挺着大肚子，去找主办画家，可画家们都躲着我们，明明在油画系里，却骗我们说不在。我们火了，才要求他们撤画。1988年寒假，院里告诉我，你体形挺好的，靳先生在假期要画一下，你要好好合作，让靳先生满意。说实在的，能给院长作画，我也挺高兴。记工单也是靳先生填的。

大年三十画了一天，靳先生、朱先生和我商量，他们长时间没作画了，手有些生；而且时间很紧。初二他们值班，要我初二来加加班。我说行。初二我就来了。工资是每小时一块八，加上谁都有三角钱奖金。田老师说给靳先生画和给学生画一样。工资是我到财会去领的。整整画了三个星期，上下午都画，一天八个小时，都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手脚都发酸。

T接过话茬说——

我画了一个半月，一天平均八小时，都是站着姿势，特累。画下来我瘦了十多斤。(H插话：她身条特好，考了第一名。)站着时，累，特难熬，干脆数数。(H插话：就盼着数到休息的时候。)我们给院长画，都想争得个好印象，在田老师那儿说些好话，田老师将来可以多派些活儿。我们都是这样想的。给靳(尚谊)先生作画时，为了减肥，我到王府井买“泻叶”(一种中草药)，喝了就得跑厕所。后来买了四瓶“减肥美”糖衣片，吃了不管用。一九八八年四、五月份时画头一张画时，休息期间，一位画家和我商量：

“我们要拍教学用的录像，你看行不行？”

“您拍有什么条件？”我问。

“就拍个腿和背面，给你五十块钱怎么样？”

我不同意。他说：“前面几个模特儿都配合得不错，你怎么这样？”

七分钟休息后，我又上台作画时，里面就打开灯光了。我特气，怎么我不同意，你们还拍？当时靳先生在场，我不好意思闹。但我在台上生气，面部表情也阴沉下来，和平常不一样了。那位画家说：

“你别这样，就当没拍似的。”

二十分钟后休息，我穿上睡衣就去找田老师，见了就问：

“田老师，他们要给我拍背和腿的录像，您知道吗？”

“不知道。”田老师说。

“还要给五十块钱呢！”

“真不像话。谁说的？”

“×××。”

后来田教师和院里交涉后，就停拍了。

大展风波后，她们就准备联合起来和艺术家们打官司了。

时隔不久,第三个女模特儿 W 也加入了诉讼的行列。

二十二

北京,护国寺五十三号。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

模特儿告画家,这是一个中国法律史乃至世界法律史都非常罕见的民事案件。

十二月三十日,该事务所正式接受委托后,顿时成为北京中外新闻媒介注视的中心。这家成立仅半年、北京唯一一家合作经营(即私营)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及委托律师权绍宁家中电话和来访不断,询问事态发展情况。

权律师向我介绍了他们欣然接受当事人委托的三条理由:公民寻求法律保护和帮助,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再者,经过调查了解,大展过程中,艺术家、出版者与模特儿确实有法律问题。而且此案很有意义,结合大展的影响,对于保护模特儿的合法权利,使我国文化事业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第三,我们非常同情模特儿面临的遭遇。虽然法律不承认良心和感情,但这次风波确实给她们的名誉和家庭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他们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在事务所驻地举行了有五十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得也很热闹。因为两位模特儿也出席的缘故,新闻发布会不准拍照,一到模特儿起来讲话,电视台就关机。事务所一看门老者坐在模特儿旁边,谁要是不自觉朝这边端起照相机,老者立即起来制止。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记者问:“画家们说,参展的油画画得不怎么像,里面已经加放了画家的再创作。”

北京版权事务所所长张赤军律师拿出 H 模特儿的油画片,请 H 站起来,他用纸张遮住画片的下半部,把画片凑到 H 脸旁,

说：“你们看看，你们凭良心说，像不像？”

一记者在下面喊：“法律不承认良心！”

一记者起哄：“我们要看全部！”

一女记者说：“画家们说，只有脸像，头是模特儿，身子是画家的妻子！”

站在最后边一个围绿围巾，穿着牛仔服的小伙子大声喊：“胡说！我也是画画的。”

有记者提出，过去也有人体展出，为何无人打官司？

经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以岭说：这是法律观念强弱的问题。同时，权利可以争取，也可以放弃；放弃并不表明侵权就合法。

对于“画模特儿是否意味着出卖了肖像权”的问题，权绍宁在十天后说：“这是个可笑的逻辑。这里面没有约定，何况模特儿是个暴露隐私的职业。”

.....

到会的记者中间，也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并在四日后陆续发出的新闻稿中表现出来。而且从起哄的内容看，记者中有一种流氓意识，一种下流和猥亵的意识，一种色迷迷的市民意识。

而到会的外国记者也对该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一位美国记者说，他对这件事引起的法律问题不感兴趣，他说：“我不理解的是，一个人体展览怎么会带来这么大的社会骚动。”

又是一位美国记者（美联社）说：“中国人没有合同、契约的观念，所以这类事层出不穷，假如当初有合同明确规定，就没有这场官司。而且，中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构成了对模特儿特殊的压力。这两位模特儿如在西方，只会为大展拍手叫好，倍感光荣。在西方为此打官司是不可思议的。”

模特儿诉讼，在法律界掀了一场不大不小波澜。

一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和法学所举办“肖像权问题法学座谈会”。会上，律师、画家、教授、讲师、博士生的观点不同，争论不休。

一月十九日，中国政法大学民法专业的研究生和张沛云教授要举办座谈会，讨论《民法》中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问题。

在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中央美院的律师和上海的有关律师亦申言要助艺术家们一臂之力。而中央美院和艺术家则处之泰然，静候法院意向。

二十三

显然模特儿诉讼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按一位律师的说法，是“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我对法律问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模特儿和艺术家们对待模特儿这种职业的深层态度，即集体无意识状态下传统文化阴影影响程度，即下意识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性。

画家们说，“艺术家与模特儿之间只有爱。”他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她们与画家，同是社会旧观念旧意识的受害者。侮辱模特儿等于侮辱画家。被告不应该是画家，而是社会。模特儿之所以作出诉讼这种悲剧的选择，是新闻界煽动、法律界诱导的结果。

这种说法是非常动人的，也不失其逻辑上的合理性。然而，却太简单了些，以至于简单到不能解释清楚模特儿为何抛弃了“爱”而去寻求法律保护这一复杂的社会行为，也不能解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本身的艺术问题和文化问题。

大展展出的一百三十多幅作品，尤其写实作品，除了极少数作品外，都有着对绘画对象——模特儿的冷冰冰的距离感。青年学者王鲁湘有段非常逼近画家艺术心理的批评，我把它抄录

于此：

这次人体大展给我的收获是颇丰的，但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也许画的是公用的、公家出钱雇的模特儿，所以总感到画家与对象之间彬彬有礼（注：着重号为作者加。）的那段距离。这段距离使模特儿成了练习绘画技法的工具（作者注：我采访模特儿时，多次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们就是活教具！是会说话的石膏！”），画家很难像画主题创作一样向对象投入自己的感情。提香、乔尔乔内、鲁本斯注视其对象的眼光，在本次大展的任何一幅画上我都没有看到（作者注：我偶尔找到过，对此，我将在后面表述我找到后的感受。）莫迪尼亚画珍妮时，把裸体画当作吹奏着爱和忧愁的抒情长笛，叫我们柔情缱绻；塞尚反复画《近代的奥林匹亚》，总是在横躺着奥林匹亚前，清楚地画上秃头蓄须的塞尚自己，把《近代的奥林匹亚》当作自己内心的故事来描写；德加和罗丹对自由活动着的女人体的充满激情的“窥探”，给我们的恰恰是对生命的自由节奏与充满活力的韵律的陶醉。所有这些，我都没有在本次大展中感觉到。

我曾经向中央美院参展的一些艺术家和其他美术院校的艺术家提出过一个问题：在艺术家与模特儿之间，艺术家是不是有一种职业上的优越感。艺术家们都非常坦率地承认，这种优越感不仅存在，而且“艺术家”作为一种极端宏扬个性的社会职业，这种职业优越感不仅在与模特儿的关系上有所表现，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亦多有表现。而这种优越感很可能导致某种职业上的歧视。

我从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倡导的：

人性矫正中庸

人性释放智慧

艺术净化人生

这一极富人文精神的主题出发，从我对大展出笼过程中众

多艺术家的一番心血付出的体察和了解,我都不愿意承认这导致痛苦后果的事实。

人文精神的本质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是指,“每一个人均体现了全部的人性;因此,人所具有的每个人都有。”(埃里希·弗洛姆)。而体现某种特殊社会关系的优越感,实际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人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根本无须语言,只要一眼神就足够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我所具有的许多“优良”品质和职业带来的主导地位你没有。艺术家们是无法躲过观众的眼睛的。

不能想象,画家们如果对模特儿充满了“爱”的激情,会出现那种“冷冰冰的”的距离感!不能想象,画家们如果对模特儿充满了“爱”的激情,表现某种性爱意识的艺术品——人体艺术,会给人绅士风度般“彬彬有礼”(这四个字的感觉太准确了!)的印象!在以弘扬人文精神的主题的人体画展中缺乏人文精神的内质,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艺术现象。

我在美院采访,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感受到的,从中央美院院长到教务处主任、从画家到模特儿的管理人员,对模特儿的境遇,对模特儿境遇导致的诉讼,都极其冷漠!仿佛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与己无关,哪怕只有一点道义上的责任!对此,模特儿的委托律师权绍宁尖锐地批评说:“艺术家们的艺术责任体现在大展中是不完整的。”

我们面临两难的选择。我们这个看似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却在变革时期文化传统急速萎缩乃至贫困的民族,急需充溢着生命意识的文化艺术注入新鲜血液,同时,更需要理性精神来保障各阶层的相关权利,使社会运转通过某些公认的约定趋于秩序化、规则化。如果大展必须征得模特儿同意,模特儿如果不同意呢?更何况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模特儿的承受力是很脆弱的,而且素质也不能尽如人意。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可能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中国文化史上动人心魄的一幕吗?谁也摆脱不了文

化的制约,谁也不比谁先走出二十世纪。艺术家、模特儿,你、我、他,都承受着同样的滞重,都裹挟在同一股潮流中。你选择什么? 如何选择? 你去选择吧!

生不逢时的艺术

二十四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搅动了中国社会,艺术家们的美术馆像英雄般地被狂热的观众围困着签名留念,站在美术馆大门外的开阔地摆起的高处,从早到晚动弹不得。他们的周围被观众编织了一圈浪漫的花环。

展览取得了成功,引起了轰动,然而却不容乐观。因为作为艺术大展,美术界的评论出乎意料地冷淡,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并对大展的商业性提出责难,对大展的艺术性提出质疑。甚至相当数量的美术界同行根本不屑跻身于凡夫俗子中间挤一身臭汗观看人体,更不屑搭工夫花两块钱看完全想象到的艺术效果。美术界褒贬两极相差甚远。

那么,参展的艺术家们对大展持什么态度呢?

美院车库上面有一拐角加层,其中一间住着参展画家中最年轻之一的孟禄丁。葛鹏仁推荐我来找他,说他是画家中较有理论功底的一位,“能谈出点东西”。

中午两点,里面却一片漆黑。同屋还住着一人,用乱七八糟的东西由外到里隔开。

孟禄丁,小个子,大头向后缩着,眼镜后边的小眼睛还没睡

醒，听我讲明来意后，慢吞吞地说——

这种展览，只有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仅从美术上看并不重要。这在美术史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大展是中国现实的产物，有着浓重的政治文化色彩，即功利色彩；在文化史上也许评价很高，在美术史上就很难说了。因为美术史上的地位不能从展览的轰动效应去确定。

他出语不凡，有着一种艺术家应该具备的良知和理性审视。他是搞现代艺术的，他的理念色彩很强的一幅画：《新时代：亚当和夏娃的启示》，是几年前最早在美术馆展出的裸体油画之一，表现人的当代意识的唤起和觉醒。这次大展，他那用破纸壳粘贴而后涂上颜料的几幅企图揭示生命元态油画面前虽然无人驻足，却被一西德人赞叹不已地买走了全部小样，说：“在中国居然有这么好的现代艺术。”他在评价大展时，把大展的总体艺术水平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类比，令我吃惊。

“伤痕文学”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文革”结束后，人们遭受的苦难积累太多，心灵被压抑的时间太久，于是就选择艺术来控诉来揭露，艺术负荷着人们最关心的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忽略了（不是有意的）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使大量概念化的非艺术语言充斥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如同昙花一现，艺术生命极为短暂。

在大展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用一个模特儿熟悉的姿势和面孔。艺术家们就像作坊里的师傅，为社会赶制了一批订货，急急忙忙地抛了出去。按照主办者与广西人民出版社签订的合同，作为甲方的大展主办人必须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前将全部作品绘制完成，由乙方翻拍制版，前后只有八九个月的时间！

正是由于大展准备匆忙，艺术上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所以授反对派全部抹杀大展以口实。美术界、中央美院形成了阵线鲜

明的两大派。在中央美院一次相当级别的会议上,有人在艺术的旗帜下指责大展说:一、人体艺术大展对满眼都是光屁股庸俗文化泛滥、社会道德败坏和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为了商品化追求,而丢掉了艺术,丢掉了艺术家纯艺术的目标;三、大展的组织形式也是错误的。

有人说,大展导致了中央美院的分裂。在两方势力的压迫下,院长靳尚谊犹豫了,他始而宣布退出上海的巡回展览,并退出即将编辑的油画人体全集的作品;后又决定只送展一幅。模特儿风波时,一位记者曾追到靳院长的专车前问他是否撤画。他非常肯定地说:“不撤!”后来还是被迫撤了。不撤→撤,撤→不撤,可以想象两次轮回反复,全国美术界最高学府的院长、教授、艺术家的心灵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历程!

葛鹏仁副教授作为总策划人,曾和我讲起大展所得的用场。他满是憧憬的口吻说,这次门票收入将用来办一个民间性质的油画艺术基金会,先是国内,然后逐渐走向世界,让这个基金会成为世界著名的油画艺术基金会。然而,院方否决了这项决定。同时决定,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赴日本等国家展出,将由二十八人改为中央美院规模。民办改官办,集体改全民,这倒是符合“有饭大家吃”这一分配原则。

这让大伙儿心灰意懒。这等于抽了大展的脊髓。

又是一例典型的窝里斗。胜负不决定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而是决定于权威和首长。

为了画展,每个画家又都是每个具体的工作人员,制画框财务,事务,对外联络宣传,国际国内巡回展出,布置展览,都得画家自己干,大家齐心,干着痛快,可如今……说到这些,葛鹏仁是眼泪汪汪一片伤感:

你们是局外人……你们不清楚……不能再多说了……我1958年就来到院里,整30年了……许多老关系纠缠不清……我

还要在美院生存……我现在是尽量地躲……

二十五

宿舍楼六层十三号，开门的是个精巧而恬静的女人。即使是背光，你也能在她黑暗中闪烁的眼神中迅速地判断出这是杨飞云那幅《静物前的姑娘》的模特儿。坦白地说，这是“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所有写实作品中唯一使我读了后受到感动的作品。与艺术家展出的其他写实作品不同的是，这幅画是一个画家、一个男人饱含理想主义目光的结晶。“姑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两只粗粗的东方人特有的黑亮大辫子垂在肩后，赭石色的嘴、厚厚嘴唇、理想化的大眼睛都好像在向你诉说一个尽在不言中的美妙动人的故事。平缓流下的肩部边沿线与锁骨构成了一个结构精致而端庄的支撑。在一个完美的框架里，两个动人的尚未发育成熟的乳房，每一方寸富有弹性的皮肤，都在证实着东方少女青春的活力和纯真；而这在柔和的平面光下的活力和纯真，只能使你哪怕是丁点儿的亵渎都荡然无存，因为她们已被高度地抽象和理念化了，她们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抽象化的理念的符号。少女下意识地将两手交叉在阴部，左手捏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孕含着少女内心的躁动与周围纤尘不染的环境之间的某种戏剧性冲突；而少女周围物什的介入；茁壮生长的橡皮树，土钵盛着桃子，都有着或生命力的暗示，而再后边的土陶罐则是一种文化的限制；性的张扬和限制强化了戏剧性和冲突。杨飞云这幅画色调偏暖，性感的介入是缓慢而顽强的，倔犟执着里有着对东方文化理想态的追溯，以及艺术家在理想与现实、灵与肉、理念与生命力、外在宁静与内心躁动面前矛盾的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态用西方古典主义的笔调来描述，不断地强调故事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节，像一首绵绵悠长略带感伤色彩的抒情诗。

这幅《静物前的姑娘》印成的画片，框在墙壁上的椭圆形镜框里。

模特儿是画家的妻子。

很难想象，坐在我面前的这位皮肤黝黑，脸部骨架宽大、身体粗壮的汉子，竟是画风如此细腻、柔情似水的艺术家！

杨飞云今年三十五岁，一九七八年考上美院前是内蒙古包头铁路局车辆段的普通工人。他告诉我，他是车辆钳工，是车辆段最重的工种。“苏联老式火车的轴箱，五百斤，两个人抬上抬下。”一九六九年下农村，一九七一年参加工作，三年的学徒，月工资，第一年十八块，第二年二十四块，第三年三十四块。学画学得很苦。

杨飞云说——

我喜欢通过绘画与观众亲切地对话。希望观众能在很平凡的画面里找到艺术，找到永恒的美感。这可能是观众喜欢我的原因。写实，到新疆西藏当然是很有意思的。而我更多地是画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我的那幅画，头像参照的是我夫人，身体却是好几个人组合的。

“我要是有那么好的身材就好了。”杨的妻子不无遗憾地说。

“我选择模特儿，喜欢选择这种纯情的，五官很精致的东方女性。”杨说。

“他画得好的作品中的女性都像我。”杨的妻子颇自豪。

“不是画你画得多才这样，而是我的一种审美追求。”杨飞云强调说。

“那么为什么画爱人的人体与画模特儿的人体有那么大的差别呢？”我问。

“模特儿在屏风后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走出来，摆好姿势，都程式化了。画爱人就不同了。一是我对她了解极深，再者就是感情因素的浸透。你看画面上那种略低的眼神，就引起了我的内

心的撞击。我画的女人不是最美的女人，然而在她的身上我却体现出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生活中苦涩太多了，生活中丑恶太多了，所以我就去追求美、表现美。说是追求，也可能是对生活的逃避。”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我一九八六年从法国回来后就结婚了。可我们恋爱的时间很长。”

“那你们的恋爱肯定挺浪漫啦？”

“……一九七四年就开始了。”杨飞云掐手指头算。

“不！七五年！”杨的妻子纠正说。

“七四年！”

“七五年！七四年我才十二岁！看把你美的……”她在床里头朝坐在床沿上的杨飞云亲昵地蹬了一脚。

“就算七十五年。”杨大妻子九岁，显然平时处处都让着。“那时她以学画为名……”

他看见妻嗔怪地瞪他一眼，便“哈哈”打住了。

这是个恩恩爱爱温温馨馨伊甸园般的家庭！艺术家拥有了她，仿佛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然而，遗憾的是，艺术家们体现在绘画中的许多极其美好的愿望，未必能尽如人意。

二十六

我在美院泡着采访时，碰到了几个社会学工作者。

那天已经很晚了。窗子外面漆黑，寒风“呜呜”地吹着。

我在葛鹏仁的十一层十六号采访，快十一点了，有人敲门。进来两男一女。两男士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女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的编辑记者。他们

对“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和我有着同样高的热情。

我们从葛鹏仁家出来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半了！我们骑自行车同路。我望着吃力地蹬着自行车的中年社会学工作者纳闷，他们哪儿来那么高的热情？他们合伙搞调查，据称还要随大展去上海分发问卷，而且没有分文“公费”资金，去上海调查，吃住和打印的问卷都得自己掏钱。我问为什么搞这样严肃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公家不出钱。女士说，你知道吗，社科院申请经费比登天还难！申请研究经费要提前向上面报计划，这个审那个审，这个批那个批，几个月能拿到手就不错，即使拿到手了，黄花菜也凉了。社科院的经费差不多就够大家闲着光拿人头份。我说，你们真不容易。她说，也甭说什么责任感，现在也不时兴这个，就是想干点事儿，总比闲着好。

更让我纳闷的是，人大社会学系的两位教师，一个早年华发的叫周孝正，一个有些谢顶的叫史希来。他们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委托进行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组成员。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与人体油画大展搭得上什么边？

周孝正是课题组的头儿。他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多，而且在人口问题的背后，是低素质人口增长过快这一严峻的问题。我们有十一亿人口，按照国家教委颁发的扫盲标准，发粮票的（城镇人口）认二千字，不发粮票的（农村户口）认一千五百字，根据局部抽样调查，只有三亿人达到了扫盲标准，每年净增文盲二百万！而且新颁布的脱盲标准比五十年代的标准退了一大步。原来是十五至四十五岁，而现在是四十岁以内，减了五岁！应该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增加五岁才对。害怕文盲多说出去影响不好？再者，国家公布的五类残疾人是五千一百六十一万，每年有三十八万个畸型异常儿出生。可同时规定，五个脚指头都剁掉了，保留一个足根即可谓“正常人”。中国的精神病也特别多，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精神病与

性有关。

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性饥渴”、“性待业”的严重问题。一般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来“例假”了，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单位都不给办，说是响应党的号召：“晚婚晚育”。起码有十几年的性饥渴。《婚姻法》根本没用。企图以控制性生活来控制生育。而且性知识的来源没有正常的渠道，孩子问妈妈，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妈妈告诉他，你是捡来的。这次画展，有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他调查一些青少年，有的男孩生殖器勃起，甚至射精；有的女孩湿润。这只能说明中国禁锢得太久了。

这就是中国基本国情的轮廓。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我到周孝正家，他的屋里一辆被拆散的自行车正仰面躺着。他说他修自行车是一把好手，仰仗着他曾经在生产建设兵团开过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他说，他们课题组的四个人，包括他，都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都由北京下到黑龙江建设兵团，都是七七级八一届大学毕业生，今年都是四十二岁，工资都是七十四元。

绝大的幽默！这些将通过他们的工作可能给中国的前途带来曙光的人，这些研究人口发展战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人，这些自己一无所有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与画家与模特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生存环境依然窘迫。

“七十四块钱基本工资，养家糊口太困难了。”我感叹到。

“没关系，乱七八糟的加上，每月能领一百多块，我不抽烟，不喝酒，花销也少。”他指着自行车和家具，“你看，自行车坏了自己修。家具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件衣服也是我爸的，你看衣兜写着我爸的名字。”

他把混纺花呢干部服的衣襟掀起来，露出里面白兜布，上面的钢笔字迹已被洗白了，但依稀可辨：

周凤鸣 72岁 退休

宣武门西大街 20 号楼 8 楼 6 层 9 号

1980.3.24

“我爸是心脏病，倒在街上好惨。我爸五年前已经去世了。”他把衣服伸平后说。

二十七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持续使用同一种刺激形式只能使刺激效果递减。即所谓的“饱和效应”。初次看到女人裸体画可能会兴奋，看多了就无所谓了。

我们说：“油画人体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性压抑宣泄的渠道，成了社会性禁锢自由的天堂，成了社会饥渴饕餮之物，而悲叹艺术不逢时，那么，我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所写到的人，有多少是生逢其时呢？

我不禁扼腕怆然！

余波浩荡

二十八

随着“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闭幕，似乎一切都该结束了，然而，又似乎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这使我们想到了首都机场惨遭布帘遮盖不见天日命运的裸体傣族姑娘，想到了“比基尼”冲击波……

“油画人体艺术大展”闭幕后一个星期，一九八九年一月十

五日至二十七日,《美术》杂志在中国美术馆主办了又一个以人体为主题的油画展——“陈皖山人体油画展”。

似乎这个油画展也可以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上写上一笔:这是第一个个人举办的人体油画展。

我在美术馆一楼西厢展厅见到了画家陈皖山。这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二十七岁的教师说——我非常尴尬、非常为难,也对是否紧接着中央美院的人体大展办我的展览而感到非常犹豫,因为美术馆很难进,我们一九八八年五月份就开始联系并排队了。我也曾提出一个想法。但美协不同意。不收门票,会给观众产生这样的心理:“怪不得不卖票,比上回差远了。”我这个展厅是美协的,比较优惠,三百块钱一天。为办这个画展,我自己筹了五千多元。看来这五千元都得自己掏腰包了。有几个外国人来问过画的价格,现在也没影了。

艺术的商品化问题是大展最难以说清的问题,全社会都在关心大展在中国美术馆的门票收入及其处置。两块钱门票几乎是大展所有问题的焦点,画家们也承认,如果没有提高门票这一说,可以说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那就是穷困潦倒的画家们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为了精神文明建设,为了改善民族文化结构,张扬人文精神,为了艺术,等等,总之为了许多非常值得尊重的崇高的目的,他们必须勒紧裤腰,用自己的血汗钱和创造性的艺术,换得老百姓欢欢喜喜,换得美术界同行的同情和怜悯。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出席了大展开幕式,对大展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然而,他在大展闭幕前对《北京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批评“画展的主办人是不是太着眼于钱了?”“以此来赢利就违背了原来的初衷。”钱这玩意儿用着好,说着不太好,艺术要生存离不开这玩意儿,又特别忌讳这玩意儿。文化与钱的结合,从来是羞羞答答的。比如画家陈皖山的人体个展,他不是也想有些收入,哪怕是不赔不赚也好,为了艺术就得有那么点献身精神。可是人

家不让,既然你有献身精神,那么就干脆彻底献到底。

按照协议,中国美术馆与大展的艺术家们,对门票收入是对半分。二十一万多观众,四十多万门票收入,主办者分到手里,付大展费用,付画家们预先支出的材料成本和资金,付大展巡回展的包装费用,再加上捐给中央美院青年教师艺术研究会一万元,所剩只有几千元了。葛鹏仁有气无力地给我一笔一笔地算着账。

“君子固穷,达人知命”。当今世界,真是不知道谁能活得那么潇洒!

买斤猪头肉,买只德州扒鸡,买只烤鸭,买几斤时尚新鲜菜,添制件把像模样的衣服,都要掐算尽了,畏畏缩缩,半天摸不出钱来……真不知道这么猥琐的境遇怎么产生伟大的艺术!谁来操这份闲心?葛鹏仁组办大展时,每当大伙作出某个重大决定时,都要在末了加上一句:“我们这么干是与当今改革合拍的。”说完,大家都一乐。什么都能改革,门票却是雷打不动。涨到两块钱,不也是人山人海吗?

中国美术馆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人们往来稀少的时候,偶尔打个瞌睡。

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旧齿轮重新咬合在一起,为那美好的过去唱着挽歌。

二十九

可是中央美院的X模特儿,他不愿意这样。他的理想是改变全北京一二百名模特儿目前的被动状况,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成立一个模特儿协会,来切实关心模特儿的生活,维护模特儿的合法权利。他告诉我,模特儿协会相似于工会,具有工会的一切功能。

大展虽然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一开始便坚定地支持鼓励 H 和 T 模特儿诉诸法律,并在 H 和 T 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全部存款,一千二百元,借给她们打官司,同时还说服 W 模特儿最终消除顾虑,与 H 和 T 站在一起。

X 一九八六年便在中央美院当了模特儿,尝尽了当模特儿的“酸甜苦辣”。他为了将来能出国深造,留职停薪补习外语,在电话上,我听见他能用一口流利的德语与一位德国朋友对话。留职停薪期间,他一面补习德语,一面当职业模特儿挣学费。模特儿罢课时,他和她们认识到,谁也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时,便走向了法律,走向了寻求自己保护自己的途径。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院方已停止给他排课,这个星期去,告诉下星期不要来了,断了他的收入来源。

现在,他没命地搜集复印与大展有关的所有材料,没命地在北京城奔波,去完成他把模特儿联合起来的使命。

我蜷缩在他那间没有暖气的平房里,听他侃侃倾诉自己的想法,冻得骨头都痛。但我想,只要干,去干了,便有意义。

虽然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已经向法院起诉,法院也受理了本案,并到被告中央美院的大展主办人处进行了法律调查,但官司最终会是什么结果,谁都说不清。甚至连最理直气壮地声称这场官司当事人必赢无疑的委托律师,都请我向画家们转达律师事务所私下协商解决的意向。

显而易见,诉讼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而诉讼和引起诉讼的“油画人体美术大展”给社会、经济、法律、文化伦理道德诸方面的震荡,却是波澜更迭、经久不衰,唤醒着我们的意识,并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我从来没有排过如此长的队买门票。然而我去排了,老老实实地在七八十米长的队伍后面从最末一个开始排起。

那天,北京下着雪,队伍有秩序地向前挪动,谁也不说话,看

谁的脸都是庄严而虔诚。雪落在身上,都被体内散发出的热量给溶化了。前胸和肩膀都是湿漉漉的。

雪,那么热烈地下着!在这一瞬间晶莹洁白的世界里,我们仿佛在接受一次透心彻骨的洗礼,在这洗礼中,我们自惭形秽,我们感到灵魂的颤栗和呼喊,我们感到个体生命的紧张和绝望,我们感到了生命力的枯萎和死亡在这颤栗和呼喊、紧张和绝望、枯萎和死亡的体验中,精神便升华了,精神便获得了崭新的面目!

一九八九年二月四日至十六日

完稿于黑龙江牡丹江欣荣小区、北京团结湖小区

附记:“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继北京展出后又去了上海,上海人很克制,舆论调子很低。是上海人独特的审美心态,还是一种逆反心理?

一家权威的文化报纸预测,一九八九年将是中国“人体热”。我在大街上连续买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五本人体艺术摄影集。有人还想在中国美术馆办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大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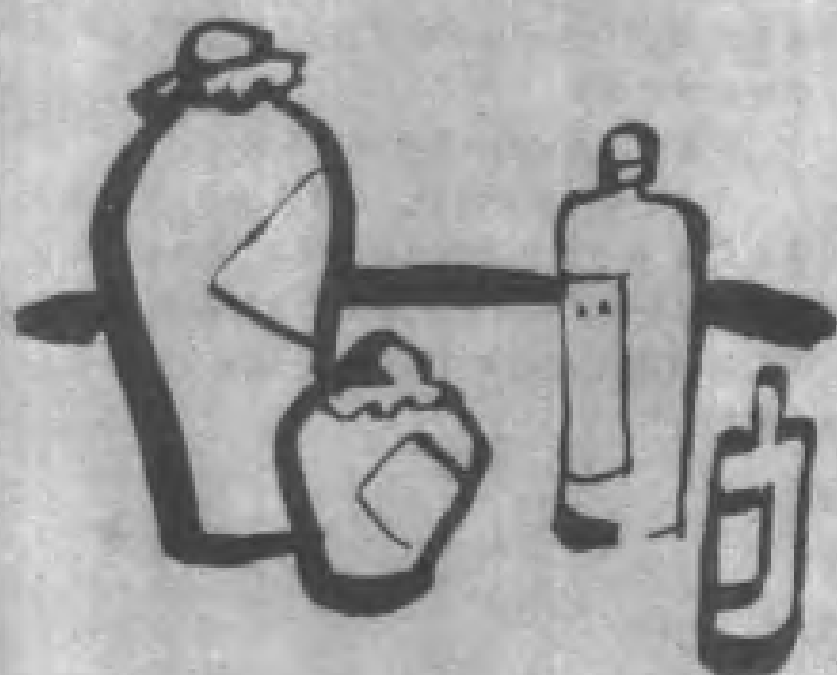
同时,我还不断地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许多省市县都在筹办人体艺术展。

又有消息说,湖南省博物馆筹办,“得到湖南省美术界通力支持”的“人体艺术展览”被有关部门腰斩。

我现在真不知道是不是喊“人体热万岁”的时候。我想不清。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又记于北京团结湖

在那酒神 徘徊的地方



茅台酒欺负人，贵州醇不服气，
所以有了斥资数千万打官司的恶战。
这是中国酒业恶性竞争的典型案例。

世纪末感言

茅台酒欺负人，贵州醇不服气，所以有了斥资数千万打官司的恶战。这场恶战，持续六七年，直杀得血雨腥风，到今天才以茅台酒停止“贵州醇”生产，贵州醇胜诉而告终。

这是中国酒业恶性竞争的典型案例。

我当时的判断没有错。文章发表后，遭到贵州省的反击，极尽权势造谣中伤之能事，编辑部在中国报告文学会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赴贵州解释，我则坚持己见，坚信报道的事实没问题。时间作出了最公正的裁判。

——作者

引子

这是一场斥资一千余万元、令国人瞩目的恶斗！

名不见经传的贵州醇酒厂竟以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诉由，将声威远播的中国白酒业霸主贵州茅台酒厂送上了法庭！

茅台酒厂亦不示弱，以雷霆万钧之势给予反击，诉贵州醇酒厂“商标侵权”。

这便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受理了贵州醇酒厂诉茅台酒厂“不正当竞争”案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受理了茅台酒厂诉贵州醇酒厂“商标侵权”案。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两案同审，贵州醇酒厂和茅台酒厂将互为原被告而对簿公堂！

这便使两家酒厂在台下历时数年的叽叽咕咕互相攻讦和指责公开化、白热化了，由夜郎国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是是非非，眼花缭乱。

一边诉茅台酒厂酒名、外包装和瓶型全版仿冒“贵州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扰乱市场，欺骗消费者。

一边诉“贵州醇”“贵州”两字，侵犯茅台酒厂“贵州大曲”的“贵州”商标权利，进而证明茅台酒厂生产“贵州醇”的合法性。

天底下竟有这等蹊跷的事情：“茅台”乃堂堂“国酒”，怎么可能屈尊仿冒在此之前世人鲜知的“贵州醇”？为什么两家贵州的企业，不在本地打官司，偏偏要从贵州高原的大娄山下和南盘江畔跨越北回归线，不远千里来到天气已是大热的广州摆擂台？

乍一看，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贵州醇”的原产地是贵州兴义市。“兴义”在哪儿？如果没有这场官司，局外人恐怕不会去贵州版图西南部的某个角落去寻找它。传说黔西南是古夜郎国的所在地。“贵州醇”是否正秉承着祖先被嘲笑了两千多年的精神，不知天高地厚地向“茅台酒”挑战？

然而，这场较量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并开庭后，一年多没有下文。在这焦灼对峙期间，与此案相关联，“贵州醇”又先后在贵阳、北京频频兴讼，官司套官司，把这场罕见的官司打得风云变幻，波澜壮阔。

“贵州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贵州醇酒厂厂长、“贵州醇”低度酒的创始人鄢文松变成了令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一

在鄢文松看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绑架”。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两辆小车朝贵阳急驶。车上，除了鄢文松外，还有贵州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和兴义市的党政要员：州委副书记、州委副秘书长、兴义市委书记、兴义市长和原市长。

兴义到贵阳，北上三百六十公里，道路险峻而漫长。无论是“绑架者”还是“被绑架者”，谁都难以预料贵阳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局面。云贵高原，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沟壑纵横，怪石嶙峋，高山巍峨，大江湍急，雄奇而不失玲珑，平常，来来往往，胜似闲庭信步。今天却有所不同。一路上，大家心事重重，沉默寡言，偶尔有一块飞石跌跌撞撞坠入杳无音讯的北盘江大峡谷，

直让人心惊胆颤。“文松,听说你同意在协调意见上签字了?”“我可没说过同意签字的话。”“哦……”书记的神情茫然,脸上掠过一丝阴云。

看来,即使把鄢文松“押解”到贵阳,这个差也没法交。

三天前,国家工商局副局长兼商标局局长白大华偕同国家商标局、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贵州省工商局、省轻工厅等有关领导和部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由北京而贵阳,来到偏僻的兴义,协调解决贵州醇酒厂和茅台酒厂已有七年的纷争。

这可是黔西南州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亦是名不见经传的兴义市和贵州醇酒厂这个县局级国营企业的殊荣。据说,国家商标局长亲自到一家企业来协调给予纷争尚属首次。

这可是给足了黔西南面子,更给足了黔西南压力。

白局长说:“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协助省、州、市各级领导调解两厂商标纠纷问题。你们两厂的纠纷已有七年多了,如果两厂的纷争能协调解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省轻工厅副厅长葛长瑞的开场白则为此次调解定了基调和原则。他说:“我这次陪同白局长来,是受省政府的委托,协调解决茅台酒厂和你们厂的纠纷问题。我们认为,如果继续拖下去,对两厂的发展,对我们整个贵州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省政府从维护两厂的利益和整个贵州经济利益出发,提出了三条协商意见。”这三条意见的简洁表述为:一、“贵州大曲”的“贵州”商标续展是符合程序的,就不要再纠缠了;二、茅台酒厂让贵州醇酒厂无偿使用“贵州”商标,但是要到工商局办理商标使用协议;三、茅台酒厂和贵州醇酒厂共同生产“贵州醇”,但是,茅台产的“贵州醇”瓶型和包装要改动,以示与贵州醇酒厂生产的“贵州醇”的区别。

白局长说:“我的想法是,我们今天最好能搞出一个纲领,一个最高纲领或最低纲领,也就是你们首先提出看法和要求。当

然,我知道你们有自己的苦衷,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能在省政府三条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方案来。省政府提出,要茅台酒厂改变外包装,这条意见是很好办的,我想也很可行。现在我跟鄢厂长说句实话,茅台酒厂那边,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看来,你们都有感情用事一面。我想,我们都把感情克制一点,丢开一切感情因素,最后把纠纷调解好。关于茅台酒厂续展商标问题,我想对鄢厂长解释一下,续展的程序是完全合乎手续的,况且关于续展问题,是对还是错,也很难把握,茅台酒厂说我们偏你们厂,你们厂说我们偏向茅台酒厂,其实呢,我们哪个也没有偏。我们今天不是想来打官腔,这个官腔我打了近十年了。我也曾经搞过企业,知道企业很难搞,搞好更不容易。我们应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当然,我不是坚持我的意见,你们可以通过法律解决,那是你们的权利,也是法律的义务。但是,法律程序是很复杂的,可以偏向这一边,也可以偏向那一边,不见得就会令人满意。我可以下个结论,如果双方都坚持己见,那么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但我希望你们给我留点后路,给我一个回旋的余地。”

一个是国家主管部门的最高领导,一个是省行业主管领导,后者还申明受省政府的委托并携带着省政府三点原则方案的尚方宝剑,该说的话都说到了,可谓是泰山压顶之势。在场的州市两级政府官员,都明白开场白话中有话,无论他们有什么想法,有多大的不情愿,都要与省政府保持一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下级服从上级,是行政系统解决问题和矛盾最基本的原则,虽然他们曾强有力地站在地方立场上向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阐述过意见,虽然他们五月份齐聚广州,在法庭外为贵州醇酒厂后援助威,亦不能推翻这个原则。眼下这场戏,与其说是演给“贵州醇”和鄢文松看的,不如说是演给他们看的。鄢文松是市管干部,贵州醇酒厂是市属企业,球,分明在他们怀里。端正他们的

态度,似乎是顺利解决“贵州醇”和鄢文松问题的前提条件。再说了,州市两级政府刚刚换届,新班子里是否有权威有能力,能否按省政府的意见协调处理好这场轰动全国的官司,无疑是块试金石。退一万步说,省政府的面子总得给吧?行业主管部门的面子总得给吧?国家商标局局长的面子总得给吧?更何况白大华已把话说得如此白了!其中利害,非同寻常。

在诸多利害因素下,各级政府的默契和联盟便是必然的了,齐心协力拿下鄢文松这一关似乎也是必然的了。

可这鄢文松偏偏谁的面子都不给!使这有各级要员参加的协调会充满了火药味,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鄢文松说:“白局长,我认为,省政府提出的‘三个尊重(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法律)’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从一九八三年搞出‘贵州醇’,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这你是清楚的。就是季克良(注:茅台酒厂厂长)本人,当着我的面,也不得不承认‘贵州醇’不是茅台酒厂研制的。这不是很清楚吗?‘贵州醇’是我们的果实,我们贵州醇酒厂的,这就是历史,应当尊重。对于尊重法律,一方面要我们尊重法律,一方面省政府却在认为我们侵权的基础上作出了三条决定,这是很武断的。我们不能接受。关于侵权问题,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开始了。当然我们很糊涂,不知道我们究竟侵犯了“贵州茅台酒”什么权,现在国家商标局已不再这样认为了,所以现在不存在侵权问题,而省政府却在我们侵权的基础上作出这三条意见,我们怎么能接受呢?况且,在作出这三条意见时,省政府并没有作出和听取我们的意见,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不承认!……我们对茅台酒厂续展商标的程度并不怀疑,省政府当然也看到了这点。省政府要茅台酒厂改变外包装,这就足以说明茅台酒全版套用我们的外包装是不正当行为。我赞成白局长的意见,双方退避三舍,只要茅台酒厂先停止‘贵州醇’的生产,我们就停止一

切宣传。对于商标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或法律来解决。茅台酒厂即使认为我们侵权,也不能用生产(与我们同一酒名同一包装的)‘贵州醇’的方式来解决。实际上,现在省政府已经倒过来,把茅台酒厂的这种不合法的作法合法化。”

白局长说:“省政府三条意见,鄢厂长认为是认定侵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认为不对。因为国家商标局没有认定谁侵权,法院也没有作出谁侵权的决定,所以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就以鄢厂长提出的双方后退三十里这一条方案作为调解的蓝本,看看能否寻到一条解决的途径。按照鄢厂长的意见,可得出两条结论。一、茅台酒厂必须首先停止生产‘贵州醇’,二、关于商标问题,茅台酒厂停止生产后,仍然可以起诉你们,你们再同他们打官司。但我仍要申明一点,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你们再打官司,避免你们两败俱伤。”

鄢文松坚持说:“省政府提出两家共同用‘贵州醇’,这个‘共同’对我们是很不公正的,以后还将因此产生很多后果。比如‘安酒’、‘贵阳大曲’等都是因为几个厂采用同一名称而产生质量不合格,最后失去市场。省政府提出的两家共同用‘贵州醇’,而不是只共同用‘贵州’二字,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白局长奉劝道:“其实,你们‘贵州醇’靠质量和营销占领市场,茅台酒厂的‘贵州醇’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听说他们的酒还积压在仓库里。我想,‘贵州醇’他们能搞出来,但是你们灵活大胆的营销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我相信‘贵州醇’的市场永远是你们的。只要他们改了包装,改了字形,那还有什么呢?鄢厂长,你如果还能退一点,关于商标续展问题,我保证可以解决好。”

对此,鄢文松仍不退让。他说:“白局长,其他我不想多说,只有在妥善解决好第三条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解决第一、二条。茅台酒厂硬要全版套用我们的外包装,和继续使用‘贵州醇’三

个字,这是绝对不行的。从两厂的长远利益出发,建议茅台酒厂改名,我们已经答应前面两条了,茅台酒厂再不退让,那就不公正了。”

白局长紧追不放,说:“我再申明一点,如果茅台酒厂把外包装和字型都彻底改变一下,(生产‘贵州醇’)你看行不行?”

“不行!两家不能共用‘贵州醇’三个字。这里我想提醒茅台酒厂,他们当初生产‘贵州醇’就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希望茅台酒厂再不要这样继续下去,否则他们将越陷越深,最后将把‘国酒’的脸丢尽!这次调解,应该是茅台酒厂后退的最后台阶。”

如此僵持的局面,逼着地方政府出来表态了。市委书记周国才说:“我们认为,兴义生产的贵州醇虽然是名牌产品,但还受不到法律的保护,打官司不一定能告倒茅台酒厂。我们看省政府的三条意见还是可能考虑的。”

地方政府背后捏咕好的态度一亮相,就等于把鄢文松给孤立和“出卖了”!如今,阵营划得清清爽爽。鄢文松哀伤万状,怒火冲天。他不能不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他大声说:“周书记,即使你们同意了,我也决不同意!如果说省政府真心是为了黔西南州的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制止茅台酒厂这种掠夺我们果实的行为!”

鄢文松摊牌了。他摆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架式说:“这次有最高的有关领导亲自到厂里来,我们非常高兴。在这次高层次协调下,茅台酒厂就明智地退下去。现在趁我们退让,他们也应该退让,等以后我们在营销上打败他们,那他们的面子就丢尽了。我想,我们两家这样打下去不一定会两败俱伤,即使出现最坏的局面,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打算。”

一场本以为能皆大欢喜的高层调解,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鄢文松“犯上作乱”,敢于在完全孤立的险境下向强大的行

政权力挑战,以及各级要员失望地返回贵阳,着实把立了“军令状”的州市两级政府悬在了半空中。

二

两天后,鄢文松接到了一个电话:

“鄢厂长吗?请你到市政府来一下。”

“有什么事?”

“来了你就晓得了。”

鄢文松和副厂长窦明来到市政府办公室。一看,好家伙!市里要员,全都在此!他预感到情况不妙。

他刚坐下便被告知,省里通知,茅台酒厂已同意有关条款,要贵州醇酒厂立即上贵阳,在省有关部门和国家商标局的主持下与茅台酒厂签署有关协议。

压迫又来了。而且是步步紧逼。如果签字,将意味着在法院和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没有法律判决的情况下,要贵州醇酒厂承认侵权并同意与茅台酒厂共同生产“贵州醇”!

这是最后通牒!

可这鄢文松偏偏不吃这一套。听完通知,他断然说:“不去!谁签这种‘卖国求荣’的协议!”

鄢文松拒绝合作宁折不弯的态度和对拟签协议“卖国求荣”的定性,让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束手无策。

鄢文松可是吃了豹子胆!这些党政要员都是黔西南州和兴义市政治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炙手可热的人物。

接下来的便是冷场和沉默,便是时间的死寂。谁都清楚,这样的气氛,稍有不慎,溅出一点儿小火星,便会燃烧,便会爆炸!

当然,这些人亦非等闲之辈,鄢文松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暴烈的性格,他今天的态度,早在预料之中。为此,他们准备了第二套方案。

市长关切地说:“鄢文松同志,你是不是不好主动去签?如果是这样,能否由市政府专门下个文件,责成你去签?”

这等于说,你鄢文松碍于面子,下不了台阶,我市政府给你个台阶下,给你去贵阳签字一个体面的说法,一个被迫无奈的说法。

这个方案,低估了鄢文松的心理素质。鄢文松可不是鲁莽莽一介武夫。他是那种审时度势、粗中有细的人。他心里说,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几爷子都签了字,如今下不来台的,不是我贵州醇厂厂长,而是你几爷子!

他不客气地说:“我做的事情,我怕什么,全部责任都由我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该签的字一定要签;不该签的字,一个字也不会签!”

市长见状,又退了一步说:“你不来贵阳签字,是不是能委托一名副厂长去签?”

这话把鄢文松惹火了。“我不是政客!我不会玩弄这些把戏!”

这话把在座各位的心戳痛了。然而,火也不是,恼也不是,火了恼了弄僵了,对谁都没有好处。说了半天,利害都在鄢文松这软硬不吃的死犟头手里捏着,只能好言劝道之,把鄢哄上路便是胜利。

副市长发言了。“鄢文松同志,冷静一点。去还是应该去,去了可陈述我们的意见嘛。”

“唉——”鄢文松轻轻一叹。这些地方官也不容易,上下两头都要抹平。从维护地方经济利益的角度看,“贵州醇”可谓是黔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的一颗掌上明珠。黔西南州、县、

市,除了州府所在地兴义市外,全部是财政赤字县。“贵州醇”在鄢文松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十年整,由一个仅有一百多人、资不低债的小酒作坊发展到今天,成为拥有职工一千八百人、年产“贵州醇”近万吨、利税八千万元的名牌企业。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国务院有关部门评选出一九九三年“全国二百五十家产值利税率最佳企业”,“贵州醇”名列第十一位,全国饮料制造业第二位,贵州省同行业第一位。“贵州醇”上交市财政的利润是全市财政收入的一半!“贵州醇”可以说是黔西南人民的骄傲!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贵州醇”在这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官司中受到损害。然而,省政府的态度,以及国家商标局和法院根据省政府的态度的态度所持的态度,明确无误地传达给了当地政府,必须压服鄢文松,让他在“共同生产”的协议上签字。两头抹平,难矣哉!

看着这些地方官两头受气,尴尬不堪、痛苦不堪的模样,着实有些不忍。他们确实尽力了。由州政府起草的各方调节座谈纪要,曲诉衷肠,已发挥了最大的智慧,绞尽了脑汁。看了这份文字游戏已经玩到了炉火纯青地步的文件,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在目前形势下,他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鄢文松冷静下来。他降低了声调说:“行行,我去贵阳。但是,字我不会签。”

在座的人一听鄢文松答应去贵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下文也不愿意听了,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什么时候走?”鄢文松问。

“午饭后。”

“那我回厂拿点钱和漱洗工具。”

“快去快回。”

可鄢文松刚回到厂,市里的车跟着屁股后面追了进来。

“鄢厂长,请马上去市里。”来说。

“什么事?”

“李昌琪主任找你。”

李昌琪是黔西南州的老州长，后调任州人大主任。因为秉公办事，为人谦和忠厚，深受鄢文松敬重。

鄢文松直纳闷，李昌琪这个时候来干什么？还这么急急火火的。

到市政府一见面，李昌琪便说明了来意：“我跟你讲实话，我也是受人之托。听说你不肯在协议上签字。我看你还是签了吧。”

“老州长，这个字我不敢签。这牵涉到企业的重大利益。别人不清楚，我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妥协。”

“你看，州委的班子刚刚建起来，这样的事情都协调不好。我们是老朋友了，给我个面子，把字签了，要不然，新班子将来无法工作呵！”

说话间，到了中午十二点，老州长又如此恳切相求，鄢文松只好含糊表态。“老州长，你放心回去。你相信我会去贵阳，会把这件事应付好。”

先来硬的，后来软的，最后请来很难驳面子的老上级老朋友做说客，用心何其良苦！亦足见当地政府在一种巨大压力下，无计可施又焦急万状的心态。吃完午饭，鄢文松要回家拿钱和漱洗工具，在座的领导都十分敏感地阻止道：“别拿了！别拿了！东西路上买。”慷慨地说：“贵阳的吃住，我们招待了。”生怕他节外生枝，有去无回，让这“请君入瓮”的心血毁于一旦。没容他说同意与否，便把他塞进了州委书记的车，一阵风地上了路。

下午，家里听说鄢文松被迫不辞而别，女儿打电话到厂里找人，“你们把我爸爸绑架到哪里去了？！”

于是便有了鄢文松的“绑架”一说。

这些情节，颇有点滑稽。然面，滑稽中也有几分悲壮。中午吃饭的时候，鄢文松端起酒杯朝大家说：“这杯酒，我喝了，和大

家道个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呵……”

说罢，一饮而尽。

满桌人的心情为之沉重，黯然。佳酿甘美的“贵州醇”，此番喝到肚子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隐苦涩。

三

至今为止，谁也弄不清茅台酒厂与仁怀县联手生产“贵州醇”并打垮“贵州醇”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因为，“茅台酒”在中国是至尊国酒，天皇巨星，是中国酒行业唯一的一级企业，其独特的贵族地位，其悠久而精湛的酱香型酿酒技术，其崇高和坚不可摧的商标品牌，谁都难以与之匹敌。摆在它面前的选择，可以说海阔天空。

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味道。

当“茅台酒”、仁怀县联军从北方地平线上铺天盖地出现并迅速兵临城下的时候，鄢文松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南北战争！一场从未有过的特殊的南北战争！茅、仁联军高举着的旗帜，竟是“贵州醇”！

鄢文松猝不及防。坏消息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兴义。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个个体户司机到某地为贵州董酒厂拉酒瓶时，发现了“贵州醇”专用酒瓶。这个司机曾经运过“贵州醇”酒瓶，他留了个心眼，顺嘴问厂家，“这些瓶子是谁定的”？对方回答说：“茅台酒厂。”

之后，又发现有人到昆明订了三万个“贵州醇”酒瓶。而这家玻璃厂恰恰是兴义“贵州醇”酒瓶的生产厂家！

紧接着，茅台酒厂又在贵州省内的报纸上放出了试探性气

球；仁怀县搞了低度酒生产基地。

七月份，鄢文松得到广东省的急报：茅台酒厂生产的“贵州醇”大举进攻广州市场！而且瓶型和外包装几乎与正宗“贵州醇”完全一样，足可以假乱真！价格比正宗“贵州醇”便宜！

广州市场是兴义“贵州醇”的大本营，也是兴义“贵州醇”成名起家的地方。一夜之间，广州消费者面前出现了两种“贵州醇”，两种品味很不一样的“贵州醇”！

茅、仁联军新亮相的“贵州醇”的外包装用金字行书赫然写到：

贵州醇系贵州茅台酒的系列产品，采用与茅台酒相同的优质高粱和小麦，经科学酿造精心勾兑而成，具有窖香舒适、酒体协调、余香悠长的特点。

这让鄢文松目瞪口呆。

鄢文松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鄢文松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拿到证据。他派出精干人员北上仁怀县，与内线合作，搞到了茅台酒厂生产“贵州醇”的样品酒，还搞到了仁怀县酒类办公室编的“仁怀县白酒生产简报”。这份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简报”详细地记载了七月二十二日仁怀县“贵州醇”基酒生产会议的情况。

拿到样品酒是容易的事情，可是拿到“简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拿到这份简报的？”我问鄢。

“你以为茅台酒厂和仁怀县是铁板一块么？那种情况下，我也会不择手段。”鄢神秘地一笑，“他们里面有我们的人！”

“简报”说：

根据县委、县政府和贵州茅台酒厂关于在城关镇建立大型“贵州醇”基酒生产基地，确保“贵州醇”生产，满足国内外消费市场的指示，县酒类协调办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县财政局召开

专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德碧、副县长李先安、县人大副主任、县酒类领导小组组长张德兴、财政局长李化模、税务局长邱崇明、“贵州醇”厂经理赵富良、商业局长刘泽福、轻工局长伍连禄、农业局长陈华敏、中枢镇副镇长邓芬、怀酒厂厂长王平金、茅琼酒厂长程先明、食品公司副经理肖先明、会计李柱丹、高粱基地张志凯、农场场长李先智、轻工酒厂伍连帮、中枢镇酒厂袁兴才，以及县酒办陆秀芬、巫胜利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进一步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借“邓小平旋风”的改革机遇，研究和开发仁怀县的又一经济支柱——“贵州醇”基酒生产问题。会议由财政局长李化模同志主持。会议要求怀酒厂、茅琼酒厂、中枢镇酒厂等七家酒厂和单位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为茅台酒厂的“贵州醇”提供基酒二千八百吨，并分摊了任务。

“简报”说：

最后，常务副县长王德碧同志对这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举足轻重，是仁怀经济发展的决策会议，是我县酒类行业群雄智者的智谋较量。

好一个“智谋较量”！

在座的每一个都清楚他们正在干什么，每一个人都清楚，他们正在较量的对手是谁。

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生产会议了。在任何——个局外人眼里，如果不知道背景和其中利害，只能把它视作千千万万个套话连篇枯燥乏味会议中的一个，决不会去理会一位县长的“高度评价”，更不会重视一家酒厂和一个县政府如何“进一步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让“邓旋风”刮出个“贵州醇”来，自然也不会吹毛求疵地对这么个“白酒生产简报”进行文本分析。

然而,在鄢文松眼里的景象就完全不同了。他认为,这是一次针对性很强、精心策划、深思熟虑的密谋。这份“简报”起码告诉他了一个重要信息:茅台酒厂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与当地政府和所属的七家酒厂结盟,组成一个强大的联军,誓师南征了!

他预感到“贵州醇”和“茅台酒”的矛盾从此公开化了。“与茅台酒厂矛盾的公开化是早晚的事情。”他对我说:“但是决没有料到会以这种极端形式公开化。”

他拿到茅台酒厂生产的“贵州醇”样品时,只是满腔的悲哀,从牙缝里挤出了四个字:“真没出息!”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鄢文松只能应战了。

就在仁怀县召开茅台酒产“贵州醇”的基酒生产协调会的前两天,鄢文松向社会散发了《致贵州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的公开信》。

这封信措辞激烈,带有非常浓重的个人情绪,某些词句明显欠斟酌考虑。然而,为了能让读者能逼真地感受到这场战争的火药味,直观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双方的心态,特将全文引述如下:

季克良厂长:

久仰。你作为中国国酒——贵州茅台酒的厂长,声名遐迩,受人尊敬。但你近期的一系列利令智昏的言行,却令人不敢恭维。在茅台酒厂生产的假冒“贵州醇”外包装的侧面,有你季厂长亲笔书写的产品说明:“贵州醇系贵州茅台酒的系列产品”。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工程师,堂堂国酒厂厂长的你在干着这欺世盗名的勾当时,你于心何忍?

你比谁都清楚,“贵州醇”诞生于黔西南州原兴义酒厂,从香型上、生产工艺上与老祖宗传给你的酱香型茅台酒完全是两回

事,要说系列,划到浓香型系列上是沾边的,更何况八四年省、州级科委数十名专家学者,两次在给“贵州醇”作鉴定的时候,给了“贵州醇”的发明创造以充分肯定,省科委授予了“贵州醇”科技成果三等奖。谁承认甚至有谁认为过是你茅台酒的系列产品?省政府一九八五年授予“贵州醇”优秀新产品的时候,肯定的是你,还是我?轻工部一九八四年颁发给“贵州醇”优质产品称号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它列入茅台酒的系列?

茅台酒两百年的悠久历史,什么时候出现过“贵州醇”诞生近十年期间,由你茅台酒厂生产的“贵州醇”有谁见过?现在的“茅台酒的系列产品贵州醇”实质是收购你周围那些小酒厂的杂牌货,通过你所谓“勾兑”而成为“茅台酒系列”的”。你不觉得如此贬低世界名酒之一的茅台酒的身价,会有愧于周总理生前对茅台酒厂的关怀吗?因为你的系列产品的品质,我实在不敢恭维。

你的逻辑是:“贵州”两个字,是我茅台酒厂的,你的产品取名叫“贵州醇”,就是我的系列产品。这好比一家人生下一个孩子,取名时无意识地跟另一家的家长姓氏名称有两个字撞了车,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常有的事,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有了大名气时,那位家长却硬要说,根据这名字,这个孩子与他有血缘关系,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的。这是纯粹的强盗逻辑。

你的理由也许还有:“贵州醇”的名称没有专利,更注不了册,不受法律保护,我茅台酒厂生产贵州醇任何人也干预不了。

这又好比是,我厂历尽艰辛,培育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贵州醇大果园,当他果实累累的时候,却没有警察守卫,如果是一些小泼皮无赖,口中念念有词“江边桃,路边果,吃不吃在于我”去偷摘几个,毕竟是些小流氓的行径,而你却以一个亿万富翁上等人的资格说:“根据他的姓名这是我的系列产品,我们去把他全部占过来,至于这是谁的劳动成果,完全不必考虑,反正没有警察

干涉,谁占了不一样呢?”反正大盗不盗,此之谓也。

茅台酒厂不要以为,在当今天下,可以像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一样,骑着马,绕着“贵州醇”的大果园跑一圈便宣布这是茅台酒的系列产品,全部归我所有了。要知道,这大果园的主人是黔西南州二百八十万布依族、苗族人民,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赖以解决温饱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谁要仗势欺人,敢于抢夺这个果实,是要砸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希望茅台酒厂要学会自尊、自爱。

茅台酒是百年来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遗产,是中国酒文化中的一个宝贵的财富。现在,你受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茅台酒厂的厂长,没有理由不把茅台酒厂经营好。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侵吞别人的劳动成果,绝不是这样身份的人要干的。

你这样做,愧对了茅台的祖先,他们在天之灵也会觉得无地自容。堂堂国酒的生产经营者,何以会堕落到这种见利忘义的地步呢,你当扪心自问。

贵州醇酒厂能够发展到今天,能够让堂堂茅台酒厂的厂长眼红,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一不靠老祖宗,二不搞假冒伪劣,我们靠改革开放的政策,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靠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这一切,都是我们全厂职工的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此,我引用一句旧歌词:“谁要把它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来表明我们誓死捍卫自己劳动果实的决心。

是非曲直,自有公理。望你三思,好自为之。

贵州醇酒厂厂长:鄢文松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

这是鄢文松北伐的檄文!意在激怒茅台酒厂,让茅台酒厂由后台走到前台来,面对面地决战!

就是在公开信发出的当天，鄢文松以贵州醇酒厂的名义，在后方进行了总动员。他散发了《贵州醇酒厂告全州各族同胞书》：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各族同胞们：

贵州省茅台酒厂，借口我厂贵州醇酒产品名称用了“贵州”二字，是侵了茅台酒厂的权为由，在全国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高潮中，公然生产假冒贵州醇，并完全套用我贵州醇外观设计专利、瓶型，到我广东、福建、广西等市场大肆捣乱，以假乱真，妄图冲垮我厂在沿海地区的主要市场，茅台酒厂强盗式的抢夺行径，得不到制止，他们以国酒厂的威望，抢压市场，成了我厂生存的严重威胁。

全州人民十分清楚，我厂依靠贵州醇在沿海市场的畅销，每年从外省调回资金总额七千万元，今年可望调进资金上亿元，这对全州经济建立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数字。我们每年的工业利润要占全州工业利润的百分之九十，上缴兴义市的直接税收，占了全市财政收入四分之一，每年实现的利税总额相当于五个贫困县的全年财政收入。因此，贵州醇酒厂是改变我们这个边远山区贫穷落后面貌的支柱性产业。我们厂的兴衰，关系着全州各族人民切身利益，破坏我厂的正常经营，就是破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茅台酒厂抢夺的，正是我们这个贫穷地区的经济利益。为了保护全州这一珍贵的产业，我们贵州醇酒厂一千多名职工，将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对茅台酒厂的强盗行为予以反击，为了全州各族人民利益，我们厂一定会斗争到底。同时，在北京、广州、南宁、福州、海口发布新闻，揭露茅台酒厂的卑劣行径。我们希望得到全州各族同胞的支持和理解。

乌蒙山麓，南盘江畔，顿时狼烟四起。

州市两级政府也向省里递交了“紧急报告”，立场鲜明地站在鄢文松一边。

贵州省南北战争的态势由此形成：北方，在茅台酒厂“贵州醇”的旗帜下聚集着茅、仁联军；南方，在兴义“贵州醇”的旗帜下聚集着贵州醇酒厂一千八百名将士和布依族、苗族兄弟。

鄢文松概括双方实力时说，“贵州醇”是一个轻量级拳击手，而“茅台酒”是一跺脚地球都会发抖的泰森。“这是一场轻量级拳击手对泰森的战斗！”双方后台的实力也十分悬殊，而且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对“贵州醇”不利。前面已经谈到，州市两级政府的支持已在上面的巨大压力下土崩瓦解了！

四

这是兴义马岭大峡谷的赵家渡。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马别河。浑黄的河水深切入大山的肌肤，生生地拉开了山与山的距离、人与人的距离。我们在这里，能够想象出夕阳斜照、古代侠客倚马而别的壮丽场面。

我与鄢文松站在马别河南岸一个三十年代废弃的大桥墩上谈话。大峡谷荆棘荒蛮，只有鸟儿嬉戏、山的空鸣。

鄢文松，小个子，头发支楞着长，宽宽的眉距，淡眉下一双坚韧的大眼睛。他八字脚走路，老是那双破皮鞋，浑身的刚烈和精悍，好像是刚粹过火从铁匠里走出来一般。他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每句话都在这马岭大峡谷朗朗回荡。“走，我们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谈。”他拉我到这里来，仿佛要给他的粗犷和激情寻找一种和谐。

在这黔西南荒蛮的大山里蹦出个敢与“茅台酒”抗衡的鄢文松的确让世人惊讶。在对手的眼里，他鄢文松顶多是个偏于一隅、富甲一方的土财主。在此之前，“贵州醇”十年潜心修炼，埋

头苦干,不作宣传,很少广告,从不以强示人。

贵州高原本是个酒神滥觞的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就是这么个地方,随便一汪潭水,一条小溪,都可能在贵州人手里魔术般地搞出佳酿美酒来。结果如何呢?一九八四年,是贵州省酿酒行业大发展的一年。贵州省出于把酒行业作经济支柱的战略考虑,光是十三家大酒厂就投资二亿多人民币进行技术改造。从此,大、中、小酒厂遍地开花,倏地冒出了近万家酒厂,光是中型以上的名酒厂就由一九八四年的二十四家猛窜到一九八六年的四十八家,一副热气腾腾“大跃进”的景象。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要想当好县长,首先要办好酒厂。”光是仁怀县就有酒厂一百八十多家。大大的发了一回“酒疯”。顿时酒厂林立,给这高原风光平添几分姿色。那时的贵州,我猜想,定是走到哪儿都是酒香醉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游游荡荡飘飘乎乎的酒鬼酒神踩在脚下的白花花的银子。然而,好景不长。这些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酒厂,绝大多数命运不佳,当走门子花大钱从国内外买回来的金银、铜牌挂满脖子的时候,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大呼隆搞起来的众酒厂走下坡路不要紧,可那投进去的数十亿贷款谁来还?贵州省就开始打“名牌”酒的主意了。所谓“一个金牌救活一厂,一个金杯带动一方”,着实发了第二回“酒疯”——“集团风”。经过市场的第一轮淘汰,到了一九八八年,整个贵州省酒行业只剩下“八大金刚”了。它们的顺序是:茅台、董酒、鸭溪窖酒、湄窖、安酒、习水大曲、黔春、贵州醇。这回,如意算盘打得好,由“名酒”牵头,组成八大集团,带着当地小酒厂背时和奄奄一息的穷哥们共同致富,昂首阔步朝前走。理由如此充足,一曰“改革”,二曰:“规模经营,规模效益”。这种“改革”,为贵州省赢得了荣誉。最出名的当属“安酒集团”,全国酒行业首家集团。一时间各路小诸侯蜂拥麾下,乐得都打着“名酒的牌子。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参观,访

问,中央领导视察,上面的表彰好不热闹。麻烦接踵而至。由于设备、工艺技术、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管理跟不上,质量总体下降,牌子砸了,产品积压,加上银行贷款压力,直逼得集团几近破产!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改革,让设计者骑虎难下,更让企业骑虎难下!当然,也有比较清醒的企业避免了这场灾难。“贵州醇”便是一个。鄢文松说:“当时压力很大。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逼着搞集团,我顶着不干。说句土话,羊羔子不跟狗打仗?归拢一些小酒厂来生产名酒,这不是开玩笑!结果只能是,救不了小酒厂,害了名酒厂!市场规律,优胜劣汰嘛!后来顶不住,我说,好好好,给你们个面子,我来试一试。我只是装模作样地到各家小酒厂考察了一番,最后不了了之。上面来问我,我说条件不成熟。条件不成熟,总不能逼着我干吧?”

这场“改革”让出风头者落了马,让观察抵制者受了益。这印证了一个成语:顺之者亡,逆之者昌。鄢文松和“贵州醇”也因此担了个不积极支持“改革”的罪名。

说起来奇怪,一九九零年,在全国经济一片疲软萧条、人们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酒的销售量却大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狂喝滥饮,成了那一时期的生活方式的标志。与酒的对话,与善饮者的对话,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最简单最放肆的对话。有这么些消愁解闷的人,有这么些慷慨悲歌的人,有这么些放浪形骸的人,有这么些失意寥落的人,当然还有这么些弹冠相庆的人,给中国的酒行业创造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忽如其来的庞大的酒精消费,给这个古老而萎靡、刚刚经受了创伤的国家以微微的麻醉和生命的刺激。贵州高原的酒神在一种百无聊赖的昏睡中苏醒了。他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他们敏感的嗅觉闻到了远方滚滚而来的酒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从此,贵州酒掀起了第三次“酒疯”。这一次“酒疯”与前一次“酒疯”的明显不同在于,前一次是自上而下

的,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而这次则是特定的社会氛围下的市场产物,是典型的消费刺激生产。真是飞来横财!让毫无思想准备的贵州酒行业欣喜若狂。然而,他们更没有想到,市场胃口太大了,即使名酒价格节节爬高,仍然供不应求。糟糕的是,酒类生产非常特殊,有严格的工艺和周期要求,产量也很受限制,不像其他饮料,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一边是市场需求的巨大诱惑,一边是产量的有限,中间的缺口,堆满了白花花的银子,让所有的名酒厂眼睛里喷火!非分之想由此而生。买小酒厂“基酒”勾兑,成了各大名酒厂共同的选择。这便造成了中国酿酒业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名酒的销量远超出了自己生产能力,挂羊头卖狗肉,名牌酒瓶装劣酒,欺骗消费者,对需求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地方政府和工商管理部门也出于利益考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至在欺骗消费者上与酒厂组成了统一战线,助纣为虐!鄢文松说“这是中国名酒的悲哀和耻辱!是典型的饮鸩止渴!这种情况一直泛滥到今天!”

一九八八年的“集团风”和一九九零年后的“大跃进”膨胀,虽然利益趋动方向和始作俑者不同,但性质却完全一样,都是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名酒质量的失控在所难免。

一九九零年,贵州酿酒业曾经发生了一件大事,著名的“湄窖”酒,在原轻工部组织的部优产品复查中,查出该酒含铅量严重超标。可奇怪的是,这可能严重影响消费者健康的大事,查出后并没有马上查封回收,并向社会公布真相。而是在某些部门手里压了整整半年后才透露出来!半年时间,足够厂家将这些含铅量严重的酒卖干净了!这其中,是官僚主义作祟,还是有内幕交易?只有天知道!

这一时期市场反应是,在广东市场一直看好的“贵州醇”突然遭到了“湄窖”降价倾销的原因和背景,只是感到“湄窖”的行动反常,也只是把这种行动理解为市场竞争。

“贵州醇”有些吃不住劲了。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五日，鄢文松致书“湄窖”酒厂厂长刘有寿，渴求手下留情。

刘厂长：

您好？

去年“六四”前在贵厂与仁兄匆匆一面，至今未能再见兄弟不胜遗憾。

通观全省酿酒业，经营之有方，气魄之大，效益之好，当推“湄窖”为首。而湄窖市场日益扩大，竞争场上，似有席卷天下之意。以兄之才，这些年来，攻城略地，战必胜，攻必取，视同行于股掌之上。广东市场角逐，仁兄游刃有余，兄弟则汗流浹背；以市场占有而论，仁兄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兄弟偏安一隅而不能。近据《粤港信息报》载，仁兄在广州附近的博罗以批发零售价下降百分之一十五来销售，此举足以置我于死地。

为此，特致函兄台，中国之大，哪一点不是湄窖发财的地方，何必苦苦相逼广东？如兄不再降价，则是高抬贵手了。仁兄大德，兄弟当没齿不忘。

去年以来，我景况不佳，无法挣脱疲软，因销售数量太微，更不敢降价，聊以糊口，已感不支，半数工人放假，至今无法恢复。难言之隐，无以尽述，望仁兄鉴谅。区区私心，望勿外传。

特颂

安好

兴义酒厂鄢文松

这是鄢文松的另外一面。他外表粗犷，却胸有谋略。“在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硬拼硬打的。转移目标，以弱示人，是我的主要策略。在贵州醇的生长幼稚期，竞争中与人家硬碰硬，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他说。“茅台”与“贵州醇”商标纷争初起，省政府第一次调停，鄢文松在上海避其锋芒，指示

去贵阳与“茅台”协商的副厂长,要态度诚恳,“以弱示人”。

所谓以柔克刚。

这种计谋,与我见到的咄咄逼人的鄢文松判若两人!亦柔亦刚,刚柔并济,非雄才大略,是很难做到的。

“茅台”告“贵州醇”的侵犯其“贵州”商标,并不自一九九二年始。缘起可以追溯到一九八六年或更早一点。当时,一位副省长出面调停。仍是三点意见:一、“贵州醇”酒名不能改;二、允许“贵州醇”无偿使用“贵州”二字;三、这件事由轻工厅做好“茅台酒”的工作。

这次调停,显然有利于“贵州醇”。这次调停,被“茅台”斥之为“行政干预”,虽然后来“茅台”也充分运用了其在政府中的特殊影响和地位来进行“行政干预”。

迫于压力,鄢文松向省轻工厅写了一份检讨式的“关于贵州醇商标问题的报告”。

省轻工厅:

我厂于八二年应外贸要求生产低度浓重香型酒,试销成功后,由外贸取名“贵州醇”,在国内市场批量销售。由于我厂对《商标法》认识不足,“贵州”二字造成侵犯茅台酒厂商标所有权的后果。

由于“贵州醇”已能批量出口,国内外市场销售已有三年多的历史,并获过部优产品称号,更改酒名,将导致我厂销售上严重困难。目前,以“贵州醇”为主要产品的技改工程已全部完成,产量在逐步上升。根据实际困难,特向省厅报告:

一、请省厅向茅台酒厂转达我厂的歉意和实际困难,请求茅台酒厂准予我厂使用“贵州醇”原名称;

二、我厂使用“贵州醇”酒名,一定整顿好企业,抓好质量管理保证体系,使“贵州醇”酒的质量不辱没“贵州”字,不损害茅台酒厂声誉。

此呈。

兴义县酒厂厂长 鄢文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份报告成为对手用以证明鄢文松出尔反尔的证据和“贵州醇”商标侵权的证据。

鄢文松笑了。

这封信在鄢文松看来,与一九九二年致季克良公开信根本不同的是,它至少传达了三个信息,一是,“我是不堪一击的弱者。”二是表达了对“贵州茅台酒”中“贵州”二字的“敬意”。三是,我宁受“胯下之辱”。“茅台”毕竟太强大了!可六年后,“茅台”拿出的侵权商标,恰恰不是“贵州茅台酒”,而是“贵州大曲”的“贵州”商标。而“贵州醇”的标识是“南盘江牌”!

鄢文松骨子里不服,但是他没有能力与“茅台”抗衡,“贵州醇”随时都有可能夭折。他只能先施“缓兵之计”。

他在等待时机。

“湄窖”让他揪住了。

他看到了猎物的虚弱,便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

中央电视台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经济半小时”公布了“湄窖”的情况后,鄢文松即向厂内各驻外经理部、技术科、质检部门、厂评酒委员会、各生产工段发出了“关于吸取‘湄窖’倒牌教训的决定”。

“决定”中说:

传闻已久的‘湄窖’含铅量超标问题被查出的传言得到间接证实。贵州省红极一时的‘湄窖’终于被自己的短期行为和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态度搞垮了。莱比锡金牌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陨落,后果将会是十分悲惨的。这给各种酒的集团性生产单

位一个极严重的教训。事实证明,名酒生产,是不能够所谓横向联合的。中级名酒厂用收购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产品来作为扩大产量的手段,从根本上无法解决产品质量的事实暴露无遗。

我厂‘贵州醇’生产,坚持不搞联合,坚持每一滴都按自己的工艺标准生产的原则,使产品质量从执行部颁标准到执行优级标准,六年内上了一个新台阶,用质量取得消费者的道路,我厂无论何时都在坚持下去。

这份“决定”,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等于向社会公布了“湄窖”的真相,并申明了“贵州醇”与之区别的和对质量、对酒行业横向联合决策长期所持的态度。

这是“贵州醇”在竞争中采取的一个相当厉害的行动。

这无疑是向全国的消费者暗示:搞横向联合,收购基酒的名酒质量舰队!

鄢文松似乎无所谓。他说:“包括贵州名酒在内的全国许多名酒这种作法的后果,在我预料之中。一天不改,一天便潜伏着危机。没有比失去消费者更可怕的事情了。超额利润,已经让一些名酒厂和地方政府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市场经济中应该遵循的起码道德。遗憾的是,一九九四年开始实行税制,为了躲税,大酒厂变本加厉收购小酒厂基酒兑‘名酒’,已成为酿酒业公开的秘密!”

如果有一天,某大报在头条位置刊登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名酒正在集体自杀!”我相信,这条消息一定会震动全世界!

欺诈公众、道德沦丧,无论如何不是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所期待的目标或后果。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我们必须遵守和正视现实,却不能容忍现实;一个精神链条已经完全断裂的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旧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却是母腹中尚未成熟的胎儿,黎明前形成一个道德和秩序的巨大真空地带在所难免。在历史主义者看来,“恶”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不

下地狱,无以获得新生;在人道主义看来,一切摧残和践踏人性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一个健全的社会,无非包括两方面内容:健全的法制和健康的伦理道德系统。前者尚可论之,后者不堪瞩目。中国酿酒业的现状便是典范。

“贵州醇”的硬气可能正在于此。然而,“贵州醇”也很孤独,它也必须忍受孤独。它与大家拉开了距离,在道德上反其道而行之,大家自然要把它当作“异教徒”抛弃。因此,茅、仁联军与“贵州醇”的南北战争,在某种含意上讲,是道德和反道德的战争,是北方十字军对南方“异教徒”的征伐。“茅台”的背后,站着幸灾乐祸的各大名酒。

总之,“贵州醇”揭露“涓窖”,不啻是捅了马蜂窝。

不久,鄢文松接到通知,省轻工厅主管副厅长要找他谈话。

他奉命来到副厅长办公室。

里面的气氛可不大融洽。

副厅长说:“老鄢,你卖你的酒,人家做人家的生意,说人家干啥?贵州的事情贵州自己解决嘛!”

鄢文松说:“厅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涓窖’查出问题后应该全部封存检验,这关系到消费者身体健康。结果是销售完存货后才公布,你们上上下下都是说了假话哟!而后,他们的做法,已经影响了‘贵州醇’的市场声誉。消费者说,贵州的酒信不过。我们必须正名。”

“已经查清楚了嘛,是瓶子里含铅,不是酒的问题嘛。”

“这种说法,连中学生都哄不了!我请教过专家,铅与硅化合,生成硅酸铅,强酸都无法溶解。酒里那么点酸,怎么能溶解玻璃里面的铅?这不是笑话吗?”

这种谈话效果,搞得厅长十分恼火。厅长最后摊牌了:“老鄢,你不要这样找人家麻烦。‘茅台酒’也在找你的麻烦!”

这是警告。遗憾的是,这个警告后来成了事实。

五

“茅台酒”大军压境的时候，贵州醇酒厂领导层充满了悲观的气氛。除了鄢文松外，谁也不认为小小的“贵州醇”能顶得住实力雄厚的“茅台”国酒，并打赢这场战争。

“茅台”在策划这场战争时，想必也有这样的考虑：凭着“茅台”的威望和实力，围也把“贵州醇”围死了。

“茅台”进攻的路数非常清晰，就像下围棋，有兴义“贵州醇”的地方，必定会不声不响地“粘”上“茅台”，就是要借兴义“贵州醇”十年培育起来的市场来摧毁兴义“贵州醇”！意在把兴义“贵州醇”一块一块地切断、分割、围困，然后“打吃”！

这是一种根本不把兴义“贵州醇”放在眼里的“弱肉强食”的打法。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茅台”低估了“贵州醇”的实力和斗志，犯了轻敌的致命错误。

别说“茅台”轻视“贵州醇”，贵州境内的所有名酒似乎都有理由轻视“贵州醇”。

自从一九八四年轻工部评优，“贵州醇”得了个第三名后，再没有参加过国内外的评优和展览。贵州的其他名酒挂满光芒耀眼的金牌时，“贵州醇”的脖子上只有一个寒酸的铜牌。

鄢文松拒绝参加评奖，鄙视酿酒业慕虚荣、花钱买奖牌的陋习，是出了名的。早先，在安徽的一次全国评酒会上，评酒委员公然向“贵州醇”索取几十万元，鄢文松二话不说，转身走人。“我不要奖牌行不行？懒得与这帮人为伍！”他说。

雄心勃勃的鄢文松长期采取的策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

称王”。他藏在天高皇帝远的兴义，省里的会议活动能推掉就推掉，尽可能不露面。而且，“贵州醇”根本不北上，市场一直在南方诸省。在贵州省内，人们很难见到“贵州醇”的影子。这给外界一个错觉，“贵州醇”在贵州，实在无足轻重，碾死它，像碾死一只苍蝇！

所以，“茅台”和“贵州醇”的战争一开始，许多人便预测，“贵州醇”必败无疑。

随着南北战争的发展，当“贵州醇”的神秘面纱揭去的时候，世人大吃一惊。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贵州醇”一九八八年位排贵州名酒“八大金刚”之末，一九九零年上升到第三位，一九九三年便紧追“茅台”之后，成了有资格藐视群雄的老二！

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实。

有识者分析说，“茅台”这个超级大国，已陷入了一场“越南战争”，速战速决是绝对不可能的梦想！

始终在黔西南暗处休养生息的鄢文松，清醒地意识到，“贵州醇”扬眉吐气的机会到了！你“茅台”不是要借“贵州醇”的市场势头置我于死地吗？我“贵州醇”这回可要借“国酒”的势头名扬天下了！

“十年寒窗苦”，等待的不就是今天吗？

鄢文松跟悲观惊恐的副手们讲：“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他抚掌拍额，庆幸地说：“真是天助‘贵州醇’也！”

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去广州出庭时叹道：“‘贵州醇’要出名，拉着名人上法庭！”

然而，悔之晚矣。

“茅台”被“贵州醇”真正套牢了！

初期几乎所有的助手都对鄢文松的乐观情绪大惑不解，并

告诫说,不可轻敌。

眼前这些人,都是“贵州醇”江山的功臣骨干。他们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茅台酒”确实不能等闲视之。但是,鄢文松必须让大家知己知彼,树立信心。没有信心,再有优势,再是机会,都打不赢这场仗。一定要让大家的精神振奋起来。

他分析道:

“‘茅台酒’果然是个庞然大物,实力雄,气势逼人。但是它有几个明显的弱点。一、‘茅台’仿照‘贵州醇’,打着‘贵州醇’的旗号来跟‘贵州醇’斗,可以说是不义之师,无论到哪里说,都是站不住脚的。退一万步说,我‘贵州醇’千错万错,他们也不应该这么干。这个馊点子让‘茅台’在道义上先失一着。这便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二、‘茅台’产‘贵州醇’,由七个小酒厂联合生产,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质量与我们的‘贵州醇’相比,差距实在太太大,虽然他们的价格低,但是要相信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特别是对老客户,要有充分的信心。三、‘茅台’虽然号称‘国酒’,备受殊荣,但毕竟是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企业。不像‘贵州醇’,完全是市场残酷的竞争中摸爬滚打、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我们有市场竞争中起码的心理素质训练,他们没有。我想,这三条很能说明问题。这场战争,即使打输了也算不了什么。何况目前胜负还没见分晓呢?”

六

应该说,“茅台酒”雄霸天下,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劲的对手。

“贵州醇”开始行动了。

除了鄢文松致季克良那封措词激烈、十分情绪化的公开信

外,在一九九二年季克良陆陆续续收到了鄢文松寄去的信函:

七月,《对茅台酒厂生产假冒贵州醇的严正声明》;

七月,《贵州醇何时成了茅台酒的系列产品?》;

八月,《强烈抗议茅台酒厂生产假冒贵州醇》;

九月,《“酒魂”的悲哀》;

十月,《茅台酒厂何以如此堕落》;

十月,《有道理请到报上公开辩论》;

十一月,《茅台酒厂假造“贵州”牌注册商标图形能骗到几时》;

十二月,《国酒厂何以如此“气度不凡”》。

在这些信函中,鄢文松引经据典,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这一段时间,是鄢文松读书写作的高峰期。

这也让世人刮目相看。原以为,这鄢文松不过是酿酒工人出身的大老粗,原来还会舞文弄墨,写一手好文章。

鄢文松告诉我,他平生一大爱好就是读书,读文学、读历史。他家里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中华书局出的二十四史。“读完了吗?”我问他。“哪里读得完。但是读了相当部分。”他说。

我们在一起吃饭,遇到了市政法委副书记,是鄢文松当工宣队时兴义中学的学生。该人已是酒醉薰薰,歪过这边来,高声叫道:“鄢厂长!”

“来来,这边坐。”鄢给他让座。

“你不晓得,鄢厂长,你给我们当班主任时,有件事你还记得不?”

“什么事。”

“那天晚上天冷,我们在郊外架起了篝火。你给我们讲安娜……娜……娜什么来着?”

“《安娜·卡列尼娜》。”

二十年前,鄢文松还是个只有二十七、八岁的青年酿酒工

人。在篝火旁给一群如饥似渴的中学生讲“禁书”、“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同”。这是何等美妙的场面！

兴义可是一个出人物的地方。辛亥革命后贵州省第一任省长、“贵州王”刘显世，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等，都出自这个边远山区。

说起来，早年间“茅台酒”还与兴义人有些瓜葛呢。鄢文松给我讲了个故事。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以其超群的品质获金奖。可麻烦的是，茅台酒业的两霸——成裕烧房和荣和烧房都选了“茅台酒”，谁都得到这块金牌，官司打到县府，县府断案不下，把矛盾上交省府。省长刘显世经过调查后断道：

令仁怀县知事覃光奎：

呈一件巴拿马赛会茅台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呈，获奖一份，难以分给。请核事由。

呈悉。查此案出品，该县当时征集，呈署时原系一造酒公司名义，故奖凭、奖牌仅有一份。据呈各节虽属实情，但当时既未分别两户，且此项奖品亦无从再领，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取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至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两户售货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仰即转飭。遵照此令。

省长 刘显世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此案断得干净利索，争执三年的官司，从此平息，茅台两霸，再不滋事。

鄢文松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兴义原有一个怪才，性情孤傲，叫李芳之。刘显世之弟，当

地名绅刘显潜在下午屯坝的硬撑坡筑“马王庙”。庙筑毕，请当地名士前来聚会，李芳之也是在请之列。入席后，刘显世请李芳之出对助兴。李芳之信笔写到：

马乃千里马

王是山大王

写毕，罢席而去。

此对暗讽刘氏家族声威显赫，独霸一方，引为世人笑谈。

鄢文松笑着说：“今天，我把这幅兴义先贤的对联，送给茅台酒厂和它的主人吧。”

七

面对鄢文松雪片般飞来的战书，“茅台”和季克良出奇的克制和矜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似乎都要端着“国酒”的绅士风度。他们似乎不太习惯这种互相谩骂然后厮杀的战法。

北军旌旗在望，却按兵不动。这让早被煽起来的舆论视线颇为纳闷。

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晚，北京城被扣在一个大蒸笼里。满街上走的人，都像狗一样被闷热逼着吐长了舌头。快十点了，我的BP机在呼叫。

“是卢跃刚同志吗？”

“是我，贵姓？”

“我是季克良呵。”

“您好，季厂长。”

我对这位“国酒”厂厂长已是久仰。在贵阳采访时，我只是和他那辆停在省轻工厅大楼前挂军队牌照的“奔驰 560SEL”专

车照过一面。与南北两军的统帅会面,了解他们的经历、性格和思维方式并进行比较,或许能对这场特殊战争有一个深入的认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都是人的战争,都是统帅和统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往往就是统帅个人风格的结果。

在京西宾馆,我见到了季克良。这次谈话,由晚十点十分持续到第二天的一点多。整谈了三个小时!

季克良长鄢文松八岁,中等个,满头的花白而茂密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洁。他是江苏南通人,一九六四年在无锡轻工学院食品工程系毕业后,就到了茅台酒厂,由一名普通技术员一步步干到了厂长。到如今,这位外乡人已经枕着赤水河的涛声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了!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八频道刚好播放“中国西部”专题片的贵州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他的背后是赤水河畔巍峨气派的茅台酒厂。他在向全国观众介绍茅台酒时,充满了痴情和自豪。

他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时,条理清晰,努力控制着节奏,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谦谦气质。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那位生产与兴义“贵州醇”同名、外包装与兴义“贵州醇”相似的决策者的影子,也看不到那辆军队牌照“奔驰560SEL”让我领略到贵族气派。

在省政府主持的调解会上,季克良和鄢文松终于见面了。他说:“老鄢,你给我的公开信,我今天都没有看到哦。”

鄢文松答道:“季厂长,我鄢文松是明人不做暗事,所有的信和文章都寄给你了,你不可能没有收到。”

“你从我骂到茅台酒,我可是一句嘴都没有还。”季说。

“可以公开辩论嘛。”鄢说。

季克良在骨子里不愿意、也不擅长公开的辩论。他告诉我:“鄢文松骂‘茅台酒’骂我,我不吭气,他又说是作贼心虚,理屈辞穷,不敢见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当时的考虑是:第一,兴

义是少数民族地区，‘贵州醇’也是他们先搞的，两家对骂，采取以牙还牙的方法不好。第二，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双方的经济所以不能和他一般见识。”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茅台酒厂为什么要生产“贵州醇”。

我问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茅台酒生产‘贵州醇’都是消费者费解的事。因为以茅台的技术水平、商标品牌、经济实力来看，都足以使茅台研制开发出与‘贵州醇’相匹敌的低度酒来。为什么偏偏要生产‘贵州醇’呢？完全有实力设计出更好的包装、瓶型，为什么几乎完全套用兴义‘贵州醇’的包装？”

在贵州酿酒企业，除了“贵州醇”用了“贵州”二字外，还有十多家酒前冠以“贵州”二字，如“贵州春”、“贵州窖”、“贵州特醇”（已在广州开庭前与茅台办理了商标使用协议，作为交换条件，生产该酒的兴义山翁酒厂将瓶型专利转让给了茅台酒厂，并让茅台生产的“贵州醇”瓶型使用合法化了。这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容当后叙。）、“贵州黑糯米酒”、“贵州刺梨酒”、“贵州仁仲酒”等等。为什么单单向“贵州醇”兴师问罪？

我提出的问题鄢文松也曾当面问过季克良。

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上午，省政府第三会议室。

在省政府出面干预下，茅台和“贵州醇”两家死对头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

主持人、省政府秘书长蒲明发说：“今天，我们把你们两家酒厂召集起来，希望你们通过谈判来解决纠纷。这次不是省政府出面协调，我们只是召集大家来谈判。你们看谁先讲？鄢厂长，干脆你先讲。”

“先讲就先讲。”鄢文松气鼓鼓地说：“在谈两家矛盾之前，我要先问问季厂长，你为什么要生产‘贵州醇’？”

鄢文松单刀直入的问题顿时让气氛紧张起来。

蒲秘书长见状，立即阻止道：“鄢厂长，你不能这样提问题。

这样不是把会谈气氛破坏了吗？”

省工商局商标处长顺着秘书长的话茬，导引着会谈的由头和主题。他对鄢文松说：“这是一次商标纠纷问题。‘贵州’商标是茅台注册的，你们使用那么多年，也不办手续。过去谅解你们，是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在要从法制的角度看了。”

可鄢文松不理这一套。在鄢文松看来，这位商标处长的“公正”背后有些不尴不尬。在南北大战之前，一九九二年三月，这位处长曾经到兴义来解决商标问题。他告诉贵州醇的酒厂办公室主任金家兴，茅台准备生产“贵州醇”，并出主意，要“贵州醇”进行全版注册保护，并与金家兴共赴北京办理注册手续。回来时，他向金提出要一百箱“贵州醇”。金说：“我做不了主，要请示。”金向鄢文松请示，被鄢文松一口回绝。“我们厂里的规矩，不送政府官员贿赂。我最不舒服执法部门借机敲诈勒索。在这种背景来说我商标侵权，有资格吗？”他说。

鄢文松穷追不舍。“我还是要问季厂长，你为什么要生产‘贵州醇’？”

季克良“温尔文雅”地说：“好好，我来解释。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谋求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选择生产‘贵州醇’。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有权利选择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

鄢文松笑了。他反唇相讥道：“这叫作‘麻皮不沾豆杆’，沾不上边嘛！你们仿冒我的产品，怎么能说是响应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呢？怎么用这种办法来发展经济呢？”

鄢又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全版套‘贵州醇’外观装潢设计？”

季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解决了。新的瓶型和包装设计已经在我的办公桌上了。我们很快就要改掉。”

遗憾的是，这句话并没有兑现。一直到一年多后的今天，我

们还能在市场看到“茅台”产的与“贵州醇”足以乱真的外包装。

紧接着谈到那封致季克良的公开信。

仁怀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发言了。他说“我看到了这封信。我认为这封信主要从情理上讲纠纷的，而不是法制上讲纠纷的。”

鄢文松没等他把话讲完，“腾”地从凳子上跳起来说：“我把你们当作人来尊重才会讲情理。只有动物才不讲情理！”

无论如何。季克良回避不了生产“贵州醇”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这场纷争有一个历史的回顾，才能讲清楚。”季克良告诉我：“我们的‘贵州’商标是一九八一年注册的。《商标法》出来后，我们的商标意识在逐渐增强。兴义一九八三年生产‘南盘江’牌‘贵州醇’后，兴义县工商局给省工商局写了报告，询问‘贵州醇’是否侵权。省工商局明确指出，‘贵州’系茅台酒厂的注册商标，兴义酒厂应停止使用。一九八五年，省粮油进口公司召集我们两家商量，我们不同意他们用‘贵州’，他们请求我们先允许他们使用。一九八七年我们向省工商局申诉，省长出来协调，提出了三条解决意见，我们同意前两条，但是不同意第三条‘撤诉’。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思想解放，仁怀县向茅台提出县财政收支矛盾，要充分利用仁怀县资源，请求茅台发挥优势给予帮助。所以，生产‘贵州醇’是仁怀县要求的。我们决定后，主动向省工商局和轻工厅报告，省里多次打电话请鄢文松来谈，他不来。一九九二年省人大开会期间，周开良（茅台党委书记）专门等了两天，他也不来。所以我们就自己搞了。”

“看来，茅台与‘贵州醇’这场官司有着很强的情绪化倾向。”我说。

“实事求是地讲，开始没有情绪，到后来就有情绪的因素

了。”季说。

我说：“茅台完全可以搞‘茅台醇’嘛，‘茅台’两个字可比‘贵州’值钱。或者是‘贵州’别的什么名。”

季说：“不能用‘茅台’。‘茅台’是有特殊含意的。何况我们已经开发了茅台 38 度低度酒，不能再用以‘茅台’命名低度酒。”

我说：“本来商标侵权是个法律问题，鄢文松不来，完全可以采用法律手段或者更妥当的手段来解决。生产‘贵州醇’不能算是个明智的做法。‘茅台’处理此事显然过激了。”

季说：“用你的话说，我们处理得是过激了一点。但说句良心话，他用了我的商标嘛。如果我们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以前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当然，‘贵州醇’的名还是要用，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包装我们已有想法。他们如果不同意（用现包装），我们也有备用方案。”

季克良语气谨慎而委婉。“我们处理得是过激了一点”这句话前，特别放置了“用你的话说”，含蓄婉转地承认了一个事实。“过激”这两个字，此时此刻非同小事！正是“过激”这两个字激化了矛盾，转化了论争的性质，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南北大战！两年后的今天还不能收场！当然，从茅台和仁怀整个设计来看，大方针已定，即使一九九二年六月前鄢文松来谈判，亦不能阻止茅台生产“贵州醇”，不是什么同意不同意外包装的问题。谈判仅仅是一种形式，一个过场，因为谈判的前提根本没有，因为“茅台”生产“贵州醇”已得到了省工商局和轻工厅的支持，已经完成了合法化的进程。谈判，顶多不过是个礼节性的打招呼。你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摆在鄢文松面前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现实。战争的爆发，是早晚的事情，并不能因谈判而避免。所以，所谓茅台的外包装方案，也顶多不过是个不至于太过分的修饰性方案。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什么省工商局和省轻工厅作为工商管理部門和行业主管部門，明明知道贵州省

内已经有一个生产了近十年的“贵州醇”低度酒,还要允许另外一个同一包装、同一灯型的“贵州醇”生产?明明知道“茅台”与“贵州醇”商标侵权之争由来已久,一九八七年已有一次高层次协调决断,他们的行为必将使矛盾激化,必将产生同室操戈的恶性后果,却偏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本以为,这场南北战争是企业情绪化和利益冲动化行为的结果,可现在看来,随着政府一边倒态度的介入,便没有那么简单了。省轻工厅一位主管副厅长曾在酒桌上毫不隐讳地跟省林业厅副厅长、原黔西南州常务副州长说:“我就是在让‘茅台’来治一治‘贵州醇’!”鄢文松和“贵州醇”怎么得罪了权贵而需要整治呢?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发动一场战争!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一丁点“护法”的味道了。处于公证裁判地位的政府部门,似乎也加入了茅、仁联军。这情形让旁观者大为惊诧!

颜大建一九八三年从贵州师大法律系毕业后就分到了省轻工厅,在企管处一干就是十一年,这是个懂法律,说话很有分寸感的年轻人。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茅台”与“贵州醇”的矛盾调解。他说:“一九九二年四月,‘茅台’打电话到我们企管处,说是要研制和生产‘贵州醇’。我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茅台’提出,双方厂长见面协商,可是请鄢文松两次都没有来。‘茅台’认为鄢文松不尊重人,‘码倒吃’。本来‘茅台’有准备,和谈效果好,就不用‘贵州醇’,用‘茅台醇’。这样一来,决定不改,直接用‘贵州醇’。”

关于轻工厅给“茅台”发放“贵州醇”生产许可证问题,颜介绍说:“厅里审核时,认为‘茅台’有‘贵州’商标,法律上具备资格,但是又考虑到兴义生产‘贵州醇’的历史原因和客观事实。我们很为难,两个企业都由我们管。‘贵州醇’生产实际上对‘茅台’没有什么轻重,主要是仁怀县的利益。详细情况可以问科技处,生产许可证由他们发放。”

下午，颜大建把我介绍了生产许可证发放办公室。该办公室是行业监督管理最重要的一道关口。也是个让人垂涎的地方。

一个叫高瑞的年轻人接待了我。

这个络腮胡、白脸、用鼻子说话的年轻人让我领教了该办公室的厉害。

进屋后，有凳子，但是主人没有让座的意思，只好站着说话。

“找我干啥？”高瑞背对着我，故意答非所问。

“规定是什么？”

他转身到一个文件柜里抽出一本《贵州省酒类产品生产许可证文件汇编》，“你拿去看！”

我在翻看时，高瑞突然问我：“谁让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你到底要干啥？”

“我想了解你们批准‘茅台’生产‘贵州醇’，是否遵循了有关规定和程序。想请你介绍一些情况。”

“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我们没有义务告诉你！”他态度恶劣地说。

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对这种例行的访问充满了敌意。

这是个缺乏教养的年轻人，跟隔壁办公室的颜大建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产品要通过生产许可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产品技术鉴定程序和法律地位的审核，如果私下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介绍情况是不困难的。而且这位没有正面对人说话习惯的年轻人忘记了一条准则，他是国家公职人员，有义务向公众陈述他的工作程序和状态，有义务接受舆论监督。因为他的工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纳税人有权力知道他们的钱养活了些什么样的人，有权力知道国家公职员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暨省政府主持的第一轮谈判会上,轻工厅企管处长跟“贵州醇”的代表说,还没有给“茅台”“贵州醇”生产许可证。然而事实是,一个月前,“茅台”已经拿到了“贵州醇”生产许可证。

贵州正上演着一出悲喜剧,一出是非不明的混战!

八

“贵州醇”到底是怎样的酒,竟有这般魔力,搅得贵州不得安宁,搅得酿酒业如此轩然大波?

我们的目光追踪到了一九八二年秋天。

贵州省粮油进出口公司食品科副科长卢保坤在广州出口商品秋季交易会上得到了日本客户赠送的低度白酒:“35°纯”和“30°纯”。

他了解到,低度白酒是国际流行趋势。他尝了一口,果然“口味纯正”。当时,国内只有“双沟”和“张弓”两家开发低度白酒,绝大多数是高度烈性白酒。他判断,低度酒“符合白酒发展方向”。

他兴冲冲把“35°纯”和“30°纯”带回贵州。可征求大家意见时,大家反应冷淡,都不愿意试制。他来到了黔西南州州府兴义县,来到了离县城三公里、小地名木贾的兴义县酒厂。

兴义县酒厂始建于一九五零年,不死不活地生存了三十多年。几十人,两三排破平房,几口锅窖,只有二十多吨窖酒产量,与其说是家县酒厂,还不如说是个大作坊。我曾去参观过兴义酒厂的旧址,发酵用的糟池已是蛙声一片,平房里黑洞洞的,发霉的酒糟气扑面而来,一副破败的惨相。总之,过去的生产环境

十分简陋恶劣。

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厂穷厂,有一个大优点,就是从不排斥新生事物。他们曾与卢保坤有过 18°“维康大补酒”的研制合作。今天,卢保坤给他们带来了日本“35°纯”的样品,令他们喜出望外。

可卢保坤提出的研制标准又让他们傻了:一、35°,二、加水加冰块不浑浊。

喝中国白酒,谁听说过还可以加冰加水?从元朝有蒸馏酒开始,中国便是高度烈性白酒的故乡。老祖宗的想法颇为奇特,偏在这块生长着中庸哲学的土地上用美酒浇灌出激烈绚丽的罍粟花来!这种文化现象很值得研究。

也可能是老天爷的恩赐。兴义县地处东经 104°32′—105°11′,北纬 23°38′—25°23′,平均海拔一千米至一千四百米,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气候,夏天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按鄢文松的话说:“这么好的地方,焉有酿不出美酒之理!”

欠帐一两百万濒于倒闭的兴义酒厂,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担任低度酒研制的副厂长鄢文松和技术员刘晓云身上。

鄢文松告诉我:“这浓香型低度酒,说它简单也简单,说它复杂也复杂。当时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们兴奋,鼓舞着我们不分白天晚上地干。”

他和刘晓云整整苦干了一年,终于在简陋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当时国内度数最低的白酒。

这年广州秋交会,卢保坤把酒样带到会上请国内外客商品尝,受到盛赞。

孩子出生了,总得起个名吧。

酒类的命名通常有如下几种:一、以原料命名,二、以地名命名,三、以酿制方法命名,四、以用曲药命名,五、以地名加曲药命

名等。但是,这些命名方法似乎都不足以代表兴义酒厂“酒质和口感均属上乘”的低度白酒特色。受启发于日本低度酒的“纯”音,一个新加坡客商建议说:“这酒很醇和,又产自贵州,就叫它‘贵州醇’吧!”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贵州省级新产品鉴定会上,经卢保坤提议,“贵州醇”得到了正式命名。

怎的一个“醇”字了得!此后十年,“醇”字风靡天下!光是贵州省境内,就有“董醇”、“山翁醇”、“贵阳特醇”、“茅醇”、“黔春特醇”、“贵州特醇”、“九龙特醇”等数十家以“醇”字命名的低度白酒。真可谓群起模仿效尤。以至于让人忘记和混淆了“醇”字的本来涵义。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函省政府,文中说:“贵州醇酒厂与茅台酒厂,因‘贵州醇’商标引起纠纷已有多年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获解决,反而矛盾进一步激化。茅台酒厂仿制贵州醇打入市场,影响兴义产贵州醇的市场和声誉;贵州醇酒厂利用新闻渠道,宣扬茅台厂生产冒牌贵州醇。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相互的经济利益和声誉。有人说,国酒厂也搞假!有人说,贵州出现两种种贵州醇,真假难辨!还有人说,贵州醇的商标是盗用的!等等。这些无疑对名酒之乡——贵州的名誉也是大损害。对贵州醇酒厂同茅台酒间的纠纷,如不及时认真解决,不但影响双方生产发展,而且还会出现不安定因素。为此,主任会议建议省政府要茅台酒厂立即停止生产‘贵州醇’,以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贵州醇酒厂必须立即停止任何有损于茅台酒厂声誉的宣传。”

明确表示了省人大常委会与省政府完全不同的态度。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省政府办公厅回函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函后附省工商局给省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解决“贵州醇”问题的意见》。省工商局作为茅台生产“贵州醇”的工商注册

部门,在“意见”中阐述了茅台生产“贵州醇”的合法性:“茅台酒厂注册的‘贵州’商标是有效注册商标,商标一经注册,就享有专用权。‘醇’已被视为低度白酒的通用名称,与‘窖酒’、‘大曲’、‘液’等一样,凡生产低度的酒,都可用‘醇’”。

然而,省工商局忘记了这么一条,与“窖酒”、“大曲”、“液”等明显不同的是,“醇”除了形容词义外,还有“醇类”的化学物质涵意。而“醇类”中,只有“乙醇”有酒的含意。甲醇、丙醇及其高级醇、多元醇都不能饮用。市场上低度酒继“贵州醇”之后使用“醇”,顶多是一种消费者辨识上的“约定俗成”。根据“约定俗成”来进行“低度酒”的法理认证,不仅制造了新的歧义,在逻辑上也是不严密的。

而且,茅台酒厂也对“醇”字给予了蔑视。在茅台酒厂的“答辩状”上,谈到兴义“贵州醇”时,非常自信地称:“该盒子的核心是‘贵州’两字,所有文字图形都是以此为中心布局的,不难设想,如果将‘贵州’两字抹掉,哪怕在盒子表面再涂上一层金粉,那么,原告人的盒子(包装盒子上的‘贵州醇’)都将失去它的光彩和价值。”

如果“贵州醇”问一句,如果整个外包装把全部设计思想去掉,去掉那个大大隶书“醇”字,去掉银灰色调,去掉里面的瓶子和“贵州醇”美酒,在一个裸体盒子上只印“贵州”二字,或者在一个“涂上一层金粉”的盒子上只印“贵州”二字,那么“贵州”的“光彩和价值”又何在呢?鄢文松说:“如果‘贵州醇’去掉‘醇’字,‘贵州’二字只代表贫穷落后!”再说了,既然如此蔑视“贵州醇”,又何必去生产和仿造“贵州醇”呢?到底是“贵州醇”让“贵州”蓬荜生辉,还是“贵州”让“贵州醇”蓬荜生辉?作出一介理智的判断是不难的。否则,便会有“买椟还珠”的尴尬了。

对于一个聪明的母亲来说,给刚生下来的孩子起名,血统姓氏是无法选择的,她的智慧和理念,应该说全部体现在了孩子姓

氏后的名字上。“贵州醇”如是。否则,便不会有后来者、包括茅台酒厂在内的群起效尤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自信:一种是血统的自信,一种是创造的自信。两种自信,孰优孰劣,孰强孰弱,也是不难判断的。

“茅台酒”打着“贵州醇”的旗帜南下兴师问罪,“贵州醇”为了保卫“贵州醇”而抹马厉兵,这本身就说明了“贵州醇”的价值所在。同时也说明了发生在贵州、蔓延到全国的这场恶斗的可笑和滑稽。

九

茅台开始没有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仿制“贵州醇”来发动这场战争,其战略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先打后谈,通过打,用实力把鄢文松逼到谈判桌上来,利用政府经过调整以后的压力,迫使鄢文松就茅台生产“贵州醇”达成某种妥协。

在策略上,联合和收编怀仁县境内的小酒厂,利用小酒厂的人力、技术、设备和急于发财又苦苦找不到大出路的心态,给资金,给茅台的牌子,不声不响地进攻兴义“贵州醇”的市场。

此举可一箭双雕。一者可以惩戒鄢文松和“贵州醇”的狂妄自大桀骜不驯;二者也可与仁怀县结成一种紧密的利益关系,廓清“茅台酒”的外部生存环境,要根本上解决被“假茅台”围困的状况。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报道:《茅台的焦虑——假酒跟踪记》,精明的记者由茅台假酒的销售地追到了源头仁怀县,追到了茅台镇。报道说:“光茅台小镇上现在就有小

酒厂四十余家……这些乡镇小酒厂和作坊生产的杂牌酒,根本没有正当销路,但生产者都有一个绝招,选择同茅台等名酒同样的瓶型,甚至可以不贴商标出厂。众多的小酒厂就成了假酒的货源地,造假者贴商标、换商标、改包装简便迅速,查获很不容易。产供销的‘地下渠道’,伪证件、销售发票、私刻公章,非法活动猖獗,假酒泛滥、祸害全国。”

同天,新华社还播发了《扫清酒乡门前假》。

这一行动让早在全国沸沸扬扬的“假茅台”传言得到了证实。一时间,人们把喝“茅台”视为畏途。这一行动还让仁怀上百家小酒厂陷入困境,给仁怀县政府以深重的打击。仁怀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投到了茅台门下。

“茅台”有治“贵州醇”之心,仁怀有造假的传统,二者珠联璧合,共商生产“贵州醇”大计。

鄢文松揪住这种“联合”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季克良当然不同意鄢文松的看法。

他说:“我去过法国科涅克地区,家家户户种葡萄,榨葡萄汁,作葡萄酒,统统卖给大名酒公司,经过统一蒸馏,勾兑、包装出厂。那里人均创汇四十万美元。鄢文松攻击我们搞联合。我认为中国酒行业事实上要走联合的道路。酒行业联合有这么几条好处:一、国家穷,可以利用分散资金;二、可以带动一大片(小酒厂),把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带动发展起来;三、减少很多大企业的负担;四、还可以消化一些矛盾,抢原料、搞假酒的矛盾,很多纠纷迎刃而解。但是也有风险,比如技术问题。统一标准、统一勾兑,统一包装出厂,真正做到了,不会有问题。就像炒菜一样,除了清蒸外,炒菜总希望吃得丰满点好。浓香型酒与酱香型酒比较,要好做些,但是“茅台酒”一定不能搞联合,离开了茅台镇,就生产不了‘茅台酒’。”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其中的要害是“消化一些矛盾”,特别是

“搞假酒”的矛盾。目的在于保护“茅台酒”，减轻“茅台酒”的假酒压力。这无论如何有一种祸水南引、损人利己的嫌疑。

从法律的角度看，暂且不管省轻工厅和省工商局的动机如何，茅台“贵州醇”的生产是合法的。也正因为“是合法的”，茅台“贵州醇”有恃无恐，把兴义“贵州醇”外包装某些细部略微改了一下，便以以假乱真的姿态大胆入市了。对于此，就连支持生产的贵州醇，采用的瓶型是由兴义山翁酒厂已获利的，装潢是原兴义酒厂（现名贵州醇酒厂）已获装潢设计专利的，在未办理许可的情况下，茅台酒厂使用贵州醇瓶型及装潢是不符合专利法的。”

如果此说得到法庭认证，亦是认定茅台酒厂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茅台酒厂顾这头，却忘了那头，露出了一个大大的法律漏洞！

开庭前，有漏洞就赶快补吧！这个时候，茅台“贵州醇”已生产投放市场数月了！

第一要补外包装明显雷同的漏洞。茅台找到了兴义“贵州醇”外包装委托设计单位，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但有一个问题是，设计单位并不是专利持有人。专利持有单位是贵州醇酒厂，国家专利局批准专利号为“9384”。而且，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是取了委托设计费的，它是否有转让设计权利？

第二要补瓶型使用完全相同的漏洞。这个工作，茅台酒厂倒是做得有几分高明。他们找到了“贵州醇”的大后方——兴义市，与黔西南州所属的山翁酒厂（肚型酒瓶专利持有者）签署了专利使用合同。

然而，茅台酒厂虽然巧妙地利用了贵州醇酒厂与山翁酒厂的矛盾，以利相诱，拿到专利使用权利，却没有想到，山翁酒厂厂长在签署合同时，隐瞒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与茅台酒厂签

署合同之前,山翁酒厂已与贵州醇酒厂签署了一个“专利申报及许可使用合同书”,已明确规定山翁酒厂的肚型酒瓶专利“不允许第三家使用”。一九九二年六月,贵州醇酒厂按合同要求,向山翁酒厂支付了赴仁怀县打官司的一万元诉讼费,两家厂长还联合发表了保护专利权益的声明。

我把这份合同递给季克良,季茫然地说:“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

山翁酒厂厂长背信弃义并没有帮上茅台什么忙。茅台拿到的是一份违约合同。他把大家都给耍了!

这位厂长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这边拿钱,那边交易。两家交易的场面一定是很庄严的。山翁心怀鬼胎,茅台如获至宝。一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轻喜剧式的图画。不过要说明的是,兴义没有“渔翁”,只有“山翁”而已。

十

打赢官司,无非有两条,一要寻找强有力的证据,二要巩固法律地位。

茅台酒厂果然是国酒大厂,谋士济济,虽然应诉和反诉都是仓促应战,但思路还是清楚的。

茅台诉“贵州醇”商标侵权的标识,不如人们想当然的那样,是大名鼎鼎的“贵州茅台”牌“贵州茅台酒”,而是停产已有数年、消费者很少知道的“贵州”牌“贵州大曲”。

一九九三年底,国家各类企业商标续展。

国家商标局收到了贵州省的工商局和贵州省政府联合签署的《关于“贵州”牌注册商标申请续展的报告》。

由省政府出面,帮助一家企业申请商标续展,这在国家商标局应该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商标续展,对于任何一个合法企业来说,是例行的法律程序,仅限于企业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省政府上阵加码施压,给“贵州”商标的续展带来了非同一般的意味。

国家商标局很清楚这一点。如果续展,很有可能把商标局也搅进茅台与“贵州醇”这场难解难分的战争中去。

国家商标局犹豫了,以“国标字(1993)第2号”文件的形式给予答复说:“我局原则同意‘贵州’牌注册商标续展注册,但需待你局组织协调,解决贵州茅台酒厂与兴义酒厂的纠纷,由这两家企业签订书面协议报我局之后,如不超过《商标法》规定的续展时间,我局予以办理续展注册。”

贵州省一看就急了。这个批复等于说不能给“贵州”商标续展注册。因为茅台和贵州醇早就撕破脸皮,大打出手,并诉诸法律了。要在规定的续展时间里协调好矛盾。签订书面协议,那是不可能的。

国家商标局提出“贵州”续展的先决条件,等于置“贵州”牌商标于死地!

这个关键的时刻,“茅台”又发挥了无比强大的威力。

省政府、省工商局、茅台酒厂等又各派出人马,打着保护“茅台”名酒的旗号上了北京城。

如果比高层公关和运作的能力,“贵州醇”的酒劲儿可比“茅台”差了十万八千里!无论是在贵州,还是在北京,在每个细部环节,我们都闻到了“茅台”酒的芳香。

事隔一个月后,国家商标局下发正式文件,撤销了“贵州”商标续展的先决条件。

“茅台”并没有因此而止步。

商标续展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不得更改原注册商标标识,通

过续展予以合法保护。

但是,经过续展打扮的“贵州”牌“贵州大曲”出台后,让世人惊讶。原标识被改得面目全非,只留下“贵州”两个大大的草书了。保护范围,也由原来的“大曲”扩展到“酒”类。

这将意味着,所有酒类产品中,粘“贵州”两字,都在“茅台”扫荡之列。

商标续展,真正奠定了“茅台”在酒行业中对“贵州”两字的垄断地位,并为即将开庭的法律辩护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

据有关专家说,这种大规模改动原标识的酒类续展商标,绝对没有先例。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独独为“茅台”破这个例呢?为什么独独给了“茅台”这种特权呢?这里面有什么猫匿呢?

“贵州”牌“贵州大曲”被打扮得如此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由浓装到淡抹地上场,引起社会各方的异议和疑虑便是必然的了。

鄢文松在那里静观其变。

他看到了“茅台”商标续展这出戏的来头和明显的破绽。

他在广州开庭前,挥师北上,问罪京都。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贵州醇”的委托律师向国家工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呈递了《注册不当商标撤销裁定申请书》。

“申请书”称:“注册人一九八一年注册的第 101902 号商标是包含‘贵州大曲’汉字、‘GUI ZHOU DA QU’汉语拼音,以及双重方框图形在内的文字图形组合商标。但是一九九三年核准续展注册的第 101902 号商标都改变为单一的‘贵州’文字商标。根据商标法第十四条,注册商标需要改变文字、图形的,应当重新提出注册申请,以及商标法第三十条第(1)款,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等规定,一九九三年该商标予以改变续展注册确属不当,应依照法律予以撤销。”

出乎意料的是，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迅速受理此案。

风云突变。

代表“贵州醇”进京反映情况的是兴义市政府，与代表“茅台”的省政府级别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我在兴义见到了赴北京的兴义市原市长、市政府高级顾问胡隆甲。

这位老人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贵州醇’有错，早就被干掉了。”

这些兴义人倒是顽强，硬是蹲在北京把有关部门找了个遍。

胡隆甲是兴义老人，资历老，从一线退下来后，自然是无官一身轻，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敢讲。

他去找国家工商局局长刘敏学，秘书接待时态度生硬，他便直嚷着要亲自见到刘局长。

刘局长只好见。

胡隆甲把续展前后的两种“贵州”商标递给刘敏学。刘敏学把商标放到桌上看，一面看一面听汇报。因为刘看得严肃认真，几乎没有听他的汇报。最后刘表态说：“你相信我们可以按照国家法律处理这件事。”

第二次见到刘敏学。刘讲：“我们已与你们省里商量个意见。我建议你们‘和为贵’。”

胡隆甲说：“同意‘和为贵’，但是‘和’要有原则哦！”

胡两次到北京，找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国家工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除了在法律上力争外，还大打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牌。

他对商标局一位副局长说：“你们这种做法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安定，你们要负责！”

他在国家工商局，针对“茅台”报告中发展革命老区经济的说法，嘲笑道：“讲老区，我们更老。早在红军左、右江起义时，我

们就是老区。中央红军也到过兴义，贺子珍就是在兴义负的伤。我们兴义是正八经的老区，比遵义还老。”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成了“茅台”和“贵州醇”互相打的牌。你是老区，我也是老区，我不仅是老区，而且还是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打法，颇有点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牌，比法律更强有力。刚听见时，觉得有点像争强好胜的孩子斗嘴，你有的，我有，你没有的，我也有，以占上风。鄢文松告诉我，他与“茅台”斗，手里握着四张牌：一、少数民族地区；二、“茅台”仿造“贵州醇”；三、“茅台”的商标续展；四、“贵州醇”的经济实力。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他把“少数民族地区”当作一张排第一位重要的牌来打。我问他，他神秘地笑了。

分析鄢文松手里这四张牌，颇有点意思。这四张牌，起码包括了三重价值标准：a、政治；d、道德；c、法律。

三重价值标准针对一件事情并行不悖地存在着，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同时发挥作用，这在一个健康有秩序的社会来说，着实荒诞。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就是道德问题，法律问题就是法律问题。如果三者一搅合，便出现了难以作出是非判断的模糊地带。站在这个价值标准上看，是非明了。但是换一个价值标准来看，又似是而非了。法律有时体现为一种信仰，一种特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有时体现为政治意志的手段和工具，这里关心的是法律的结果，而不是法律本身。法律不是一个纯洁的少女，也不要指望她是个纯洁的少女。“贵州醇”为什么要跑到异省他乡起诉“茅台”？一是因为笃定会输，贵州这块地而太对“茅台”有利了；二是因为贵州的法院压根就不会受理此案，省里面早就打过招呼。所以，鄢文松手里的三重标准下的四张牌，是环境所迫的产物。

“政治”说：你们处理此事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贫穷落后的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吧？不能不考虑一千八百多职工的就业以及他们家庭的饭碗吧？何况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问题向来都是个头等重要的大事。

“道德”说：你“茅台”理直气壮地仿造“贵州醇”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在公众舆论面前，政府支持“茅台”也不能太过分。

政治和道德为铺垫，然后直逼法律。“贵州醇”的境遇，只能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鄢文松在拿“贵州醇”作赌。

法庭庭长在一次百般无奈调解会上说：“如果我硬判下来对你们不利怎么办？”

旁边有人说：“顶多不过我们不生产‘贵州醇’。”

“你的意见代表鄢厂长吗？”庭长问。

“鄢厂长就在这里，你问他。”

“我就是这个意见。”

后来庭长问鄢文松，“你不妥协是不是你仗着你在少数民族地区？”

鄢说：“也是也不是。少数民族地区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正义在我们一边。”

季克良则认为，正义在“茅台”一边。

季克良手里也握有牌。一是“国酒”的威望和实力；二是“贵州”商标专有权；三是“贵州醇”并没有获得法律地位；四是省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五是广州法庭态度。

庭长在季克良在场的情况下，对鄢文松说：“‘茅台’一九九二年生产‘贵州醇’是高明的。我如果是‘茅台’的法律顾问，也会出这样的点子。不管你们骂‘茅台’卑鄙也好，无耻也好，我在法律上支持他们。因为老是那样下去商标得不到保护。‘茅台’之所以采取这个办法，是对几年前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

对你们‘贵州醇’还是好的，他们要是允许十家八家生产‘贵州醇’，就更麻烦。

这位法律的守护神在表述态度时，倒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然而，他也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知道要作出一个对“贵州醇”不利的判决，一九九四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对鄢文松说：“我佩服你干出这番事业，但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说着，眼睛里溢出了泪水。

白大华局长赴贵州调解未果后，鄢文松空前孤立。他对庭长说：“你看我孤家寡人，国家工商局，省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州市两级政府，大家都来压我。”

庭长接过来，说：“也包括我广州中级法庭对你的压力。”

十一

我曾与季克良讨论过压力。

我说：“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鄢文松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季克良说：“我也不轻松。应该说，我的压力比他大。‘茅台酒’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茅台酒厂的，也不是贵州的，而是中国的。你想，如果法庭判我败诉，‘国酒’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

季所说的压力与鄢所面临的压力，严格地说是不同的。

季的压力是“国酒”的面子。

鄢的压力则是“贵州醇”的生死存亡。除了市场外，谁对他们都没有好脸色。贵州新闻界也被打了招呼，不准替“贵州醇”说话。

在这种超常的压力下，鄢文松走了一回极端，几乎使“茅台”

不战而胜。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鄢文松得知新任省长陈士能来黔西南州视察，下榻盘江宾馆。他想请市长向陈省长汇报“贵州醇”的事。结果州里不同意安排这次汇报。他一听就火了，厂里刚好没车，他就坐了一辆三轮摩托，上门堵陈士能。非要见省长不可，不见不走。

他在会议室外，一直等到里面散会。

鄢文松是省八届人大代表，王朝文落马，陈士能奇迹般地当选新省长，他也是投了一票的。不说别的，作为人大代表，见自己选出来的省长，是情理之中的事。

他见州市领导拥着陈士能出来，便迎上去自我介绍：“陈省长，我是贵州醇酒厂厂长鄢文松。有问题想跟你汇报一下。”

州市领导都没有思想准备，又不好出来阻止，只好愣在那里看省长脸色。

省长倒大度。“好好，我们就坐在这里谈几分钟。”

大家刚一落座，鄢文松就没有任何铺垫地说了句难听的话：“陈省长，你们省里为什么和茅台一块整我‘贵州醇’？”

在外交辞令上，鄢文松显然不如季克良。不论在什么场合，季克良都能掌握说话的分寸，给别人也给自己留够余地。

这话说得省长直皱眉头，说得州市领导坐立不安，脸色大变。

这不是叫人难堪吗？大家心里暗暗叫苦，却又无可奈何。这鄢文松！

省长说：“茅台”和“贵州醇”“手心手背都是肉嘛。”

鄢文松是想找省长主持公道、论是非明白来的，听到省长这种说法，便挑着那副大嗓门说：“怎么能这么说呢！”

州长见状不妙，赶紧上来打圆场，“不谈了不谈了，吃饭吃饭。”

大家簇拥省长而去，把有一肚子话要说的鄢文松孤零零搁在那儿了。

鄢文松一怒之下，回到厂里，召集全体职工传达了中午见省长的情况。

下面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一千多职工坐着大卡车进城，把盘江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

工人们喊着口号。“还我‘贵州醇’！”“陈士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两个多小时后，里面传出话来，“厂领导班子留下来谈话，其他人回厂工作。”

围困省长这种做法，像搞文化大革命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些工人有纪律，听招呼，见好就收。临走时还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市民们满心欢喜。

鄢文松此举实在是莽撞，稍稍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同意他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对当地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企业来说，开这个先例，只会事与愿违，给社会带来负面效果，对解决眼前的矛盾极为不利。

后遗症稍后便显示出来了。

州委接到上级的指示，必须撤销鄢文松在贵州醇酒厂党内外一切职务。州常委集体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因为在兴义，谁都清楚，鄢文松是个“经济怪才”，当然也是个脾气怪得无法容忍的怪才。他正维护着黔西南州目前最大的摇钱树。把他撤职，等于砍了“贵州醇”这棵摇钱树。

鄢文松也知道后果的严重。他一个月后，给厂各驻外公司、经理部亲笔写了一个慷慨赴“死”的电传：

贵州省政府为了帮助茅台酒厂打赢官司，迫使州市两级以“三·二二事件”为罪名，将我于开庭前撤职已成定局。不管我个人发生什么事，请各公司、经理部一定要以企业利益为重，保持

稳定,正常经营,维持市场的势头,不得有任何差迟。

鄢文松把“贵州醇”看得像自己生命一样重要。“即使我完蛋了,也不能让‘贵州醇’完蛋!”他说。这份电传,看得大家热泪盈眶。

鄢文松对事业的执着,季克良讲起来也很钦佩。“但是,鄢文松处理问题缺乏冷静。”他说。

这时节,鄢文松怎么会保持正常的冷静呢?他太爱“贵州醇”了,太爱这些与他同甘共苦的职工了。

鄢文松有刚烈的一面,也有柔情的一面。

比如,他对“贵州醇”质量的控制管理,几乎到了严刑苛法的程度,谁要是玩忽职守,造成质量事故,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

有一次贴标签组的八个女工,因为赶着下班,商标贴得不合标准,被勒令全部返工。可这个班组的女工有情绪,没有按要求返工,不合格产品又被检查了出来。

鄢文松大怒。

怎么处理呢?按规章制度,这种人为造成的质量事故,责任人要开除。可事到临头又下不了手。这个班组,按理说还是个优秀班组,班组长顶尖骨干。然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难以服众。

“因为在这种问题上,我们不仅有规章制度,更有制定这些规章的基本价值观。”他对我说。

我读到了鄢文松专门为职工写的并在职工中展开了广泛讨论一篇文章:《我们的价值观》。

他写到:“在生存的前提下,由于人群的生存导致的社会生存条件,产生了人的生存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如何有意识的发挥自身生存的社会意义……逐步意识到自身生存的社会意义,这是人生观的高级表现形式。人从最初的社会生存条件具备起

产生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中得出并认识到人生意义和价值观念,导致对社会的奉献和为社会服务中寻求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产生的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意识,也就是高级的人生观。这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

他写到:“凡是以自我存在或生存好坏,作为全部生存意义的人生观,即是最原始、最落后、最无知的人生观。……由此而表现的自私、保守、落后、不求上进,造成了社会的惰性。……极端自私、损人利己、空虚、生存在社会中而排斥社会存在的起码公德,是一切社会罪恶的出发点。”

他写到:“我们认为,衡量一个人贡献大小应该从以下三个步骤来评定。第一,岗位本职工作的敬业程度、业绩。第二,创造性劳动的有无。第三,个人能力的最大发挥程度。以上三点都只能在克服个人自私自利心理,不计个人得失,将自身利益渗入集体利益之中,才能做得到。这就是我们必须树立的价值观念的全部意义。”

我们来到贵州醇酒厂的下午屯新厂区。

新厂区坐落在一片秃坡上,投资近一亿,完全靠自有资金建设。厂区对面是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的奇异景观——万峰林。山下是下午屯坝,水田如镜,波光掩映着恬静的村寨。

已是黄昏时分。“走,我领你去看个地方。”他说。

这里掩埋着鄢文松的父母,父母坟墓的旁边,陪伴着妹妹鄢文慧的墓碑。

他抚摸着妹妹的青石碑跟我说:“我只有一个妹妹,我最疼她。一九七零年插队时患肺心病,家里穷,没有条件给她治病,我就发奋学中医,发誓要治好她的病。唉,她死时才十七岁,正是青春年华的时候。要处分的那八个女工,跟我妹妹的年龄相仿。我平时都把她们当我妹妹看待。”

厂里决定,给八个女工开除留用半年,以观后效。

那天,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由鄢文松宣布处分决定。他看着台下坐着的女工,仿佛看到了还活着的妹妹,不禁热泪盈眶。他在念处分决定时,声音哽咽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在场的人,莫不潸然。

十二

一九九三年,是鄢文松和“贵州醇”背时的一年。

“三·二二事件”,“贵州醇”围困省长,令贵州舆论大哗。一般判断是,随着鄢文松落马,“贵州醇”这场官司必输无疑。然而,峰回路转。在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干预下,鄢文松保住了职务,侥幸过关。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开庭。鄢文松坐在了“贵州醇”法人代表的席位上。

这是一次轰动海内外的开庭。

这一天,注定要在中国司法史上记下一笔。

上午法庭调查,下午三点开始法庭辩论。

“贵州醇”的诉讼代理人是广东著名律师黄惠莲女士。

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黄惠莲女士。

黄女士六十三岁,印尼归侨,早年就学于法国,一九五零年归来参加祖国建设,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律师,任暨南大学副教授、广东省女政法工作者联谊会会长、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三十多年来,《人民日报》等30多家报刊对她的事迹作了报道,被同行推崇为“广东四大女律师”之一。

黄女士仔细分析案由后,认为“贵州醇”作为酒名并非侵权。置六十三岁高龄且身患心脏病的状况不顾,出任“贵州醇”诉讼

代理人。

开庭两天前,她曾对一位记者说:“我参与这场官司,既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贵州黔西南是个很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呵,我哪怕赔上这条老命,也要帮助兴义人民打赢这场官司!否则对不起黔西南二百八十万人民!”

没想到,黄惠莲这番话,竟成了她永诀人世的谶语。

黄惠莲这天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神色端庄。

法庭辩论开始。台下坐满了中外记者和社会各界人士。

黄惠莲首先发言。她在向法庭列数了“贵州醇”从产品成果到市场成果都归于贵州醇酒厂后,情绪激动地说:“遗憾的是,最近贵州茅台酒厂仿冒‘贵州醇’,冲击市场,收购仁怀县小酒厂的酒,进行‘勾兑’,加上厂名及采用与贵州醇相似包装,鱼目混珠,企图搞垮贵州醇酒厂,掠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成果和权益,掠夺贫穷山区的最大税收来源,这是兴义市全体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称为国酒厂的企业,居然会违反商业道德,做出这样很不光彩的侵权行为,实在有损国酒厂的声誉,该厂的决策者难道不感到内疚吗?”

念至此,下面还有两三百字没念完,心脏病发作,突然伏在了桌子上。

忽如其来的事故,使法庭内骚动起来。

人们冲上前,把黄惠莲抬下来时,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这是新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例律师在法庭上以身殉职!

黄惠莲法庭猝死,给这场“贵州醇”与“茅台”的官司蒙上一层浓浓的悲壮色彩。

“贵州醇”刚一出师,便折损大将,实为不祥之兆,也给鄢文松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云。在法庭上决胜负的原初想法,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法官没有因突发性事故休庭。

法官继续开庭。

鄢文松心神不宁,已无心恋战。

法官提出“法庭调解”。

双方同意调解。

休庭。

晚上,鄢文松前去黄惠莲家慰问死者家属。他心情沉痛地对黄惠莲的丈夫陈先生和泪流满面的女儿说:“黄律师是为我们黔西南自治州的经济发展和贵州醇酒厂的事业殉职的,厂里已决定永久悬挂她的遗像以志纪念,教育职工学习她的敬业精神。开追悼会时,全厂一千五百名职工将停产为黄律师默哀三分钟以表示哀悼。”

陈先生含着眼泪向鄢文松一行辞别时说:“早上出门时,她还对我说,胜诉这场官司完全有依据,想不到这一去就不回头了。现在双方都接受法庭调解,惠莲也会高兴的。”

十三

从此,贵州这场南北战争进入了一个漫长如马拉松式的调停冷战期。这个局面很像电影《停战以后》和《重庆谈判》。这边打,那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这种局面,对“贵州醇”是非常不利的。围绕在“茅台”周围的各方力量,得以从容地介入,并影响着调解的舆论倾向和进程。

一九九三年六月四日,《贵阳晚报》刊登几位站在“茅台”立

场上的记者写的长篇通讯：《知识产权必维护，事实真相白天下——“贵州醇”商标侵权案开庭审理见闻》。

文中某些不实报道引起“贵州醇”有关当事人的诉讼。之后，以《贵阳晚报》和作者荆中茅向原告各方一次性赔偿六万元、《贵阳晚报》公开见报道歉了事。

作为对“贵州醇”在《经济参考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致驰名商标组织，继《法制日报》等数家报纸之后，又在《中国质量万里行》一九九三年第七期刊登了该组织的《关于“贵州醇”侵权纠纷的调查》，招致贵州醇酒厂在北京状告驰名商标组织及《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后，驰名商标组织和《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亦反诉贵州醇酒厂。一九九四年五月开庭后，至今没有结果。

鄢文松不怕打，就怕谈。如果是打，主动权可以完全捏在他手里。兴义“贵州醇”和茅台“贵州醇”的遭遇，颇像李逵和李鬼的遭遇。他给广州经销部经理林沂发去手书电传。

“两鼠斗一穴，勇者胜！”

鄢文松在千里之外断定，“茅台”犯了个大错误，叫作：“屯兵于坚城之外，不战自溃。”

茅台“贵州醇”在各战场大作广告。鄢文松则不予理会，认为，这些广告都将会是兴义“贵州醇”的免费广告。

鄢文松说：“‘茅台’把我当齐宣王，跟我玩‘田忌赛马’。他们没想到，他们又犯了个‘以其之短，击我之长’的错误。在市场上，这种打法，怎么不吃败仗！”

季克良也对我感叹道：“现在我们的不如他（“贵州醇”）。他（“贵州醇”）早进入市场经济。茅台酒厂是计划经济管的。供销不如他（“贵州醇”）。

季克良对我说：“打打停停嘛。打完之后，还是要来谈嘛。”

如今“茅台”已经为生产、销售、贵州醇”投资近千万了！“茅

台”再财大气粗,这也不是个小数字!问题是,在兴义“贵州醇”强大的市场攻势面前,这笔投资的回报并不理想,甚至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可能把“联合”的“优势”全都丢了。

“茅台”以打促谈,希望通过谈判来达到“共同生产‘贵州醇’”,路数渐趋明朗。季克良说:“土话讲,‘听人劝,得一半’。这件事,不认真不行,太认真也不行。‘茅台’和‘贵州醇’都是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我们都是为国家办事,终归要‘和为贵’。要他不生产,我不会要求;他要我不生产,我也不答应。”

鄢文松怕在贵州省的主持下谈判,第一,不可逾越“三点意见”;第二,这些年来,他鄢文松是把贵州省的大小权贵都得罪完了的。

真是——言难尽。

原省长王 XX 的女婿由州里的秘书带着来要酒,鄢文松不给。

秘书说:“这是 XX 同志的女婿哟!”

鄢文松一听这话,火就往脑门子上冒:“XX 同志女婿怎么样!是女婿就要我拱手送他几十万呵!”

现省长的儿子拿着各级政府批的条子来要酒,鄢文松不给。

省长公子说:“不给?你们厂长是谁?”

供销科办事员曾霞给省长公子写了“鄢文松”。

省长公子把写着“鄢文松”大名的字条塞进兜里,“哼”地一声,拂袖而去。

省委书记的夫人,是省计委副主任,要把“贵州醇”列入“计划”,一年要低价收购几十吨。被鄢文松拒绝。“我‘贵州醇’永远不进哪家的计划!”他说。

县长写了条子,派人来要酒。供销科负责人说:“要请鄢厂长签个字。”鄢文松就在场,来人不认识,便狐假虎威地说:“怎么?县长的条子还要厂长批准吗?”

鄢文松轻声说：“把条子拿来我看看。”

来人不知厉害，把条子递给鄢。

鄢一把抓过来，看也不看，几把撕成碎片。摔在来人脸上，大喝：“你给我滚出去”

鄢文松敢撕县长的条子！恶名声一下子传出去了。

省轻工厅来要酒，汇了三万元到兴义，也被鄢文松给退回去了。

我觉得鄢文松似乎不太近人情，卖谁都是卖，轻工厅钱都汇来了，又不是不给钱，何必把钱退回去呢？卖了，乐得落个人情。

鄢文松说：“你不明白，我不是事实上要驳他们的面子。原来每年都要给轻工厅点酒，后来发现他们拿着我们给的低价酒到广州东山宾馆卖，冲击我们的广东市场。他们说，‘钱都汇到你的账上了’，我说，‘汇到账上也可以退！’那些人来要酒，大多数都要给钱。关键是，我‘贵州醇’在市场上有营销价格体系，这个口子一开，可能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价格体系全破坏了！所以，轻工厅说我这个人太傲慢。”

鄢文松为了“贵州醇”的利益，得罪了省长，得罪了省政府，得罪了省工商局，得罪了省轻工厅，得罪了国家工商局和商标局，得罪了由首都新闻界实力人物和各大企业组成的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得罪了州市级政府，仔细算起来，除了阎王爷和太皇大帝，几乎所有的神仙都得罪了。换了谁都不会是这样。

这个“判”，怎么“谈”法？

白大华一行人走后，这棋被他走死了。怎样才能摆脱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干涉，直接与“茅台”对话，主动把这步棋盘活？

心里烦躁得很，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无计可施。

恰好，广州法庭庭长诸葛东到厂里调解。鄢文松的眼睛突然一亮。他请诸葛东给“茅台”带个口信，就说我鄢文松愿意以

省政府三条意见为蓝本,在广州邀季克良谈判。

诸葛东将这个口信带给了季克良。

也是无计可施的季克良接到口信后,自然是“欣然接受邀请。”

十四

这又是鄢文松的“缓兵之计”。

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压力太大了。

前面说到,鄢文松被州市两级政府“押解”到贵阳签字。省轻工厅已经起草的“协议书”正等着他们呢!

到贵阳的第二天,在白大华局长的主持下,拿出了协议书。

鄢说:“我宁愿以土地换和平,让步第一第二条。但第三条不行,‘茅台’不能生产‘贵州醇’!”

白说:“你说这条,他们(茅台酒厂)不同意。我们也传达了这个意见。看来,还是要按省政府的三条意见处理。”

旁边的人都劝鄢文松:算了,尊重省里的意见。白局长这次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你不让步,僵持下去不好。

下午的州市两级领导的劝说会上,说得火起,兴义市长脱口而出:“你要晓得,你是代表政府管理企业的,政府可以任命你……”

市长还没说完下半句,便被鄢文松接过话头:“你不要说了,可以任我,也可以撤我。在你们现在还没有撤我之前,我仍然守土有责。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千八百多职工,为你们做牛做马,挣得了这份家业。你们今天把我们出卖干净了!”

市委书记说:“文松呀,你也太犟了。”

有的说：“文松同志不同意就算了。”

有的说：“我们完全可以打赢这场官司。”

明天要走了。州委书记拉鄢文松去与白局长告别。

大家的心里都不是滋味。

州委书记说：“白局长，州委州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你是明白的。但是鄢文松同志不同意，事情只能这样了。”

白局长也没好气地说：“情况我已经向省里汇报了。我也只好打道回府了。”

面对贵州这场南北战争，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陷入了两难境地。

省政府“手心手背都是肉”，把谁打重了都不行。

国家商标局给“茅台”商标续展，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意见却不一致，而贵州这边又抹不平。

州市两级政府，上面下面都挨骂，两头受够了窝囊气。

错错错！真正错在了哪里？

难难难！真正难在了哪里？

出路在哪里呢？鄢文松“万念俱灰”。

回来的路上，他终于忍不住了。他的承受能力已经顶到了极限！他失声大哭。

车上的人都沉着脸不说话。

由他诉说，由他痛哭，由他宣泄尽胸中久久的积郁和压力！

北盘江大峡谷回荡着这个兴义汉子感天动地的哭声！

听到哭声的人心里都明白，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实际是他鄢文松一个人的战争！然而，是谁导演了这场战争？

他的哭声在贵州高原孤孤地徘徊。

十五

鄢文松恢复了理智。他的判断告诉他，“缓兵之计”无论对谁都有好处。

真是巧了。赴广州谈判时，鄢文松和季克良生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

上飞机时，他们还装着互相没看见，可下飞机后，他们几乎同时走到了出港口。

唉，不是冤家不聚头。

双方开始不太自然。

鄢文松镇定了一下，大方地把手伸给对方。

“季厂长，你好。”

“你好你好。鄢厂长，希望我们这次会谈有一个好的结果。”季克良不失风度地伸出手去。

“我也希望这样。”

两个枭雄的手握在了一起。

这是他们恶斗数十年后的第一次握手。

他们互相微笑地注视着对方。那微笑背后，有着讳莫如深的意味。

这次谈判仍然没有结果。

然而，季克良在京西宾馆告诉我，他对前景持乐观态度。鄢文松也在兴义告诉我，他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可我隐约感觉到，他们所说的“乐观”不像是一回事。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于北京木樨地

报告文学新局面的诞生 ——读卢跃刚的报告文学

冯立三

一旦发现重大题材,便不遗余力、不避风险地予以周密调查以求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决不采信道听途说。直接当事人自不必说,凡相关者,无论高官细民,都在视野之中,既不先入为主,划地为牢,也不削足适履,断章取义。大儒大商可以畅述其志,荒冢墨迹亦要究其底蕴,受难者可以倾诉冤情,施虐者亦容其自辩。不可或缺而有意回避者,必千方百计逼其就范,而计划之外不期邂逅者,必备以作出新的开掘。

题材出于一时一地,但思考必定穿越时空限制,历史背景、社会矛盾、世风民情、文化积淀、人性善恶,皆附丽于问题或事件而作浑然统一的思考,以求一个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大的结论。

对事件之是非,人物之功过,所陈各方的责任,社会应取的经验与教训,乃至为政之道,抚民之方,抑恶之途,均不惮于直陈己见,有时委婉告诫,有时慷慨陈词,有时可为一家之言,有时直可视为铁案。

人物不再主要地作为取证材料而存在,呼之即来,挥之则去,而是作为一种有其历史,有其必然命运与偶然遭际,有其社会角色与个性角色的类存在物而被观照,人物因此由报告而进入文学。

对事件的介入更直接、更深入,作者成为与事件融为一体并干预和影响事件进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威风八面,结友结仇,

充分领略无冕之王的甘苦。一身而任记者、观察家、政论家、作家诸种角色。

——凡此,构成卢跃刚报告文学真实客观、言近旨远、纵横捭阖、形象生动等特点,在他的同辈作家当中显得卓然不群,足以代表一九八九年后作了自我调整的报告文学所创造的新的成绩。报告文学一度思想彷徨、艺术苍白的局面的结束,不是跃刚一人之功,但他是为结束这种局面思考最多、全力以赴、势头猛烈、成就突出的一个,当无疑义。

—

卢跃刚的报告文学,我最早看到的是他的《辛未水患》。此前我不认识跃刚,但知他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他的富于见地、视野开阔、对后来以综合问题见长的报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深度报道,多少读过一些。在《辛未水患》中他所展现的洪水滔滔、哀鸿遍野的惨烈景象,灾民誓与糊口之粮同存共亡的决绝意志,救苦救难者的英勇无畏与某些达官贵人的冷漠敷衍的强烈对比,作者本人急赴灾区,涉险犯难,与民同哭,恨无回天之力以救民于倒悬的悲怆心境,实在令我感到震惊、愤怒、感佩与感奋。跃刚对自古及今的治水之道、赈荒之策的得失之严肃负责、持之有效的评说,大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概,更使我深表钦敬。扼腕长叹,泪洒稿纸,读之者无人能不怦然心动。《辛未水患》既是辛未救灾的无虚无妄的历史实录,又是总结历史教训、综合专家意见、经由实地考察而贡献于今的新的治淮策。能够达到这种高度的报告文学,几稀矣!《辛未水患》应该引起轰动效应,但不知何故,竟被忽略了,当时不谈,今也不论,这又令我叹惋不已。历史有时真是让人莫名其妙。

最早给卢跃刚带来声望的是《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这是篇诗情浓郁、文采斐然的作品。

这篇作品能称之“史诗”，与其说是针对三峡工程，毋宁说是针对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论证过程已属历史，建设过程正在进行。前者侧重于物质，后者侧重于精神。处理三峡工程论证过程这样的题材，很容易为赞成派和反对派之间各有根据的争论所左右而难免抑此扬彼；但强论两派之是非，则为班门弄斧，适见其不自量而已。跃刚的明智是超然于两派学术之争的具体是非，而以瞻仰之态洞察其共有之心志，借论争之大要集中显示中国一批大知识分子诗一般的人格魅力与天才的智慧风采。唯有如此，才算是我们的作家为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一笔最可珍贵的精神遗产做了一件好事，否则，只是徒增混乱而已。

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坝工程，本身就是文明的产物并给此后的文明以影响。跃刚描写三峡工程应该如他所做的那样带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宏阔性。作品对推动和影响三峡工程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大争论、重要举措、国际国内形势，均有简要的评述。他将如下的历史伟人：孙中山、蒋介石、罗斯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一载入三峡史册，对世界著名大坝权威萨凡奇甚至设专节予以评说，向这位最早提出三峡大坝建设计划——“萨凡奇计划”——的美国人表示感谢。跃刚这种不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而随意涂抹历史，而是就其所知尽力表现历史真实的唯物主义态度，首先就给人以好感。

毛泽东是作品中的重要人物。离开毛泽东，或许就根本无所谓三峡工程。离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的理想主义，他的犹豫，他的英明和他的错误，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三峡故事。毛泽东留在三峡工程蓝图上的每一笔触，跃刚都极力予以捕捉，极为审慎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使跃刚可以居高临下而揽其大

要。跃刚赞美毛泽东为显示新政权的生命力和中国人的创造力而欲兴建三峡大坝的雄心伟志；赞美毛泽东求贤若渴、礼遇人才、不耻下问、知人善任；赞美毛泽东嘱托在大坝建成的祭文中不要忘记提到他的名字那样一种魂系长江的情怀……在跃刚限定的题材范围内，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当之无愧的，超出这个范围，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至于毛泽东在心情急切之时不顾及国力，或是在狂热的气氛中夸大了国力而以为不成问题，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中夸大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简拔李锐于南宁会议，旋即罢黜于庐山会议那样一种顺者昌逆者亡的专断，对“文化大革命”给社会带来的空前灾难之近乎麻木不仁，不大懂经济却又视经济为易事的莫名其妙的自信……叙述中则潜含着跃刚的微词和愤怒。

跃刚把深切的理解、敬意、民情、悲悯献给林一山、李悦、潘家铮、李伯宁这些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的楷模。这四个人物或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首立汗马功劳。选择他们作为作品主角，既可借以连续性地表现三峡工程一些最为重要的场景，又可以构成一个群落，大小适度，交相辉映，全面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智慧、才能和功绩。潘家铮创作科幻小说，构思奇特，语言瑰丽，论辩有力，其对三峡工程的炽烈情感，跃然纸上。跃刚大段大段地摘引潘家铮的小说，事半功倍，虽属讨巧，确乎聪明。林一山把全副精力献给了长江，既富于学识，又善于谋划，是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人，即使双目近乎失明，右手近乎残废，依然主持三峡工程，鞠躬尽瘁，无以过之。李伯宁为妥善安置百万移民，奔走呼号，老泪纵横，是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典型。李锐在南宁会议力挫主上之论，不期御前得彩，虽胜而无骄色，反有“碰鬼”之说，充满英雄气概，不乏政治清醒。在李锐身上，作者开掘了一种可以称为命运的东西，李锐有时把它看作性格悲剧。知识分子的

性格是由自身的高教养并自觉赶赴一种人生的高目标而形成的,故一旦形成,万难改变,因而性格也即是命运。但纵然是恃才傲物,刚直不阿,也未必构成悲剧,只有当这种性格不为社会所容,冲突激化,才形成悲剧。

作品中有一段作者与林一山的对话:

“可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决定了,你再说还有什么用呢?”

“那怎么行!仓促上马会坏大事。我看到了,为什么不说?我必须对毛主席负责,必须对周总理负责,必须对党的事业负责!”

“毛泽东再与你有什么交情,万一哪句话把他惹恼了,后果会如何呢?”

“那可顾不了许多喽!”

正是这位主上三峡工程,但反对先于三峡工程修建葛洲坝并为此不惜面折廷争的林一山,当葛洲坝工程恰如他之所料陷入困境的时候,却又慨然受命,大谋大断,挽狂澜于既倒。

进谏言于前,不怕龙颜震怒,济灾难于后,耻于隔岸观火,见识过人,是可防患于未然,事业为重,从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人格魅力、智慧风采之所在了。

南宁会议的场面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人物众多,事关重大,矛盾尖锐,祸福难料。跃刚调查周密,才气纵横,将南宁会议描写得氛围浓重,层次井然,穿插有序,跌宕起伏,各得其所。

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并任裁判的一场“智力量级相当的天才较量”。三峡工程主上派首领林一山滔滔不绝,先声夺人,反对派代表李锐以图助论,针锋相对,本已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毛泽东忽发奇想,口头辩论之后又命题作文争胜,更使这场论战柳暗花明,胜景迭出。作品这样评述林李二文:“林文纵横捭阖,材料丰富,逻辑严谨,有如长篇论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长江

流域规划’的概论。”“李文提纲挈领,观点鲜明,且行文流畅,深得毛泽东嘉许。”二者均不同凡响,堪称双璧。李锐之能略胜一筹者,“在于文中包含了‘经济’的思想,包含了‘动态’和‘综合’的方法。很有些超越政治热情的理性。”跃刚进而议论道:“这两文应该有很强的互补性。可惜,一些非常好的意见未能得到及时的利用,反而演变成怨怨不解的根源,演变为打击对方的正当判断素材。”中肯,深刻。紧密结合人物与事件,不失时机地楔入中肯、深刻的议论,以深化作品主题,是今日报告文学的一个长处,此为适例。

李锐赢了这场辩论,被毛泽东所赏识,平步青云,倘受宠若惊,也就不是李锐了。李锐反而陡生忧患,说这是“自投罗网”,而身不由己,宦海浮沉而时感彷徨,这该是不少知识分子共有心境的一种写照吧!

幸而毛泽东不仅将修建三峡工程当作自己的梦想,而且对其利弊、风险多有斟酌;幸而毛泽东于紧要关头首肯了李锐的意见。否则,三峡工程或可仓促上马于当时,必会夭折于困难时期,万难度过十年浩劫。(作品对林一山与李锐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入狱有细致的刻画。“长江王”置诸牢中,何人能代他主持长江大政而称其职?李锐置诸牢中,反对派的忠告将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由于反对派敢于坚持己见,执政者有容人的雅量而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灾难的成功范例!计不必己出,择善而从可矣,位至高而权至重,又计必己出,事必独断,若想没有失误,难矣。

跃刚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可能很复杂,期望获得的效果,可能有诸多方面,但其中心却是治国理事须有科学态度和民主一个有机的构成了。然而,他并没有到此为止。讲清楚七十三年论证的细枝末节已属不易,进而提炼出“民主”与“科学”的主题,充分展现中国人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命运,并赋予命运

以苍凉、悲怆的性质，层层递进，构筑了全篇。跃刚这篇作品中所揭示的“命运”的性质给人印象深刻。无论是伟人还是天才，他们在亘古奔腾的长江面前，在巍峨挺拔的三峡面前，只能是匆匆过客；由于生命的短暂，由于认知的缺乏，他们在命运面前多少都表现出了无可奈何的局限，给三峡史诗蒙上了一层浓郁的宿命色彩。

三峡工程终于上马。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主上派的胜利，反对派的失败。跃刚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既是主上派一贯坚持的结果，也是反对派积极反对的结果。当主上派完全吸收了反对派的智慧之后，上马才有可能。跃刚的这种见识充满了辩证法，与那种喜欢争论又不善于争论，一有争论便走极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与时髦，大相径庭。

跃刚对林、李二公见解不同却彼此仰慕，心怀敬意，以为极见风度，而对将学术观点间的争论，科学探索中的分歧，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这种反科学、反民主的恶劣行径，深表不满，以为心术不正。林、李二公过去曾有介蒂，至今也有距离，亦是身受其害者。往事如烟，前路尚远，当年彼此之讽刺攻讦，已不值得挂怀。相逢一笑，握手言欢，既可颐养天年，又可垂范于后，岂不圆满！

二

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是篇檄文式的报告文学，称之为民主对于权势的起诉书不为过誉。这样说，还不能完全概括这篇报告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篇报告文学实际上已把对于一起骇人听闻的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的揭露，同时变成了对一个地区政情、民情、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剖析，使人物的命运变成一种必然的存在，使

作者针对性极强的评判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涵盖力的认识。它同时还是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一次集中的、涉猎广泛的发言。

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被非法拘禁一案,非有过人的胆识不敢触及,因为一旦揭露,便是一幅不尽完整但要素皆备的“文化大革命”景象;这景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倒也司空见惯,但是在今天,却倍觉阴暗与恐怖了。

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人大会议上递交“罢免市长案”,是他的合法权利。因此而被罗织罪名,非法拘禁,秘密关押,刑讯逼供,百般凌辱,待遇不及犯人,剥夺人身自由七个月之久,因此而钳制舆论混淆是非,株连无辜,逼取伪证。人大、政协、公安、司法、市委,一切称得上是国家机器的东西,唯一人之命是从,蒙冤者哭诉无门,迫害者反倒手续齐全。到了非处理不可的时候,又不过是将主要责任者赵伯栋由市长平调为地区公安处长,且于平调之际赠送“有贡献的中青年干部”称号以示抚慰,颜跃明则到处去讨“说法”而毫无结果……宁屈民而不屈官!真是匪夷所思。

这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阴暗而恐怖的情景。这使人想起那些有识之士关于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卷土重来的警告,关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应该大体同步前进的提示。

跃刚创作这部作品,也是着眼于政治改革的。他有这样的议论:

没有比讨论‘权大还是法大’更荒谬的事情了。因为现有司法体制,恰恰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制体系外,又有了一套更强有力的体系来管理之,笼罩之。”

“独立审判、独立检察、独立侦察,到底有多大的独立性呢?没有独立性,或者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何谈法制?何谈公平?何谈公正?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何谈保障?”

“权力的交易成为可能。”

“政治体制与新闻体制是一体化的。所谓舆论监督,所谓客观报道,与所谓司法独立一样,都是绝难做到的事情。”

这是跃刚对娄底事件的一个理论性总结,但不限于此。总结于实践,落笔于大处,简洁,明快。中国正在探索权力制衡的途径,一时尚无眉目。是否发生娄底那样的事件,全取决于主要领导人是否英明。性质上如娄底但程度上没有那样严重的事情,其实是必然要经常发生的。娄底的问题,正为跃刚所说,是“太过分”了。过分的事情也有个好处,就是矛盾暴露得清楚,使人再不能无动于衷。寄希望于制衡机制,远水难解近渴,无可奈何,还要尊重老祖宗“治国即治吏”的遗训,强调为政清明,使贤者在其位,能者谋其职。如娄底之赵市长,心胸狭隘,颐指气使,压制民主,草菅人命,罢之不足惜。罢一官而万民安,何乐而不为!唯有贤者在其位,也才可以指望制度被尊重,社会由人治而渐至法制。

作品曾写到地检分院副检察长、颜跃明案专案组长刘松平。他懂科学,也懂法律,所缺的是检察官的职业道德。作者指责他“纵容”公安人员对颜跃明刑讯逼供。他说“纵容”一词言之过重。作者说,改成“默许”如何?他说,他不好否定这个词。这段对话妙趣横生。一方是冷峻的幽默,一方是严肃的滑稽。“纵容”与“默许”真有值得计较的差别吗?真实的罪状加诸己,苦心孤诣淡化之,虚假的罪名加于人,残酷无情锻炼之!检察官有些一辩,跃刚有些细笔,我们对这位执法者的认识就更加全面了。

文中也描写了作者对赵伯栋的采访。赵市长说的“不是他打击报复了颜跃明,而是颜跃明打击报复了他”,“我也有责任,自己培养的典型嘛”,耐人寻味。这不像是有意诡辩,而更像一种逻辑的套用。他是牧民者,颜跃明是被牧的民。牧的责任是管理,民的义务是贡献。牧有过错,可以自省,民不必置喙,若起

而纠正之,则是犯上则应惩处,即使曾经有功,亦毫不宽待,即使使用阴谋诡计,也不必不安。大而治国,小而治县,很多有奉行这种逻辑。以现代民主观念论,这种逻辑已有所不同。可惜赵市长不懂,故视民主为报复,抒报复当管教,时至今日,还振振有辞。跃刚没有当面驳斥,这是顾全采访礼貌。一连四个小时,杯中有水,渴而不饮,也足见其内心之不满了。

省调查组是敷衍塞责的典型,与跃刚的调查有天壤之别。跃刚是为了解决问题去调查的,调查是兼顾双方,重要人物一无遗漏的,是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重大关节、重要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的,是乐于公布其调查结果并希望得到社会指正的。这个调查组则不然,行动诡秘,派头十足,只见官员,不见百姓,名为调查,实为偏袒。作品曾经描写过调查组把受害人拒之门外的冷酷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慄。旧时尚可拦轿呼冤,如今反倒陈情无处,娄底百姓诚然可怜。如此调查,其结果便是跃刚所说:姑息者被姑息。如此姑息下去,总有不可收拾的一天!跃刚揭示出这个教训,是对娄底市、娄底地区、湖南整顿吏治的一个贡献。

跃刚反对极端的、整人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他希望社会通过加强教育,提高人的文明水平,为自身创造一个日渐充分、日渐强大的监督吏制、监督法制的人文环境。这是跃刚的一贯思想,娄底事件给了他新的刺激。于是他驻足凝视娄底师专的地牢,徘徊沉吟于娄底先贤执教与葬身之所。报告文学应当尽量广泛地纳进作家对社会的思考,但必须像跃刚这样义在题中,才觉自然。

娄底可以有自己的监狱,但在师范专科学校建造水牢就有点费解了。地上书声朗朗,地下囚徒呻吟,不是太不和谐了吗?铁门石壁,阴暗潮湿,不见天日,插翅难逃。过去可能是备而未用,颜跃明一案审理中,被派上用场。未闻真正罪犯的哭号,先见无辜者的血泪。这座地牢,究竟体现着娄底什么样的惩罚原

则和教育方向呢？

跃刚以沉郁的文笔描写了娄底另一座学校，与陶行之先生齐名的伟大教育家罗辘重先生创建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陶龛学校。彪炳陶龛学校校训的“血性”二字，矗立在学校三层楼顶，但那本色、老实、光明、正大、刻苦、负责、见义恐后、见利恐先、富于牺牲精神、百折不挠等精神内涵，几十年来，却随着罗辘重先生的沉塘而死，烟消云散了。而愚昧、狭隘、残忍、野蛮、虚伪、阴谋诡计、恐惧、神经过敏，却笼罩娄底。说娄底辜负了娄底的大好河山，辜负了以心血和生命播种文化的娄底先贤，不算苛责。血性！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字眼！一种鼓舞人、激励人提升灵魂的精神！当这种精神重新主宰娄底的时候，娄底将出现新的政治景观，新的经济景观，新的文化景观。跃刚在娄底的土地上缅怀娄底的先贤，召唤血性精神，证明他对娄底是真正负责的，真正有感情的。他对娄底所进行的批判，完全是为了帮助娄底人民开辟一个光明的前途。

教育是包括颜跃明在内的。在态度明朗地划清颜跃明案谁是谁非并对颜跃明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作了充分肯定之后，作者开始就颜跃明的思想、认识、性格、追求提出了告诫了。既疗可见的创伤，又治难见的心疾，跃刚所为，非一般报告文学家所可比的。

告诫之一：“改革者”不是一种价值尺度，价值尺度是法律、道德、公众情感。不能把围绕自己发生的一切冲突一概简单地看成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跃刚的这种提法很值得重视。可以补充的是，“改革者”是个只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范围之内才有必要存在和予以强调的概念，不是永久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旦被认定便可终生享有的称号，那要视其变化而定。

告诫之二：自身应该反省。改革的政绩，不能转化为特权，一旦转化为特权，改革者将走向反面。对自身杂糅着一种理想

主义、狂热与不稳定性的性格可能带来的悲剧命运,应该有所警觉。这里应指出的是,跃刚最早提出改革者应该反省这个观念的人,时在一九八八年,当年他写了《“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一文,时机不好,没有寄出,后发表于《环球企业家》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告诫之三:对自己活动的领域应该有所限定,如望在经营企业方面有所成就,就不必过分热衷于政治,不要把自己所获得的一点社会荣誉当成自己可以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

这些告诫不仅是针对颜跃明的,其他人也可从中获益。一篇报告文学收束于临别赠言,既尽了公职,又尽了友情,又呼应了娄底车站颜跃明摇动伤残之手迎接作者的开篇,结构之妙,有如小说。

三

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暂不触动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有利有弊。利在全部国家机器可以利用,社会虽处改革之中而仍较稳定。弊在改革举措易被掣肘,离开社会最高权威的推动,改革便有停顿、倒退的危险。这样的改革设计,势必会造成改革的行进与改革的困境并存,深化改革与治理整顿交替,矛盾变得错综复杂,生活变得光怪陆离这样的局面。有些报告文学家显得无所措手足了,卢跃刚却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

我指的是他的报告文学新作:《春天里的神话》。粗粗一看,这是在表现刚刚成为过去的中原商战,细加揣摩,却发现其意是在借以折射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一个人们常常以悲观的眼光加以观照的历史阶段。

即令是一个悲观的阶段,生活也在前进。

亚细亚商场,这个在封闭、落后的中原地区从未见过的一个“四不像”的经济实体,在郑州诞生了!

亚细亚被跃刚的诗意的笔墨描写为朝气蓬勃、光彩照人、向着未来跳跃着奔跑的美丽的少女!

被跃刚比喻为激活满舱银鱼的鲑鱼,比喻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对于亚细亚,“商城”、“华联”单独较量,均失利,联合“郑百”、“紫百”、“商厦”分进合围,仍败北。此一战,把旧体制的弊端,新体制的优势,揭示得十分清晰。

跃刚对亚细亚精心于商业文化建设的描写特别给人启发。他在作品中对最早提出商业文化这一概念的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对最早物化这一概念,催发了亚细亚现象的恩波公关所所长王力,表示了应有的敬意。仰仗传统优势,依赖政策优惠,只可奏效于一时,建构现代企业制度,树立企业文化形象,将现代物质文明建设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溶于一炉,才能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亚细亚之前,可有谁想到:一座商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让儿童流连忘返的童话世界吗?升旗、操练、朗诵、表演,不但可以招徕顾客,还是培养企业团队意识的一种有效方式吗?照顾孩子就是照顾母亲就是照顾顾客,就是不但赢得现在的顾客还是在争取未来的顾客,就是在传播一种文明风尚吗?负责赡养“二七”老人,不仅可以打破对革命传统的垄断,也体现着一种社会互助精神,一种力求统一政治思想教育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努力吗?当这些重在体现文明、人道、平等、民主的企业文化精神与重在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健全的制度、科学的管理、强硬的纪律、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经得起竞争考验的。晋野、王遂舟们在改革处于低潮的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间,把亚细亚办成了这样一个新型企业,应当受到激赏!

居于旧体制、“主渠道”之中的“商城”、“华联”、“郑百”、“紫百”、“商厦”便相形见绌了。这不是指他们的规模、设备、资金和人才,那是毫不逊色甚至更占优势的。是指他们受限并陶醉于旧体制,在应该弃旧图新的时候仍然抱残守缺。是指他们即便意识到应当通过改革以增强自身的活力,也因为缺乏用人权、分配权、奖惩权、独立经营权而徒发浩叹。经济学家胡平有句名言:“计划经济是一片苦海。”沉浮于这片苦海中的人,苦不堪言。作品中商业大厦总经理王振华有这样一段话:“开会可热闹了,互相争执得很厉害,你说一句,我顶一句。一个办公室办公,互相见面黑着脸,不说话。这都是什么事儿!这哪叫办企业,这是在办收容所!”王振华可以大光其火,但不能改变这种收容所状态。市长、市委书记们一讲平衡,三顾私情,要办收容所,你敢指其意?商城总经理李自强处置十位副手的办法是“虚设”和“架空”,但这样做,短时间可以,长了岂不也会闹事!

跃刚的深刻之处不在于看出国营企业管理者的无权之苦,而在于揭示这无权之苦是企业输入官本位评价体系必付之代价。级别、待遇属于政府论功行赏。既承受功赏,自应言听计从。像王振华那样词锋犀利地顶撞组织部门,已属难得。国营企业输入官本位,有助于维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干部的心态平衡,曾经是必要的,但在今天,却构成束缚,并对新体制下的企业家形成歧视。跃刚反诘得很有道理:如果销售额超过两个亿便可以享受司局级待遇,那亚细亚的王遂舟为何不能援以为例?郑州国营巨头们压根看不起王遂舟,说穿了,就是这个级别、待遇作祟。不是开罪于上司自己失权失势,就是贻误事业自己苟延残喘,国营企业管理干部这种两难处境,不是短时间可以摆脱的。

这使他们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商城”、“华联”、“郑百”、“紫百”、“商厦”五巨头结成同盟扼制亚细亚。围剿中他们发出

了一个函件：《郑州市大型国营商业零售业总经理联谊会致各友好单位函》。对此，跃刚批判道：“这是彻头彻尾的行业垄断，标准准的不正当竞争！要把亚细亚扼杀在稚嫩中，行文中充斥着要挟和恐吓的语气，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探索中一个非常恶劣的范例。”既是两难处境中的无奈之举，也是他们把国营当作一个特点、一种优势、一种独占力量、一种贵族血统、一种道德载体加以自矜、加以炫耀这种一贯的观念上的错误导致的行动上的错误。他们把市场竞争的本质和目标完全颠倒了！

然而，对于郑州国营五巨头，作者并非只有批评。作者对他们昔日的汗马功劳，今天的巨大贡献，他们的才能和人品，有充分的评价。李自强的勤勉、谨严、克己奉公、宽以待人的作风被跃刚描写得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张淑云冒死远行西藏、泪洒高原的情景被跃刚渲染得极具悲壮之美。几十年来一贯单纯地扮演革命力的角色，忽然之间，变得重负依然在肩，同时却又成了被改造的人物，他们感到矛盾、屈辱、痛苦、彷徨、愤慨，是可以理解的。否定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体制，是痛苦的，调整已与旧体制成为表里的思维方式，则是艰难的。他们有优秀的素质，复杂的现实与历史，使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应该如跃刚这样给他们留有足够的余地。当他们最终超越了旧的体制和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他们一定会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强大的社会力量。

但是，河南省体改委向中原不动产总公司夺权的错误，却难以被谅解。没有什么事件能比这次夺权更能反映现行政治体制与新生经济体制的冲突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了。借口很堂皇：帮助中原不动产完成股份制改造。行动很蛮横：强行注销其生存权，强行改变产权关系，性质很严重：政府部门非法吞并一家股份合作企业。

体改委不是为了加强对改革的理论、政策、方法、步骤的研

究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综合研究性质的机构吗？不是被称作改革的参谋部、智囊团的吗？认真总结中原房地产的经验才是职责所系，怎么反倒前去挥舞板斧呢？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府系统对于新体制的探索，所持态度至关重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应该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环境。政治形势一旦不利于改革，政府系统中的某些机构、某些人物便会乘机发难。

明目张胆的清算已不大可能，常见的将是偷梁换柱。以新体制的外观延续旧体制，或使新体制潜移默化向旧体制复归的现象，值得注意。

未必都是思维方式问题，有的属于超越社会强行进行利益再分配，属于滋事以攫取改革成果。例如那位体改委负责人被法外施恩，许以夺权之后出任党委书记，进入董事会即是。“兵不血刃”而使他人创造尽成“囊中之物”。一面凭靠旧体制的权势，一面染指新体制的福利，这是新旧体制交错时期必会出现的人物。可惜跃刚对体改委主任的心思和谋划，只能知其大概，否则，在跃刚的人物画廊中有可能增加一位典型人物。

改革作为一股历史潮流已不可能作全局性后退，但一时失利一地溃改的局面将有可能出现，新体制的探索者应有经受风浪的准备。面对政府文件与接管大员，曹殿宣义正词严捍卫自己的法人地位，造成当代英雄以法抗命的悲壮一幕，令人喝彩。那危难关头夜夜聚首，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场面，也被跃刚描写得氛围浓重。我曾经担心王遂舟迭经征战而赢得的英名为“联吴抗曹”式的计谋所玷污，后来释然于怀；跃刚行文善为跌宕，携手创业共度时艰的友情因此倍觉感人。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能使用杀手锏，但诉诸舆论，何时都不为过。舆论非一己之私见，乃社会之公论，如跃刚之报告文学，一旦调动，足振声

威,还有孤立无援之感吗?

中原商战,经济学家肖灼基以“两种体制的战争”概括之,十分深刻,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公关学家王力以“中原商战是河南人的今天与河南人的昨天打,是河南人的明天,河南人的今天打”概括之,同样深刻,这是历史哲学的角度。

但什么样的“昨天”才是应该与之作战的呢?有人以为是迄今为止的整个的历史和整个的传统文化。跃刚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上承“五四”偏颇,而在1949年后得到国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保证,并与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激进的工业化进程相匹配,所形成的西方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与苏联体制的一统天下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潮的沿袭。正是这种思潮,在社会道德鼓励的范围内,在教育的体系中,将传统完全排除出去,而使中国与世隔绝。跃刚断然写道:“阻碍国家现代化进程,束缚中国人聪明智慧的,不是愁思缕缕、魂牵梦绕的历史,不是一锹土一锹土培育起来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情词激越,掷地有声,有的放矢,振聋发聩。验之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学习西方,而在精神道德上固守东方,因此而崛起,创造了一种被称之为“亚洲之道”的社会发展新模式,更觉跃刚之论言之有理了。

当然,历史是可以分析的,是经扬弃方可服务于今乃至服务于未来的,而不是一切既有的传统,例如官本位,例如以共性排斥个性,以群体排斥个体,以道德排斥自我,以传统排斥创新,例如巩固政权的自觉超过创造历史的自觉的原样继承,那也没有今天,更无未来。例如“亚洲之道”之重家族观念、权威观念、决策者意见一致、个人与集体和谐,便与封建时代迥然有别,它因基于本土文化同时又渗透着现代民主意识而成为现代社会秩序中一种更富人情味、更富纪律性、更富社会义务感、更富效率的方式。

这也是跃刚的意思,这里只是把意思表述得更清楚一些。跃刚在他的作品的结尾部分,描写了他于风雪黄昏中与宋史专家周宝珠教授一起神游于宋代东京的情景,那是举例证明他心目中的传统和中华文明其意所在的一段漂亮的文字。似乎是,古开封之所成,今郑州未必尽成,古开封之所未成,亦今郑州之所未成;这就不仅是凭吊和感伤,也存有激励了。跃刚关于“以往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可能完全错了,或者说‘农耕文明’难以简单概括中国文明”,“重农轻商,这实际上只反映了统治者的一种治国态度,并不能妨碍民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的看法,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研讨。

小说可能会部分地走上非意识形态化、非典型化、非模式化的道路。这将使报告文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善于捕捉重大事件并有足够的学识和思辨能力予以综合解剖,以漂亮的文学语言予以描写的跃刚的报告文学,更可寄予厚望。迄今所成,想必只是一个宏大计划的开端。

称卢跃刚的报告文学为报告文学新局面的诞生,是因为此前新时期报告文学业已经历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及《中年颂》、黄宗英的《大雁情》及《小木屋》、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为代表。拨乱反正、大呼猛进、反映现实人生、总结历史教训、呼唤改革,义勇和文采,形象与议论,相辅相成,发一代之雄声。第二个阶段可以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及《自由备忘录》、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赵渝的《中国的要害》及《强国梦》、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及《性别悲剧》、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及《世界大串连》、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及《沙净天》等为代表。这标志着问题综合报告文学样式渐趋成熟。此时期报告文学虽不乏歌颂社会新气象和英雄人物为主的报告,但规模及影响均不及问题综合报告文学,这是中国改革拉开序幕之后有所深入,社会矛盾日

益暴露并急需解决在文学上的反应,是历史将有更大变动的一种征兆。这批报告文学中的思想、艺术更敏锐者,已有矫正问题归类、举例说明、结构松散、多靠主题统一素材的自觉追求。在此时期末期,报告文学评论家曾明确提出报告文学应沿着三个方向——英雄报告、问题报告、历史报告——齐头并进的告诫。第三个阶段,即最近四五年,这一阶段报告文学可以卢跃刚、邓贤、李鸣生、杨兆兴、麦天枢、张建伟、马役军、解思忠、黄传会、夏萍等为代表。卢跃刚是其主要代表。这一阶段是报告文学同时并重英雄报告、问题报告、历史报告而均有重要作品问世的时期。它的社会启动力量是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春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出现第二次浪潮。报告文学的整体布局更为合理了,对生活的反映及辐射面更为广阔了,自我保护机制因其对社会观念、文学观念、艺术手法、文学语言、介入社会矛盾的角度作了必要的、适当的调整而更加健全了。英雄报告类有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杨兆兴的《沙坡头·世界奇迹》,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夏萍的《李嘉诚传》等。问题报告类有卢跃刚的《辛未水患》、《以人民的名义》、《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解思忠的《盛世危言》,黄传会的《托起明天的太阳》(虽然它把地处穷乡僻壤、待遇菲薄但眷恋孩子、忠诚教育事业的教师写得精神崇高,令人肃然起敬)等。历史报告类有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这两部作品均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在中西文化的最初冲撞的文化视野内,重新审视历史,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貌,尤其是对“天朝心态”、“天朝文化”的保守性、落后性、悲剧性、荒诞性有入木三分的剖析,读来振聋发聩,惊世骇俗。

当前的报告文学似有以下发展趋势:

人民性即民主性趋于作深刻化的渗透与表现。肤浅的、一

时的、哗众取宠的尖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招致无谓的麻烦,而真正深刻的人民性必会带来深邃的历史意蕴并激发卓越的艺术表现。

事件解剖将重于问题综合。事件解剖将是全方位的,包括事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例如旧体制与新体制的纠缠、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与新的时代气氛的摩擦,利益再分配所引起的兴奋、希望、愤怒与不平,个性间的区别、矛盾和冲突,总之,事件解剖是在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中完成的。

作者将越来越成为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不只是串连事件、勾连情节的中介物,而是事件的本质性的参与者,甚至是问题的重要解决者。社会考察家、社会批评家、作家、记者诸种社会职责将集于一身。捕捉社会重大事件、义无反顾地介入其事、极其周密地调查研究、看看公理胜于发散个人情绪、综合人类已有的客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一家之言,将构成当今之报告文学家的基本人格、基本文格、基本风范。

将逐步乃至彻底摆脱简单的通讯语言,将根本抛弃包括合乎逻辑的推理在内的一切虚构,将逐步形成一种决然有别于其他新闻样式、文学样式的独立的文风,叙事、描写、联想、评论、作者与报道对象,将相互映衬,浑然而成一体。报告文学毕竟因其具有某种新闻性而难于细加打磨,但修养到家,造诣深厚,虽急就而仍可有相当高的结构能力和语言水平。报告文学在语言上大多不敢恭维的局面可能一去不复返。

若论新时期报告文学大体的发展轨迹,似可作这样的勾勒:在第一阶段,是既有暴露,也有歌颂,既有反思,也有呼唤,虽然不能说无懈可击,终究酝酿既久,且行文严谨,经得起时间检验,今日再读,仍觉感奋不已,奠基之功,不可埋没。第二阶段重在揭露社会矛盾,这既是普遍的社会情绪的一种宣汇,也是改革开放题材应有之义,作家也有选择参与生活的角度的自由。惜乎

对生活的复杂性有某种简约化的倾向,对生活的辩证法有尚未悟透之处,多少带有难于完全经得起生活检验的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所提名家,后来各有所求。这里谈的是文学,不是政治,为示公正,该提的还要提,不好因人废言,以今废昔。新近一段,报告文学家对生活的无序状态和复杂有了更为深透的了解,深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去观察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很可能会产生不尽相同、根本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因而他们虽有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学术性的、道德性的或明显或隐蔽的倾向性,终究不愿作断然的、不留余地的理性评定和终极判断,而宁肯倾向于作客观的描述,无论是前景性的还是背景性的,宁可提出问题供社会做解决问题的参照系,以防偏颇。生活不再单纯,而是日趋复杂。密切联系于现实社会的报告文学有此演变,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也是报告文学家更深入地参与生活的一种艺术追求。将周详的调查与少有偏颇的议论统一在一起,决非易事。

抢占公理的制高点,坚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这是跃刚的为入之道,也是跃刚的为文之道。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家,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以为。

卢跃刚速写

吴 滨

卢跃刚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身子挺得很直,他在说话。他的身体姿态表明他从心灵到肉体都处在一种激动不安之中。他平时有板有眼字斟句酌的语言表达习惯被一连串断断续续的描绘、叙述、分析和推理所取代。我意识到有一种东西在他心中涌动,他浑身都浸透在一种表达的冲动之中。我直觉到有一篇沉甸甸的东西即将渐渐从他的脑中凸现。我在理解他的同时也在隐隐替他担忧——在这种亢奋状态下进入写作,那文章将会“愤怒”成什么样?

这是一九九三年他刚从湖南娄底采访归来时的情景。

我和卢跃刚相识相知相交,从一个最严格的字词意义上讲,确实属于“文字缘”。我是先见了他的文,然后才识了他的人。一九八六年,我在一本文学杂志当编辑。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读到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手稿。作者的名字自然是极其陌生,但展读之下我却发现它文字精到,中间充满了一种极难进入文本的蛮荒山野的粗砺之气。小说过了些日子在刊物发表了,而我和他却由此开始相交并通过几次交谈把人和人之间有时几十年都无法逾越的一段距离迅速消灭了。

那时我们倒不是经常见面。但是只要我和他一碰面,总是被一些似乎不着边际的问题、话题所缠绕。从艺术到历史、从时局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从抽象的哲学命题到时髦的各种热门话题,范围似乎无所不包,但我们的对话方式却神奇地飘行于

所有“实用”的可能之外。那时,我们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讨论和环顾世界时难免有一种盲目的俯瞰姿态。但重要的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思考者的形象——他在读书、思考、不遗余力并且沉溺其中。有的朋友嘲讽我和他,说一听我们俩在一起侃就累!累得喘不过气来!旁听者如此,可见我们谈话的内容之不着边际、书生气和飘忽不定。可他却乐此不疲。那时我常想,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朋友愿意和你一夜一夜地乱侃“废话”,也许证明或仅仅证明了这世界上不仅仅只有我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卢跃刚是一个出色的记者,这一点有文为凭。但我却和他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夜里枯坐几个小时交谈小说的技术技巧观念语言等等,而当时围绕着我们的气氛却异乎寻常,充满了新闻记者应予关注的东西。他充耳不闻,安坐不动,兴致勃勃地同我讨论。那是一九八九年夏天的事情了。从那天起,我认定在内心深处跃刚趋奔世术的冲动要大于他的记者职业冲动。

卢跃刚在写他的报告文学。我想这是他现在将上述两种冲动强行扭合到一起的合理结果。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某种对自己的不满情绪。在报告文学作品中他同样没有忘怀于对文字本身意味、力量、可把玩性等等的迷恋。这种迷恋从严格意义上说绝对属于小说家而不属于记者或报告文学家。区别在于,前者有时可以把对语言的玩味、追问当作目的本身,而后者却仅仅把它当作工具。一个工匠对其工具的加倍在意无论如何也只是为了让其在使用时更顺手,更有效而已。而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更接近于一个诗人,他毕生都将致力于对语言的构成方式、讲述方式、行进于时间之中并消散和永恒于时间之中的存在方式的不断追寻之中。从卢跃刚身上,我能感觉到这种潜在的东西像泉水流动于地下一样真实存在。

所有认识跃刚的人都能很快感受到他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

“热情”。他常常像一个孩子一样被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甚至某一组数据激动起来。“不可思议”、“极其可怕”、“耸人听闻”、“无与伦比”、“非同小可”……这一类词汇被他在日常对话中高频度地使用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了他关注的事情和问题的高、精、尖、新、难,说明了进入他视野的事物的信息强度和他整合这一类事物信息的能力;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许多事物的极致化意义与他热情奔放的认识观察乃至阐释方式有直接的关系,这常常造成了他能见人之所常见而能言人之所未言。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跃刚也有沮丧的时候,这在他十分罕见但绝对有。有一天,已是很晚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声调十分低沉地诉说他的苦恼。晚上接近十一点的时候,我和他约见子国际饭店。我和另一个朋友站在饭店华丽的大厅里望着他一步步走进来。他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我们在咖啡厅里坐下来,他开始说起工作上的繁忙等等。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工作狂,他能在一天之内,从石景山到通县在上百公里的范围内连兜几个圈子并在晚上和朋友们对坐时仍然神采飞扬。工作上的忙我相信不是问题的要害。慢慢地,他说出了真相。我被他说出的事情搞得哭笑不得——他是被他儿子学校的老师给制住了。儿子正在读小学,正是男孩子睁开眼睛看世界和以逐渐成熟的身心感受世界的时候,难免在学校里搞出各种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故事来。但一旦发生了什么,这个学校的老师有一个一般讲是毫不过分的办法,就是把家长传唤到学校去谈话。而儿子闹出故事来的时候又太多太频繁,于是卢跃刚便频频被“传唤”了。如果碰上一个无所事事的爹,这种传唤也许本来也无所谓,如果老师恰好是个漂亮女郎便由此生出一个影视中常常出现的悲喜情节也未可知。可是偏偏碰上了大忙人卢跃刚,他的时间常常是以分钟来计算的。而偏偏他而对的又不是什么妙龄女老师,对起话来又偏偏毫无共同

语言可言。三天两头的传唤,终于使卢跃刚像一个在拳击台中连连中拳的拳手,他开始摇晃了,也许很快就要倒下了。他满脸的沮丧疲惫,一筹莫展。这是我很少看到的他表示“服了”的样子。

当然,一切都得照样,地球在转,人仍在喘气、活着,增加着自己的年龄。跃刚在和自己朋友吃过那顿夜宵后仍得连夜赶回家去,工作、写作、打电话……也许包括第二天下午再次到学校里“受训”。——也许真的,命该如此!让我说,谁让你干上了这一行!谁让你那么心高气傲不肯俯就交谈对象!谁让你当爹!

跃刚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气势恢宏、论辩精辟、资料占有翔实见长。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乃是作品中闪现着的作者本人的热情澎湃的形象最有力量。无论是写水灾、写长江三峡的论争、写娄底的绑架人民代表案,到处都可看见作者本人清晰明快的一个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形象,这差不多就是跃刚他本人的自画像,离他本人相去不远。

跃刚和我同年,从他的名字大概可以想见他出生的年月,一九五八年,属狗。这一年是个好年头。我周围有好多朋友都是这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写东西的也很有几个出了大名。像北京的王朔、四川的廖胡子等,我相信跃刚的实力,也相信这一群“狗”总能各自以自己的吠叫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健康和出乎意料。

跃刚做过插队知青,眼见过死亡的贫困。他做过勘探队员,漫山遍野地去寻找有用的矿藏。他和我们一样,经过了最危险的一段时光,又有幸赶上了我国正在经历的有史以来最深刻和猛烈的巨变(关于这种变革,我曾和他在几年前有过一次争论,现在想来,他的某些狂想式的预测似乎正在一点一滴地成为现实)。我想现在正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黄金时代。从苦难中擦了个边儿走出来,我们绝对曾经置身于其中,了解它的狰狞

嘴脸,但我们在未被它压弯了身子碾碎了灵魂之前便有幸走入了另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可以相对从容的状态。世界范围内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深刻变化的现状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我们的阅读和我们的经验,而我们时当盛年。我想,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是幸运的年代,而充满可能性的生命才是完美的生命。我们没有理由不赞赏跃刚的状态并尽力加入之。我指的状态是他的热情、他的愤怒、他的沉思以及他正面地绝不回避的与世界的交谈方式。

跃刚曾几次向我描述,他做知青时带领一群知青男女挖坟造地,有个女知青的奇怪的猝死。在那时候,为了“为粮为纲”,挖几片坟地掘了谁家的祖坟那是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但那个恰在此时被石头压死的女孩子(她正在开花的年龄,出事之后,跃刚背着她奔向公社卫生院一类的急救地点,女孩子在他身上渐渐变凉、变沉),却给跃刚带来莫名的恐惧。这不是对子死亡的恐惧,而是来自于死亡背景上,来自于那些坟墓中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我想,如今他在讲述这件往事时仍然心怀惊惧,甚至更加惊惧。我不知道一个不知恐惧的人将如何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恐惧和抗拒恐惧才会使一个男人的生命变得沉重、有分量。而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才会使一个男人的生命变得沉重、有分量。而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当是人类最本原的素质之一。宗教、生命科学、外层空间科学等等一系列固定了我们人类的面容和表情的东西大概源出于此。心怀恐惧的卢跃刚也许恰在此时与人类中特殊的一类“思想者和创造者”,找到了一条可能融合在一起的道路。由此,他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作家思考时空。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在创造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也许与光荣无缘、与不朽无缘,但它将不可或缺、不容替代,在将来的美丽世界中它会凸现它重要的意义,而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作品将

出面作证！我相信跃刚的报告文学作品将是最好的证据这一。

我很快读到了《当代》上发出的卢跃刚的那篇《以人民的名义》，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种担心使我在读它时充满了审视的心理。在夏秋之交的一个夜晚我在灯下展读这篇东西。虽然我曾从他的口中大略了解到那篇东西描述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审视使我充满了挑剔。但渐渐地，我被他的文字所吸引，我进入了他的文本，它使我渐渐激动起来。一个普通公民（也许并不普通）的遭遇使我渐渐联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可怕状态，不由得寒而不栗，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卢跃刚愤怒地要抗拒和声讨的是什么东西。卡夫卡以曲折和象片的手法描述的情形，在这里突然被卢跃刚以清晰、真实、直接的方式叙述了出来。它的力量似乎更强烈，因为它背靠的是“真实”！读完最后一段，我立即给他拨去了电话。这一次是我有些语无伦次了——我们似乎还不善于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当面进行赞扬——我向他表示祝贺，我说我刚刚读完了一篇极其优秀的文字，我说我等着看续篇……等等，我想他也陌生于这种赞扬方式，在电话那头他似乎也有些发懵，忘了他简短地应答了些什么。我在放下电话后才意识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中间一直缺少着一种交往方式，那就是“赞扬”！由衷的赞扬。一是我们可供赞扬的东西仍然太少；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我们应该也可以开始期待从我们自己手中，从朋友们手中出现真正优秀的作品了。

我有话要说

卢跃刚

当我在《中国》一九八六年那本悲壮的“终刊号”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潮地》时,我还根本没有想过要写报告文学。那时,我把自已关在北京西便门一间平房里,冬天奇冷,夏天酷热,趴在那张破桌子上与心灵对话。那间破房子里洋溢着我自由自在的梦想。只有我一个人。我与我的心灵对话。以至我无法预料第二天迎接我的将是什么。是一阵春雨后的杂草疯长一片荒芜,还是和风煦煦阳光灿烂;是那根部紧紧扎入旧城墙砖缝中顽强生长的榆树枝枯叶黄,还是残垣断壁上浅薄的白雪被西北风横扫……我忘记了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生存空间的险峻和狭窄,心灵空间的无限宽阔和自由,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界定了我的社会角色。我只能是一只蝙蝠,装着一脑袋的奇思怪想,装着一脑袋的欲望和迷狂,在语言的漫漫长夜中寻觅。在某种意义上,我只面对我自己,我只面对审美的人生,我的全部智慧和才华只用于编织精美的语言花环。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偶然的因素,把我推到了中国现实的最前沿。部队转业后不久,就在发表《潮地》的当月,我调进了《中国青年报》。这是一家非常有趣和充满了魅力的报社。数十年来,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复刊以来,这里聚集了一批中国新闻界的精英,可以说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大本营,曾经影响了两代中国人。有理想,有抱负,立志于新闻界有重大作为的年轻人,都向往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机会大门朝每个有能力的人敞

开着,因为这里是诞生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这里生机勃勃,充满了朝气,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的观念淡薄,在我的社会经验中,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并深深地鼓舞着我。可我还是迷恋小说,写完了“川西北农村系列”小说的第二篇《雾域》,又开始写第三篇《雨族》。但我的职业要求已经不允许我那么从容不迫地来构造我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了。写小说如同走钢丝,这一头是冲动和激情,另一头是绝对的平心静气和语言自恋,如此这般地保持着一种张力。他总是用一种梦幻的眼神若即若离地审视着人生,审视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变迁,并与之保持着一段距离。他的偏执,他的怪诞,他的不确定性,他永远的恋爱状态,构成了小说的魅力。而这些都与新闻报道与报告文学与严酷的社会现实的距离。我不可能平心静气。我必须建立另外一套思维系统方能直抒胸臆。我必须与小说暂时告别了。我别无选择。我被中国的现实生活,被职业要求和职业困惑压迫到了一个死角。

一九八八年元旦,我只身下安徽芜湖,探察著名的“傻子瓜子”欺诈消费者,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并揭开了导致这种后果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只身到辽宁本溪,看到一位著名的改革家、当年的“中国第五号新闻人物”如何在“改革”的旗帜下享有特权,藐视法律;一九九一年华东大水灾,我由长江流域而淮河流域,目睹了行蓄洪区数百万灾民在水深火热中奔走呼号,而不少新闻却把一场天灾人祸描绘成了一幅高唱着共产主义凯歌的“战洪团”……如何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深刻矛盾利用成了改善某种关系的政治机会;一九九二年一月,我顺长江而下,去感知三峡工程半个多世纪论证的拍岸惊涛,主上派和反对派,多少英雄豪杰,历史沧桑,可歌可泣;一九九三年三月,我闻讯去湖南娄底市,一位人民代表被非法拘禁二百一十四天……我不能不呼唤民主与法制,不能不对现行的

某些缺席提出质询,不能不对宪法保证下的公民权利提出疑问……所有这些,见报却较困难,即使见报,许多重要的事实、背景、原因也大多被淡化、掩藏了。咽喉被一股力量强有力地扼住了。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说!直截了当地说!于是,我拿起了报告文学这柄剑。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一个职业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悲哀的选择。我感到,小说在这个时刻,突然变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时,更需要清晰明快的事实陈述,更需要刀刀见血的逻辑力量,更需要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我只能把小说珍藏起来,先把堵在喉咙里的话说完,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说完。

“文学”与“报告”联姻,而且经久不衰,真是一种奇迹。究其原因,有一条,就是它们都揭示人类社会的真相和本质,都朝着“真实”顶礼膜拜。但是我敢说,报告文学的兴盛和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崛起的代价,是中国新闻界一批名记者的消失或“死亡”。这是一种体制性的归宿,一种让人心碎肠断的归宿。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